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4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zhejiao.com>

读书人·新系列
新视野·新体验·新潮流

帝国

金钱游戏

经济杀手的隐秘世界和全球腐败

(美) 史蒂文·希亚特 主编

王少国 杨永恒 译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

是谁主宰着全球金融的兴衰？是谁布下了重重金钱骗局？又是谁制定了这场残酷游戏的潜规则？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帝国金钱游戏

A GAME AS OLD AS EMPIRE 经济杀手的隐秘世界和全球腐败

(美) 史蒂文·希亚特 主编
王少国 杨永恒 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金钱游戏 / (美) 希亚特主编; 王少国, 杨永恒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170-639-3

I. 帝… II. ①希…②王…③杨… III. 国际经济关系—经济斗争—研究
IV. F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2729 号

A Game As Old As Empire: The Secret World of Economic Hit Men and the Web of Global Corruption
By Steven Hiatt and John Perkins

Copyright © 2007 b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Copyright licensed b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in conjunction
with Beijing Reader's Cultural & Art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授权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4577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 划 王冬军

责任编辑 宗 边 王冬军

版式设计 李子奇

封面设计 古 手

编 务 张新苓

印 制 寇斯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ina.com

编 辑 部 (010) 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 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 × 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2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010) 66572159

目录

引言

来自经济杀手们的新自白与新揭露

/001

经济杀手服务于一小撮社会掌权者，无论谁赢得正式选举，这些人的影响都是无所不在的。他们的目标是更多的利润和权力，即帝国的维持和扩张。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约翰·珀金斯讲述了自己服务于帝国、压迫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的经历。这里珀金斯将他的经历同本书中其他经济杀手讲述的自白和揭露结合了起来，进一步揭露全球化的黑暗一面。

第一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

/013

第三世界国家一年所偿付的债务利息在 3750 亿美元以上，是它们所收到国外援助数目的 20 倍。这个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即南方贫穷国家补贴北方富裕国家，尽管南方国家中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这样一个不公平的体系是如何维持的呢？史蒂文·希亚特讲述了在金融、政治和军事方面维持了上述体系的控制之网，解释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逃离这张网是如此困难。

第二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

/031

石油价格上涨造成了国际银行的石油美元存款供过于求，并急需年轻银行家们把这笔钱变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贷款，用于资助那些可疑的项目。S·C·格温代表美国银行的利益走遍了全球，帮助诱捕第三世界的债务国。

第三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

/041

每年至少有 5000 亿美元的脏钱经由西方银行从贫困国家流向离岸区的账户，这还不算那些国家以对外援助方式接收的



第4章

资金。这些资金来源于逃税、回扣、资金外逃以及洗钱和毒品交易。约翰·克瑞斯滕森是一位离岸区银行的职员，他发现自己正在管理着这些秘密账户。他揭示了这些离岸银行体系是如何尽最大可能榨取那些国家的钱财的，并解释了为何这种黑暗的经济体会对国际公司精英们变得至关重要。

BCCI 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 /069

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对很多位高权重的客户来说是很重要的工具。这些客户包括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麦德林垄断集团到基地组织的奥萨马·本·拉登以及炙手可热的共和党人。当 BCCI 最后被关停时，损失或被窃走的资金达 150 亿美元之巨——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欺诈。露西·科米萨揭露了为何银行业官员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对此顾左右而言他以及 BCCI 在华盛顿为时已久的同盟者是如何阻挠任何有意义的调查的。

第5章

廉价手机的人力成本 /095

在过去的 10 年里，刚果的内战夺走了 400 万人的生命，这皆由民兵和军阀争夺该国的资源而起。这些暴行至少间接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公司的资助。它们仅将刚果看作廉价的钶钽铁矿的来源地——此矿石对生产某些电子产品必不可少——还有其他一些矿产的来源地。凯瑟琳·克恩探究了刚果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与西方国家公民以低价购买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之间的直接联系。

第6章

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 /115

预计到 2015 年，美国 30% 的石油将会来自非洲，跨国公司越来越诉诸于利用私人军队来保护它们在非洲的运转。尼日尔三角洲的各个集团都在尽可能地争夺从它们脚下抽出来的石油份额。2006 年，奈杰尔·沃森-克拉克是石油开采网络前线上的雇佣兵，他作为尼日利亚壳牌的保安人员，保护着海上石油钻探设备。他在遭当地武装袭击之后被抓为人



质，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置于了尼日利亚石油冲突之中。

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 /135

当伊拉克人民为结束未来政治上的混乱和暴力而斗争时，他们最宝贵的经济资产——石油，却正把他们拒之门外。强加在伊拉克身上的石油产品共享协定会造成该国上千亿美元的收入损失，这还不算外国公司的巨额利润。格列格·穆特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专门提供经济杀手的西方基金会——国际税收和投资中心（ITIC）。

第8章

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 /161

世界银行已为第三世界国家几十年间的发展推出了债务为本的发展战略。数百亿贷款理应带来进步，计划也决不应该辜负对它们的承诺。恰恰相反，执政精英聚敛财富，而穷人肩负还贷的负担。世界银行前幕僚史蒂夫·贝尔克曼以内部调查人的身份说明了这些计划是如何把发展中国家的钱财转移到腐败精英和他们在第一世界的伙伴口袋里的。

第9章

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 /179

“发展”和“现代化”成了美国努力扶植马科斯政权的口号，而世界银行则成为了为马科斯政权筹措资金的渠道。大约800份来自世界银行的泄密文件告诉我们银行如何负担戒严经费以及如何基于跨国公司使菲律宾成为其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试金石，这对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第10章

出口灾难 /203

出口信用机构于不经意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仅2004年就资助了7880亿美元的贸易。由于缺乏透明措施和政府管制，出口信用机构唯一的使命是：促进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在做到这一点的过程中，它们变成了经济杀手游戏中最肮脏的玩家。它们资助一些国家建设核



电厂，而这些国家根本没有能力管理这些电厂。它们还资助对饱受战争折磨的地区大规模出售武器。所有交易的获利，几乎都少不了进行贿赂，甚至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贿赂。布鲁斯·里奇仔细审视了出口信用机构的隐秘世界，并揭露了它们对全世界造成的危害。

第 11 章

债务减免的幻觉

/225

G8（八国集团）的领导者们自豪地宣布，对拉美和非洲的高负债贫穷国家提供 400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这个数目不过是这些国家所欠 3.2 万亿美元债务的 1% 多一点，而真正实施的债务减免不过是这小小数目的一小部分，而且减免的附加条件使得这些减免几乎毫无价值。这些附加条件带来的结果有：医院和学校的关闭，当地商业的破产，还有高失业率。詹姆斯·S·亨利对这些进行了分析，并列出了一些步骤，以推进一个对第三世界债务国家真正有效的减免运动。

第 12 章

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

/271

对这个全球剥削体系，你该如何与之斗争，使其改变呢？安东尼娅·尤哈斯为我们指出如何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以及在全球正义运动中创造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力量。全球正义运动的活动指南指明了方向，赋予我们以力量，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希望，使我们也能够将帝国的控制之网摧毁。

作者简介

/291

致谢

/297

附录：希望之源

/299

约翰·珀金斯结合自身经历，揭露了全球化背后推动霸权的力量。

引言

来自经济杀手们的 新自白与新揭露

约翰·珀金斯

经济杀手（EHM）是收入颇高的专业人士，他们从全球各国骗走了数万亿美元。他们从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和其他对外援助机构那儿挪走资金，放入大型跨国公司的保险箱和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少数家族的口袋中。他们使用的工具有虚假金融报告、非法操纵选举、贿赂、勒索、美人计和暗杀。他们玩的是一场与帝国同生的古老游戏，但在全球化时期却以新的面目和可怖的情形再现。

我应该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杀手。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以下简称《自白》）一书中，我以上述开头段落描述我自己的职业。自从2004年11月初这本书出版以来，我经常听到电视、广播主持人在将我介绍给观众时读到这段话。经济杀手的真相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感到震惊。许多人告诉我，那本书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负责任地采取行动，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自白》所唤起的公众注意出乎人的意料。当时，我曾花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试图将《自白》出版。在我拿定主意之后，我想出版的意愿就变得非常强烈。



到2003年末，许多出版商都浏览过手稿，但都拒绝出版。最后，我几乎要绝望了，以为不会看到这本书出版了。前后共遭到25家出版商拒绝，尽管他们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称其为“吸引人的”、“资料翔实的”、“一个重要的揭露”和“一个必须有人来讲述的故事”。我和我的作品经纪人认为也许这本书“反金权政体”（Anti-corporatocracy）的导向太强了（“反金权政体”一词是在那本书里初次介绍给广大读者的，“金权政体”是指那些掌管着全球最大公司、强权政府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的全球帝国的权力集团）。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主要出版商要么被“金权政体”的权要所胁迫，要么对他们深怀感激，因而不可能出版这本书。

最终，一家有勇气的独立出版商——贝雷特-克勒（Berrett-Koehler），接下了这本书的“出版任务”。《自白》在公众间的受欢迎度令我十分吃惊。上架一周时间，该书在亚马逊网站的销量就排到第4位。此后很多周，该书出现在每一份主要畅销书名单内。在不到14个月的时间内，该书被翻译成20种语言出版。一家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公司购买了这本书的电影版权，企鹅出版集团/普鲁姆公司（Penguin/Plume）购买了该书的平装本版权。

尽管有了上述种种成功，但一个重要元素一直缺失。因为经济杀手、“金权政体”和现在已出现在大学课程提纲中的“走狗”（jackal）等词汇，美国主流媒体拒绝评论《自白》或和《自白》所揭露的事实。《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不得不将其列入畅销书名单中——毕竟数字不会撒谎（除非经济杀手们制造虚假数据，就像你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的）——但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头15个月内，大部分报纸顽固地拒绝对其进行评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的代理人、我的作品宣传人、贝雷特-克勒和企鹅/普鲁姆公司中最有思想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还有我，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但我们知道几个全国知名记者曾犹豫着，想对这本书写点什么或说点什么。他们曾和我进行过深入的电话交谈，也曾让制作人邀请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饭，但最后他们都退缩了。一家大型电视网曾邀请我参加西海岸谈话旅行节目，于是我飞越全境来到纽约，并精心打扮准备参加节目。但当我在门口等该电视网的豪华轿车时，一位职员来告诉我节目取



消了。媒体的辩护人随即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能证明其他经济杀手的存在吗？”“有其他人写过类似的著作吗？”“在上层人士中间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揭露吗？”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

这些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当然都是“是”。本书中描述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由其他作者深入讨论——通常是多位作者。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的阴谋；大石油公司的傀儡——伊朗国王，重新执政时所做的种种残暴事件；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洗钱事件；厄瓜多尔总统杰米·罗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奥马尔·图勒何的惨遭暗杀；亚马逊河上，石油公司和传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辩解；柏克德（Bechtel）、哈利伯顿（Halliburton）和其他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持者在国际上的行为；美国单方面无故入侵巴拿马，逮捕了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推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政变——书中的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事件都有公开记录。

几位学者曾指责我的以下观点，认为那是激进分子的谴责。这些观点是：为达到政治目标，经济预测被操纵和扭曲（违背了经济的客观性）；外国援助不过是获得大笔生意的工具，而不是缓解贫困的无私手段。然而，上述两方面是同经济健康发展和真正的利他主义相违背的。许多人提供的文件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中写道：

“为了使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看起来有效，为了使数据和项目相符合，经济预测必须加以修改。许多人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和普通的预测有何不同。在这些例子中，对GDP的预测并不是基于精密的统计模型，也不是基于精通经济人士的最佳估计，而只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需要加以确定……^①

就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全球化以国际金融势力的新式专政取代了许多国家国内权要者的旧式专政……对数百万民众来说，并未从全球化受益……这些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被摧毁，生活变得更不安全。”^②



我在为第一本书——2004 年末和 2005 年初的精装本——出版奔波期间，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不时听到观众提出“这代表了主流舆论的观点吗？”这样的问题。但当 2006 年初书的平装本发行时，这类问题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读者已经成熟了很多。人们日渐怀疑主流媒体和“金权政体”是一伙的，显然许多主流媒体为“金权政体”所拥有或至少通过广告接受其资助。尽管我很乐意将公众态度的这种转变归功于《自白》，但我的这本书不得不和许多其他作者的著作一起分享这份荣耀，如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戴维·克顿的《当公司统治世界》、诺阿姆·乔姆斯基的《霸权和生存》、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杰夫·福克斯的《全球阶级斗争》、安东尼娅·尤哈斯的《布什议程》；还有一些电影，如《不朽的园丁》、《辛瑞那》、《卢旺达饭店》、《晚安，好运》和《慕尼黑》。美国公众最近无疑享受了一顿揭露全球化的盛宴，而我的书自然也不再是旷野中的孤独呼声。

尽管数不清的证据表明：“金权政体”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造成全球数百万民众陷入贫穷和痛苦的深渊，任意践踏自主、公正和自由这些构成美国基础的信条，并将美国这个二战结束时被誉为民主骑士的国家，转变为令人害怕、憎恨和厌恶的国家，但主流媒体忽略了这些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为取悦富人和位居高位的执政者，许多记者转身从真相面前走开。当我的作品宣传人联系他们时，这些记者只是不断地问：“你说的这些事发生在哪里？”“你能证实这些事真的存在吗？”“有其他客观的研究者确认你的故事吗？”

虽然证据已经唾手可得，贝雷特-克勒和我还是认为适当的反应是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这种方式使人们必须正视事实，且仅有那些持续坚持否定真相的人才会有所争议。我们决定和许多合作者一起再出一本书，一本进一步揭露经济杀手的世界和它的运行方式的书。

在《自白》中，我讲述了一个植根于冷战的世界，处处反应了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冲突。我对那场战争的叙述结束于 25 年之前的 1981 年。自那时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帝国运转的动力已经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和欧洲的崛起，并和美国展开竞争，现在的世界显得更加多极化，更加



以金钱为目的。帝国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这些公司的利益超越了某一特定国家主体的利益。^③伴随这些，出现了新的多国机构和贸易协定，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新的清晰的意识形态陈述和计划，如新自由主义和结构调整计划，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施加的种种附加条件。但是有一件事始终没变：第三世界的人民继续在受苦；他们的未来，如果有未来的话，看起来也比20世纪80年代早期更黯淡。

25年之前，我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经济杀手在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利益服务，即争取在冷战中控制发展中国家。今天，这场经济杀手的游戏更加复杂，其中的腐败也更加普遍，而其运行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来说也更加重要。经济杀手也出现了许多新类型，扮演的角色也更加多样化。对经济杀手们来说，令人尊敬的外表仍然是关键因素。从官员们所采取的精心挑选的洗钱和逃税活动到可算为经济战争罪犯和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成了经济杀手们加以利用的手段。后面各章将揭露全球化的另外一面，揭示依赖欺骗、扭曲和暴力来维持的经济体系：一位离岸银行^④的官员藏匿数亿美元窃取来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们大量削减加纳教育和健康项目的经费；保护欧洲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利益的商人集团；重写伊拉克石油法的咨询师以及资助军阀来确保刚果锡矿石供给的管理人员。

汇编这些文章的主要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经济杀手都认为谈论他们的工作，不是一件对他们有利的事。许多人仍在积极从事这些工作，而那些已经退出的人通常都收到了退休金、咨询费和他们的前雇主支付的其他费用。他们知道多嘴的人 would 失去这些好处，而且有时候失去的会更多。在做这类工作中的人中，大多数认为对以前的工作伙伴保持忠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一旦我们中有人决定迈出这艰难的一步——用中情局的话说，就是“迈入冰冷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将不得不艰难面对现实中处处保护跨国公司权力机构的强大力量、全球银行、政府的保卫和安全部门、国际机构以及对所有这些进行操纵的少数权要们。

近些年，那些被指责欺骗民众的家伙变得更加狡猾了。“五角大楼文件”和白宫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使他们意识到写下和录下具体情节的危险，



因为别人可能会得到这些材料并进行指控。安然（Enron）、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和世通公司（Worldcom）的丑闻和最近对中情局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天才表演”的辩解以及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事件，所有这些服务于进一步掩盖真相的方针。政府官员曝光了一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以报复她揭发政府制造虚假情报而未受惩罚的丈夫。所有这些事情对讲真话形成了终极威慑：那些揭露金权政体的人可能会遭到暗杀——如果不是用子弹，也会在经济和名声上遭到封杀。

不那么明显的威慑也会阻止人们讲真话。自我告白，打开自己的灵魂深处让公众审视，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自白》之前，我写了许多书，其中有5本得以出版。但这些书的写作并未使我准备好去面对揭露自己作为一个经济杀手的事实时所产生的焦虑。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不愿将自己视为腐败的、软弱的或不道德的，但当我们描述作为经济杀手的生活时，几乎很难忽略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就个人而言，写作这本书是我曾遇到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在接触写作一本类似此书的合作者时，我将告诉他们在终点时自白是值得付出这些痛苦的。但是，对一些准备沿这条路前进的人来说，终点看上去是如此遥远。

我和勇敢的贝雷特-克勒公司的建立者和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皮耶尔桑蒂，讨论了这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后的潜在利益。做出版《自白》这本书的决定的，正是史蒂夫·皮耶尔桑蒂。我们谈了没多久，就认为好处可观，完全值得付出这些努力。如果我的自白可以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反应，那么我们可以期望多个人的自白或有关需要自白的人的经历将会感召更多人，鼓励他们采取行动，将这个帝国重新变成它本该成为的民主共和国。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劝服美国公众，使他们相信我们能够也必须创建一个未来，让我们的子孙以及每一块大陆上的他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感到骄傲。

当然，首先我们要从向新闻记者们展示事实开始。我们决定应当收入一些精心研究的分析，这些分析是由持更客观态度的观察者做出的，而不致仅包含个人观点。在 firsthand 资料和第三方陈述之间取得平衡，这看起来是一个谨慎的办法。



史蒂夫亲自寻找既可以担当编辑一职，又能像侦探一样行动的人。这个人必须找出期望中的作者，劝说他们，以对国家、家庭和每一片大陆上子孙后代的忠诚请求他们参与这本书的写作。经过漫长的挑选过程，史蒂夫、他的职员和我都选定了史蒂文·希亚特。史蒂文是一位职业编辑，但也有一个作为激进主义者的长期记录，从抗议越南战争开始，到后来成为一家教师联盟的组织者。此外，他在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过很多年，该组织是一个智囊团，一个为遍布世界的跨国公司和政府机关提供服务的咨询机构；而且和贝克特尔公司、美国银行和经济杀手世界中的其他玩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那里他主要是制作研究报告，他把那些报告的描述为实质上是“金权政体在自言自语”。

文集编撰工作一开始，我就着手对其进行宣传。当人们问到下述问题——“你能证明其他经济杀手的存在吗？”“有其他人写过这些事情吗？”“其他人做过类似的揭露吗？”——我就告诉他们这本即将出现的书。出版文集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定，这一点在2006年2月19日得到了证实。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周末商业版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讨论《自白》一书的重要文章。我相信，编者对背后的确认结果感到满意，证实了我对自己生活的陈述和《自白》中所描述的情节。但是，我也认为，其他经济杀手和研究者参与写作本书，是他们决定刊登那篇文章的最重要因素。

本书的撰稿者们揭露了发生在许多国家的事情，所有的经济杀手游戏也在种种伪装下计划着。每一件事都向人们展示了帝国的形成过程，虽然帝国和美国自由、平等的原则相违背。各章节的顺序按照全球帝国中金钱和权力的流动过程排列。下页的图展示了这个过程：将贷款出售给第三世界国家，通过隐秘的离岸银行账户再将黑钱流回第一世界，债务主导的发展模型在减少贫困方面的失败，高额未偿付债务的积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确保得到资源的军事干预。史蒂文·希亚特在“全球帝国”中给出了控制之网的一个概述，控制之网是第一世界公司和机构用来统治全球经济的，随后每一章揭露了一个侧面。现简短概述如下：



全球帝国之北方和南方

金钱和权力的流动

数十年来，北方国家在兜售基于债务的发展模式。第一世界的贷款人推动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而腐败的第三世界掌权者们又不断地攫取这些贷款，结果便是南方国家高达 3.2 万亿美元的债务陷阱，而同时又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国家发展。许多贷款简单地流回第一世界的贷款者处或离岸银行天堂。同时，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开始了，其表现是通过干预别国政治以确保对石油等稀缺资源的控制。

北半球

G8(八国集团)·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1. 金钱的流动

S·C·格温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

故设的债务陷阱

约翰·克瑞斯滕森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

露西·科米萨

BCCI 的两面派手法：

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

4. 债务陷阱

詹姆斯·S·亨利

债务减免的幻觉

2. 债务主导的发展

史蒂夫·贝尔克曼

世界银行和 1000 亿美元问题

埃伦·奥古斯丁

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

布鲁斯·里奇

出口灾难

3. 投资和控制：资源的获得

凯瑟琳·克恩

廉价手机的人力成本

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

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

格列格·穆特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

经济杀手在行动

南半球

欠发达国家



● S·C· 格温参加了克里夫兰信托机构，随后很快接触到了国际银行业的随意氛围，在那里他了解到支付能力和发放贷款是没有关系的。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中，他描述了商业腐败文化。地方权要和国际银行业在这种文化中，建立了基于债务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些债务最终是由普通民众来偿付的。

● 约翰·克瑞斯滕森在泽西岛离岸银行业天堂中一家信托公司工作，泽西是英国海峡群岛之一。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处于经济杀手世界的中心，这里是全球离岸银行业的一部分，离岸银行业主要是便利逃税、洗钱和资本外逃。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他揭露了盗钱体系的运作，该体系从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公民那里盗取了数亿资财；叙述了富足生活方式的诱惑以及为什么他决定退出。

● 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BCCI）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离岸（地下）银行业的关键玩家。它为各种各样的客户提供非法交易，从中情局到麦德林卡特尔（Medellín Cartel），再到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露西·科米萨叙述了该银行的快速沉浮和它涉及130亿美元的破产事件。

● 刚果至今仍旧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并深陷内战漩涡中。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至少有400万人丧生。而西方的跨国公司为了确保得到黄金、钻石和锡、钶钽矿石，还在大力资助军方，推动内战。在“廉价手机的人力成本”中，凯瑟琳·克恩提供了一个见证，叙述了为了向第一世界消费者提供廉价的电子产品，刚果人民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约30%的石油供给希望能够从非洲得到，但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将和其他国家争夺获得这些石油储备的渠道。当地居民曾发起运动，要求参与分享这份新财富和阻止对他们地区环境的破坏。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中，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



特讲述了英国一个受雇工作在国外的雇佣兵如何发现自己处于这场石油和权力之争中心的经历。

● 据估计，伊拉克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因此获得伊拉克的石油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伊拉克临时政权正计划和美国、英国的石油公司签署石油生产分享协议，这份协议将耗去伊拉克人民2000亿美元，而他们现在正需要这笔钱去重建家园。在“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格列格·穆特揭露了这场高水平掠夺背后的经济杀手。

● “你带钱来了吗？”一位利比里亚的官员向世界银行职员史蒂夫·贝尔克曼问道，明显期望他递过来一包现金。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贝尔克曼提供了知情者的视角，解释当腐败官员们偷走本该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时，世界银行为什么视若不见。

● 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是世界银行以债务发展推进现代化模式中的佼佼者和典型代表。在“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中，埃伦·奥古斯丁讲述了美国如何利用数亿美元帮助马科斯维持其独裁统治的，其中世界银行扮演了中介角色。

● 出口信用机构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使贫穷国家更容易地买到本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这些公司发家致富。在“出口灾难”中，布鲁斯·里奇将聚光灯照到了出口信用机构的隐秘世界，并揭示了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它们的行为有：将核电厂出售给不能有效管理它们的国家；向饱受战争灾难的地区出售武器。

● G8（八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在格伦伊格尔斯会议前，宣布他们已达成协议，将给予18个第三世界国家40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詹姆斯·S·亨利（前国际银行家）表明了真正实施的债务减免是多么的少和为什么数十个国家仍然深陷西方世界的债务陷阱中。

请根据你的兴趣，随意阅读这些章节。跳着读，一次读一个地区发生



的事，或者某一个特定主题，这些都请随意。最后请读安东尼娅·尤哈斯的“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了解一下为抵制“金权政体”带来的全球控制，你都能做些什么。

阅读时，请用你思考和体会所描述的这些行为对世界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含义。请放任你的热情喷涌，觉得有义务采取行动。我们，你和我，这么做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家变回反映独立宣言中价值的国家以及反映我们成长中所尊敬和为之奋斗价值的国家。今天，我们必须开始重建“金权政体”所强加给我们的世界。

这本书提供了一系列经济杀手所使用工具的快照，这些工具被用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但是这些章节不过是公司精英们所做的许多穷凶极恶事件的引子，而且这些事件时常打着利他主义和进步的旗号。在二战后新的时期——经济杀手成功地将“民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变为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在对一些人实施残忍的、通常是极权主义的手段时，是毫不会退缩的，因为这些人拥有我们所觊觎的资源。

读完这些章节后，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全球人民害怕、痛恨甚至憎恶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作为“金权政体”政策的结果，平均每天有24000人死于饥饿；数万人，尤其是孩子，死于本可治疗的疾病，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医药费；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在许多地方这点钱根本不够支付基本的生活需求。本质上，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依靠人类农奴和奴隶剥削的现代版本。

我们必须结束这些。你和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孩子将不能继承一个稳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除非我们能够改变经济杀手们所创造的这些恶劣条件。我们所有人一定要问问自己的良心，再决定我们做什么才是最好。我们的优点在哪儿？我们的激情又是什么？

作为一名作家和演说家，我知道自己拥有一些技巧和许多机会。这些你的和我的也许不同，但它们同样有力。我催促你为你的生活设定一个基本目标，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所有其他的人。为实现这个目标，请每天至少做一件事，想想每天死于饥饿的24000人，然后以一生的时间投身于改变这个状况的事业中。报纸、杂志、地方和



全国的组织代表们、你的朋友、做或没有做着正确事情的生意人，请给他们写信或发邮件吧；参加电视节目；有意识地选择购物；不要购买那些推动了当代奴隶制形成的便宜商品；支持非盈利机构，因为它们帮助传递信息、保护环境、保卫民权、抵抗饥饿和疾病以及致力促成一个更健全的世界；做自愿者；去学校辅导孩子们；和你的邻居组成讨论小组——所有可能采取的行为是无止境的，只是看你自己想象力有多广了。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能力和激情去做贡献，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出去，行动起来。

说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不再是借口了，因为你现在有了这本书，而且许多其他的书，大量的电影、CD、VCD 正在帮助着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除此之外，每次你读、听、看一则关于国际事件的新闻报道时，请带着怀疑的眼光。请记住，这些媒体为“金权政体”所拥有，或至少受到其财务支持。请挖掘这些表面之下的真相。附录“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提供了一份媒体的名单，从那里你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这也许是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关键、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这个国家正建立许多关键且激动人心的事情上。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和我选择如何应对全球帝国，将很可能决定了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我们是否会沿着这条充满暴力和对他人剥削的道路继续前进呢？这决定了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很可能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或者我们将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们的后代会骄傲地继承这个世界。

这个选择是我们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纽约：Norton，2003），第232页。

②同上，第247～248页。

③“金权政体”作为国际的、相互联系的掌权者，更多的信息见杰夫·福克斯的《达沃斯派对》，《国家》（Nation），2006年1月26日。

④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关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离岸银行是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其业务只限于与其他境外银行单位或外国机构往来，而不允许在国内市场经营业务。

史蒂文·希亚特描述了一张维系今日全球帝国的控制之网，这张大网已经深入到了金融、政治和军事等多个领域。

第 1 章 全球帝国： 控制之网

史蒂文·希亚特

财富积累必须基于权利集聚之上。——汉纳

在宣称“赋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后，2003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向欢欣的西点军校学员宣布：“美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帝国。”与此同时，像尼尔·弗格森、查尔斯·克劳海默等新保守派学者却怂恿布什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通过确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并接受“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障眼法”这个事实，来完成美国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国的转变。^①这个二战后伴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所逐渐形成的新世界秩序——难道会在转了一圈后重新转向帝国时代吗？

由于《大西洋宪章》确定了民族自治权，这样1945年盟军的胜利似乎标志着世界殖民帝国的彻底覆灭。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国家目睹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军队1940~1941年的战争失败，知道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再也没有长期维持殖民统治的实力。另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美国长期致力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支持发展中国家谋取独立地位。



苏联自1917年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谴责帝国主义，它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对许多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欧洲的殖民力量却试图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它们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确实于1947年最终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地位，但在肯尼亚、塞浦路斯和马来半岛，英国在承认它们独立之前，都和当地义军进行过战斗。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为保留一点帝国的荣耀，打了一场失败的分裂之战。然而，明显有利于独立自主的历史大潮还是波及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社会当权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新兴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是否会自力更生，通过控制本国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工业？或者他们是否会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结盟？或者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否会为共产党执政铺平道路？

对欧洲人来说，失去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一个巨大打击，那样他们被二战削弱的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所以他们计划强迫殖民地替他们支付经济重建的成本。这时的美国也担心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会削弱其欧洲盟友，还可能导致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扩张，进而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的商业领袖们也担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会在二战后重现，所以积极保护其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场。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埃及的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正日益显现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转变。

1951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些工业之前是由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后更名为英国石油）控制的。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主义者，毫不奇怪摩萨台（《时代杂志》1951年的年度人物）会痛恨“伊朗石油利润的92%被AIOC获得”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曾是一个为时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对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后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的第二个任期，他决定在其附庸国过分自信的挑战面前，重建英国的实力和威望。丘吉尔命令封锁波斯湾，阻止伊朗向其他购买者出口石油，而且他还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伊朗贸易的联合行动，但没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这是由于朝鲜战争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



苏联对伊朗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英国需要采取更隐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计划了“阿贾克斯行动”。行动的第一步是制造政治混乱来削弱支持摩萨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报局不停地传播谣言，使伊朗坚定的民主党人同伊斯兰民主主义者决裂。最后，伊朗军方在1953年8月发动政变，逮捕了摩萨台，并任命了新一任总理。伊朗国王被重新赋予了权力，石油工业被解除国家化。但是美国的帮助不是免费的，英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几家美国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开采权。美国军方和对外政策领导人为计划的成功而喝彩，该计划以较低的代价从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恢复了伊朗的原有状况。

危地马拉提供了西方国家维持帝权利益的隐蔽策略的又一个实例。1952年5月，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该方案将把属于地主但未被开发的土地收归国有。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土顿联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点收归国有。总统的灵感来自亚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这个方案可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小农场主。但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水果董事会成员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CIA）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林肯式行为太激进了。克米特·罗斯福对艾伦·杜勒斯听取“节气行动”汇报时的反应做了如下描述：“他看上去异乎寻常的兴奋，眼睛闪着光，眼珠像巨猫那样咕噜着。很明显，他不仅在享受着所听到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在进行着盘算。”^②

后来，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大约15000名支持他的农民被杀。

在以隐蔽策略成功地干预了伊朗和危地马拉危机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展示了老式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56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是相当重要的国家资源，当时却掌握在欧洲投资者手中。纳赛尔希望利用运河的收益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纳赛尔的计划使几个“敌人”活跃起来：英国，前宗主国，此前一家英国公司经营着这条运河；法国，因为纳赛尔



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军，而法国自 1954 年起一直在和叛军作战；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义者算账。以色列于 1956 年 10 月 29 日入侵埃及。尽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国和英国仍迅速地占领了运河地区。这种直接军事干预的行为向联合国提出了挑战。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处理苏联干预匈牙利、罢免改革者伊姆雷·纳吉的事件，美国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机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方对苏伊士危机的干预方式，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冲突，这次美国的反应是创造性的，结果是英国被迫撤军，干预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表明旧殖民主义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加速，也使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此后，由于数十个新独立国家涌入联合国，美国不得不和苏联竞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 非殖民化 VS 冷战时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与拉美国家一样，都是初级产品生产者，这些产品包括：糖、咖啡、橡胶、锡、铜、香蕉、可可粉、茶、黄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许多农业初级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当地地主耕种的种植园生产的，许多初级矿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炼的。不论什么情况，产品都是在由欧美公司主导的市场出售，通常在纽约和伦敦交易，并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进行加工。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为国家发展而奋斗的时候，他们总是强调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困难。他们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受到欧美流行发展思想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广泛采取了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许多新领导者，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印度的尼赫鲁和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桑戈尔，都曾在欧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此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国内缺乏一个能够领导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开始其经济生活的。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专注于大项目即样板似的政府



发展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成为经济变革的发动机，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涉及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的生产力，以替代来自欧美的昂贵进口产品。但是建设这些工业化项目需要大量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于银行、出口信贷代理机构和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组织。

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们再一次遇到了难题：如何保住西方获得第三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独立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方面摆脱了对殖民地的管理责任以及维护秩序和发展的直接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国的所有权益。但是独立也带来了挑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成为本国经济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上地自主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其他的可能选择——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毕竟，帝国的权力并不是简单地从拉美进口石油和咖啡，或从非洲进口铜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些商品，这实际上是要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向其前宗主国提供固定补贴。无论是基于直接统治还是间接影响，帝国权力本身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大都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资源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选择也会成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描述的，1971 年克劳丁·马丁向约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选择那样，^③美国及其盟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世界霸权，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了数不尽的贷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减免债务并使用贷款引诱这些国家进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控制之网呢？这些个国家根据借款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像约翰·珀金斯这样的“经济杀手”所诱惑，愿意借款兴建宏大的项目，并认为这些项目将带来繁荣和现代化。向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资金还有助于赢得新第三世界权贵们的效忠，因为这些权贵们处于需要为他们的政治追随者、盟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荣耀的压力之下。这使腐败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种可能还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使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陷入与西方世界建



立的关系中，难以自拔，从而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结果使这些第三世界领导者放弃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走上一条可能不仅是更严峻，而且是更危险的发展道路。

▣ 债务繁荣到破灭：对第三世界的侵蚀

1973 年的赎罪日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了 1974 ~ 1976 年的滞胀危机，并标志着二战后繁荣的结束。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银行中，充满了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这数以十亿计的美元（1973 ~ 1981 年间约有 4500 亿美元）都堆积在银行账户中，其结果将会是吸干全球资金的流动性，加剧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衰退效应。该怎么办呢？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 20 世纪 30 年代瘫痪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而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石油美元作为借款重新流回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就借了 1000 亿美元，用来建设钢铁厂、大坝、高速公路、铁路线和核电站等一揽子项目。^④

S·C·格温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一文中写到，大量借钱给第三世界的繁荣景象于 1982 年 8 月急转直下。当时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随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宣布它们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随后则是一系列变相拖欠。为此，借贷双方采取了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宣称其目的是帮助债务国站稳脚跟。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与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第三世界的债务从 1973 年的 1300 亿美元涨到了 1982 年的 6120 亿美元，到 2006 年竟达到了 3.2 万亿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而转向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励企业竞争。北美之外，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转变的标准拥护者有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按照 IMF 的结构调整计划（SAP）运行，但是这些



经济杀手：隐藏于表面之下

那些为全球帝国霸权利益服务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正如约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职员中每人都有一个头衔——金融分析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能表明他们的真正身份——一个经济杀手。”伦敦银行设立了一个离岸分支机构，其员工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穿着打扮与你在城市中或华尔街见到的职员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每天的工作却是掩盖被盗用的资金，清洗贩毒的黑钱以及帮助跨国公司逃税。他们是经济杀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工作组来到某个非洲国家的首都，该工作组拥有增加必要贷款的权力，但非洲国家获得这些贷款的条件是削减教育经费，开放本国经济，允许北美和欧洲的出口商向本国倾销商品。这种工作组也是经济杀手。一个咨询师在巴格达由美军保护的“自由区”里开了一家店铺，他重写了开采伊拉克石油储备的法律，他也是一个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采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实上有些行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机构执行的；有些则处于灰色区域中；还有些却违反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由于受惠者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行为提出质疑。一个植根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精英分子集团，伙同第三世界的客户们努力按他们的意愿安排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们关注的是美元，人并不重要，地球上数十亿的普通民众就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国家几乎不能完成 IMF 所要求的改革，或许正因如此，它们尚未重获金融健康和经济独立。

■ 控制之网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一年偿还的债务要多于 3750 亿美元，这是第三世界得到国外年援助金额的 20 倍。这样的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尽管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费低于 2 美元，^⑤南半球的国家仍要补贴富裕的北半球国家。

这样一个失败的体系是如何维持运行的呢？



帝国金钱游戏

A Game As Old As Empire

控制之网

从南半球勒索来的“礼物”

第三世界国家获取的国外援助、投资和发展贷款远远比不上因贷款服务、被指定购买特定进口商品和服务、黑金和资本外逃而流出的资金数量。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从贫穷国家流向第一世界的资金至少有 5 万亿美元，相当一部分流到了离岸银行账户中。与此同时，IMF 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扼杀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

北半球

G8·跨国公司·世界银行·IMF

流向不发达国家的资金

- 浮动项目的贷款
- 结构调整贷款
- 发展贷款
- 武器援助
- 出口信贷代理机构的融资
- 离岸生产

流回第一世界的资金

- 合约，贷款偿还
- 暗箱投标
- 外逃资本
- 存入离岸账户中的酬金
- 被操控的商品市场
- 离岸账户中盗用的资金
- 武器合约
- 指定的服务和供应商
- 逃税（洗钱）
- 错定价格的转让

援助、贷款和投资条件

- 资源开采的让步
- 单方面的生产分享协议
- 与当地掌权者的伙伴关系
- 单向削减关税
- 建设不必要的军事和安全力量
- 有利于私人公司项目的公共投资

实施

- 操纵选举
- 贿赂
- 军事和安全势力的渗透
- 操控当地货币和利率
- 操纵当地的种族冲突
- 暗杀不合作的领导者
- 利用当地的军事和安全势力
- 军事干预

南半球

欠发达国家



简单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均陷入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网中，而且极难逃脱。自约翰·珀金斯第一次为美因顾问公司（Main）设计预测以来，控制之网已经变得愈加宽泛、复杂和无所不在了。上页图描述了控制之网中货币与权力的流动。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发达国家，但这种流动，正如约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债务束缚，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经济。本章其余部分将概述自由贸易计划、IMF 和世界银行所奉行的债务主导型经济发展，阐明腐败和剥削如何成为权力控制体系的中心，并探索第一世界可能采用的实施措施。

▣ 市场：富人的补贴与穷人的自由贸易

如果全球帝国有一个口号的话，那一定是自由贸易。作为援助的代价，IMF 和世界银行在它们的结构调整计划中，坚持要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包括：关税、出口补贴、外汇管制和出口替代项目。而它们赞同的发展模式集中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用贷款发展新的出口工业。例如，引导轻工业进行出口加工（像耐克这样的公司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贸易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 19 世纪 50 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

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下进行的。格兰特总统在 19 世纪 70 年代谈道：“200 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战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当属“东亚四虎”：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



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小组如果在 1958 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政策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丰田公司没有这样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总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第三世界国家采用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⑥

“自由贸易”一词让人们想起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而非事实，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也不会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 在 2002 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结果使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农民的生计被毁于一旦。IMF 的经济杀手们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⑦

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 140 家企业的本土产业，却因 IMF 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 140 家企业中的 132 家破产。^⑧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要致力于自由贸易，而第一世界的国家却通过出口信贷来补贴出口者，而这通常会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布鲁斯·里奇在“出口灾难”一文中对此做出了解释。

上述行为还会产生其他的负面效果——保守主义者所乐于引用的一个著名的“意外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IMF 在秘鲁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大幅削减玉米关税，结果美国的玉米蜂拥而至。美国对其农民的补贴一年大约 400 亿美元。许多秘鲁农民竞争不过进口玉米，只好改种可生产可卡因的古柯。^⑨

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从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价格都在持续下跌，而且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跌得更多。例



如，1975 年一辆拖拉机等值于 8 吨非洲咖啡，但到 1990 年，这个数量变成了 40 吨。^⑩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资本，市场狭小，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们很难转向去生产更复杂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实上，许多 IMF 的项目要求大幅削减健康和教育开支，这使得这些国家更难提高其劳动力的质量和能力。这些国家通常劳动力文化水平很低，几乎不懂技术。在一些国家，如加纳，由于 IMF 强制的预算削减，儿童入学率在不断下降。^⑪

■ 垄断：不公平的竞技场

尽管第一世界的精英们一再鼓吹自由市场的魅力，但为了主宰和操控市场，他们使用了非市场力量来确保控制力。他们坚持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协议（TRIPS），这个协议是他们在 1994 年乌拉圭贸易回合谈判时，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通过的。TRIPS 允许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垄断，这样就将第三世界的生产商拒之于获利市场之外（而使他们陷于商品生产的境地）。

为达到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美国坚持将基因物品，包括种子、人类细胞和微生物等，界定为可申请专利的物质成分，这样它就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权。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 TRIPS 条款，通过开采南方国家的本地动植物基因资源，并申请专利，从而获得生产与销售的垄断权。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生物盗版。^⑫一个尤其无赖的事例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Rice Tec 公司申请并获得了一项一种印度的大米专利，声称其开发了新的大米基因种类，实际上这种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民经过几个世纪精心培育出来的。

■ 债务：向公司商店出售灵魂

债务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赖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生存，已经谈不上真正的发展了。它们被迫重构经济、重写



法律，以满足 IMF 结构调整计划 and 世界银行制约条款所开出的条件。它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控制世界储备货币，也不能做到长时间的人不敷出还能避免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作者道格·亨伍德写道：

“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将会立即成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国家。我们的支出远远超过收入；我们有巨大的外债，且还在持续增加；我们有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备有所行动的政府。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IMF 将来到美国的门前，告诉我们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贸易账户平衡，要少消费、多投资。但由于我们是美国，这类事情从未发生过。如果那些措施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剂良药，那为什么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⑬

■ 腐败、债务及其内幕

腐败通常伴随着权力，作为一种利益和控制机制，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源泉那儿吸引过来。腐败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扎伊尔的蒙博托，他贪污了至少一半的对扎伊尔援助资金。^⑭他当然喜欢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额外的收益，但这些债务是靠他国家的人民来偿还的。同时 IMF 和世界银行也乐于继续贷款给扎伊尔，尽管它们自己的调查员警告说这些钱将会被贪污。也许在冷战期间蒙博托支持美国实行的非洲政策对他能够持续获得贷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贷款仍能够稳定地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银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贝尔克曼在“世界银行和 1000 亿美元问题”中，向我们展示了内部调查者关于发展基金是如何转移到贪污者的口袋里的说明。

这种“债务和资本的循环”已经引起了许多借贷委员会的广泛兴趣：Sag Harbor 集团估计“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债务者借去的资金将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个月这些贷款就会回来。”^⑮约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账户如何通过泽西岛



和开曼群岛等一些没有管制的离岸银行业的避风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们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

同样的，离岸机构能够帮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权要们藏匿他们从逃税中获得的利润，却让普通市民来承担这些账单。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在卢森堡大公国的银行保密法下，把离岸银行业的投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银行诈骗案中，大约有 3 亿美元被盗。露西·科米萨在“BCCI 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监管机构看到了另一条路：BCCI 调整银行业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球员”——从中央情报局和在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士到麦德林贩毒集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IMF 推出的民营化项目为那些受贿者提供了发财机会。按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那些领导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进瑞士银行的账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变大了。”当他们意识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反对变卖国有工业的声音都沉默了。”^⑥

■ 实施者：胡萝卜加大棒

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议程呢？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国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如果他们对于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没有反应，经济杀手们还有各种方法让他们顺从，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种对征服者和当地统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对于不听话的领导者们，颠覆其政权是控制他们的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强国国家将其作为一个基点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军事、商业、学术、外贸关系。在几次沉默的会议并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资金后，一个不太愿意合作的国家会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压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会反戈相向，而政治对立者讨伐的声音则更加尖锐，媒体也提升了警告调门。压力的增大



使经济学家调高了对爆发商业危机的预期：资金从本国转移到迈阿密、伦敦和苏黎世，投资将下降，失业将增加。如果政府意识到这其中的信息，改变了态度，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资金开始回流，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立刻变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过这场危机，最好这样做，不然的话，更加激进的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暗杀领导人到军事政变都会发生。

委内瑞拉的政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万美元给几个企业、媒体和劳工组织，资助它们发动反对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例如，NED支付了5.5万美元给莱昂纳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变领导者成功地帮助佩德罗·卡莫纳（一个亲美商人）掌握政权，莱昂纳多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⑩

私人或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同样有用。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对尼日利亚的石油越来越有兴趣。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一章中，他们揭示了一个猎豹计划：那些石油的代理商们在使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远离当地居民。

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越线。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在那里帮助领导中情局的活动。^⑪凯瑟琳·克恩在“廉价手机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卢旺达和刚果的种族分裂，抢占钶矿和其他资源的。为此，这两个国家付出了4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尼加拉瓜，美国利用宗教和种族关系积极鼓动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对桑地诺政府。^⑫

恐怖活动虽然经常被公众谴责，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喷气式飞机在墨西哥城机场的停机坪爆炸^⑬。由于乘客还没有登机，所以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古巴政府将路易斯·波萨达驱逐出境，原因是证实他在委内瑞拉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随后他也承认他接受了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类袭击事件设立的基金中的20万美元。^⑭



用各种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绪的总统和首相们。约翰·珀金斯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马的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的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²²很多著名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以及1965年阿尔及利亚的迈赫迪·本·巴尔卡都死于暗杀。克雷格·威廉森，就职于南非安全部门，是这种定点清除活动的典型执行者。他被认为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激进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袭击的元凶。他应该为南非国民党党激进主义者鲁思·福斯特的死负责，1982年她死于一个炸弹包裹。²³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如果暗杀失败或者没有可以收买的军官，那么军事干预就是另一种选择。这种干预有时采取在内战中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相结合来推翻政府或者令人们渐感厌烦。这场折磨人的战争最终只能以选举对手被打败或谈判结束。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另外，美国为了反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军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许多行动，不但摧毁了两个国家的经济，而且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

直接军事干预是当形势极度恶劣时采用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导致政权改变的方法。越战的例子似乎拿这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检验了大国的力量。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高科技武器的装备又把这种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充分利用了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无孔不入的监视技术、网络中心指挥和军事力量控制技术、精确的供给等，



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贝洛克对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对殖民地采取霸权政策的描述：“我们有格林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

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国防部的副部长，新保守主义者保罗·沃尔福威茨，陈述了布什主义的“防务规划指南1994~1999”，这个政策计划强调了三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认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力；还有在中东地区，主要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反抗力量的控制”，从而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石油。^⑧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这种言论的体现。切尼，现在是布什主义的拥护者，他在谈到1991年海湾战争和倒萨的后果时，说道：“我认为美国军队介入伊拉克战争就像进入泥潭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陷进去。”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未来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储备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控制中东作为权力支点、获取有利的合约和让步的前景，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进行长期干预，而且很难从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报告“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讲的那样。安德鲁·J·巴切维奇，一个保守的军事理论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使地缘政治重要性左右摇摆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除了自己，傲视其他政治经济原则的合法性；宣布已经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称在全球展开军事布局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击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都是一个帝国治理国家的行为。”^⑨

然而，在1776年，帝国被接受的条件是，它统治下的臣民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的渴望局限在统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有足够的机会过上第一世界那种富裕生活，但是同时，还有20亿人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高额负债又阻止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⑩在这种环境下，布什政府还叫嚣着战争不会结束，除非帝国的控制之网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就像安东尼娅在“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决心，要努力缔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来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



【注释】

①尼尔·弗格森，“欢迎新帝国主义”，《卫报》（*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的根源》，纽约：Wiley，2003年，第209页。

③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Berrett - Koehler，2004），第14～15页。

④纳奥米·克莱恩，“贪婪之路”，《地球和邮件》（*Globe and Mail*）（多伦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数据表》，华盛顿人口统计局，2006。

⑥张夏准，《踢走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写，为新自由主义寻找借口的》（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⑦见 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萨拉（赞比亚银行）和杰克·琼斯·祖鲁，“赞比亚：债务的诅咒”，见 www.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萨德·伊斯米，“打着借口抢劫：世界银行”，《Z杂志》（*Z 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页。

⑩克里斯廷·爱德，《贸易游戏——贸易如何运行》（牛津：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Oxfam]，2003）。

⑪阿萨德·伊斯米，《使陷入贫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 [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2004），第13页。

⑫范达娜·席瓦，“知识产权中的南北冲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⑬道格·亨伍德和埃伦·奥古斯丁的访谈，2006年1月21日。

⑭约翰·奥谢，“向腐败体制提供援助不会帮助穷人”，《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2004年12月9日。

⑮詹姆斯·S·亨利，“钱去了哪里”，《财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页。

⑯引自德里克·麦克维什，“水、土地和劳力——被迫私有化对脆弱社区的影响”（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2004），第29页。

⑰迈克·恺撒，“美国税收资金资助查韦斯政权，回顾发现”，《波士顿全球》（*Boston Globe*），2002年8月18日。

⑱塔里克·阿里，《正统派基督教的崩溃——宗教改革，圣战和现代化》（伦敦：Verso，2002，第209～210页）。又见史蒂夫·科尔，《幽灵之战——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



密历史，从苏联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纽约：Penguin，2004）。

①⑨见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边境上的鲜血——内战的记忆》（波士顿：South End Press，2005年）。

②⑩同上，第119~123页。

⑪安·路易斯·巴德掣和拉里·罗特，“古巴内战呼吁流放者归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见国家安全档案网站的分类文件，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⑫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153~161页。

⑬南非真理和调节委员会的决定，见www.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⑭巴顿·吉尔曼，“保持美国第一——五角大楼将排除竞争性的超级大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2年3月11日。

⑮安德鲁·巴切维奇，《美利坚帝国——美国外交的实质和后果》（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年），第243页。

⑯见迈克·戴维斯，《贫民窟的世界》（伦敦：Verso，2006年），审查第三世界没有发展的增长和五角大楼对低收入世界可能战争的准备。

雄心勃勃的地方银行及其年轻的银行家们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贷款，用来帮助它们建设那些资金去向可疑的项目，却留下大批账单让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来偿还。

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 故设的债务陷阱

S·C·格温

兜售金钱是个奇怪的买卖，它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用于交易的钱不是来自欧洲货币市场以及拿骚、香港或苏黎世的神秘的地下市场，却来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美国人的储蓄账户。像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俄亥俄州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钱不再用于建造隔壁的房子。

我过去依靠放贷他们的钱来维持生活，曾经为了美国中西部一家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中型银行的贷款业务而四处奔波。就这样，我从事着银行业令人吃惊的所谓“常规业务”。这些业务活动已经开始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灾难。

.....

那是1978年，多亏了贪污、专制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政权，我才能平安快乐地入住在马尼拉最好的半岛酒店。我即将着手运作一项特殊业务，将1000万美元贷款贷给一家菲律宾建筑公司，它是马科斯家族的合作伙伴，这是一项不久就出了漏子的贷款。当我走进半岛酒店的大厅去吃饭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关于这项贷款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我一直在努力消化着肚子里的章鱼，那是头天晚上一家台湾银行招待我的东西，我试图去回忆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和为什么他们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不管怎么说，国际银行业都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行业。那年我 25 岁，有一年半的银行工作经验，我是凭借着一个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以“贷款分析师”的身份进入银行的。因为我碰巧能流利的讲法语，所以 11 个月后被提升为贷款部门的主任，主要负责北非地区讲法语的阿拉伯国家的业务。在那儿，我在国际上开始有了名气。这已是我第三次外出旅行，6 个月之内我去了 28 个国家，我的“领地”也在迅速扩张。

我并非总是那么年轻和缺乏经验。20 世纪中期的国际银行业到处都是充满干劲的聪明但又缺乏经验的信贷员。他们在世界各地四处奔走，兜售他们那满口袋的贷款配额，而且生活极为奢侈。他们的主管都是 29 岁左右的副主席，同样是聪明又缺乏经验，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生产的行头，有着不是沃顿商学院就是斯坦福的 MBA 学位。但由于缺少培训，他们会对一个简单的零售分期贷款不知所措。作为高级贷款委员会委员的老板都是注重细节和实效的银行家，他们都有二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所以他们对本地银行业往往有着深刻地认识。但当面对国际借贷时，这些高级银行家们就不知所措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初都不愿意把钱贷出去但最后又不得不这样做，原因就是美国商业活动国际化的需要。当他们的本地客户逐渐参与到国际交易时，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跟从客户的需要，否则就只能把生意让给大型跨国银行。所以他们不安地监督着自己的属下——那些世界金融体系的“骗子”和不知疲倦的宣传员们，他们向波兰、墨西哥、巴西等国家推销各种贷款，而这些国家都会威胁到他们努力维护的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1975 年，美国对外贷款 1100 亿美元，到 1982 年末，这个数字达到 4510 亿美元。前九名的美国银行大约贷出去 310 亿美元，这超过了它们所有资本的 112%。单单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提供的贷款就已经使这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重新制定债务计划。

当我走出酒店大厅时，马尼拉变得热闹起来。在一个舞台上，一支菲律宾乐队正在演奏，下面聚集了商人、游客、银行家、当地小贩以及坐在桌边互相等待着认识的女孩和一些老家伙们。

尽管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觉得总会发生点什么。一天早



上，我乘坐一架航班从台北抵达，在喷气飞机旁边，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了一位“接待者”——这是第三世界的奇怪产物，专门负责接待来往的重要客人。这个人自称叫乔伊，是我的一位客户的特使。菲律宾建筑发展公司（CDCP）是菲律宾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办法使其成为我们的客户却没有成功。乔伊显然对旅客出入境通道很熟悉，我们只用了两分钟就出来了，而其他 300 名乘客，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中不停地流着汗，不停地抱怨，最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出来。他带我穿过喧嚣的人群，来到了一辆早已等候的“美洲虎”前，这辆车配备了空调和非常棒的立体声系统，还有一个大约 20 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这个女孩在我的意料之外。曼谷银行接待我的是一辆银色林肯，但没有女孩；沙特则是一辆加长奔驰，并且偷偷给了我一公升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也没有女孩。亚洲的商业世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明明明面上的事才是交易重点，但类似的事一再发生而且总有恰当的理由。我想，有些事将要发生了……

几小时后，在乔伊的带领下，我又一次来到了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他穿着一身精致的白色制服，拿着我的公文包，里面有一张 5000 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张价值 9000 美元的打折飞机票、我的护照和一些信用卡。总之，一瞬间站在我面前的人和我的所有东西就消失了。我们就像在玩“绝对忠诚”的游戏。1 分钟后，那辆红色的“美洲虎”驶到了出口处，我的公文包伴着那女孩甜美的笑容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路上平稳行驶着，开始周围寂静无声，但后来各种车的喇叭声响个不停，这是马尼拉周六晚上糟糕的交通状况的产物。在路上，那个女孩告诉我，我在这个城市逗留的这些天里，她和这辆车将为我服务。

我被带到马尼拉的一家高档餐厅，公司主席鲁迪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我们银行为了使这家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花了 5 年时间。我们经常请他们吃饭，请他们打高尔夫和潜水，在圣诞节期间送给他们酒和雪茄。但直到现在，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礼貌的谈话。在上了一道菜、喝了足够使棉兰老岛的穆斯林群众都醉倒的酒以及掉了一只鞋后，鲁迪用蹩脚的英语宣布，他愿意向我们借点钱。他说他想通过我们银行在美国的办事处买一些掘土设备，用于马尼拉湾的一个改造项目。



“您想借多少？”我用同样蹩脚的英语问他。

“1000万！”他放声大笑，“我的副总会在明天早上和您商谈具体细节。”

5分钟后，菲律宾的财政部长“顺便”来接见了我。我们没有说起关于贷款的事。他很有礼貌，也很圆滑，他只说了鲁迪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建议我应该去一下碧瑶城（Baguio）。我觉得这真是非常好的礼遇，但我没想到所乘坐的飞机是属于他们公司的，连我喝醉后将要去的位于北部山区的豪华酒店，也是他们公司的。

.....

我这个“国际银行家”已经成功挤入了一个海外的狭小市场。他身穿一件昂贵的西装，这件西装的价格比本地人的年平均收入还要高，所以他对普通人的生意没有多大兴趣。他不会穿过一条漆黑的小巷或者星期四晚上在一个简陋的本地酒吧消磨一夜。他去哪里都不用步行，因此总能与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危险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但危险还是以不同的更加微妙的方式存在着：比如你通过阿尔及尔市的海关却忘了掩饰自己的以色列护照；或者在进入了沙特阿拉伯境内却忘了把苏格兰的瓶子留下来。对这些挑衅者的惩罚措施是拘留，通常会关在移民监狱一段时间。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司机在穆斯林国家的街道上出车祸或撞到什么人。按照当前韩国人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没有雇用他，你就不能撞到他，所以你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场面会相当搞笑，且十分罕见：一个手里拿着公文包的美国银行家，因为一个小事故狼狈地逃进一个不知名的集市中。在马尼拉，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你过于沉醉于主人的盛情款待，那你或许会患上当地的疾病。

作为贷款部主任，主要是负责对外贷款，而不是关注那些冗长、繁杂的问题，比如你所做的是不是在威胁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名年轻的银行家就像一名前线战士：他是听话的，富于进取，不受道德约束的。他的效率正是由于他以一种非常狭隘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美国银行通过像我这样的代理处的贷款官员们，把大量有问题的贷款贷给那些支付余额到现在还在拖欠的国家。按照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的



说法，偿付能力已经不是主要值得考虑的问题了，所有的事情现在都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借钱的能力更重要。那些在各个国家都有业务，最近却很难满足这些国家借债需求的大银行看来，这是很容易得出的原理。它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只要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借到贷款，它会使它的债务无限地翻倍，这很像美国政府翻番它的国际债务的方式。然后只要这些国家增加了债务，银行就会按时收到欠款，而这些国家也不会因为无法还债而破产。但是银行也会被逼上绝路，除非它们能借出更多的贷款，否则它们就必须被迫冲销大批坏账，甚至会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是由于许多笔贷款业务中使用了交叉违约条款。

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尽管银行会允许一个国家延期付款，比如允许它20年还清而不是10年，但利率也会提高。更有趣的是这支持着银行盈亏账目的底线。这意味着尽管许多贷款状况非常糟糕，花旗银行的业绩也会非常不错。起初银行也许轻率地放出贷款，但当它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资产时，它们会变得聪明而且细心。

这种世界范围的贷款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安全。当你贷款买一辆车，银行要证实这车不会出问题。如果你不履行贷款合约，银行就会卖掉你的车，把这些钱用于归还你未偿还的欠款。但是国际银行不能拍卖台湾的一棵老树，或者迪拜的一家医院，又或者加里曼丹丛林的一辆小型拖拉机。它们不能在菲律宾的一棵香蕉树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它们也不能抢夺智利的铜矿并把它卖到芝加哥。在国际借贷活动中，美国银行经常违反借贷业中有关安全的最古老规则。当我还在国内作为一名信贷分析员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对所有贷款要确保抵押资产是安全的，除非贷款者确实是正直可靠的。现在作为国际借贷部的官员，我又被告知忘掉所有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配额，好让总行的上司对贷款业务感到满意——尽管从技术上讲，这些贷款是不安全的。

.....

在马尼拉，我不停地与人会面，感觉像在梦游一般，对于这单1000万美元贷款的前景已经无动于衷。在这一时刻我感觉到我相当伟大，我笔尖轻轻一动，大笔资金就随之移动，给这宗国际交易中的大型机器加足了动



力。当然，我个人并不赞成这项贷款。银行也许忽略了某些方面，但这不是愚蠢。这宗贷款将上报给总行，展现在高级贷款委员会那些灰色头发、粉人脸庞的上司们面前。他们会用眼睛的余光盯着我，并且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贷款量增加了，当期的利润却下降了？”

我剩下的行程包括香港、吉隆坡、东京和汉城。尽管我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可还是对前景做了一些展望。我主要想的还是贷款，写一页页的报告，并想象这些报告被送到贷款委员会的情形。尽管由于我的狂热，越来越觉得自己重要，但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冒出来，并最终在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由坐在我旁边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一个自称银行家的家伙提了出来。

“您在马尼拉做了什么交易？”在点了15轮能使这位国际银行家在旅途中心情舒畅的苏格兰酒之后，他问道。

我告诉他是给CDCP发放贷款。

“这与马科斯有关系，”他说，“不过这也没关系，但他们的杠杆已经够到了他们的耳朵。”

当一个银行家评价一个公司用了“杠杆”这个词时，也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债务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公司的净资产。在美国，银行家们很早就被告知要对这种情况说不，因为这将会给贷方带来很大风险，在公司破产后，他不得不和公司争夺余下的少量资产。我曾经看了一眼这笔与CDCP所做交易的杠杆比例，是7:1。1:1被认为是正常的，2:1就存在潜在危险。但现在突然间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放出这笔贷款简直是疯了。

他哈哈大笑，说：“最好在合同上有马科斯的个人血书签名。”

.....

在美国冬天的城市上空，由于时差的缘故，我依然双眼蒙眬。回到银行总部，我开始回想我的旅行。我想起了那用了三个小时、吃了五道菜、喝了两瓶酒的午餐，却忘了究竟是谁吃的。

说银行家是被训练出来的悲观主义者，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对于退休的银行家来说，这好像是真的。现在的国际银行家是乐观的，比如当高级副主席问你，这个城市通常做什么项目，你绝不能回答：“是这样的，菲尔，我认为他们将要建地铁。”即使这是真的，你也不要说。因为菲尔会



轻易做出在这个城市不可能放贷的判断。而你的工作表现则主要依靠你放出去多少贷款。作为一个信贷分析员，我曾经注意到一个负责墨西哥贷款的副主席无视石油将会改变 2000 年以来墨西哥城 3000 万居民的生活现状，也无视当地的石油工程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我还被告知不要把这些写进城市报告中。

“我们只关注贷款的偿还问题，目的纯粹而简单，”他说，“这不是人口统计学，他们有那么多石油，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置，我们来帮他们。”

啊，乐观主义！它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波兰到处闪现。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得不推迟还款日期，这是一种拖欠还款的委婉说法。如果它们都是乐观的，我想，那么我也应该乐观，尽管是与贸易逆差问题严重、不稳定且腐败严重的亚洲国家的一个杠杆比例是 7:1 的公司进行的交易。

在我继续想着我那似是而非的理由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掘土设备公司的首席财政官打来的。这是一家为大型汽车公司提供配件的公司，也是我们的老客户。

“我听说你和我们在马尼拉的朋友谈过了。”他说。他没有拐弯抹角，好像我们等级的不同对他来说无所谓。

“他们非常好客。”

“他们是一群吸引人的家伙。”

“他们想通过我们的贷款来购买你们的设备。”

“我知道，”他说，“因此我们想请你帮忙做一个结论是优质可靠的评估。”他接着说。他的语气好像在提醒我，他们公司以存款和退休基金的形式在我们这有不少钱。

我向他保证说这份评估会按照他的建议来进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10 分钟后，我们银行的主席也说起了同样的话题，我被要求做出一份结论是优质可靠的评估报告。他的意思是说他想在贷款委员会那里尽快看到这个报告。这该死的菲律宾贸易逆差问题！

这件事变得刻不容缓，我的狂热劲也退去了。我要尽快结束这一切。在对这家公司进行仔细分析后，我现在明白这是件不能做的交易。但我还



是要必须赶在高级贷款委员会会议之前做好它，我可不想接受 30 分钟的盘问和羞辱。银行主席已经告诉我们要出一份可靠的报告，尽管实际上这个年轻的贷款主任像个“傻瓜”。因此我必须承担发展一个我曾经学过的简单原理，用银行家的行话就是：“遮住自己的屁股”。

现在我们发展到了真正的国际银行业时代，这种银行业使花旗集团有可能借 20 亿美元给巴西这种不太可靠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担保人”和“信用证”的国家，这两个灵巧的方式将借款人的弱点转嫁为一些新的领域理应的强度和可靠性。

让我来解释一下。当你想要得到一份国际贷款合同但条件又不太符合时，你可以找一个可靠的第三方担保人来提高贷款额。这个第三方可以是私人商业银行、政府拥有的商业银行或者外国政府。其中，政府作为担保人是最好的。如果合同上出现的第三方担保人看起来不错，大多数美国的贷款委员会都会同意贷款。不要计较世界各地上千宗糟糕的贷款是由政府支持的，比如说波兰，在千禧年来临之前它甭想还清贷款。但是美国银行仍然坚持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旧观念，那就是“银行和政府不会欠款不还”。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不错。于是我开始着手使菲律宾最大的那家银行成为一个局部担保人。这家银行已经为很多债务做过担保，多到这些债务可能自己都还不清。这是个很容易的过程。这家银行的老板和那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在政治上有紧密关系。这个策略不仅能很好地向我的银行主席与顾客解释，而且还有助于我的事业发展。

这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打了几通越洋电话就得到了菲律宾那家银行的担保。对它来说，这就像对外发放免费样品一样简单。在一个刚从俄亥俄州大学取得英语学位 3 个月的信贷分析员的帮助下，我们做出了一份足以使全部贷款委员会的委员感到目眩的报告。

副主席在我脑门上敲了无数下，之后把我的职位往上提了提。我被客户请去听歌剧，然后就被派去香港为这笔贷款签字。

三个星期后，我们支付了 500 万美元，这笔钱首先被用于掘土设备的装船出货。尽管作为我们的转账银行，蔡斯·曼哈顿银行还是为损失了 500 万美元惋惜了好几天。最终这笔钱还是到达了指定账户。



.....

在放出这笔贷款一年半之后和这宗贷款变成无息贷款一年之前，我离开了这家银行，去了西海岸一家大银行。与此同时，借方开始怀疑这宗贷款的偿付问题，所有曾经参与这宗贷款的官员们都已经去了别的银行，这种跳槽在银行界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市场非常火热，如果你的工作做得相当好，那么不仅你的薪水可以加倍，甚至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生活的城市。因此那些放出大宗糟糕国际贷款的人最后都不再管它们了。相反，最后收拾残局的都不是最初放贷的人。因此他们对于这种责任也很茫然。

我的菲律宾贷款悄无声息地变成了坏账。没有人关注利息和本金在某一天会收不回来。现在已经不可能再从那家公司了解到任何关于财务状况的信息。同样也不可能找到公司的负责人，他们正忙于躲避其他的讨债人。我的继任者花了好几个月，打了无数次越洋电话试图找到他们。而当找到他们时，他们保证欠款马上就会归还，实际上他们永远也不会还。通过长期谈判，银行谨慎地做出让他们延期还款的决定，希望用这种方法让他们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把贷款还清。在这个约定的期限内，银行只收到了一小部分的还款。在我看来，菲律宾那家银行的担保也不起什么作用。

所以我继续前进。不管什么人被招来收拾这一烂摊子，而高级贷款委员会的老家伙们在想着哪里出了问题。在那些天他们一定想了很多，里面有一半部长级别的人出现了技术失误，竟然把上千万的贷款贷给这个国家。而在他们看来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就是在将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金钱中心的银行再大胆的了。这只是“正常的交易”，而且这种交易还会继续。直到有一天大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到时候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后记：马科斯在1986年垮台，而菲律宾的对外债务也超过了280亿美元。这其中6.75亿美元来自马科斯亲信控制的公司和由政府机构担保的债务。就像埃伦·奥古斯丁在本书第九章“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中写的那样，现在菲律宾人民仍然在努力偿还马科斯时代遗留的债务。

第一世界通过离岸银行每年从第三世界国家吸取大约 5000 亿美元转移来的非法钱财，这已经成为全球精英资金转移的必经途径。

第 3 章 黑金： 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

约翰·克瑞斯滕森

吉隆坡，1985 年 7 月。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吉尼斯黑啤酒和库瓦西耶（拿破仑）干邑白兰地让我感觉迟钝，但坐我旁边的这个人正说的那些事听起来却仍然令人难以置信。此时，我正与一家马来西亚最大的合资企业——KSM 的首席财务官在一起，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在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里是位重要人物。整个早上我都在与他的团队以及合作企业委员会会谈，讨论该合作企业存款和投资活动的非常规增长。他们竭尽全力地取悦我。开完会后，我们乘电梯到他们位于商业中心区的办公大楼顶层，那是一个奢华的场所，在那里，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龙虾宴，配的是烈性法国白兰地。

随着上来的一道道菜肴，气氛渐渐缓和下来。上面提到的那位邻座似乎对我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最感兴趣，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泽西岛——一个英吉利海峡中的岛屿。他对泽西岛作为一个离岸避税港的角色尤其感兴趣。

“在那投资安全吗？”他不断地问我这个问题。当我告诉我对那个地方的金融机构所受监管情况了解不多时，他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其实他对这些并不关心。最后我终于弄明白了：他并不担心监管是否严厉，而事实上，他正在策划一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合法的事情。



■ 放松管制、腐败和避税港

我在吉隆坡审查马来西亚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时，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混乱的问题。这是一个旨在帮助农村存贷款合作企业的法律小漏洞，它给了许多接受存款合作企业（DTC）的董事会机会，使它们能给存款提供较高的利率，这比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所确定的利率高一些。由于这个缘故，它们吸收到了数十亿存款，这些存款它们可以拿来投资，而不会受到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或者银行与金融公司委员会规章制度的管制。我在那里访问了一些较大的“投资合作企业”，发现它们将这些存款大量地贷放给了企业董事、亲戚和关系密切的亲信，而且这些贷款通常都没有任何担保。^①这些资金直接被寄往包括香港、伦敦、新加坡和纽约在内的不同避税港的秘密离岸信托基金或公司。这些存款在市场繁荣时，被投资到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而接下来的市场低迷，使其损失高达数亿美元。由于处在离岸金融市场的特殊用途投资机制中，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无可挽回地损失掉了。1986年，在一次阻止民众对马来西亚银行体系信心崩溃的行动中，马来西亚中央银行不得不中止了最大的接受存款合作企业中24家的交易活动。^②

对投资者缺乏保护这一点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很多接受存款公司的董事都是马来西亚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与执政联盟的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此期间，卷入其中的金融中介公司中竟然没有一家对这些向避税港非法转移资金的行为进行报告或者仅仅是提出质疑，这包括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我也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缺乏职业操守现象的人。很多研究洗钱的专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用来转移犯罪、毒品走私和恐怖活动所获收入的金融网络路径，与数十年前西方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为了非法资金外逃和避税所使用的金融网络路径一模一样。奥萨马·本·拉登在2001年时奚落说，基地组织的资金是安全的，不会被美国所冻结。他自夸道，他正充分利用“西方金融体系的缺陷……恰恰是这些缺陷已经成为西方金融体系自身的陷阱。”^③



我曾经一度极力想弄得更明白，到底这些来自于 DTC 的资金是如何从离岸银行挪出去的，但后来我发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离岸信托基金都没有注册，这也就无从获悉幕后那些人的身份。碰上这个无法逾越的秘密障碍，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努力。我就我的发现向马来西亚官员提出警告，并建议他们通过加强有关合作企业的法律来克服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兴趣自此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如何防止非法钱财从发展中国家流向西方银行体系这些更大的问题。

■ 离岸中介

完成我在马来西亚的任务后，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要回到泽西岛查明离岸金融体系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会丢掉我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职业而开始从事一份存有很大疑虑的新工作。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个人如何看待这份工作的性质和通常的避税港，我一刻也无法放下我的决定去干别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我泽西岛的家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坦率点讲，这个抉择也让我感到畏惧。

我在泽西长大，我喜欢这个岛上的风光景致，喜欢它的海岸线，也喜欢它那迷人的传统。尽管我为自己是一个泽西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我仍觉得应该增加更多的阅历，于是我离开泽西岛，在伦敦进行审计和项目评估的培训。当我差不多 25 岁时，我又开始学习以便能拿个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后，我获得了经济学和法律的双硕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与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Oxfam2000（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一些运动参与者取得了联系，开始研究世界上那么多最贫困国家的资金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流入秘密银行账户的问题。

这个研究一直持续到我毕业以后。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在印度工作时，就逐渐意识到由 IMF 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资本市场和贸易自由化计划使有钱人和资金充裕公司的避税变得更简单。在将资金非法转移到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基金的过程中，避税港起了关键而隐蔽的作用——不仅有利于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力的个人及公司，而且也耗尽了世界上最贫



困国家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随着它们的财富大量地消失在离岸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举债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收入。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放慢的经济增长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不平等，助长了日益增多的政治风险，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外逃。放缓的经济增长使这些国家在维持公用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时越来越难应付它们的外部债务。简言之，离岸避税港破坏了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

在查阅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学术文献后，我证实目前几乎没有关于避税港的作用和在新兴的全球化金融市场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的研究，离岸金融在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的专业文献中少有提及，更别说在世界上财经类大学生的主流教科书中出现了。^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疏忽，特别是当你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时：有五成的世界贸易经过了避税港，从理论上来看，每天有数十亿美元通过离岸网络输出输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工作使我遍历了东南亚和北非，无论行至何处，我总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财富，特别是像来自于石油等矿产资源的财富都正遭受着腐败政界和商界权要的剥夺，这些财富被输出到瑞士、摩纳哥、开曼群岛和泽西岛等避税港的离岸银行账户和信托基金。在这些国家，严重不公与极具腐蚀效应的独裁的结合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石油出口国，在这些国家，极少数权要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很多人却连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贫困造成犯罪、刺激暴力行为并助长恐怖活动。从这个角度看，非法钱财流入离岸银行账户与那么多穷国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愤恨情绪之间的关系也就容易理解了。

对尼日利亚财富近乎无休止的掠夺和该国日益滑落到犯罪和暴力的深渊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根据《经济学家》载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萨尼·阿巴查还是尼日利亚的独裁者时，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有一个固定的指令，即每天将大约 1500 万美元转入他的瑞士账户。”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金融专家团以及能够为犯罪和主要金融体系提供中介中获得好处的离岸政府官员形成的基层组织的默契配合，这样大规模的贪污是不会得逞的。全世界有大约 100 家银行都参与处理阿巴查掠夺的财富，这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英国渣



打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建富证券公司、德国商业银行和印度银行。根据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洗钱专家雷蒙德·贝克的研究，“随着阿巴查的财富被估定为 30 亿到 50 亿美元之间，很多银行都开始对这笔钱虎视眈眈，希望能拿到这笔巨款，给这笔钱提供一个庇护和管理场所。”^⑤

阿巴查的非法所得中，大约有 3 亿美元最终落户于位于泽西的银行，毫无疑问，泽西银行都知道这笔钱的来历，它们对为这样一个政治风云人物管理这笔资金收取高额手续费。不必说，在阿巴查倒台后，当国际压力最终迫使这笔贪污赃款被遣返尼日利亚时，银行一分钱的费用也没拿到。虽然曾给这个非洲近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没有一个职员受到指控，更别说受到任何方式的处罚了。相反，泽西官员们还大肆吹嘘他们在将这笔钱遣返回国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尽心尽力。

简单地说，南半球如此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没有富裕国家金融机构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尼日利亚一直都位于透明国际（Trans 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全球腐败指数排行榜榜首，但是，我们很难反驳前尼日利亚教育部长阿里亚·法风瓦教授的说法，他在 2005 年曾说道，瑞士“因藏匿、怂恿和引诱世界范围内的侵吞公共财产，将这些贪污所得保存在他们的地下保险库中以保证其安全”，应该位列最腐败国家名单的榜首。^⑥

在很多西方国家，银行和其他的接受存款机构都被要求执行详尽的检查，以确定它们存款人的真实身份和他们的资金来源。在实践中，富于灵活性的官员们私底下向我透露说“认识你的客户”这一标准，在实际处理中经常只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标准，没人关注他们的客户是否在逃税。近年来，在阿巴查这样的政治大亨事件后，这些应予关注的检查措施得到了加强。但是银行仍然不愿意执行“增强型”的稽核任务，部分原因是因为涉及费用成本，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更愿意对它们的客户行为的合法性听之任之。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在实践中，很多律师、银行家和逃税者沆瀣一气，他们从为这些逃税者处理赃款中获得大量手续费收入。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德高望重的美国瑞格士银行在它的“了解客户”文档中这



样描述它的一个政治大亨客户呢：“客户是一位从事私人投资的客人，定居在巴哈马群岛，该客户是处理受益人投资需求的中介人，现在该客户是一位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已退休专业人士，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条不紊地积累着自己的财富。”^⑦这位“已退休专业人士”就是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从1979年开始就在瑞士银行开立了28个账户和存单，金额总计为600万~800万美元之间。皮诺切特因为涉嫌酷刑和暗杀已遭起诉，在他的统治下，智利政府组织屠杀小分队排除异己，胁迫民间组织。他还涉嫌毒品交易、非法军售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在2005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一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家族成员因逃税和欺诈遭到调查。

■ 碧海、银沙和秘密

泽西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异常繁荣。在最近10年里，世界各地的许多大银行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应付它们的高级净（增）值客户所需私人银行服务的迅猛增长。律师事务所和大会计师事务所也在离岸区设立子公司，以便向它们的企业和私人客户提供管理和信托服务。泽西距伦敦只有45分钟的飞机航程，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离岸避税港的伦敦提供离岸服务。早在20世纪60年代，地方律师事务所就热心于学习百慕大和开曼岛，向泽西政府递交了一系列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变革措施，这使泽西慢慢地变成了企业界所称的“有吸引力的离岸投资环境”。这个环境对鼓励研发或者商品和服务生产毫无用处。它的吸引力来自于极低或者为零的税收以及几乎对非本地注册企业的毫无管制。很多企业在技术上看似是合理避税，但它们实际上是在这种极易被识破的伪装下基于非法逃漏税而存在的。

对离岸金融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以致泽西岛都无法应付这种巨大需求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人手，但是有资格的劳动者却不多，有经验的职员更是紧缺。尽管放松了雇用标准，但银行仍然无法那么快招收到因其业务飞快增长所需的人手。在我回到泽西的那些日子里，我有一些可



从中选择的工作机会。虽然我没有在银行和信托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提供给我的报酬远高于我目前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所挣的报酬。我选择了一份沃尔布鲁克信托泽西有限公司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现今全球会计师事务所德勤（Deloitte）的一个子公司。沃尔布鲁克的客户遍布全球，这个公司对于我了解实践中的资本外逃和逃漏税是很有帮助的。

从我的办公室窗户俯瞰圣赫利尔码头，我能看出泽西是怎样转变成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的。旧的城市住宅和农业商场迅速地让位给国际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大楼，旅游纪念品商店正日益被改建成酒吧和奢侈品商店，以迎合金融行业的高收入者。尽管公路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 40 公里，我窗外的街道还是被车子塞满了。保时捷、美洲虎和宝马在这个岛上备受欢迎，在短短的 9 英里道路上就可以看到 5 辆。在这个不久前还是一个保守而很有节制的社会，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现在的常态。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个岛屿的传统农业发展急速下降，旅游行业也同样如此。二者都是被离岸金融服务业所导致的迅猛增长的物价和工资给挤垮的。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而且随着传统行业被经济过热所摧毁，这个岛对避税港活动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随着这种依赖性的增加，从英国那儿享有很大自治权的泽西岛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这个自由自在的行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这个行业能够通过施加政治压力以保证得到特殊对待。我最初对离岸银行这个潜在“政府战利品”的担忧在几年后被证实了。

在我开始工作的几周内，我对我们公司为客户提供的业务类型有一种体会。为大量的小规模账户工作包括依照指示在离岸账户中支付和转移资金。这些指示一般都是由伦敦、卢森堡、纽约和瑞士的律师传真或邮寄过来的。资金的真正（或说受益的）所有人真实身份是严格保密的，而离岸公司的所有权都伪装在名义董事和股东名下。通常这些公司属于离岸信托，后者是完全隐秘的，甚至没有注册。我被告知，这些程序构成了几乎所有离岸交易良好的习惯性做法，这种交易一般包括三个媒介（信托、公司和真实的银行账户），这种交易在不同的离岸管辖区域内广泛地展开来。各公司还采取严密措施来保守这些秘密，包括特别设计的传真机，使得表面



看来这些客户公司的确是在泽西进行实质性的公司职能运作，它们还不断地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保证外人不会获知它们客户的真实身份。这对一家在伦敦的证券经纪联盟集团来说尤其便利，这个财团在泽西利用一家匿名离岸公司，作为它处理大量会员的贸易欺诈行为的大本营，几乎不用受任何处罚。单是这家公司涉及的交易金额就达上亿英镑。

这些秘密安排完全都是为了阻止正当权威机构的调查，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客户的安全，大多数的信托基金都订立含有“逃遁条款”的合同，这个条款使这些客户的受托人在一遭到调查时就能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另一个管辖区域并指定新的受托人。毫无疑问，这些服务要价不菲。但是这些客户的潜在收益和税收节减远远多于这些。

偷税是我们很多客户的主要目标。理论上，税收行业在逃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做了很严格的区分，逃税涉及欺骗性申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间的区分很不清晰，英国一位前财政部长就这种混沌不清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浓厚得跟监狱围墙一样。”^⑧我在泽西工作时所使用的大部分税收方案很可能通不过那些受益人所在国家税收当局的详细审查。如果他们的税收方案是严格合法的，他们就不需要秘密银行账户和离岸信托了。当然，任何问起这个秘密的人，他们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存款者，他们的税务当局都要求他们申报收入，但是业内人士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其金融状况能够瞒天过海，不会为人所知。

税收筹划者通过很多方式来证明这种极度隐秘性的必要。最经常使用的证明方式是，在一个充满政治风险和专制的世界，人们需要保护自己以免受到来自贪婪政府力量的压榨。隐秘性，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极力想摆脱纳粹金币丑闻给他们带来的臭名）的成员银行在财金出版物上用半版的广告来向人们描述的那样，“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不可缺。”一位来自美国遗产基金会（U. S. -based Heritage Foundation）的避税港倡导者曾将离岸市场的隐秘性与保护沙特阿拉伯同性恋的必要性联系起来。^⑨我曾经从事的国际发展方面的工作使我对人权问题极其敏感，但是在我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没遇到哪怕是一个调查记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贸



易联盟的激进主义者、人权运动参与者或者容易受到任何政治极端势力极权政府迫害的人使用秘密的离岸市场账户。相反，恰恰是那些独裁者，比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还有他们的亲属和亲信都利用离岸账户来藏匿他们盗得的赃款和逃漏税。如果细细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离岸银行的隐秘性保护了人权”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 给全球化商业的车轮加点润滑油：逃漏税的运行机制

很多公司的逃漏税涉及贸易的不当定价。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跨国企业，它们利用避税港通过所谓的转移定价将利润从高税率区域转移出来，转移定价是指由同一个人所有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进行贸易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来讲，转移定价是合法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世界贸易是发生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的。但是在实践中，跟转移定价有关的国际惯例大部分都缺乏效率，因为同一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格可循。因此跨国公司利用它们设在避税港的子公司来抬高进口价格，压低出口价格，以此大规模地减少税负。有些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还被挂在离岸区子公司名下，这样它们能获得比在本国申请时高得多的估价。在泽西工作时，我见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石油经营商、制药公司的子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离岸区转移利润的。

我们的某些客户是小公司的业主，这些小公司大多都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设立离岸公司以便能通过一种被称作重开发票的手段在泽西达到洗钱的目的。重开发票表面上看来就是将商品或服务先卖给在避税港的第三方，然后再卖给最终购买者。在实践中，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旨在欺骗当地的税务当局，这些经过离岸区非法转移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最后都留在了隐秘的离岸区账户。有些资金后来则披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外衣绕了一圈又回到国内，而这些投资一般都享有税收优惠待遇。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不当定价来转移利润很少被税务当局发现。美国



的一些研究学者曾揭露过一系列不当定价的同业贸易，包括从中国进口的卫生纸定价为1千克（大约四卷）121.81美元；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塑料桶定价为每个972.98美元；从俄罗斯进口的自行车轮胎定价为每个364美元。^⑩在出口方这边，人为压低定价的例子有：出口到委内瑞拉的美国产推土机定价为每台387.83美元；出口到特立尼达岛的装配式房屋单位定价为1.2美元。这项研究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仅因不当定价转移利润给美国带来的税收损失为1.75亿美元。^⑪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此造成的损失比例比美国要高得多，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财力对隐秘的离岸中心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例如，很多非洲经济体的诸如油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这些战略部门都被跨国公司控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管理部门没有能力对转移定价的诡计进行调查，所以它们也就没有能力筹集到公共设施部门建设所需的足够资金。一个研究非洲税收问题的专家指出，转移定价的陋习在这个大陆上已成通病，但至今还没有哪个非洲国家在挑战这个陋习上成功过。

一些经济学家竟然赞成这种积极的合法避税形式。他们认为，公司董事有义务最小化成本，包括税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抑制高税收/高消费的政府，迫使它们服从市场经济的严格法则。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只要斟酌片刻，就会认识到原来他们对政治领域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在传统的术语层面上，税收并不是企业的成本，就像股息支付，将其作为利润分配更准确一些，这跟税收出现在损益账户中是一样的。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便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通过它们设在类似泽西这样避税港的有名无实的纸上子公司安排它们的贸易和投资，还使它们能获得高于它们竞争对手的明显税收优势。由此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领域，这给了跨国公司相对于非跨国公司更多不公平的优势。在几乎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更有利于位于世界北半球的大公司而非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竞争者。这种不公平优势还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受到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投资的压力而更趋恶化。这种方法往往被误认为是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同样对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有利。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合法逃税和提供税收鼓励以吸引外国投资在近几十年来对调整贸易和投资资金流向



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这些问题从未被列入过考虑范围。

由于这些扭曲和滥用市场的努力，避税港实际上降低了全球生产率，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原教旨主义人士提倡一种无障碍方法以促进自由贸易，可他们忽视了避税港的角色。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少对财政补贴和税收扭曲如何破坏自由公平贸易的问题进行调查。但这个惯例也曾出现过有趣的例外：2000年，WTO决定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境外销售公司（FSC）将利润留在免税离岸区；FSC成为一种被WTO所禁止的出口补贴。FSC被撤销后，随后被一种与其类似的不在辖区内的收入免税的税收优惠所代替。2002年，在欧盟的控诉下，新的替代方法再次被WTO禁止。这个问题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寻求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游说努力花了许多功夫——而另一方面却公然抨击对穷人的福利项目。

随着我在泽西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在我与我的同事们发展工作关系时，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工作的更广泛意义漠不关心。他们都仅仅是为了钱而工作。初级职员频频跳槽以寻求更高的工资，高级职员则竭尽全力想尽快挣到更多的钱。那里的气氛很疯狂，人人都集中全力寻找合法避税的新办法。曾在这个合法避税行业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政府出台了新措施，大量的律师和会计师就会被雇用去进行详细分析，看有什么样的税收漏洞能供利用。当然，只有很有实力的公司才能支付得起每小时850美元的费用给那些帮助它们制定详细的合法避税方案的专业人士，而大多数的小公司则支付不起。这种不公正的合法避税手段使大公司能享受到有害的竞争性优势，而税负则日益从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转移给中产或者底层收入家庭。

我的很多同事对由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各种后果的指责并不关心。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小岛之外的世界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工作，他们的话题很少偏离当地的流言蜚语、汽车和房子价格这些主题。在工作中，我对那些在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间流出流入的资金来源不予理睬，这些资金很多来自非洲国家。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在我们出去参加“周五万岁”的办公室饮酒狂欢会时，我的部门上司桑德拉·毕松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对讨论那些事情毫无兴趣，而且从不在乎非洲发生的任何



事情。桑德拉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她的生活乐趣集中在敞篷娱乐车和在周末喝得烂醉这些事情上。她憎恨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很枯燥而且日复一日、毫无生气，她仅仅将工作视作迅速致富的途径。很奇怪的是，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她的坦白，她对不那么富裕的客户毫不体谅更别说同情的做事方式、对有钱客户恬不知耻的奉承态度都让我目瞪口呆。在很多方面，她对享乐主义的虔诚和完全的自私自利是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缩影。就像我的大多数同事，桑德拉从不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其他地方的犯罪和不公正行为联系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不希望做这些联系。

■ 反复无常：合法避税的疯狂增长

“规则不过就是规则，规则是要人来打破的。”这是引自 2004 年 3 月《卫报》上的一篇文章。这些言辞不是出自一名带着面具不敢露面的反对全球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对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马施云（Moore Stephens）的一个公司税务合伙人进行的采访。在评论英国财政预算报告中的税收方案时，他接着说：“不管立法是否适当，会计师和律师总会有隙可乘。”在面临煽动犯罪的指控时，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慌忙跟它的这位合伙人的言论划清了界限——但事实的确如此。多年来，合法避税已暗中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什么也无法挡住赚钱”这一观点也坚不可摧。

跨国会计和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代表了这种傲慢自大的具有颠覆性的态度。该公司税务部门的公司文化于 2003 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在对从该会计师事务所获得的公司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信件进行披露后被曝光。在毕马威的高级顾问格列格·里奇的一封电子邮件里，他提请公司中主管纳税的负责人吉尔夫·斯坦注意，他说，即使监管者针对公司的高净值客户所使用的税收策略采取行动，从这种策略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超过任何可能的法院罚金。“我们的一般交易，每桩可以收到 30 万美元，而最多只会有 3.1 万美元的损失。”另一份内部文件包括一个警示，



说公司如果遵守美国国税局（IRS）关于合法减税的法定要求，毕马威将“不可能在有利税率产品市场中竞争。”这些对合法避税行业文化的披露促使参议院对此进行报告，其中称一个毕马威的高级官员已“有意地、有目的地，而且蓄意地违反联邦合法减税法。”¹²

在支持这些企业文化方面，记者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们写的文章对合法避税不加批判，不考虑它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附和奥威尔关于税收行业从业者的说法，奥威尔将合法避税描述为“有利税率产品”、“减轻税收负担”、“前摄的财产保护”和“税收效率”。在泽西这个离岸区的工作让我明白在逃漏税和合法避税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岸金融行业通常都达到了一种协调状态，那就是对其他的腐败和不道德行为比如军火交易熟视无睹，“佣金”被汇入离岸公司的账户以寻求对规模大的合同的保护，而内部交易操作则通过离岸公司的处理掩盖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复杂的法律架构和不同离岸管辖区间错综复杂的交易都是为了虚张声势，制造误导调查组的信息，而名义董事和不合作的当地监管机构则与调查者周旋，阻挠调查工作。正如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British Serious Fraud Office）的一位高级官员所言：“避税港就跟登记中心一样，我曾看到有些交易，其所有的交易决定都是在伦敦做出的，但却在避税港登记。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对合法调查的阻拦。”¹³

一种“别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了”的文化滋生在银行和金融服务产业。很多公司的董事会宣称它们不知道旨在维护它们利益的税收计划是怎样设计出来的，当它们精心构建的离岸机构被披露具有欺骗性质时，它们仍声称自己是清白的。例如在安然例子中，该公司利用设在开曼岛的几百个有特殊用途的机构来隐瞒它一直在亏损的资产负债表，首席执行官肯·莱和他的前任杰弗里·斯基林辩称他们对首席财务官安德鲁·法斯托创设的资金结构一无所知。他们还引证说，那些资金结构都已经获得了律师、银行家和会计师的批准，他们以此来解释自己所持的立场，为自己洗脱罪责。

他们的辩解纯粹是胡说八道。2006年2月，有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税务负责人向我证实说，董事会给他们税务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最大限



度地利用合法避税的功能。而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参加了一些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会上，律师和会计师们都殷切地推举安然公司为 21 世纪的模范公司，首先是因为它有创新的资产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显然意味着可以在很多国家进行详细而积极的合法避税。已公布的安然账户显示在 1996~1999 年间其净收入为 23 亿美元，而为了逃避纳税，公司宣布亏损 30 亿美元，因此在此期间，公司没有缴纳任何税。其 2000 年的财务决算报告需纳税收入为 31 亿美元，但同样是为了税收目的，它宣称亏损为 46 亿美元。就是这样的创新和公司职能让律师和会计师将之推荐给世界各地企业的董事会，这已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安然的例子充分表明，即使它在法律字面意思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金融服务的产业文化已经对规章制度、税收体制和民主进程造成了颠覆性的破坏。2003 年 11 月，参议员乔·利伯曼向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呈递呈词，将这些堕落的价值观归纳为“大批律师和金融会计师缺乏职业道德，一切就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客户避税，这样能给他们自己带来丰厚的报酬。”^⑬

事实上腐败还涉及更高层次，我们却为何单挑金融和公司团体的刺呢？我们该如何解释民主国家政治领袖们的价值标准呢，他们一方面对他们的国民强制征税，另一方面却建立周详的离岸机构为自己避税？就拿前加拿大财政部长兼总理保罗·马丁来说吧，为了合法避税，他的海运船队注册登记在加勒比海和欧洲的不同避税港。^⑭还有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据说他通过设在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的离岸公司来控制他的电视网络电视五台。前泰国首相他信·西那瓦又怎么样呢？他在 2006 年 1 月将他的通信集团西那瓦公司的控制权以 19 亿美元的免税价格出售，这使得数十万泰国居民上街抗议他所领导的政府腐败。英国的一本私人侦探杂志《天眼》中有一篇题为“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的短小精悍的文章，据其报道，西那瓦公司是通过一家英国维京岛公司，合适地说，名称为富财投资公司贱价出售的，目的是为了避税。^⑮英国的工党又是怎样的呢？它从 1997 年执政以来，多次接受来自持有离岸区账户的知名赞助者的捐款，这些腐败的风气已经成了标准规范。



■ 女王忠心的避税者

表面上看，对于很多临时的观察员来说，我和我的同事工作的离岸世界与“真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相隔甚远，但事实上，离岸银行处于全球化金融体系的中心，这使得企业和被看作是银行圈里高级净值个人（HNWI，或说微型母鸡，“hen - wees”）的超级富豪，能够在国内公众和法律当局所管辖不到的地方进行操作。20 世纪 60 年代，当大量的石油美元开始在欧洲积聚起来时，离岸经济系统作为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最显著的是通过放开国际汇率管制来达到金融交易的自由化，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的终结，20 世纪 80 年代对金融市场的放松管制以及轻点鼠标就能实现资金高效转移的新型通讯技术的涌现。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发展，离岸避税港的数目从 70 年代初期的 25 家上升到 2005 年的底的 72 家，金融服务业的扩张规模变化之大可见一斑。¹⁷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立它们自己的离岸金融中心。比如，2006 年 2 月，加纳总统约翰·库福尔宣布他的政府意欲争取立法机构的同意，以允许在其首都阿克拉通过与英国巴克莱银行集团组建的合资银行提供离岸金融服务。¹⁸有趣的是，72 家避税港中的 35 家都与伦敦金融城有关系，它们或者与英国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或者是成了英联邦的成员。几乎所有这些避税港都与工业化大国有关，有相当数量的避税港群集在加勒比海、欧洲的外围边界地带、中东和东亚。其中大多数都与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东京有密切联系。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债务危机之后，西方大银行将它们的营销努力转向为世界上大约 800 万的“微型母鸡”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在那场危机中，很多的高负债穷国最后都宣布对银行财团的私人贷款不予偿还。私有银行专心于向富人们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全球大约有 300 万亿美元的客户资金由它们管理，这可是很大的利润来源，尤其是在低税率和无税环境下管理时，更是如此。1995 年在伦敦金融城的一次银行业会议上，有



人告诉我说，这个行业的目标就是在 10 年内将“微型母鸡”们的大多数金融资产都转移到离岸信托基金和公司。例如在拉美，财富高度集中，约 30 万人拥有大约 3.7 万亿美元的个人资产。¹⁹据估计，这些拉美地区的富人中，其整个现金和已列出的证券资产中有超过 50% 的部分都放在离岸区。有趣的是，世界银行甚至在其 2006 年的拉美报告中指出，富人们的逃漏税阻碍了该地区的发展。²⁰这导致了一个投资不足、失业和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加剧了贫困、犯罪和极端主义。

关于全球财富管理趋势的研究报告认为，离岸金融业在达到其将富有客户的资产转移到离岸区的目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进展。2005 年发布的一组调查报告显示，大约 11.5 万亿美元的“微型母鸡”资产位于离岸区，这些资产或是免税或是被课以极低税率。²¹如果对这些资产的收益按 30% 的平均税率征税，将使政府岁入每年增长 2.55 亿美元，这足以实施对低收入阶层的大型减税计划，足以为整个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是在 10 年内将贫困人口降低一半，提供足够的资金。目前的 7800 万美元全球援助预算在这一税收损失估算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这种税收损失还不包括由于公司以各种形式偷税造成的其他损失，或者由于税收竞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不利影响，根据英国援助机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估算，2000 年这一损失大约为 500 亿美元。²²

▣ 出卖泽西岛

泽西以及其他类似的避税港，都提供了将管制与放任、合法与非法联系在一起 的离岸界面。表面上看，这些离岸银行是在模仿国内的银行体系，但是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也就意味着这些离岸公司没有经过审计，从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是谁拥有这些公司，谁会从离岸信托机构中受益，它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的。这些隐秘性为犯罪和腐败提供了理想土壤，使这些勾当不那么容易被主流经济组织察觉。离岸公司并不是利用避税港来增加它们活动的经济价值，而更多的是利用它从事节省成本的“搭便车”活动，或者是从事金融欺诈。避税港的工作包括参与到一个充满欺诈、腐



败、洗钱、逃漏税、军火交易、黑手党敲诈勒索、内部交易和其他形式的市场扭曲活动中，这些活动搅乱了真正的企业和财富创造的正常秩序。被私人侦探杂志《天眼》描述成“腐败小岛”的泽西岛，因参与欺诈活动，几乎不可避免地获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这则伦敦金融城的“泽西或者监狱”的笑话将其概括得淋漓尽致，这个笑话同样适用于任何在税收事务中顶风逆行的人。

慢慢地，我对我的工作感到了厌烦，而且对合法避税行业也感到困惑不安，于是我放弃了在信托公司的工作，在泽西岛政府申请了一个经济顾问的职位。1987年我被任命就职。

泽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质的正式名称“泽西州”而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样拥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反对党，泽西没有任何政党体系。立法者财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够的研究人员和助手帮助他们为经理们的政策进行详细调查。地方政治活动也掌握在私产所有者和企业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脑（立法机构）都与该岛的司法官有关联，而司法官是由英国国王指派的，这意味着立法和司法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和区别。泽西唯一一家报纸——《泽西晚间邮报》，很多年来都是由岛上的最高层政治家掌控。泽西没有大学、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团。大约四分之一的适龄人口直接被岛上的离岸金融中心雇佣，其他大多数居民则靠经济体自身循环过程中的收入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就没有多大机会对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忙什么进行长期持续的严格调查分析。一个民主政体所需具有的检查和平衡机制的缺失给不当行为和腐败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特别是像泽西这样有着深厚因循守旧思想和隐秘性的小岛。《华尔街日报》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将泽西政体准确地描述为：“泽西……由一个团体在管理，尽管这些人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主力，但他们大多数是小企业主和农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管理着一个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全球范围的产业，大体说来……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²³

当我1987年就职时，泽西的银行和金融管理体制缺乏有经验的职员，而且受到政治控制。当时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规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来装饰门面。本来政府规定这些规章措施是必须贯彻实施的，



但泽西缺乏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执行能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泽西晚间邮报》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缺乏调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着泽西岛在履行实施国际金融诚信标准的义务上存在很大风险。²⁸退回到1987年，由于本应该对公司管理机构进行管制的高层政要同时又是公司管理机构的一员，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例如，皮埃尔·霍施福，一个旅馆经理，是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时，他还是州金融与经济委员会会长，并且还是财经事务部部长，而这个官方部门是负责管理银行业事务的。他的继任者，弗兰克·沃克，是一家报业集团的所有者，现在是泽西岛的首席部长，他将自己的管制职责与巴克莱银行的管理者职位结合起来。他们找借口说这些互相冲突的角色是为了让这些特殊安排给管制者了解离岸银行运作机制的机会，但事实上，这些互相重叠的职位表明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利益冲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为公务员，他们希望我们不要看到、听到、说到有关避税港的任何罪行。这种“三只猴子”的态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译者注）起源于大家对金融丑闻会毁了泽西的名声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畏惧。这种千方百计掩人耳目的策略风险很高，最后，当《华尔街日报》披露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银行的子公司与英国的一名通货贸易商罗伯特·杨的交易关系违反了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案时，它终于崩溃了。在对政治和金融利益间的重叠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曝光后，《华尔街日报》断言泽西是一个危险的离岸区，“靠松懈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存活”。纽约的副检察官约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锐，他评论说：“当法律需要它与犯罪势力合作时，泽西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要求它将那些犯罪分子隔离出来。”

在泽西岛上，如果有人问一些让人尴尬难回答的问题，就会被告知不要“将小岛的家丑外扬”。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建议“在次日搭艘船离开”。在这个小社会，没有有效保护揭发者的机制，没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这种姿态有效地压制住了反对者。结果，泽西民众就像很多小社会的人民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一位在医院当清洁工的老奶奶露丝玛丽·帕斯特拉纳曾公开反对将泽西岛作为避税港，她说：“泽西只会围着富人转，如果我们谈论避税港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断头台上，如果他们不能让你闭嘴，他们就会威胁恐吓你。”令人悲哀的是，岛上的离婚、酗酒、滥用毒品和家庭暴力问题都非常严重。

就像其他避税港一样，泽西的税收政策旨在创造一个对“微型母鸡”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税收环境。泽西对外宣称，泽西之所以吸引离岸企业是由于它的稳定和低税率体制，而且它还是资本进入伦敦金融城的一条重要渠道。这些言论都忽视了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这些让人忧虑的事情，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泽西被用来隐藏贪污的赃款和逃漏税，但岛上的高层人士却极力否认泽西是一个避税港。实际上，尽管税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数十年之久（由20世纪40年代初期，德军占领泽西岛时确定），但税务机关不断修改税收制度，创造吸引非居民企业来岛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部信托法，以确立在泽西设立离岸信托机构的执业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规以将某些免税企业归入一类特殊范畴，与本地经济体相比，这些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规，该法规允许成立“国际商业公司”，准许有非居民股东的公司按照它们在岛上登记的利润总额来商议税率，税率处于0.5%~2%之间。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围栏围护”起来以独立于当地经济组织，使它们免受居民企业和个人的利用，而且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税活动。2005年，政府当局决定将所有公司的企业所得税降低到零，以与其他提出这一税率的避税港竞争。2006年1月新法律开始生效，它允许“受保护的小公司”参与离岸保险活动以及将资产转换为证券再出售。

不断有来自合法避税行业的压力，要求避税港创造新的离岸公司实体类型。一些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正极力寻找合适的、能满足它们要求的傀儡政权，此时，如果缺乏比较优势，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岛经济体则可能会在政治上被它们俘虏。这解释了为什么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 & Young）和普华（Price Waterhouse，现在为著名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这两家会计公司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泽西的高层政



要快速通过创立一个不同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立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意在保护在它们由于审计疏忽而给股东造成损害时免遭股东起诉。这两家公司委托伦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费用超过了100万美元，接着与泽西立法机构的金融和经济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霍施福达成一致意见，由后者将其作为既成事实呈交给州议会。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这种向州议会呈交法规的方式，由于利益冲突，一起政治丑闻被捅了出来。该法规的反对者们争论道，这座小岛成了“出租立法权”的小岛，而且对泽西州政府如何成为跨国企业的俘虏表示了更广泛的关切。他们的担忧被上述两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所证实，这个合伙人随后在英国会计新闻界宣称：“我们完全可以保证该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给州议会，并通过（补充强调道）……9月份会出现在法令全书中。”^⑤

最终，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成了泽西岛法令全书的一部分，但在泽西，没有哪家企业采用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形式。自始至终，这一行动的真实目的都是为了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降低英国自己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管制力度——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泽西的统治者大多都从泽西岛的避税港法令中获得个人利益，他们很少因以这种方式出售岛屿的政治主权而感到内疚。尽管还有那么一些的政治家坚持立场，反对某些避税港法令提议，而且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公民激进主义分子团体在《卫报》上公开表示质疑，说“我们不想出卖我们的小岛。”但大多数岛民对这种使泽西州渐成俘虏的过程不闻不问。

由1997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规提交给州议会的方式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引起了英国政治家们的注意，包括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高级内阁成员。泽西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不受欢迎的境地中心，不仅仅是受英国政府欢迎。英国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财政部官员安德鲁·爱德华兹来检查泽西的管制行为，而且也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质疑，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是负责加强监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钱活动的机构。与此同时，作为工业化大国智囊团的经合组织（OECD）也于1998年发起了反对有害税收行为的公开活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像泽



西一样的避税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审查。

爱德华兹的调查报告于1998年发布，其中列出了对英属皇家领地的153条监管体系的改进措施，但是，它没有公开披露对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没有离岸信托机构必需注册的要求，没有公开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随一位政治家参加了安德鲁·爱德华兹的口头听证会，我们向他提议说，无论如何，泽西的离岸信托机构必需登记托管财产者和受益人的细节，而且应对年度财务预算进行归档。即使是这些小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我们对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机会又这样错过了。不幸的是，在忽视了更广泛的非法资金流动和逃漏税的情况下，通过承认针对恐怖分子和毒品资金的管制行为，IMF似乎将避税港合法化了。这种没有触及离岸信托机构隐秘性根基的变革是一种失败，这意味着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还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这样的公司。

■ 我们在次日清晨搭船离开

我在避税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税行业的政治腐败和破坏性活动的内幕。在此期间，每当面对与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门上司——泽西州首席顾问出现不合的境况时，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这种紧张状态有时候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我的部门毫无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续地超负荷工作时。我明白，我的经济顾问工作在外人看来就是将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岛外的朋友因我涉入这些事情而经常表示他们的不满。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97年，旨在通过将我的顾问工作角色约束在仅向高层政要进谏而非向整个州议会进谏，以此取消我的职业独立性的计划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在我40多岁时，我的两个儿子都到了上学年龄，此时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这个重重受限的职位上，还是听从我良心的安排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我并不喜欢离开泽西的想法。我已经在这个小岛深深扎根。当一条在小池塘里相对来说的大鱼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宁为鸡口，不



为牛后，而且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我还是可以让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岛上电影协会的会长，而且为 BBC 泽西电台作影评。周末，我在泽西岛的西海岸冲浪，参加双体船航行比赛。我的妻子同样也在忙她的美术事业，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这个小岛。安于现状的诱惑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对我们的乔治风格的市区住宅刚刚完成修葺后，我们正想着要好好享受一下这项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对而言较舒适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泽西。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心反省，1998 年 1 月，我辞掉了泽西公务员的工作，但同意干完 6 个月的公告期。我的辞职消息在《泽西晚间邮报》上刊登后，有一家猎头公司跟我联系，开出了两倍于我现在收入的价钱，希望我能加入一家离岸公司管理企业的管理团队。我知道这家公司，而且也喜欢它的管理团队，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它提供给我的这个机会。6 月底，我们组织了一个“明晨搭船离开”的聚会，跟我泽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别，两天后，我们登上了从圣赫利尔到英国威茂斯的渡轮。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泽西岛北海岸的峭壁渐渐消失在雾气中，感慨我自儿时就深爱的泽西岛现在却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以前自称自己是泽西人，并曾为此感到万分自豪，可现在我却感到万分羞愧，这个岛已被那些将它滥用作避税港的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泽西由于泛滥成灾的汽车和难看的办公大楼变得过度拥挤、物价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经的社会意义和个性。就像有天晚上—位泽西州的前议员杰瑞·多瑞在圣赫利尔艺术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样：“泽西已经建立了希尔顿酒店会客室那样的社交体系。它已经成了一个为追逐金钱而日渐被人们疏远的趋利者集合体。”我岛上的朋友认为我离开泽西的决定实在是太疯狂了。也许还是有那么几个人理解我离开的真正动因。事实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与这个离岸经济体系有任何的关联，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认为我们就是通过助长其他地区的贫困和不公来挣钱的。

我很快在位于伦敦和牛津之间的奇尔特恩丘陵（Chiltern 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咨询公司的管理工作，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风险评估。但我与离岸避税港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结



束。1999 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给了我一项咨询任务，请我加入一个小组调查避税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牛津饥荒救济委员的报告《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于 2000 年 6 月发布，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于跨国公司有害的税收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每年 500 亿美元的损失。不用说，泽西岛的政要和银行家都不会为我参与这些研究而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对小岛的抨击。”我在《金融时报》、《护卫者》和《世界报》这些国际报刊或者 BBC 的时事节目中对避税港的严厉批判都被视作对小岛的彻底背叛。而泽西州的公共宣传机构做得更过分，它们将我描述成一个充满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伦敦有两位 BBC 记者曾分别告诉我，他们都被泽西州高层警告说不许对我进行采访，原因是我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我才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我，泽西财政部——泽西岛金融行业的营销部门高级主管菲尔·奥斯汀曾联系她，含沙射影地说我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有联系。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个专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由文鲜明（Sun Myung Moon）所有的《华盛顿时报》上撰文诽谤我，²⁸滑稽的是，文鲜明在受到逃漏税指控时被宣判有罪。2005 年，我扬言如果《泽西晚间邮报》的主编克里斯·布莱特不发文收回对我的性格和动因的诬陷，我将向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告发他。他立即认输了。所有这些都很有趣，而且都是一些无聊的政治争斗，压根儿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税行业在受到合法调查时会变得怎样的气急败坏，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这些人都会搞邪门歪道；这里涉及巨额赃款；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家丑。

2002 年 11 月，很多民间活动群体、学界人士、记者、金融专家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汇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讨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我随英国学术界和活动参与者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对避税港影响的深刻认识和广博知识以及他们创立一个民间组织网络以将我们关注的话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决定让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间，我们都同意设立一个机构以配合研究和活动。4 个月后，在英国国会大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连线活动随后



立即扩展到欧洲、美国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创立连线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详述了对资本外逃和避税现象的关切，60年后的今天，民间社团终于触及了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持久贫困根源的核心。

■ 客厅里的大象

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民权运动的鼓舞，在10多岁的时候，我便开始致力于全球正义事业，尽管目睹了离岸经济体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我仍然保持着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义运动中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也相信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和勾销它们的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导致贫困的根源作斗争。这意味着要解决腐败、贪污、资本外逃和逃漏税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正是这些金融体系助长了上述行为的发生。由于有巴塞尔一号银行协议的优惠待遇条款支持，离岸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却没有任何措施约束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也没有取缔以逃漏税为目的的离岸账户和信托机构。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在过去10年中，大约有5万亿美元资金从较贫困国家流向西方国家，每年有1万亿美元脏钱流向离岸账户，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②

避税港对犯罪、腐败和偷税收益大开方便之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流动总是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从穷国流向富国，而不是像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反向流动。^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建设资金，而必须依靠外债和援助为公共设施融资，这些资金本来应该由税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财富都放在离岸区，这些财富处在离岸银行和信托机构的隐秘保护下，要么是全免税的，要么是大部分免税的，毫无疑问，如果不取缔避税港，减少贫困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上述很多论断在世界银行2006年关于减少拉美贫困的报告中得到了证明。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非洲和中东的情况更加糟糕，这也说明了长期失业、犯罪和社会紧张局势耗尽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尼



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国的国力。这头特殊的站在客厅里的大象已经庞大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掌握在离岸区的 11.5 万亿美元财产可不是笔小数目，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数目还在膨胀。

与国内权要的避税、腐败和贪污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也完全被同化了，它们广泛地利用避税港偷税。例如，多年来泽西就被欧洲利用来进口香蕉和咖啡这样的初级产品。而事实上，寒冷、多风的英吉利海峡并不出产这些热带水果，但名义上这些贸易都经过了泽西，部分原因是为了将利润转到离岸区，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这些市场已被极小一部分垄断公司控制的事实。英国政府估计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贸易名义上通过避税港，所以被非法转移的利润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离岸区的资金将“绕回来”：这些资金被非法转移到了开曼岛或海峡群岛的离岸公司，随后它们又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身份返回国内投资。这引起国内当局出台优惠税率、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此做法扭曲了当地市场，将国内企业置于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外逃资金永远地离开了本国而被投资于西方的国库券或大型证券交易所，或者瑞士、伦敦、佛罗里达和法国南部的不动产。

尽管将手提箱装满钞票也是洗钱的一个选择，但传真、电脑、因特网和复杂的秘密离岸公司及信托机构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被用来将黑钱转换成合法财富。面对越来越猖獗的非法资金流动，很多国家都试图对国际资金转移体系、无赖银行和避税港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没有实现自觉化和全球化，对并行的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经济体没有采取合适的抵制措施，那它们的努力注定会付诸东流。一位研究洗钱问题的专家引用一位瑞士银行家的话说，追踪流经该国的黑钱的行动失败率为 99.99%。^⑨这很让人吃惊，尽管在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 精英们的反叛

在处理这些全球金融体系顽疾时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法律无用、欠缺职



业道德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癌症一样在攻击市场体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义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则的公司董事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平等的平台上与那些试图将合法避税利用到极致的公司违法者们竞争。全世界的税收负担正日益从富人身上转到中产收入者和较低收入阶层身上。为了首先服务于超级富豪们的利益，发明和改造了各种手段以方便他们窃取全球财富。富豪们成了与众不同的一群，特别是在税收事务上。大多数人将财产放在泽西、瑞士和开曼岛这样的离岸避税港。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一心想着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们的财富可以自由流动，他们甚至能决定在哪儿缴税，或者要不要缴税。

地产巨鳄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说，只有小人物才缴税。当时，很多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震惊。到现在，事态恶化到这样一种地步：很多人都认为富人规避缴税。乔治·W·布什总统在 2004 年 8 月曾说，设法对富人征税是没有用的，因为“富人们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税。”^①

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秩序未能也无法满足 21 世纪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逃税和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来充实离岸银行账户，使国内滋生了普遍而长期的怨恨情绪，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低水平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匮乏。但这种状态也不是无药可医。很多此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各国政府间的有效信息交流对克服资本外逃和逃漏税问题有很大帮助。银行隐秘性所造成的障碍可以通过将主要的条款嵌入国际条约来克服。可以通过要求登记离岸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细节来降低其隐秘性。那些人因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受益，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们身份的基本信息的义务。可以采用全球框架体系对跨国企业征税，征税依据是创造利润所在地。像这些政策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实施。对那些想尽快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途径。

【注释】

①约翰·克瑞斯滕森，“备受关注的合作社运动新趋势”，《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



(马来西亚), 1985年12月14日, 第11页。

② “马来西亚银行与合作社危机的抗争”,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英国版), 1986年8月12日。

③ 摘自 http://al_qaeda.sitemynet.com/alqaeda/id3.htm, 2002年9月23日。

④ 马克·汉普顿, 《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港——全球资本的风险》(伦敦: Macmillan, 1999)。

⑤ 雷蒙德·贝克, 《资本主义的要害》(霍伯肯, 新泽西: John Wiley & Sons, 2005), 第62页。

⑥ 引自《今日报》(*This Day*) (拉各斯, 尼日利亚), 2005年6月6日。

⑦ 《洗钱和外交腐败: 爱国者法的执行和有效性——有关瑞格士银行的案例研究》, 摘自美国参议院调查问题常设小组委员会编写报告, 2004年7月15日, 第28页。

⑧ 摘自 www.economist.com/research/Economics/alphabetic.cfm, 2006年12月12日。

⑨ 税收竞争联盟 (Coalition for Tax Competition) 发布的新闻, 2005年4月7日。

⑩ 西蒙·J·帕克, 玛丽·E·德·博伊和约翰·S·左丹努维科夫, 《国际贸易中因不当定价所导致的资本外流规模估计: 俄罗斯—美国情形》, 艾塞克斯大学税收竞争和合法避税研讨会报告书, 2004年7月1—2日。

⑪ 奥斯汀·米切尔和普雷姆·西卡, 《驯服公司》(巴兹尔登, 英格兰: 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 [Association for Accountancy & Business Affairs], 2005年)。

⑫ 《美国合法减税行业: 会计师、律师和财务专家的角色——四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案例研究》, 摘自美国参议院调查问题常设小组委员会编写报告, 2003年11月18日, 第15页。

⑬ 奥斯汀·米切尔、普雷姆·西卡、约翰·克瑞斯滕森、菲利普·莫里斯、史蒂文·菲林, 《避税港没有会计制度》(巴兹尔登, 英国: 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 2002年)。

⑭ “利伯曼说合法避税应该有经济实质以遏制因避税而存在的行业”, 摘自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 2003年11月18日。

⑮ 埃伦·迪尼奥特, 《保罗·马丁公司: 关于避税港法律性质的60个论题》(温哥华: Talonbooks, 2006)。

⑯ “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 刊登于《天眼》(*Private Eye*) “在都市”专栏, 2006年2月17日。

⑰ “区域避税”, 摘自《尽你所能向我们征税》(伦敦: 税收公平连线 [Tax Justice Network], 2005)。

⑱ 见 www.ghanaweb.com/public_agenda/article.php?ID=4824, 2006年2月12日。



①⑨《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 2006年2月22日; 见 www.institutionalinvestor.com/default.asp?page=1&SID=614639&ISS=21302&type=12, 2006年2月24日。

②基利蒙·E·佩里, 亨伯特·洛佩兹和威廉·F·马罗尼,《贫困的减少和增加——良性和恶性循环》(华盛顿:世界银行, 2006年)。

③《离岸区价格》(伦敦:税收公平连线, 2005年3月)。

④《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牛津: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2000年6月)。

⑤“离岸风险——泽西岛并非货币投资者的避难所”,《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1996年9月17日, 第1版。

⑥哈利·麦克兰德,“金融犯罪: 500例荟萃”,《泽西晚间邮报》(*Jersey Evening Post*), 2006年2月9日。

⑦《会计》(*Accountancy*), 1996年9月, 第29页。

⑧理查德·昂,“税收公平的不公正性”,《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 2005年4月。

⑨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第172、173页。

⑩K·古哈,“全球化: 战利品的分赃——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害怕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的‘粗放’增长”,《金融时报》, 2006年8月28日。

⑪同上。

⑫“富有的逃漏税者这么说布什——是诚实的闪光还是口误?”太平洋新闻通讯社(Pacific News Service), 新闻评论, 露西·科米萨, 2004年9月9日。布什总统2004年8月9日在安南戴尔的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演讲时所言。完整的引述是:“在税收方面, 只需要记住, 当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 我们正准备提高某些人的税收, 最重要的是, 真正富有的人挖空心思逃漏税, 这使得小公司业主最终承担了很重的税负。”

美国到底是怎样利用离岸银行来私运枪支、资助伊斯兰圣战战士和洗黑钱的？沙特阿拉伯酋长和美国内部知情人士又是如何骗取了存款者的上百亿美元的呢？他们最终又是如何把这笔资金转移出境的呢？

第4章 BCCI的两面派手法： 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

露西·科米萨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罗伯特·盖茨曾经称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为“国际骗子和罪犯的银行”。它是军火商和毒品贩子的亲密搭档。它还跟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它是布什家族亲密者和其他华盛顿位高权重者的一部分。它最大的股东是沙特和阿联酋的酋长。大陪审团一定会认为洗钱专家 BCCI 的“公司策略”和它所窃取的财富——大约在 95 亿 ~ 150 亿美元之间——使它 20 年的巧取豪夺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欺诈。这些诈骗所得中的大部分是永远都无法弥补回来的。这起大规模诈骗东窗事发时，当政的乔治·布什政府对事件的追踪调查心不在焉，只是在受到纽约地方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起诉时才开始上心。但调查从未触及世界上那 70 多个金融中心的离岸体系，这些离岸区域银行账户和公司所有者的信息对执法者都是高度保密的。它也从未触及那些控制 BCCI 这家犯罪企业的波斯湾投资者。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布什家族及其联盟者是如何利用它，并以此保护世界上大多数犯罪银行的。

BCCI 于 1972 年由巴基斯坦银行家阿迦·哈珊·安白第创立，得到了阿布扎比酋长国首脑兼阿联酋首领的酋长扎耶德·本·苏尔坦·阿勒纳哈



扬的支持。

美国银行持有 BCCI 四分之一的股份，尽管美国银行较早地脱离了 BCCI，但因其自身的不道德行为而仍有嫌疑。BCCI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致力于在发展中世界树立自己的权威，在那之后跃升为大联盟集团。

■ 武器渠道

诺曼·贝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职员，他负责通过追踪美国资金的运动监控世界恐怖主义，1981 年，他开始注意到了 BCCI 的特殊重要性。NSC 获悉 BCCI 涉嫌“恐怖活动、技术转移，包括不经批准就将美国技术转移给苏维埃集团、武器交易、操纵金融市场”，^①另外还有私运枪支、游击运动、触犯禁运和联合抵制法令等犯罪。BCCI 还例行公事地为非法武器交易商提供伪造证明和信用证。

诺曼·贝里同样也意识到了 BCCI 和 CIA 之间的关系。BCCI 事实上已经成了 CIA 的秘密银行，替它处理世界各地谍报研究中心的资金。CIA 局长威廉·凯西还好几次在华盛顿的马德松酒店会见阿迦·哈珊·安白第，该酒店就在《华盛顿邮报》的街对面。^②CIA 利用 BCCI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和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来接收一笔大约 20 亿美元的资金，这笔钱是美国汇给奥萨马·本·拉登的圣战者的，以帮助他在阿富汗与苏联势力作斗争。BCCI 管理着这笔美国汇给圣战者的援助资金，而巴基斯坦军队和政府官员却趁机从中揩油。另外，BCCI 还挪了一部分资金给沙特的情报活动。对圣战者而言，BCCI 充当的远不止是一个银行的角色，它还打点了卡拉奇的港口和海关以保证其武器通道能畅通无阻，它甚至还组织了走私护卫队将武器运送到阿富汗。

圣战者通过数十亿美元的金新月毒品贸易资金来换取他们活动所需的武器。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份成了从阿富汗输入毒品的主要途径和中转站。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曾去过边境主要城市白沙瓦，在这个脏兮兮的城镇里，两个轮子的马车还在跟四个轮子的汽车竞争，当地市场除了出售五花八门的 burkhas 服饰，还出售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售货员亲切地向外



国顾客示范如何使用。我当时是去白沙瓦调查美国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的，于是就在边境逗留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美国和它的沙特伙伴正在给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运送大把的钞票和武器，后者是伊斯兰协会 Hezb-i-Islami 的创始人和首领，是伊斯兰主义武装派系中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我获知巴基斯坦军方，也就是负责这次运送的中间人，从中拿走了很大部分的武器和现金给阿富汗叛乱者。

10年后，随着我开始集中精力调查秘密离岸银行系统，我发现，在试图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时，BCCI 的行为足以让美国企业分析家们叹为观止，它成了每一个卷入区域秘密武装行动人员的主要银行，它为武器和毒品商、圣战者、巴基斯坦人和 CIA 管理账户。

CIA 的资金从美国出发，经过拿骚的阿尔-塔克瓦 (Al-Taqwa)，再到巴巴多斯，到卡拉奇，最后到达伊斯兰堡的 BCCI。Al-Taqwa——名字的意思是“敬畏上帝”——它不是一家用砖头水泥搭建、有存款者和业务服务的真正银行，它不过是为了给圣战提供资金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空壳银行，事实上，它仅仅是瑞士私营银行里的一个对应账户，是前瑞士腐败的意大利安保信银行 (Banco Ambrosiano，“梵蒂冈银行”) 的一个子公司、意大利安保信银行 1982 年因贪污了超过 10 亿美元的顾客账户资金而垮掉了 (这个故事成了著名的《教父Ⅲ》中陪衬情节的灵感来源)。BCCI 还操控毒品交易所得资金和支付给巴基斯坦军队和官员的费用。

BCCI 的运作给奥萨马·本·拉登上了关于离岸秘密金融的生动一课，于是在组织圣战者反对美国时他就把这给用上了。CIA 对它的学生的能力认识得很深刻。“9·11”事件后，美国的密探们直接将矛头指向瑞士、列支敦士登和拿骚的阿尔-塔克瓦银行，把它们全关了。瑞士警方审问了阿尔-塔克瓦的主席约瑟夫·穆斯塔法·纳达，后者是激进伊斯兰教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瑞士官方还搜查了他位于意大利卢加诺湖旁的避税港金皮庸的家。

2002 年的某天，我从瑞士这边的卢加诺坐船到金皮庸。纳达看起来大约有 60 多岁的样子，在码头同我碰了面，然后驱车七弯八拐地带我去了他山顶上的宅邸，那房子的客厅奢华堂皇，装饰有华丽的浮雕，内嵌式的家



具设施让我想起了曾在伊斯坦布尔见过的蓝庙。纳达极有修养的风度举止与房内高雅的环境很协调。他叫一个仆人给我们来了点饮料。

我已调查瑞士私营银行数年，与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当中有个情报员曾经给我发了一份机密名单，上面记载了拿骚阿尔-塔克瓦银行的股东，其中列出了本·拉登家族的成员。

我拿出那张名单跟纳达对质，他立即承认说那些都是真实的。他说：“你可以问尼卡提先生（瑞士联邦副检察官）。他调查了所有这些事情。FBI 甚至 3 年前就知道了。”然后，他又自我更正道：“他们从 1997 年就知道了。我跟他们谈过话……本·拉登的姐妹？你去问尼卡提先生吧。这故事有点古老，他们知道的，FBI 知道，财政部也知道。是他们写下这张名单并把名单的照片带过来的。”

采访到此结束。纳达开车送我，过了连接金皮庸和卢加诺的桥后，他把我送至火车站就走了。

跨越了大半个地球，BCCI 和 CIA 间的联盟在美洲各国都非常有效率。NSC 职员奥立佛·诺斯在巴拿马设立空壳公司和秘密 BCCI 账户，以处理 1985 年和 1986 年向尼加拉瓜康查斯叛军和伊朗出售武器的 2000 万美元支付款。作为非法运作的一部分，BCCI 为 1250 件美国陶式反坦克导弹提供了超过 1100 万美元的融资，这些导弹被出售给了伊朗革命卫队以换取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的获释。美国开出的支票都在 BCCI 的巴黎分行兑付，这笔兑付——并不让人惊讶——在美国执法机构稍后的调查中发现，其账户没有任何记录。BCCI 还掌握着里根-布什政府给巴拿马强人曼纽尔·诺列加的报酬，在 CIA 的建议下，曼纽尔·诺列加也成了 BCCI 客户。作为美国计划的一部分，叙利亚毒品贩子、恐怖分子和军火商芒扎·阿尔-卡萨与伊朗做了笔交易，卖给伊朗价值 4200 万美元的武器，其现金是通过 BCCI 的离岸银行开曼岛分行支付的。

BCCI 还与它华盛顿的支持者同谋一起帮助过萨达姆·侯赛因。该银行向意大利政府所有的国民劳动银行（BNL）的亚特兰大分行分拨转移了数百万美元，该分行是在伊朗的国人的银行，所以从 1985~1989 年，它能秘密地贷给萨达姆 40 亿美元买武器。美国国会议员亨利·冈萨雷斯 1992



年在BNL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会上，他援引一份CIA档案的机密报告，证明CIA一直都知道BCCI头脑参与了美国分行向伊拉克的贷款活动。

这笔贷款的佣金有15%被BNL作为回扣给了伊拉克的领导者们，回扣通过BCCI设在开曼、卢森堡公国和瑞士的分行进入他们的银行账户。BNL是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客户，亨利·基辛格与布伦特·斯考克洛夫特都在该银行的国际咨询部任职，而布伦特·斯考克洛夫特当时即将成为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由于这重关系，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的支付虽然故作义愤，但表现得很不真诚。布什和他的朋友们知道，萨达姆在他们的注视下将这些支付都装进了自己腰包：他们最中意的犯罪银行正在调拨资金。然而美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9·11”前的特大事件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与美国军队和它的同盟军对上阵了，其所用武器正是用BNL提供的贷款购买的。

另一个满意的武器买主是恐怖分子阿布·尼达尔，他是法塔赫和黑九月组织的巴勒斯坦创始人。他1981年就成了BCCI的客户，他用6000万美元的伦敦存款来支付武器购买和军事后勤的费用。某个伦敦BCCI的银行经理嘎山·卡塞姆在别人将刊登在法国新闻杂志《快报》(L'Express)上的阿布·尼达尔照片拿给他看时，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客户竟然是被紧急通缉的恐怖分子。这个经理把这个信息提交给了BCCI总部，但却被告知：“立即销毁它，回你的分行去，永远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事，因为现在总经理已经满脑袋的问题了，他可不希望再火上浇油。”卡塞姆转而向军情五处(MI5)报了警，MI5是英国的一个情报部门，调查从一个叙利亚情报特务的BCCI账户向阿布·尼达尔的某个代理人的支付款情况，1986年，这个代理人曾企图利用他的女朋友从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以色列航班走私一枚炸弹却失败了。后来英国向CIA提出警示，而CIA却表现得很不在意——也许早就知道了。^③

银行的毒品交易客户也不是只有政客。

阿联酋是那些知名银行股东的家乡，也是非常适合洗热钱的场所。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毒品强制执行管理局(DEA)、美国国税局，当然，还有CIA，都知道BCCI参与洗可卡因黑钱的活动，它还在哥伦比亚



建立了很多分支机构为麦德林和其他毒品垄断集团管理账户。根据 1986 年 CIA 的一份机密报告，“我们认为 BCCI 的很多非法银行活动，特别是那些跟西半球的毒资有关的活动，都集中在开曼岛的分支机构。”^④DEA 的 C - Chase 行动组发现了 1900 万美元是通过 BCCI 在巴拿马、日内瓦、巴黎、伦敦和拿骚的分行非法转移的，C - Chase 行动组让 BCCI 第一次站在了美国法院的被告席上。

■ 离岸区的奥秘

安白第于 1976 年将 BCCI 的总部迁到伦敦，但银行实际上的运作仍然是通过离岸中心网络进行的，特别是卢森堡大公国和开曼岛，还有黎巴嫩、迪拜、沙迦和阿布扎比，后三个是阿联酋的酋长国。

离岸银行和公司的奥秘就是解开 BCCI 运行和欺诈之谜的钥匙。

离岸中心——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避税港——允许客户用隐蔽或者捏造的所有者开立银行账户。他们注册“空壳公司”，把它放到“代理人”的名单里，雇用挂名负责人，然后把它们列入控股公司、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各个层次。这些资料都分散到了数不清的离岸港。其目的是为了在转移资金时掩人耳目，让人找不到踪迹。没有哪个政府能弄明白骗子公司们到底在做什么。也没人能解释清楚这一系列的虚假交易。离岸港被毒品贩和军火商、独裁者、恐怖分子、贪官污吏、逃税者和其他欺骗者用来藏匿和转移资金。离岸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上的大银行希望它们存在——它们从那些诡秘的分支机构捞取油水。BCCI 不会发明什么更好的体系来取代当前的这个体系。

BCCI 在离岸金融中心卢森堡进行了合并。于是 BCCI 控股诞生了，由卢森堡的 BCCI SA 处理欧洲和中东事务，由位于同样是离岸港的大开曼岛上的海外 BCCI 处理发展中国家事务。BCCI 的国际信贷和投资公司是位于开曼的分支机构，它是“银行中的银行”，到 1990 年时它还仅仅只有一个邮箱，而就是这个只有一个邮箱的公司却拥有超过 75 亿美元的财产。审计职能被分配给了恩斯特 & 威尼公司（Ernst & Whinney）和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但它们并不互享彼此的审计信息。英格兰银行被指控犯有长达 15 年的渎职罪，而它却说一切运转正常。

到 1977 年，BCCI 在 43 个国家拥有 146 家分支机构。它的资产也从 2 亿美元上升到 22 亿美元。美国银行因其惨淡的贷款业绩感到了一丝不妙，在 1978 年撒手撤出——但是没有向美国预警局发警报，这本是可以给股市重重一击的，但由于美国银行保持了沉默，使它在股市赚得钵满盆满，将一笔 250 万美元的投资变成了 3400 万美元。沉默是金啊！

到 1983 年，BCCI 在 68 个国家拥有 360 家分支机构，其中，91 家在欧洲；52 家在美洲；47 家在远东、南亚和东南亚；90 家在中东；80 家在非洲。到 80 年代中期，它扩展到了 73 个国家，资产上升到 220 亿美元。

贿赂中央银行高层和财政部官员能为它赢得中央银行存款，或者有时候能获得管理一个国家使用美国商品信用的权利，或者获得在一个有货币管制的国家转移资金时的特殊待遇，或者获得在某国拥有一家银行而外国人却不被允许的权利。在智利，通过在巴拿马瑞士银行的 300 万美元，BCCI 从阿兰·加西亚政府那里赢得了 2.5 亿美元存款。

总共，BCCI 将下面这些国家的官员都拖下了水：阿根廷、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巴西、喀麦隆、哥伦比亚、刚果、加纳、危地马拉、印度、象牙海岸、牙买加、科威特、黎巴嫩、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沙特、塞内加尔、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突尼斯、阿联酋、美国、赞比亚、津巴布韦。

BCCI 深谙如何从犯罪公司收取利润，而对如何经营正常业务却很不在行。1983 年，它设立了一个部门从事股票和商品市场的交易。为了诈取税收，交易都在伦敦执行，而在对银行欺诈示好的避税港开曼岛登记（花旗银行也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货币贸易中使用过同样的手段，但是，1981 年，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了它的这种税收欺诈行为，刚上任的里根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主管、委员会律师约翰·M·飞达士放了花旗一马，解释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触犯税收和交易管制法规的公司就是坏公司的理论……”安白第肯定也看到了这则新闻报道）。BCCI 的证券经纪人在 1979~1986 年的美国国库券投机交易中的损失超过 8 亿美元，但他们将亏



损转移到开曼以隐瞒这些记录。

■ 位高权重的朋友

一家深陷犯罪活动的银行对著名朋友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安白第转向了中东，在那儿，他发现了很多大投资者。

阿布扎比酋长扎耶德和他的家人缴税不超过 50 万美元，但他们却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 BCCI 股权，这无人能敌。他的很大一部分投资都是无风险的——具有有保证收益率和回购协议。酋长克马里·阿德汗在 1963 年到 1979 年担任沙特情报机构的首脑，同时也是已故沙特国王费萨尔的内弟，他是这片地区的 CIA 联络员，后来成了 BCCI 的最大股东。乔治·布什先生从他 1975 年开始管理 CIA 起就知道阿德汗这个人物了。另一个投资者是王子图尔基·本·费萨尔·阿尔沙特，他后来接任阿德汗成为沙特情报机构的首脑。

利用它积聚的现金，BCCI 向股东和其他与银行关系密切者贷出了大约 20 亿美元的内部人贷款。例如，克马里·阿德汗借了 3.13 亿美元，这包括他购买股份的钱。法赫德国王顾问的儿子盖思·菲冉昂也是 BCCI 的投资者，在该银行非法购买 3 家美国银行时，他是名义负责人。共获得了 3 亿美元的贷款。

这些阿拉伯赞助者的贷款都是一气呵成，名义上是通过在离岸银行的资金划转支付的。BCCI 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指骗人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以后来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者以诱使更多人上当——编者注）。当巴基斯坦银行家和他们的朋友提款时，这些钱是由 140 万存款者来支付的，其中很大部分的存款者都是南亚小商人和移民。

阿拉伯国家在这家银行的利益远不止于金融。一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关于 BCCI 的机密 CIA 备忘录这样说到：“它的主要股东都是中东的权要人物，这包括迪拜和阿联酋的统治者，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沙特阿拉伯人。相对获利能力而言，他们对促进穆斯林事业更感兴趣。”^⑤ 阿布扎比王子对



BCCI的“专门礼仪部门”所提供的好处很感兴趣，据参议员约翰·克里后来的调查，该部门向大投资者提供妓女，特别是十几岁的处女。

BCCI还有些美国朋友。

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及其联盟

吉米·卡特是通过他的财政部长伯特·兰斯结识安白第的，伯特·兰斯曾因在一个佐治亚州银行的某次投资中深陷困境而被 BCCI 踢了出来。坐着 BCCI 的波音 707，卡特陪同安白第去了一趟非洲，其目的在于让那些国家的官员将外汇储备存到 BCCI。作为回报，前总统从 BCCI 那儿为卫生项目揽到了 800 万美元的捐款。在 BCCI 面临刑事诉讼时，卡特一定会出面保护它。

兰斯还把安白第介绍给了卡特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时的室友杰克逊·斯蒂芬。斯蒂芬是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斯蒂芬公司——华尔街之外最大的私人投资银行的所有人，他帮助 BCCI 铺平了在美国的道路。

安德鲁·杨，卡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后来任亚特兰大市长，他每年从 BCCI 抽取 5 万美元的律师顾问费，同时，他还从 BCCI 获得了一连串的贷款，后来有 15 万美元贷款余额被银行豁免了。杨的功劳主要是给安白第介绍了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众多商界和政界官员，替安白第争取到这些国家的央行存款。

共和党人：布什家族及其联盟

布什家族是通过德克萨斯州商人詹姆斯·R·巴斯而与 BCCI 股东卡立德·本·马赫福兹联络上，并建立起与该银行的联系的。巴斯以本·马赫福兹的名义在美国投资，他们俩与盖思·菲冉昂分享休斯敦主办银行的所有权。1976 年，当乔治·布什先生还是 CIA 首脑时，情报局卖了一些美国航空的飞机给巴斯和本·马赫福兹名下的仕格维公司，这些飞机可是当时美国的稀罕货，越南战争就用到了这种飞机。于是在 1979 年和 1980 年，巴斯给小布什的石油公司布什能源公司提供了一些经费。

兼并了布什能源公司的哈肯能源公司，在 1987 年陷入了财务困境，卡



特的朋友杰克逊·斯蒂芬帮助它从瑞士联合银行获得了 2500 万美元的融资。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哈肯股东阿卜杜拉·塔哈·巴哈尔酋长得到了董事会的一个位子，酋长的首席银行家是本·马赫福兹。当乔治·布什先生当选 1988 年总统时，哈肯公司也得到了一些好处——一些新投资者，这包括萨勒姆·本·拉登，他是奥萨马·本·拉登和卡立德·本·马赫福兹的同父异母兄弟。奥萨马·本·拉登自己当时正在别的地方——组建基地组织。

■ 买进美国

BCCI 的子公司遍布全世界，但它必须将触角伸到美国。它的资金转移都是以美元形式进行的，作为一个没有美国营业执照的离岸机构，它不得不利用美国银行作为其代理银行。代理账户是指某家银行在另一家银行开立的账户，通过这个账户该银行可以为自己和其客户进行资金转移。但 BCCI 有点难言之隐，因为它不想给美国银行提供资金划转所必需的文件档案。不然那会让它的洗黑钱活动没法顺利进行，而这可是它的一部分核心业务。它本来试图买下纽约的切尔西国家银行，但却被纽约州当局拒绝了，因为 BCCI 公司被分成了两个离岸中心，这意味着没有银行监管者可以看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

所以安白第决定对监管者耍点小诡计以渗透进美国的银行体系。安白第还是很幸运的，其他的美国银行监管者并不像纽约当局那样古板。BCCI 在美国那些享有威望且跟政府关系密切的赞助者和波斯湾的富豪朋友帮助下买下了一些银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BCCI 拥有了 4 家大银行，包括佐治亚国民银行和 FGB 银行（后来更名为第一美国银行），这些银行在哥伦比亚、佛罗里达、佐治亚、马里兰、田纳西和弗吉尼亚地区开展业务。这是将黑钱转移到美国金融体系的较好方式。

盖思·菲冉昂——布什的朋友詹姆斯·巴斯和卡立德·本·马赫福兹的沙特同伙——是购买佐治亚国民银行和其他银行时的名义负责人。他用 BCCI 的贷款以两倍的市价购买了伯特·兰斯在佐治亚国民银行的股份。兰



斯在阿肯色州的朋友杰克逊·斯蒂芬帮忙组织了这一起股票收购。兰斯，当时正处在财务困境中，也从 BCCI 获得了一笔 340 万美元的贷款——既无担保也无固定利率。

BCCI 的另一个支持者是克拉克·克利福德，他是林登·约翰逊的国防部长，也是几届总统的顾问。20 世纪 70 年代我采访他时，他将我带到他办公室的窗户那儿，向我炫耀从那儿可以多么清楚地俯瞰白宫。跟权力如此接近！兰斯把他介绍给了 BCCI，克利福德和他的门徒罗伯特·A·奥尔特曼秘密地——也是非法地——帮 BCCI 买到了 FGB 银行。在 FGB 银行更名为第一美国银行后，克利福德成了该银行的主席，而奥尔特曼出任首席执行官。克利福德还是 BCCI 和“第一美国”的法律顾问。

BCCI 的秘密股东包括克马里·阿德汗酋长、图尔基·本·费萨尔·阿尔沙特王子、另一个沙特情报局负责人阿卜杜尔·乌夫·哈里尔、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酋长和巴林总理，而这位巴林总理的兄弟，也就是巴林的统治者，将其著名的海外钻探合同给了哈肯能源公司。由本·马赫福兹和他兄弟控制的 5 家代理公司购买了第一美国银行的股权。这些秘密所有人的名义负责人是前密苏里州参议员斯图亚特·西明顿、已退休的空军少将埃尔伍德·科萨达、已退休的陆军上将詹姆斯·M·加文·西明顿——他在 1960 年参加了民主党主席候选人提名，当时克拉克·克利福德是他竞选活动的理事，詹姆斯·M·加文·西明顿成了信贷商业美国控股公司的主席，这家控股公司是一家位于芬兰离岸港安的列斯群岛的空壳公司，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用 BCCI 的钱来购买美国的银行。

BCCI 的美国名义负责人为获得“第一美国”而寻求政府许可，他们向联邦储备系统保证在投资资产基金时的资金补充将来自于跟 BCCI 无关的银行，美联储管理着联邦银行。由铁面无私的保罗·沃尔克领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有证据表明 BCCI 的确站在这些交易的幕后，但却没有起什么作用。CIA 和国务院告诉联邦储备委员会说，它们对这起购买背后的中东人并不关注。BCCI 的“雇用枪手”克利福德和前联储干事鲍德温·塔特尔总算是长长地舒了口气。

唯一的反对声来自西德尼·贝利——金融机构的弗吉尼亚州督察，他



注意到这家公司是由一系列国外投资者通过在美国之外注册的空壳公司所有的。这些钱都来自担当 BCCI 名义露面者的一家法国小银行。后来贝利说：“我觉得就像是荒野里的呼声一样无人理睬。美联储对我说的丝毫不予关心。”^⑥

克利福德在第一美国银行当了 13 年主席，也做了 13 年的 BCCI 律师，但稍后他宣称不知道 BCCI 控制着这家银行。奥尔特曼在被问到“第一美国”的股东是否从 BCCI 借钱时，他也扭曲事实真相，声称：“我们无从获得这些信息。”可能其他地方还有记录，但 BCCI 曾贷款给克利福德和奥尔特曼，他们先买进然后卖出 BCCI 的股票，这些交易让克利福德赚了 650 万美元，奥尔特曼赚了 330 万美元。

毫无疑问，“第一美国”对该如何交朋友很内行。它曾贷了 100 万美元给里根政府的官员迈克尔·笛福，这位先生于是就成了沙特的说客。它还贷过款给保守党记者罗伯特·诺瓦克。它的董事会包括议院说客伟达公司的罗伯特·格雷（曾在国会给困境中的 BCCI 进行疏通活动）和小卡尔·G·哈尔——他是“航空宇宙”说客，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业务协调委员会（监督 CIA 的秘密活动）任职。CIA 在 BCCI 和“第一美国”有几个账户，^⑦这些账户为将至少 50 万美元的美国政府资金转移给巴拿马的曼纽尔·诺列加提供了便利。

■ 克里的调查和坦帕事件

华盛顿律师杰克·布卢姆在 1972 ~ 1976 年间曾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副顾问律师，他在位期间，曾处理了委员会就美国公司接受国外贿赂以及对国际石油产业的调查。在此之前，他是美国参议院反托拉斯和垄断小组委员会的助理律师。他是一位热心的反腐人士，了解很多美国政府内的犯罪活动。

他被约翰·克里的恐怖主义、毒品和国际运作小组委员会雇为专门律师，以调查毒品法律的实施与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的关系。从那时到现在，里根政府通过尼加拉瓜康查斯叛军保护者来压制对毒品交易的曝光，克里



仍希望弄清楚美国外交政策和毒品走私之间的关系，但受到参议院的阻挠。最后，他从1987年开始听证会，一直持续到1988年。

布卢姆向我解释：“外交委员会正在考虑毒品走私与军火交易间的联系，还有我们实施外交政策的方式。我们是否忽视了目前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而跑去支持尼加拉瓜战争？我们陷入了洗黑钱的问题中。”布卢姆说他偶然发现了李·里奇，他因毒品走私刚从美国监狱服刑出来。里奇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但因他父亲的原因，他是开曼岛的公民。他告诉全体陪审员：“我以前在开曼岛洗钱。美国知道了这事，银行家们告诉我转去巴拿马洗。在巴拿马，我被告知我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是诺列加。他把我送去了BCCI。”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山姆·贤是常务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他也曾在自己的听证会上听到了相同信息，可是他没有理会。司法部也没有理睬这条信息。

布卢姆说：“我们四处刺探消息。我发现了一个曾在BCCI工作的家伙。我是在迈阿密碰到他的。他说：‘这是他们工作的主要方式。他们是一帮罪犯。’他继续说，除了管理毒资，他们还管理诺列加的个人财产，那些人现在就住在迈阿密。诺列加还持有一张BCCI的维萨信用卡。”所以布卢姆获得了那个信息。

乔塞·布兰登，前巴拿马外交官，跟诺列加反目成仇。他告诉布卢姆，BCCI是诺列加的银行，在大规模的犯罪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转移麦德林垄断集团的资金。布卢姆同意让联邦海关署从另一间房子听证言并录音。当税务司威廉·瓦·拉布问CIA对该银行的看法时，副局长罗伯特·盖茨却向他撒谎。布什的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利告诉拉布不要掺和进这宗案子。拉布被从调查中排除了，当他坚持时，就有人要求他辞职。

布卢姆从BCCI拉美运营部的首脑、诺列加的私人银行顾问阿姆贾德·艾莞那儿也听到了关于BCCI违法活动的相同事情。他让艾莞承认BCCI有犯罪客户、非法转移毒资、秘密拥有和控制第一美国银行。

坦帕，位于佛罗里达州一个伸进墨西哥湾的海港的阳光港口，以手制卷烟、捕虾、磷肥航运而驰名。它吸引了一些佛罗里达州西海岸的旅游者、



附近空军基地的职员以及一些不怎么体面的人物。BCCI 丑闻就是那年由坦帕的一起毒品走私事件引发的。布卢姆说：“我们认识到，在 C - Chase 行动组的坦帕毒品走私调查中，由于洗黑钱活动，未来将有一场逮捕运动。我们从非法转移毒资开始调查，但越查越深入，从证词里发现这家银行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犯罪。做了这些以后，我们写了一份报告说这事需要作进一步调查。但司法部没有很快地理解这些线索。我告诉他们，我有该银行的一位重要人物（艾莞）可以出庭向政府提供证据，而政府却不想听。我跟一些密探在迈阿密一家旅馆的房间给艾莞录了 3 天的音，但政府却没有听录音带。”

布卢姆说服了两位 BCCI 的前官员面见坦帕的联邦检察官。这两个检举人都相信而且宣称 BCCI 控制着“第一美国”。联邦检察官发了几张传票后，并没有对这些证词进行调查，甚至只是把这些信息给了 FBI 和其他一些机构。布卢姆说，“Fed（俚语，联邦调查局人员——编者注）只想把这个案子限定在坦帕，他们不希望调查别的枝枝蔓蔓。他们的说法是他们有自己的案子，不想与其他无关的事情搅到一起。这是一种认为其他事情是无关的、会扰乱他们思绪的观念！”

1988 年 10 月，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个月，该银行和它的 8 名雇员因为涉嫌为麦德林垄断集团非法转移数百万美元资金而遭起诉。起诉并没有涉及诺列加，他还在 CIA 的薪水册中，这种关系是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管理该局时就开始了的。布卢姆给克里提了一个醒，那时的克里已经宣誓作证，说诺列加与毒品走私和 BCCI 有干系。

但司法部的首席检察官理查德·索恩伯与 BCCI 达成了申诉协议，协议中，被告都伏法认罪。5 个巴基斯坦银行家获刑 3 年到 25 年监禁。令人稀奇的是，他们的律师都不许他们自己申诉，这本来可能会减轻他们的刑罚，但这会泄露 BCCI 的信息。司法部喜欢将讼案缩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它拒绝援引诈骗、操纵和贿赂组织法（RICO 法）——为帮助调查毒品走私贩和有组织犯罪的检察官而设立——这预示该银行的财产可能会被没收。

BCCI 的罚金是 1400 万美元——差不多正好是密探们所提出的毒品走私贩的存款额！坦帕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同意不会以其他的“在执行该协议



时那些正被调查和已为政府所知的”联邦犯罪行为控诉 BCCI 和它的附属机构。司法部甚至给政府管制者写信让他们保持 BCCI 的正常营业！这次协议使 BCCI 得以继续运转，也阻碍了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官员透露更多信息。

克里批判这份协定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注脚，国家本应对洗钱给予充分重视的……当银行蓄意参与洗钱时，就应该将它们关闭。”当司法部反驳说没有哪部法律允许政府关闭参与洗钱的银行时，他起草了一份法律。这部法律被参议员奥林·哈奇领导的共和党人否决了，奥林·哈奇发表了演讲宣称 BCCI 是一个好公司。然后，哈奇就要求 BCCI 给他的一个好朋友贷款 100 万美元。

同时，那些谈论“第一美国”与 BCCI 间的联系以及报酬的录音带证据失踪了。布卢姆说：“我很明白，联邦政府内部有人故意阻止这次调查。唯一的问题是，这是更高级腐败的结果，还是企图隐瞒非法政府行为的结果。”^⑧

联邦律师后来说，司法部官员告诉他们，BCCI 是一例“政治”案件，所以由华盛顿决定如何调查和检查它。CIA 需要一家腐败的银行，它将不会揭发 BCCI。当克里的调查官试图查明 CIA 到底知道些什么时，该情报局再三说谎，或者隐瞒信息。但是布卢姆还是发现情报局跟 BCCI 间的关系。他发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CIA 编写了数百份报告，讨论 BCCI 的犯罪联系——毒品走私、洗钱——以及它对“第一美国”的非法控制。那些熟悉内幕的人士如前 CIA 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威廉·凯西，后来却撒谎说他们没有一点线索。CIA 阻拦案件中对领导的调查。一个密探后来报告说，他们毁掉了相关文件。^⑨ CIA 将其报告交给了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后者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给坦帕的检察官提供信息。

财政部和司法部还扣押证据。它们扣押了一份纽约民主党职员查尔斯·舒默议员的报告，该报告记录了 1983 年海关曾接到一个约旦军火商和咖啡走私犯的告密，里面说到 BCCI 的犯罪活动。1984 年，迈阿密 BCCI 分部前司机向美国国税局告发 BCCI 的洗钱活动，但是美国国税局密探对该银行进行进一步调查的请求却被他们的上司打了回来。1986 年，美国国税局从印度获得了 BCCI 在一些国家洗钱的消息，但美国国税局并没有采取行



动。一个 DEA 侦探曾给一位受了点刺激的 BCCI 官员录音，该官员透露了他是如何为情报局洗钱的，但仍然没有深入调查。舒默的报告认为，联邦调查局人员收到了数百条关于 BCCI 的秘密信息。

海关秘密侦探罗伯特·马佐，在 BCCI 的坦帕案件中也对 BCCI 提出了异议，他发现他建议作认真调查的提议反而引来了将他调职的恐吓，在感到万分厌恶的情况下，他辞职去了 DEA。司法部命令关键证人不得与克里合作，而且它还拒绝提供他的小组委员会需要的物证。司法部曾试图压制马佐的言论自由，但最终他还是向小组委员会做了报告，说有数百条 BCCI 犯罪行为的线索被包括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内的机构忽视了。当坦帕缉毒小组侦探大卫·伯里斯告诉联邦监管者曾有一个 BCCI 雇员说该银行控制着“第一美国”和佐治亚州的一家银行时，该监管者说他不能在证明文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不称职？笨拙？或者对一家有政治干系的犯罪银行的庇护？布卢姆告诉我：“当我刚开始考虑这件事情时，我想那肯定是有些无法无天、令人难以启齿的事，那是什么呢？他们的无能？或者更糟糕？你永远都无法知道答案。”他谈道：“这一群人整个的都处于田纳西州布什家族的掩饰下。其中沙特的知名人士起了重要作用。”

克里是一名新议员，他的反恐和缉毒小组委员会授权被限制在调查这两问题间的联系。

但当这个小组委员会想制定关于 BCCI 的公开听证会时间表时，受到了司法部和参议院的阻挠。他发现关键的民主党人士都不大支持他，他们不想在目前已爆出的一些金融丑闻后再来个雪上加霜——包括银行委员会主席唐纳德·里格尔——他们曾因被揭露接受了储蓄和贷款诈骗犯查尔斯·基廷的捐献而被弄得下不了台。基廷和他的林肯储蓄信贷银行在一家用外币进行投资的投机商趋势投资公司投资了数百万美元。趋势投资的董事会成员之一是阿尔弗雷德·哈特曼，他是 BCCI 的一家分支机构 Banque de Commerce et Placements 的经理，也是纽约交互海事银行的副主席，这两家银行都位于日内瓦。林肯储蓄信贷银行的瓦解牺牲了纳税人 25 亿美元。他们的困窘战胜了腐败，所以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克莱本·佩尔阻挠进一



步的听证会。^⑩

■ 盲目的监管：英国会计师和英格兰银行

在英国普华永道的会计师帮助下，这些欺诈行为得以一直延续下去。这些管理 BCCI 的家伙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聪明。他们用存款人的 100 亿美元资金买卖货币、商品，一旦亏本了，他们就造假账。他们通过在离岸隐秘性保护下的空壳公司网络虚构交易以隐瞒亏损。但是到 1986 年，普华永道发现商品交易亏空 4.3 亿美元，这可是 BCCI 的整个现金资产。根据它们之间的章程，审计师告诉管理这家腐败银行的经理，不得向可以保护存款者和借款者的执法机构报告。而且它们也没有通知美国的普华永道，后者是 BCCI 在美国的审计机构。

直到 1987 年，普华永道还和恩斯特 & 威尼公司共同分担会计职责，但恩斯特 & 威尼公司因不满无法使用 BCCI 的全球账册而退出了。尽管变成了唯一的审计人，但普华永道仍然受到银行秘密法则的阻拦，没法获得像瑞士这样的离岸管辖区内的子公司信息。在某些离奇的情况下，普华永道放弃了自己的立场。伦敦的贷款文件都是用乌尔都语写的，但当派了一个会说乌尔都语的人去银行时，银行却不让他进去。审计师们也没有坚持。当 BCCI 对借款者不予鉴别时，审计师们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原则。^⑪普华永道可能还有别的考虑——加勒比海的普华永道合伙人在 BCCI 借了不止 50 万美元的贷款。^⑫

尽管其他国家的监管者表示了担忧，普华永道仍然将 BCCI 的诈骗和危险状况瞒得严严实实。当它获知 BCCI 通过代理人非法购买了第一美国银行后，它没有告知美国的普华永道。在它的审计结论中，它撒谎说它对 BCCI 的描述是“真实且公正的。”

美国的普华永道也许还是会有些线索的。罗伯特·本奇在接到 CIA 关于 BCCI 的一份报告的拷贝时任财政部的通货副监理官。于是他辞职去了普华永道管理 BCCI 的账户。^⑬直到 1991 年英国的普华永道才道出实情。在英格兰银行的要求下，普华永道写了一份机密的《沙尘暴报告》（普华永道



用暗语“沙尘暴”指代 BCCI——译者注），详细描述了假冒者和空壳公司、中东代理人的作用以及庞氏骗局。

另一项监管的失败是 1987 年由巴塞尔协会（Basel Committee）设立的八国委员会的工作，巴塞尔协会是世界大银行的核心俱乐部，在关于 BCCI 欺骗性行为和巨大亏损的流言四起后，该委员会对 BCCI 的非法交易仍然没有进行深入调查。该委员会简直是毫无助益，即使在坦帕指控已经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它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1988 年和 1989 年，英格兰银行获悉 BCCI 涉嫌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以及非法转移毒资，但它没有将 BCCI 关闭。1990 年，当普华永道向英格兰银行报告 BCCI 的诈骗行为时，该银行仍然无动于衷，它甚至试图阻止会计师与纽约区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的合作——摩根索当时正对 BCCI 展开认真的专项调查。

英格兰中央银行认为 BCCI 于 1990 年将总部、工作人员和档案资料从英国管辖区移到阿布扎比实在是太好了，这样它就无须再为 BCCI 费脑伤神。当起诉书最终宣布时，阿布扎比政府拒绝给美国或英国的犯罪调查官提供资料证据。

■ 摩根索：反对 BCCI 的浪潮

在克里的支持下，1989 年，布卢姆面见了纽约区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摩根索从 1975 年开始便一直是纽约郡（曼哈顿）的区检察官。在美国，他是最重要的金融犯罪调查官，到现在仍然如此。布卢姆告诉了他关于司法部拒绝就 BCCI 涉嫌非法转移毒资和其他犯罪进行调查的事情。摩根索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结果却受到来自司法部的大肆干扰，司法部拒绝合作，也不同意他们会见证人，或者共享信息。摩根索甚至还得给坦帕的美国检察官发传真，请求他接他的电话。^⑬他的首席调查官约翰·洛维兹，得知坦帕的检察官曾对布卢姆的告密者进行过录音。但是，洛维兹说好几个月来，他们坚持说没有那些录音带。

但接下来摩根索有了意外的收获。伦敦的 BCCI 内部复审委员会主席马



西赫·(阿瑟)·拉赫曼告诉他的老板，该银行的真实财务状况由于欺骗和人为操纵被歪曲了，然后他就辞职了。接着他收到用死亡来威胁他及他的家人的电话。拉赫曼联络到了摩根索的办公室，披露了普华永道的审计报告，他说通过一系列伪造贷款，BCCI 获得了第一美国银行的秘密所有权，第一美国银行现在已是一家拥有 110 亿美元资产的州际银行控股公司。

1991 年 5 月，克里最终在银行业专门委员会的审理过程中，获得了一天的听证会，该专门委员会拒绝给听证会派遣人员，克里只好用了他自己的人。参议员克莱本·佩尔给他的朋友克拉克帮了个忙，将发传票的日期推迟到听证会之后。司法部命令关键证人不得与之合作，它还拒绝提供传票文件。当克里扬言要永久性终止对罗伯特·盖茨的 CIA 局长的提名后，一名情报局官员才证实多年来 CIA 对 BCCI 就很了解，而且它还在 BCCI 开立有账户。在布卢姆告诉佩尔他发现了一些 BCCI 与第一美国银行有关联的证据后，佩尔将他排除出了委员会。

布卢姆说银行的支持者阻碍了更多的克里听证会：“他们从外交委员会来打通……我们后来获知 BCCI 在 1988 年 9 月到 1991 年 1 月该银行关闭间，花了 2600 万美元在律师和（议院）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身上，以试图让该银行重新开业。他们在两边都雇了人以将其（调查）终止。”最后，银行业调查官开始对 BCCI 使用名义负责人购买美国银行的事感兴趣，并发现了某些迹象。1991 年 1 月，在不断接到足以毁灭 BCCI 的消息但多年按兵不动的情况下，美联储终于成立了调查组对 BCCI 控制第一美国银行的事情进行调查。3 月，美联储宣布 BCCI 非法获得了 60% 的“第一美国”股份，并令其提交整顿计划，与“第一美国”脱离关系。它接着宣布因在诈骗“第一美国”股份时盖思·菲冉昂所扮演的角色，对其处以 1700 万美元罚款。

与阿布扎比政府和审计机构普华永道沆瀣一气的英格兰银行还曾试图重组 BCCI，掩盖该银行的犯罪事实。但是 1991 年 6 月，英格兰银行通知美联储，一份新的普华永道设计报告显示，BCCI 存在大规模的欺诈行为。两周后，英国监管者关停了 18 个国家 BCCI，命令其他 44 个国家监管机构严格监督和约束 BCCI。阿联酋的 17 家分行、与巴基斯坦官方有密切联系的 3 家 BCCI 分行仍保持营业。



多年后，资料将会表明，英格兰银行官员至少在案发7年前就察觉到了BCCI的诈骗活动。清算机构德勤代表债权人以故意疏忽罪向该银行提起诉讼，要求赔款8.5亿英镑（约16亿美元），但2005年，英国高级法院驳回了德勤的请求。

■ 起诉

区检察官始终主张对BCCI背后的美国和沙特势力提出更严厉地指控，但司法部却试图将起诉限定在过去的毒品走私指控范围内。

1991年7月，纽约郡的一个大陪审团对BCCI、它的开曼岛子公司ICIC（事实上是几家公司，包括国际信贷和投资海外公司及国际信贷和商业海外公司，合并为一个名称）以及包括安白第、克利福德和奥尔特曼在内的6人提起诉讼，指控他们策划了涉案金额达数百亿美元的阴谋，这包括欺骗存款人、伪造银行记录隐瞒非法资金、非法侵占总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他人财产。它指控该银行实际上是一家犯罪企业，其企业策略就是为资金外逃、黑市资金和毒资收益开道。它指控克利福德和奥尔特曼从假贷款、股票交易和虚构律师费用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不当收入以及卡立德·本·马赫福兹从该银行盗取了3亿美元资金。它还对科威特航空公司前主席盖思·菲冉昂和费萨尔·沙特·阿尔-弗莱提起诉讼。克马里·阿德汗则同意协助调查。

摩根索的披露促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不是沃尔克在华盛顿的联储，该联储曾允许BCCI的名义负责人购买“第一美国”）将BCCI关闭以配合他的行动。主持本次摩根索调查的约翰·洛维兹，说服了纽约联储主席杰拉德·柯瑞恩，使他相信BCCI是一家违法银行，应该关掉。Fed罚了BCCI 2亿美元，采取措施剥夺了盖思·菲冉昂、克马里·阿德汗和费萨尔·沙特·阿尔-弗莱进入美国银行业的权利。它还罚了本·马赫福兹1.7亿美元。

最后在8月份，坦帕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斯瓦莱奇·纳奎和其他5名BCCI官员，还有一位号称是哥伦比亚毒枭的杰拉德·蒙卡达——而不是



起诉安白第和 BCCI。它只关注非法转移毒资以及与诺列加（不再是美国的朋友了）的关系，而不关注对银行存款人的欺诈。它利用了很多 C - Chase 行动组的信息，并扩展到了一些 BCCI 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曾被忽视的领导人、证人和可能揭露该银行存在更大范围欺诈或者 CIA 和里根—布什政府非法利用该银行的证据。以前为 CIA 效力的首席检察官威廉·巴尔取代了索恩伯。BCCI 对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垄断集团共谋转移了 1400 万美元的可卡因非法收入认罪。

1991 年 10 月，首席检察官助理罗伯特·穆勒三世视察了一次联邦大陪审团对克利福德和奥尔特曼的起诉，他们俩的罪状是，合谋通过误导“第一美国”与 BCCI 的关系来欺骗联邦储备委员会；妨碍美联储对 BCCI 的调查；通过 BCCI 给“第一美国”股东贷款，包括华盛顿的律师；他们在自己所获贷款方面对 Fed 撒谎。但他没有继续追查本·马赫福兹和其他关系密切的石油王国的阿拉伯人。而且他也没有回应摩根索起诉 BCCI 自 1972 年开始就是一家犯罪企业的控诉，或者该银行向很多发展中国家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官员行贿数百万美元的控诉。他从未与所有知道 BCCI 交易的证人一一谈过话，也从没有劝说过 CIA 抖出它所知道的内情。克里的报告记录了司法部曾再三地阻挠他和摩根索对 BCCI 的调查。该部门曾对其他调查官撒谎，对洗钱证据不予理睬，拒绝提供可能是针对布什支持者的证据或证人。

11 月份，司法部宣布起诉 BCCI、安白第、纳奎和菲冉昂。该起诉再次被限定在 BCCI 秘密拥有加利福尼亚和迈阿密两家银行股份的范围內。

最终，在 1991 年 11 月，司法部主要针对 BCCI 提起控诉，该银行当天就对联邦指控和州指控认罪，主要罪行是欺诈、涉嫌洗钱和非法接管“第一美国”和其他美国银行。BCCI 同意支付超过 5.5 亿美元的美国资产，部分注入“受害人基金”，部分用来脱离跟“第一美国”和独立银行的关系。而且还要向纽约上缴 1000 万美元的罚金。但只有一个被告在法国被逮捕。到那时为止，其他人都在中东和巴基斯坦，无法逮到手。

摩根索的调查一直在继续。1992 年 7 月，纽约的一个大陪审团以诈骗 BCCI 和它的存款人 3 亿美元，用存款人的钱为自己购买银行股份为由，起



诉卡立德·本·马赫福兹和一个随从参谋。美联储宣称本·马赫福兹违反了银行业规章制度。但美国刑法无法够到沙特阿拉伯半岛的卡立德·本·马赫福兹。1993年，在本·马赫福兹同意支付2.25亿美元的罚金后，摩根索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他和国民商业银行达成了一笔2.53亿美元的交易，以解决BCCI债权人的索赔问题。克马里·阿德汗，前沙特情报局局长，同意支付1.05亿美元的罚金。罚金最后升至15亿美元，但这仅仅是消失金额的一小部分，也没有人进监狱。司法部根本就没有追查本·马赫福兹这位布什家族的支持者和聚宝盆。

克拉克·克利福德通过使用皮诺切特抗辩手段：他的健康问题，逃脱了法庭审判。奥尔特曼通过使容易受骗的陪审员相信他——一个薪金和股票收益方面身价数百万的执行官——不知道谁是银行的真正所有人后也获释了。克利福德在1998年92岁的时候去世。奥尔特曼现在仍然是律师，跟他妻子琳达·卡特住在马里兰华盛顿郊外的波托马克（Potomac），他妻子是20世纪70年代著名电影《神奇女郎》的女演员。

从BCCI流失的数百亿美元都怎么样了，难道再没有什么偿还给存款人了？秘密离岸银行体系的国际银行串通一气，巧妙地掩盖了这些资金的去向。但是在BCCI垮台后多年，卡立德·本·马赫福兹仍然富得流油，而前乔治·W·布什的金融家则变成了奥萨马·本·拉登的金融家。1992年，本·马赫福兹在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建立了穆瓦发格基金会，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资金。美国财政部称其为“基地组织接收沙特富商基金的一个前沿阵地。”

由本·马赫福兹所有的价值210亿美元的沙特国民商业银行（NCB）是世界上最大的私有银行。NCB与交互海事SA管理公司有关系，后者是纽约交互海事银行在日内瓦的子公司。碰巧的是，另一家交互海事子公司Unimags贸易公司，与SICO，由叶斯兰·本·拉登管理的沙特投资公司共用同一个日内瓦地址。SICO是沙特本·拉登集团（SBG）的控股公司，SBG是中东最大的建筑公司，通过离岸公司网络运作，由一手遮天的本·拉登家族所有。叶斯兰是奥萨马·本·拉登的同父异母兄弟。

这种联系很有趣。卡立德·本·马赫福兹是 Dar al-Mal al-Islami



(DMI)——伊斯兰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成员，DMI 是一家位于日内瓦的银行，被指控在穆斯林世界向皇室家族分发补贴。DMI 成立于 1981 年，据估计有 35 亿美元资产，也跟本·拉登家族有联系：它的 12 名董事会成员中包括有海达尔·穆罕默德·本·拉登和奥萨马·本·拉登的同父异母兄弟。

DMI 的主席穆罕默德·阿尔-费萨尔，也是阿尔-沙蒙银行的投资者和董事会成员，阿尔-沙蒙银行保存着基地成员的账户。美国 1998 年向沙特阿拉伯半岛抗议国民商业银行为奥萨马·本·拉登在阿富汗和车臣的活动提供资金。在 1998 年美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遭受袭击事件中，根据美国对嫌疑犯的追踪证词，一个基地组织的背叛者——埃萨姆·阿尔-瑞迪详述了本·拉登是怎样将 23 万美元从阿尔-沙蒙银行转移到亚利桑那州的银行，以购买一架飞机将“毒刺”导弹从巴基斯坦运到苏丹去。而且，阿尔-费萨尔的 DMI 是阿尔-塔克瓦银行的重要股东，这家空壳公司位于拿骚，是 CIA 和基地组织的工具。

1999 年，美国调查人员在对驻非洲的美国使馆被袭击事件进行调查时发现，从 NCB 转移到“慈善机构”的数千万美元可疑贷款很可能是为了给奥萨马·本·拉登筹集资金。这些“慈善机构”有些是由本·马赫福兹家族管理的。国民商业银行总共有 20 亿美元下落不明。沙特政府软禁了本·马赫福兹，命他出售股权。但他管理的资金依然流入了奥萨马·本·拉登的账户。

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再次废弃了某些证据，对于 CIA 和沙特情报官员卷入一家为非法毒品、武器走私以及恐怖主义融资的银行这些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它们没有追查。国会的其他大多数成员看起来对这件事也不是很关注。克里小组委员会的 1992 年报告揭露白宫知道 BCCI 的犯罪行为；CIA 将 BCCI 当内部银行使用，还曾向国会调查官撒谎；而且 BCCI 例行地向美国政府官员行贿。除了纽约民主党的舒默和田纳西的亨利·冈萨雷斯发布了谴责报告外，国会对此没有表现出一丝兴趣。

如果国会领导层能支持严肃深入的调查，也许能得到克里报告中指出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关于 BCCI 和美国有势力人物的问题，包括与已故 CIA 局长威廉·凯西的关系；核心人物在“十月惊奇”（里根—布什政府与伊



朗官方达成赎回人质交易，以将美国人质关押到 1980 年卡特—里根选举之后再予释放）中利用 BCCI 的事情；BCCI 董事与 S&L 诈骗者查尔斯·基廷和他的名义公司达成融资交易；还有 BCCI 大股东在美国融资和不动产投资的性质。

报告还对 BCCI 的国际运作表示了怀疑，包括该银行涉足巴基斯坦的核计划；BCCI 对欧洲和加拿大商品和股票市场的操纵；它与被判有罪的伊拉克军火商萨凯斯·萨肯阿连，叙利亚的毒品走私贩、恐怖分子兼军火走私贩芒扎·阿尔—卡萨和其他大军火商的关系；它对国际犯罪金融家马克·里奇的商品和其他商业交易的融资以及它向土耳其库罗瓦集团贱卖 BCCI 在日内瓦的分支机构 Banque de Commerce et Placement 的行为（土耳其库罗瓦集团有一机构与意大利银行 BNL 亚特兰大分行纠缠不清，而该分行掌控着向萨达姆·侯赛因和其他一些人的军火销售）。

克里小组委员会说，如果美国、英国和阿布扎比官方拒绝提供相关证据，那将无法对上面的问题作出回答。该银行掌握的很多证据文件都已经被销毁了——在调查开始，巴基斯坦的主要负责人逃走后，寄存 BCCI 档案的伦敦防火仓库起了 7 次大火。其中一次大火烧死了 4 名消防员。但却无人遭到起诉。

【注释】

① 乔纳森·比蒂和 S·C·格温，《无法无天的银行——对 BCCI 神秘实质的探究》（华盛顿：Beard, 2004 年 [1993]），第 315 页。

② 《BCCI 事件——参议员约翰·克里和亨克·布朗呈交给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1992 年 12 月，第 102 次国会，第二次会议，参议院（克里报告）。

③ 彼得·特儒勒和拉里·格尔文，《欺诈性收益》（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1992 年），第 135 页。

④ 詹姆斯·云·亚当斯和道格拉斯·法兰提斯，《全方位服务的银行——BCCI 是怎样在全球窃取百亿美元的》（纽约：Simon & Schuster, 1992 年），第 238 页。

⑤ 特儒勒和格尔文，《欺诈性收益》，第 117 页。

⑥ 同上，第 57 页。

⑦ 同上，第 134 页。



⑧比蒂和格温，《无法无天的银行》，第118页。

⑨同上，第24页。

⑩1980年，在无节制地放松对里根主义者的管制下，国会结束了对储蓄和贷款行业的规制。它允许存贷款机构投资风险大的房地产业。在一般的账户只有大约6000美元的情况下，它将存贷款机构的联邦保险限额从4万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国会已经忘了为什么要放松管制了。骗子们则纷纷在离岸区设立公司和账户，然后向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贷款，这些钱他们一分都没有还。很大一部分的骗子银行设立在德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些处在布什家族影响之下的州。老乔治·布什的儿子尼尔·布什，就是腐败的西维拉多存贷款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他被处5万美元的罚款，禁止再进入银行业，却免受牢狱之灾。在布劳沃德县的联邦存贷款机构的一笔违约贷款中，一幢佛罗里达州的建筑物被用作该贷款的部分赔付，而老布什的另一个儿子杰布·布什（现为佛罗里达州州长）正是该建筑物的合伙人之一。布什和他的合作者坚持认为他们对该贷款没有偿付责任，最后他们保住了那幢建筑物，而纳税人则承担了该贷款的成本。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知道存贷款机构存在问题，如果当时采取应急措施，费用为200亿美元，但它一直等到1988年老乔治·布什大选后才揭露这些骗局，将犯罪银行关闭。有大约800家存贷款机构倒闭了，这将花掉美国5000亿美元，其中包括西维拉多的10亿美元。这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盗窃行为。

⑪亚当斯和法兰提斯，《全方位服务的银行》，第43页。

⑫《克里报告》，第102~140页。

⑬特儒勒和格尔文，《欺诈性收益》，第359页。

⑭同上，第287页。

在过去的 10 年里，刚果内战夺走了 400 万人的生命——冲突是由西方跨国公司寻找廉价的钶钽铁矿和其他矿产资源而引起的。

第 5 章 廉价手机的人力成本

凯瑟琳·克恩

戈马医院的综合治疗营地有一顶帐篷是用来给遭强暴的受害者等待手术时用的，另一顶是给手术后的受害人康复用的。在预备手术区，我抱着一个 1 个月大的女婴，她对房子主梁上悬挂的黯淡电灯很入迷。她弓着背挥着手，尽力想迎接这个令人激动的新世界，忘了创造她生命的那些暴行。

女婴的妈妈告诉我婴儿叫伊斯尔。她抱着胸说她没有乳汁。她没有告诉我她在等待做什么手术。可能是那些施暴者使她的下体受伤了，他们还用枪和弯刀对付她。我们曾经见过一些妇女照片，有的施暴者对着她们的下体开枪，有的用盐擦她们的眼睛直到使她们变瞎（因此她们无法辨认出这些加害者），还有的妇女在遭强暴后被烧伤或被砍掉手臂或腿。

一周之前，我们去布卡武（Bukavu）拜访了一位人权组织官员，看到了最近发生在堪忧拉附近村庄的屠杀的血淋淋照片。这些行凶者都是联攻派民兵的成员，他们在卢旺达实行种族屠杀。他们不用枪，而用弯刀将这些受害人砍死，然后烧掉，这样在附近基地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就不会听到声音了。这位拿照片给我们看的人权工作者最近已经接替了这个组织的前负责人——帕斯卡·卡巴鲁鲁·金本贝的工作。在当地的刚果^①军官对这位前负责人进行恐吓之后，金本贝老早前就在自家门口被暗杀了。



这些吞噬刚果东部的低技术野蛮行为源自全球对高技术含量消费品，比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的需求。钶钽矿石（钶铁矿石和钽铁矿石的缩写），是生产这些设备必不可少的矿石，也引起了对卷入暴行的跨国公司进行研究的研究者们的异常关注：世界已探明钶钽矿储量的 80% 在刚果，这使刚果像波斯湾一样成为美国的潜在战略重点。^②但是对黄金、钻石、铜、锌、铀、钴、镉、木材和刚果其他富产资源的需求也促成了过去 10 年该国的大屠杀。

■ 赤道上的大屠杀

从 1996 年开始，刚果（前扎伊尔）内战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死亡人数约为 400 万人。^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什么冲突造成过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自 1994 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后，卢旺达军队和胡图族民兵联攻派的胡图族士兵与 100 多万平民蜂拥进入刚果制造了这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96 年，图西族总统保罗·卡加梅借口边境胡图族人对卢旺达安全构成威胁，派遣卢旺达军队进驻刚果。这些军队屠杀了上千名在卡加梅掌权后去刚果避难 的胡图族平民。卢旺达、布隆迪（也有一个图西政府）和乌干达于 1997 年派军援助洛朗·卡比拉领导的刚果反叛联盟，卡比拉企图推翻扎伊尔独裁者蒙博托。^④战争使人们离乡背井，纷纷来到矿区，靠在那里挖掘金矿、钻石和钶钽矿为生。

1997 年，叛乱者推翻了蒙博托政权，卡比拉就任新总统。在列举了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对他的暗杀阴谋和卢旺达军队对胡图族难民的屠杀罪行后，1998 年，卡比拉将两国军队驱逐出了刚果。但卢旺达再次入侵，声称要继续追击对该国安全造成威胁的胡图族人。接下来，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以色列在炮轰黎巴嫩南部并随后占领时所做的那样，乌干达人也试图在刚果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此与乌干达反叛联盟作战。^⑤在部署他们的入侵时，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和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同意在保持对与他们国家接壤的刚果东部的控制下，在刚果扶持一位新总统。卡比拉请求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帮助，到 1998 年，刚果东部陷入僵局。乌干达



占据北部领土，而卢旺达控制南方区域。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士兵将已占领地区的银行、工厂、农场和贮存设备都掠夺一空，将他们的战利品装车运回了自己的国家。

1998 年，卢旺达政府将刚果 7 年的钶钽矿储备——大约 1500 吨——从仓库运到了基加利（Kigali）。^⑥此时，钶钽矿价格已经达到 18 美元/磅（40 美元/千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卢旺达军队经常将俘虏当合同工使用，他们有计划地掠夺刚果东部矿山的钶钽矿，并将其运回国内。钶钽矿的国际价格在 2000 年 1 月份攀升至 30 美元/磅，在当年的 12 月份则飙升到 380 美元/磅（由于 2000 年圣诞节索尼 PS2 游戏机的紧缺而导致了钶钽矿的紧缺）。由于开采矿石只需要一把锄头和一把铁锹，军方、政界和公司权要们从卢旺达的俘虏和贫困的刚果人身上获得了丰厚利润。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的兄弟萨利姆·萨勒控制着 3 家航空公司，他将公司出租给乌干达军方往刚果运送士兵和物资。在乌干达军官、刚果反叛联盟和私人企业的协助下，萨勒保证每趟飞机又都满载黄金、木材和咖啡而归。他将那些油水丰厚的钶钽矿卖了后得到了大笔现金，同时与黎巴嫩商人哈里欧·纳泽姆·易卜拉欣合作，通过后者的维多利亚集团公司走私钻石——免税。他通过这种方式剥夺刚果迫切需要的财政收入。

通过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出口历史，我们可以窥见这种掠夺的疯狂程度。在 1996 ~ 1997 年间，卢旺达的钶钽矿产量翻了一番，每月给卢旺达和它的刚果反叛联盟带来 2000 万美元的收入。^⑦卢旺达政府宣称该国出口的所有钶钽铁矿都是它自己生产的——每年 1440 吨。但是，联合国专家小组（稍后讨论）2001 年的报告引用官方的政府统计数据，该国的生产量为每年 83 吨。^⑧

卢旺达没有钻石矿产，但是它的钻石出口量从 1998 年的 166 克拉上升到 2000 年的 30500 克拉。1999 年，乌干达没有生产任何钶钽矿，却出口了 69.5 吨。尽管自己没有钻石矿产，但 2000 年，乌干达的钻石出口收入超过 125 万美元。它自己生产了 0.0044 吨黄金，但出口了 10.83 吨。^⑨

2002 年的一份“和平”协定，使约瑟夫·卡比拉在他父亲被刺杀后掌握了总统权力。他的 4 位副总统均来自军阀，正是这些人的军队给刚果带



来了灾难。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卢旺达和乌干达继续侵犯刚果。2004年12月，卢旺达派遣了6000人的军队进入刚果东部，宣称它必须抵御给卢旺达安全造成威胁的胡图族。^⑩卢旺达军队在北部的基伍省实行了大规模屠杀，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大约一年后，我们访问布卡武一个大学区的学生社团时，代表团看到了这些掠夺的影子。一个年轻人带我们穿过一间空空的房子，向我们证实所有东西——家具、电脑、电话和传真机——都被卢旺达军队偷走了。那个年轻人告诉我，由于学生们大胆说出了对卢旺达军队践踏人权的不满，卢旺达军队和由它支持的刚果民兵将目标对准了学生团体。

■ 把强暴作为战争的武器

2005年10月，作为基督教维和工作队（CPT）代表团的一分子，我第一次来到刚果东部调查设立一个类似中东和美国CPT的暴力阻止项目的可能性。代表团很快意识到刚果局势带给了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挑战。我们还发现所有的武装集团在这里大范围地实施强暴，这是全世界大部分人包括我们教会的支持者都没有发现的。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些恶行，当偶然遇见牧师和地区官员想要在这个惨遭蹂躏的国家维持一种很脆弱的社会秩序后，我们开始关注这些事件。

对很多刚果女人，强暴只是她们噩梦的开始。那些施暴者使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而且他们经常在她们的丈夫和孩子面前侮辱她们。之后她们的丈夫和丈夫的家人都认为她们是“肮脏的”，即使他们并没有感染上病毒，都会把她们和她们的孩子赶出村子。有时他们会说如果她们把那些施暴者的孩子杀了的话，她们可以留下来。一些刚果人告诉我们，那些没有被杀的孩子就成了流浪儿，这是1996年以前的一种不为人知的现象。

被剥夺了社会支持之后，很多女人为了养活自己和抚养她们的孩子而不堪重负。我们在每一个去过的地方都能看到她们：弓着背，背着用皮带捆在身上的粮食或者建筑材料，皮带在她们的额前勒下了深深的印痕。



刚果一些教会和市政府试图为那些被强暴的幸存者提供一些医疗、咨询和工作培训，并且责难那些排斥她们的社会行为。但是被蹂躏和背井离乡的妇女数量实在太多了，使得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和人权组织估计，自从1998年，有数十万妇女和少女被强暴，尽管绝大部分这种暴行由于社会歧视而没有曝光。布卡武妇女组织的官员告诉我们，在2004年，丹麦路德教堂捐赠了一笔钱使得她能够帮助这个地区1200名被强暴的妇女，当这些基金用完后她不得不停止这个项目，现在她甚至连记录下这些兽行的工具都没有。

把强暴当作一种战争武器加剧了刚果西部人民的分裂。因为武装团伙经常在妇女们田间劳作的时候袭击她们，所以很多妇女害怕离开家。因而，在刚果肥沃并且全年都可耕种的土地上，人们却在挨饿。

武装集团的暴力行为导致了人民内部暴力事件的增加。“我们的社会失常了。”北基伍基督教妇女协会领袖珍妮·莫里利-卡巴卡特伊说。该协会记录了那些战争之前前所未闻的强暴和性袭击事件。她告诉我们，女孩子们——最小的只有18个月——被邻居、兄弟、出租车司机和老师强暴。她所在的协会辅导了36000名孩子怎样反抗强暴，并告诉她们的父母不要让女儿单独去任何地方，也不要让她们单独和任何男人在一起，哪怕是老师。

有一些事件看起来只是为了残害妇女。就在一个年轻妇女3岁的孩子死了之后，她又生下了一个胎死腹中的婴儿。新生儿的尸体还在屋子里，这时，5个武装分子闯进了她家，她丈夫悄悄逃跑了。她太虚弱了，根本不能动，任凭那些男人轮奸了她。她需要做5个手术，而且以后也不能生育。而她的丈夫之后却又娶了另一个女人。

之后，一个女孩被她的两个兄弟和父亲强暴了。当她母亲发现她怀孕了之后，就把她送到她的父兄那里，说照顾他们是他们的责任。“她现在疯了，不让任何人触摸她，”莫里利-卡巴卡特伊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告那些强奸犯，因为她不说话。她现在非常可怜。”

将这些事件叙述完之后，她停下来，说：“你自己都会受不了。”

在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5000名联合国维和士兵虽然已经出现在那里、集体大屠杀还在继续、政府官员10年都没有领到薪水的情况下，这



数百万件的强暴事件消失在了混乱当中。

▣ 刚果战争中的西方共犯

西方人在讲像这样的故事时，他们必须记住我们一直受益于定型非洲人为野蛮人的殖民主义。太久以来，第一世界国家的人民都是主要通过暴行来了解非洲的，这些暴行诸如卢旺达种族灭绝或者“饥荒”——鼓胀着肚子的儿童身上布满了苍蝇。

我们向牧师、人权主义工作者和妇女激进分子打听谁在和被强暴的受害者一起工作，她们希望怎么来讲述这些故事。大多数人都认为她们的情況太悲惨了，不把这些消息散布出去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耶稣说，说出真相就等于死亡。”戈马的一位妇女组织领导人说。然而，她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打抱不平，我们应该宣扬西方国家是怎么促成刚果的不幸的，是怎么从刚果的不幸中攫取利润的。谈到数量巨大的武器被倾销到这里时，她说：“我们就像是世界的废纸篓一样”。卢旺达政府利用从美国得到的军事援助组成了刚果民主联盟军（RCD-Goma，刚果民盟戈马派），这个联盟军在刚果西部煽动暴乱。美国也扶持了卡比拉总统和他的刚果军队用来对抗RCD。一个人权组织CODHO的代表给我们的代表讲了一个美国、英国和南非的“说英语国家的阴谋”，这个阴谋把武器分配到民兵和军队中。他说，通过这么做，它们给这个地区制造混乱，因此打开了到这里开采资源的大门。

几乎我们遇到的所有刚果人都认为就是这些事情让刚果人陷入了绝望境地，而且还有西方人手中还在冒着烟的枪。

卢旺达和乌干达就是强盗，但是正是第一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支持着它们的掠夺行为。

2001年4月6日，由联邦女众议员麦金尼举办的听证会暴露其参与了的西方国家，金权政体几乎在这个地区的冲突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1990年，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接受了美国军队的训练。^①1994年，美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阻止联合国维和工作团到卢旺达停止



种族灭绝行动，并迅速在卡加梅当政之后提供给卢旺达 75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¹²美国特种部队在 1994 年开始训练卢旺达军队，就在 1994 年 4 月 6 日导弹袭击了载着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的飞机事件之前的 3 个月，这次袭击促成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特种部队的训练包括如何在扎伊尔作战中镇压叛乱、战斗、实行心理战术和指令。¹³8 月份，在组织 1996 年的入侵之前，卡加梅为了获得美国的同意而访问了五角大楼。1996 ~ 1997 年，在布拉格堡受训过的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为了推翻蒙博托而入侵。¹⁴据传闻军事承包商布朗 & 罗特公司——哈利伯顿的子公司，在刚果和卢旺达的边界地区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在那里的卢旺达军队已经训练完毕。¹⁵柏克德公司为卡比拉提供了卫星地图和勘测照片，所以他能监视蒙博托军队的一举一动。¹⁶柏克德是典型的官商勾结的例子，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就曾在柏克德任职，前国防部长贾斯帕·温伯格也曾在柏克德任法律顾问。柏克德高级副总裁杰克·希恩是一名美国海军退休将领，他也同时是国防政策局的成员。¹⁷

在 1996 ~ 1997 年之间，很多公司都开始和卡比拉谈判刚果东部的矿藏开发权。1997 年初，他派了一名代表去多伦多和矿业公司谈关于“投资机会”的事情。这次旅行行为卡比拉带来了 500 万美元的收入，他用来继续向金沙萨（扎伊尔首都）和刚果首都进军。1997 年 5 月，美国矿业集团（AMF）在卡比拉的军队占领了戈马（位于卢旺达和刚果的边界附近）之后，削减了与他的一笔 10 亿美元的交易。卡比拉亲美的财务专员进行的这次谈判，给予了美国矿业集团在此地区专属开采锌、铜、钴矿的权力。比尔·克林顿的朋友密克·科穆若夫是 AMF 的总裁。当月，泰恩科矿产公司宣布它与卡比拉签订了一项合同，该合同是它之前在 1996 年与蒙博托政府签订的。一批批其他公司的代表也开始来这里做生意了，比如柏克德。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士兵（大概是特种部队）在 1998 年 7 月 23 日至 24 日，大概是卢旺达官方入侵刚果的前一周，被卢旺达军队发现在刚果的公司。就在这些军队于 1998 年入侵刚果保护它们利润可观的石油合同的时候，加拿大巴里克黄金公司（它的董事会成员有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美国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和克林



顿的顾问弗农·乔丹)和海诺特石油公司也随着乌干达和卢旺达军队到达了这里。1999年,刚果民主联盟军戈马派的财务部门从纽约花旗银行得到了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它也从比利时考格考姆公司(Cogecom)处融到了资金。^⑩比利时、丹麦、日本、瑞士和美国成倍增加了对卢旺达的援助,从1997年的2610万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150万美元,为卢旺达入侵刚果提供充足资金。^⑪

卢旺达和乌干达继续抢劫并变得富裕起来,它们不断增加的GDP还受到IMF和世界银行的称赞。2002年,IMF一个不是故意讽刺的评论说,它在卢旺达的一个代表“敦促政府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平”,尽管GDP增加了,IMF还称赞说做得正好,因为卢旺达政府加剧了在刚果东部的暴力,而且利用动荡取得了开采权。2006年,IMF称赞乌干达道:“财政抑制再加上谨慎的货币政策,乌干达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且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了一位数,比前几十年都要好。近几年,这些政策使国际储备控制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水平。”再一次,它选择了忽略乌干达是怎样积累它的国际储备的。^⑫

2001年,世界银行致力于重整哲卡麦恩公司(Gécamines)——一家破旧的刚果国立矿业公司。因为哲卡麦恩公司的私有化,工人们被解雇了,本来他们期望在这次重整中得到培训。世界银行的第二个重要目标是勾画一幅对刚果政府有益的矿藏重组蓝图。但是,临时政府不顾世界银行顾问的劝告,把哲卡麦恩的大部分资产连同工厂卖给了私人公司。^⑬世界银行,本应该详细审查矿业部门并重整哲卡麦恩,最终却还是允许外国集团剥削曾是刚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的这家公司。^⑭

■ 联合国专家小组和OECD方针

尽管从1996~2004年一直困扰刚果的苦难,并没有在西方国家中引起多少疾呼,但联合国安理会从2000年就开始寻找暴力发生的潜在原因。它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未来3年的报告。这些报告描述了刚果及其周边国家的高级政客、军官和商人是怎样勾结武装集团来攫取



刚果资源的控制权的。该小组称，民兵和军阀部队利用这些资源购买武器来加剧战争。

正如他们的观点，专家小组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方针“指导跨国公司”。确立于 1976 年的这些方针是用来推动贸易和定义法人行为的组成的。^③

政府为遵守这些方针成立了“国家联络中心”（NCP），它是用来宣传这些方针，并在企业不遵守方针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

基于专家小组 2002 年 10 月的报告，非政府组织（NGO）发展中的权利和义务小组（RAID）也在 2004 年发表了它们自己的报告，把刚果企业违背的 OECD 方针一一列出，如下页表一所示。

专家小组 2002 年的报告列出了被它指控的 85 家在刚果战争中获利的跨国公司；其中包括 6 家美国公司。除了比利时参议院，其余那些企业总部所在地国家的政府都未打算让企业对其在刚果暴力中所起的作用负责。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报告只能让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一些企业打通政府和安理会，将它们的名字从专家小组的黑名单上抹去。^④

企业与政府勾结把它们的名字从专家小组的名单上抹去的这一过程很缺乏透明度。专家小组的一个成员说道，他对到底是哪 85 家公司在名单上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这使得政府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进来。然而，有 5 家加拿大公司本来在名单上，后来却被抹掉了，他说：“这只能说明一些公司与外交事务有联系，特别是马伯乐，当时的加拿大大湖区外交特使。”^⑤

国家联络中心 2005 年年会的附录文件让我们看清楚了两家英国公司对联合国专家小组的报告和英国国家联络中心（UK NCP）干预的反应。钻石公司戴比尔斯（DeBeers）声称专家小组未提供任何细节来支持它的主张，虽然在 2002 和 2003 年，那些公司都在要求它提供相关信息。英国国家联络中心写道：“在这种环境下和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上，英国国家联络中心断定联合国专家小组所做出的针对 DeBeers 的断言是没有确凿根据的。”英国国家联络中心最后还采取了埃维恩特航空公司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其在刚果的航空交易操作是符合法律规定的。^⑥



表一：刚果企业违背的 OECD 方针

OECD 方针	刚果企业的违背行为
- 企业必须对其在其他国家影响过的人们坚持该国的同一标准的人权主义。 - 方针的人权条款隐含着企业不能纵容武装集团滥用人权。 - 企业必须采用会计和审计惯例以正确记录交易。 - 跨国集团使它当地的合伙人、供应商和转包商遵守 OECD 方针的要求。 - 即使企业不直接从武装部队控制着矿物资源的当地购买资源，它们也要对接下来的供应链负责。例如，一个公司从比利时购买了钻石，它必须问清楚这些钻石是从哪里来的。 - 企业不能通过贿赂或被贿赂来做生意，它们也不能加入任何反竞争组织或寻求法律法规的豁免权。 - 企业应该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进步。 - 所有企业，包括银行，必须“拥护好的管理方针”。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确保企业和个人在使用它们的服务时是遵守 OECD 方针。	- 企业受益于军队和其代理人民兵，它们用武力在矿藏地交易。它们也用军队来保护它们的财产。 - 企业为叛乱者和政府部队提供武器，甚至参与军事行动。 - 企业参与走私钻石、洗钱和非法货币交易。 - 企业从外国或者控制区域购买矿石，而不管它是从哪里来的，从谁那里买的。 - 企业从供应商那里购买外国的矿石，而不问出处。 - 企业明知政局不稳定，仍然与秘密中间人交易，来保护它们的合同和特权。 - 企业伙同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代表一起开采自然资源并从合资企业中获利。刚果人民几乎没有从这些企业中获得一点好处。 - 银行为掠夺刚果的私人和企业提供服务，使他们能够在不正当行为中获利。

资料来源：RAID，《无法回答的问题：公司、冲突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行政概要》，报告，2004 年 4 月，第 2 页，www.raid-uk.org/docs/UN_panel_DRC/Unanswered_Question_Full.pdf。

在金权政体团体的抗议下，联合国安理会在 2003 年 1 月 23 日的 1457 号决议中建议将专家小组的任务延长 6 个月。该决议规定延长的目的是“以调整报告附录上的名单为目的，核实、补充、在必要时更新小组的结论



和之前报告上的确切名单。”^②

专家小组在 2003 年 10 月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报告中说，在之前的报告中所列举到的大部分企业的行为并不需要更深入地调查研究。很多企业抗议将它们名单上的名字移到一个模棱两可的“决意的”范畴。据专家小组有关官员说，“决意的”表明企业已经承认其不当行为并提议或者实施补救行动，或者停止与不正当的刚果合伙人的交易，或者主动表明缺乏透明度，这会使专家小组找到它道德行为的疑点，但是之后表明它并没有不正当的投机行为，或者在 1998 年之前就已经在刚果工作了很多年，或者即使在冲突多发地带，也没有做过任何不正当的事情，或者仅仅处于掠夺的边缘。

2003 年的报告并没有详细解释每一个企业都掉进了哪一个“决意的”范畴。因此，理论上，一个公司故意从卢旺达军方购买钶钽矿——支配奴役之后停止的罪责，和公司行为基本合法但未主动提供记录来证明它的合法性的罪责是一样的。其实，专家小组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来描述哪一个案例是“决意的”。列入名单的企业并未对专家小组的声称回应，看起来像是在回避进一步的审查。

尽管 2003 年的报告明确说明决议不能解释为赦免，但是大部分名单上的公司和它们的政府声称已经赦免了它们。^③

就在 2002 年联合国专家小组被指责之后，西方国家串通一气来掠夺刚果资源，美国大使理查德·威廉森（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候补代表）告诉联合国安理会：“美国政府将会调查针对这些（美国）企业的主张，并且采取适当措施。”然而，地球之友（FoE）在专家小组针对美国公司主张上穷追不舍，它于 2003 年 10 月说：“到此为止，布什政府把更多重点放在证明美国公司无罪上，而不是采取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来确定美国公司通过供应链在刚果的冲突中起了怎样的作用。”^④

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对其企业列入了专家小组报告名单的行为采取适当行动，所以地球之友和 RAID 在 2004 年 8 月 4 日投诉美国国务院，反对卡伯特公司（Cabot Corporation）、鹰翼国际资源公司（EWRI）和 OM 集团有限公司。



波士顿卡伯特公司被认为在战争期间从刚果购买钶钽矿。卡伯特公司否认了这点，但是一个比利时参议院的报告证实了 EWRI（奎尼泰克控股的子公司）有一份向卡伯特供应钶钽矿的长期合同。专家小组声称由于 EWRI 与卢旺达军队的紧密联系，它得到了钶钽矿和被俘劳工的使用特权。俄亥俄州的 OM 集团与一个比利时人乔治·福雷斯特的联合关系使得它的行为很可疑。专家小组在它 2001 年的报告中详细指出福雷斯特在刚果东部的暴力中获利。该小组指控他的公司 Groupement Pour le Traitement des Scaires du Terril de Lubumbashi（GTL）故意无视为在刚果建造两个电动炼油厂和一个锗处理转炉而提供的技术协议，建在了现有的钴和铜原料堆旁边。那些半加工的矿石用船运往 OM 集团在芬兰的加工厂，这样就抢走了哲卡麦恩国家矿业公司的财源。^⑨

美国国家联络中心的卫斯理·萧尔兹拒绝深入调查那些公司，他引用专家小组 2003 年 10 月的报告说，涉及美国公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2005 年 1 月，他通知 3 家公司说 FoE 和 RAID 仍存在想要讨论的问题，他还促成了这两个组织和这个公司之间的一次非正式谈话。但他的官方立场是“方针真正关注的不是过去的行为，而是试图改善将来的行为。我们不是法官，不是去判断企业是否在准则的约束下履行了它们的义务。法官是对已发生的行为作判断，并且说你做错了。”当 RAID 在 2005 年 9 月联系萧尔兹想继续深究的时候，他说，那些公司已经确认收到了他的信，但还没有回应。^⑩

并不是只有美国对 OECD 的跨国公司的准则持有自由放任的态度。一些国家政府并不是去分析专家小组主张的实质，而是在怀疑一个联合国任命的小组是否能够断言对 OECD 方针的违背和方针是否能够适用于企业的供应商。

■ 改变方针

在国家联络中心穷究刚果公司的不正当行为而终无所获之后，RAID 建议修改 OECD 方针。需要采取特别措施来强迫第一世界国家的政府去调查



它们本国公司的滥行。该报告还强调政府必须找到适当方式来要求公司遵守这些方针。但这些方针的完全自愿性意味着在它们的行为造成了数量惊人的人类灾难时，它们却不会为此承担任何后果。^②

这些结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观察（OECD Watch）2005 年 9 月 22 日的报告《五年：经合组织方针和国家联络中心回顾》中得到了证实。该组织悲观地提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方针曾有助于降低地方团体、民间社团和跨国公司间的冲突。”造成该方针失败的关键原因是，对于方针应该在什么时候应用到企业活动中，NCP 采用了一种狭义的解释。NCP 争辩说，跨国企业和它们的供应商间是一种贸易而非投资关系——因此不适用该方针。这样，联合国专家小组所提到的那些公司只有在它们实际上拥有那些进行抢掠的公司时，它们购买掠夺品的行为才应该受到指责。这些赞成狭义解释的人进一步争辩说，跨国公司对供应链上的其他公司没有多少控制权，所以它们不应因为那些更直接地参与榨取资源的公司的不法和不道德行为而受到责备。

NGO 争论说，方针的术语清晰地表明它们既可以应用到投资也可以应用到贸易。它们还主张公司应该“欣然负起供应链上产品质量的责任，而且监督它们的管理工作以保证产品质量。”公司在其他国家雇用分包商生产有特殊用途和性质的产品时，它们能够轻易雇用到那些不会违反这些方针的员工。

OECD Watch 报告建议通过加强 NCP、政府和 NGO 管理公司违法行为的权力的方式来强化 OECD 关于跨国企业的方针。例如，它建议将此委派给 NCP，NCP 相对于政府和公司利益较为独立，有较大的权力对违反方针的行为进行调查。NCP 会将年度报告提交给国会，让议会委员会和巡视官对它们的决定做详细审查。只要公司遵守 OECD 方针，政府可以给公司提供补贴、出口信贷和政治风险保险。如果 NCP 对方针的解释过于狭义化，非政府组织有权对 NCP 提出异议。在没有签署 OECD 方针的国家，NGO 可以通过公司母国的外交人员直接向 NCP 提出控诉。^③

如果国家和国际政府机构没有批准这些改革，那么金权政体和它的当地供应商将继续逃避它们在资助战争和践踏人权方面的责任。



■ 证据

当我 2005 年 10 月第一次到刚果时，我试图了解该地区使用其他方案的情形，这些方案是我的非政府组织——CPT 建立的参考框架。在海地和恰帕斯，我们与准军事暴力的袭击对象居住在一起。我们也曾陪伴巴勒斯坦的城乡居民共同面对以色列士兵和移民的暴力。

在 2003 年伊拉克遭入侵时，我们在水处理厂和医院旁搭建了帐篷，以便在美国开始轰炸时能保护这些基础设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对这类工厂的破坏和强制制裁导致了后续多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耳闻美国军队在搜捕伊拉克家庭时虐待其家庭成员，折磨被拘留者（这些被拘留者几乎都没有起诉过他们）后，我们小组开始记录这些虐待行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爆发前 3 个月，我们将报告送到了所有相关的美国军方和非军事机构。³⁴

在所有我工作过的 CPT 项目中，哥伦比亚跟刚果的局势最相像，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哥伦比亚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资源刺激了军事力量、准军事力量和游击队组织间的纷争，而受害者大部分是平民。恐怖行为——绑架、酷刑和斩断手足——使得武装团体能够控制这些资源。跨国公司通过阻碍具有重大意义的民主变革以保证它们的既得利益。

但是，哥伦比亚好歹有职能政府、司法系统和新闻机构——虽然政府议员、检举人、法官和记者经常被谋杀（一位哥伦比亚教堂的负责人曾告诉我：“在哥伦比亚，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因你说的话别人也可以想杀你就杀你。”）。在我们访问过的哥伦比亚教堂、市民组织以及马格达勒纳中部地区的农夫住宅小区，你将会看到，CPT 的存在将会为他们的社会改革开启一片政治空间。在 CPT 承诺陪伴他们的情况下，大约有 100 多户被准军事团体赶出家园的家庭迁回了他们的农场。

相反，刚果人发现 CPT 在美洲和中东的通常做法在他们这里没有什么用处。趁着这些陪伴我们的妇女耕地的间隙，我们问了她们一些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在武装集团的袭击中，我们必然也会遭遇到像刚果人一样的



命运。“当然，你也会被强暴。”在布卡武，一个在妇幼部门工作的妇女这样说道。白人的出现很可能导致军队袭击那些款待白人的刚果人团体（但有几个妇女告诉我们，黑人国际组织可能会偷偷地潜入村庄，记录那里的暴行）。

我们因此感到非常无助。我们能拒绝使用因刚果境内的掠夺而变得便宜的技术。但是，金权政体却使得排着长队、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代替了我们的位置。而且，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戏剧性地提高了人权工作者记录政府和个人暴行的能力。

最后，一旦她们发现我们不是援助和发展工作人员时，我们遇到的很多刚果妇女都表示她们也仅仅是想让她们的经历为人所知。所以我正在跟你讲述的，是五六十个被强暴的幸存者在进入布卡武的路德教会议厅时为我们鼓掌和歌唱的经历；是非路德教会人员告诉我们“当她们歌唱时，她们能忘记过去”；是当我们讨论让北美过来的妇女代表与被她照顾着的250个幸存者碰面时，沮丧牧师脸上的豁然开朗；是那些认为西方国家“它们谴责事态的发展，却不拿出行动，所以国际性团体才采取行动”的大学生。

我将把上文提到的那个女婴伊斯尔和她母亲的悲剧公之于世。首先是强暴将她们逼入到了破败社会的边缘。其次是刚果有足够的财富给伊斯尔和其他数百万刚果儿童的未来生活提供充足的营养食品、干净水、教育和像样的医疗保健这一事实。但是，它的资源却变成了装饰富有的第一世界国家富人们的珠宝，用来生产游戏机、手机和武器装备的关键资源。

看来，约翰·珀金斯用“经济杀手”这一字眼对刚果的金权政体和它的走狗的行为来说实在是太过平淡无力了。只需勇敢地看一下他们对刚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许用“经济战犯”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会更合适。

为了保护我们的社会，那些不知悔改的杀手和战犯，他们的唯一归宿只能是监狱。

【注释】

①在本章，刚果指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即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该国曾经



叫做扎伊尔；而对立的刚果共和国，即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这两个国家相互接壤。

②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黑人女议员麦金尼在2001年4月16日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来源：www.house.gov/mckinney/news/pr010416.htm。

③国际救援组织（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2004年估计，从1998年以来，大约有390万人死于政治动荡，在刚果每月死亡人数超过其“一般水平”38000人，也就是说，每天死亡人数超过1250人。在东部的不安全的省份中，70%多的遇难者死于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理查德·J·布伦南指出：“仅仅有2%的人是直接死于暴力冲突。”“然而，如果冲突效应（例如不安全限制了患者去医疗机构就诊）能够得到消除，死亡率就会降至‘一般水平’。”英国医疗杂志《柳叶刀》（Lancet）证实了国际救援组织1998~2004年有390万人死于同战争相关的统计数据。它提到刚果几个月的死亡人数相当于一次东南亚的海啸（这里指的是2004年12月的特大海啸）。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表明，这样高的死亡率仍然在继续。《抢先的战争流行病——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得到的教训》讨论的是国际救援组织和《柳叶刀》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为本杰明·科格伦、理查德·J·布伦南、帕斯卡·卡布拉等人编写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死亡人数——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该文发表在2006年1月7日《柳叶刀》367。网址：www.thelancet.com。

④1961年，比利时承认刚果独立后，蒙博托在美国和比利时的支持下杀害了第一任刚果（扎伊尔）总理卢蒙巴。此后，在美国支持下蒙博托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卢蒙巴是一个泛非主义者和平民论者，不愿意同美国或前苏联结盟。在他公开表明鼓励利用刚果的资源使得刚果人受益后，戴比尔斯钻石公司担心其会失去进入刚果钻石市场的权利。该政策加速了卢蒙巴的死亡。没有了卢蒙巴在此事挡道，总理阿都拉同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谈判代表毛瑞斯·坦普斯曼一起批准了一项合同，并且将此消息通过电报告知了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从美国国务院1961年的备忘录上记载的条目“刚果钻石交易”中，我们可以推断出美国应当是支持这个建议的。资料来源于www.minesandcommunities.org/Company/diamonds1.htm，“钻石卡特尔是如何影响美国数十年来的国外政策的”。在该网站中还包含了部分由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黑人女议员麦金尼于2001年4月16日提交的讨论报告的抄本。珍妮·法雷尔·罗伯茨对麦金尼提案做了证实。罗伯茨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充满血迹的钻石——一项全世界的钻石调查》（布里斯托尔：Impact Media, 2001）。接下来的10年，蒙博托作为比利时人的傀儡掠夺了这个国家，在国外银行的存款高达数十亿美元。坦普斯曼和他的职员们帮助蒙博托掌控刚果（扎伊尔），并且从美国那里为蒙博托获得了安全基金。然而，蒙博托开始限制西方国家接近刚果的资源。这样招致了美国支持卡比拉、卢旺达和乌干达发动推翻蒙博托政权的政变。坦普斯曼是民主党的主要捐助者。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他曾去白宫数次，并且同克林顿夫妇乘坐游艇去漫步文雅岛度假。资料来源于苏珊·施密特，《坦普斯曼计划获得了美国的帮



助》、《华盛顿邮报》，1997年8月2日。

⑤马德琳·德里安，《暴利——公司为何和如何用武力进行贸易》（吉尔福德，康涅狄格州：Lyon's Press，2004）第302页第3段。

⑥专家组关于非法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然资源及其他形式财富报告，2001，www.un.org/docs/sc/letters/2001/357e.pdf；阿赛德·艾赛米，“刚果：西方的黑暗之心”，《加拿大政策选择监控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Monitor*），2001年10月，www.minesandcommunities.org/Country/congol.htm。

⑦未来在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和扎伊尔可以开采出钽矿石。在这些地方它通常是作为工业上锡矿石开采的副产品。极地学院（Pole Institute），“钽现象：一个贫矿如何改变被战争摧毁的、地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北基伍省人民生活”，2002年1月，www.pole-institute.org/documents/coltanglais02.pdf。

⑧非洲大湖地区 and 全党派国会团体阻止有计划屠杀，“非法矿石与冲突”，议会简报，2003年3月，www.appggreatlakes.org/cgi-bin/site/index.cgi?back=&pid=27&keywords=&topic=Briefing_Papers。也可察看卢旺达对“专家小组报告”的官方答复，2001，见 www.gov.rw/government/04_22_01news_Response_To_UN_Report.htm。

⑨“专家小组报告”，2001。可参见德纳·蒙塔古和弗莱德·贝里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商业战争”，《美元与意识》（*Dollars and Sense*），2001年7~8月。报告包含了连接刚果和津巴布韦的政治、军事与商业利益的战利品，指出这一网络已经从国家矿业部门向私人公司转移了50亿美元的财产。从1998~2000年，没有一项交易使刚果的国库受益。报告指出政府控制地区的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率是从国有公司如Gecamines向腐败的津巴布韦和刚果的政府官员转移财富的结果。

⑩关于谁侵吞了刚果财富的“专家组的报告”，2001，对于“卢旺达声明”持有怀疑态度。该声明以保护刚果自身安全为幌子，实际上侵吞了刚果的财富。专家组2000年3月26日发表了一封信，在信中，刚果民盟戈马派（一个由卢旺达人支持的刚果武装组织）军队的高官力劝各个组织保持同民兵组织较好的“兄弟”关系。2002年一位居住在布卡武的30岁的民兵派战士向联合国人员讲述：“近两年来我们同RPA（卢旺达爱国军）战斗没有几次。我们觉得他们同我们一样已经厌倦了战争。在刚果他们不会追击我们。在这里我们曾经见到过他们开采金矿和钽矿，并且看到过他们是如何抢夺劳动力的。”

⑪2001年4月16日，麦基尼女议员调查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策划1994年4月6日的谋杀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案件，怀疑卡加梅利用通过乌干达获得的美国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他们的飞机。喀麦隆记者夏尔·奥纳纳在他的书《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的秘密》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评断。卡加梅指控夏尔·奥纳纳诽谤，但是巴黎的某法院却证实奥纳纳所述声明是真实的。在



卢旺达种族灭绝行动后,出于对卢旺达的图西族的同情,西方国家全权委托卡加梅以同样方式进行无人道的人权践踏。在二战期间,以这种方式,世界没有能控制住无数的以色列人权遭到践踏。以色列人权遭到践踏是由于德国意图灭绝所有的犹太人所造成的。刚果人民对于西方国家的这种放任态度十分的憎恨。在我们代表居住的一个戈马的家庭旅馆中,当旅馆的经理发现我们试图理解冲突的根源时,他告诉我们:“图西族是非常残忍的。”之后他又和我们谈起了在种族灭绝计划之前图西族的残忍行为。

⑫蒙古和贝里根,“商业战争”。

⑬麦金尼听证会,2001年4月16日。

⑭艾赛米,“刚果:西方的黑暗之心”。

⑮麦金尼听证会,2001年4月16日。

⑯德纳·蒙古,“被窃取的财产——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柯坦矿和冲突”,《高级国际研究院评论》(SAIS Review) 22, 第一期(2002年冬季—春季)。

⑰阿密·古德曼和戴维·古德曼,《统治者的抗议——暴露圆滑的政客、战争受益者和喜爱他们的媒体》(纽约:Hyperion Press, 2004年)。

⑱蒙古和贝里根,“商业战争”;艾赛米,“刚果:西方的黑暗之心”;“专家小组的报告”,2001年;《五年:经合组织方针和国家联络中心回顾》,2005年9月22日, www.oecd-watch.org/docs/OECD_Watch_5_years_on.pdf;全党派国会团体,“非法的矿产和冲突”。

⑲“专家小组的报告”,2001年。

⑳“IMF总结了2002年与卢旺达磋商的第四条款”,2002年9月20日, www.imf.org/external/np/sec/pn/2002/pn02104/.htm;“卢旺达为‘高速增长’奠定基础”,非洲新闻社(afol News), www.afrol.com/html/News2002/rwa023_econ_growth.htm;“IMF执行董事会完成了对乌干达减贫和发展计划整顿的最终评审,并且同意了为期16个月的支持政策”,新闻发布号06/14,2006年1月24日。

㉑这些公司其中之一是金罗斯·弗莱斯特公司。一点也不奇怪,它以比利时战争的受益者乔治·弗莱斯特为首的,乔治·弗莱斯特过去在刚果强行掠夺矿产的行为受到了联合国的责难:“刚果资产地带”,矿产和集团网站(Mines and Communities Website),2006年2月27日, www.minesandcommunities.org/Action/press949.htm。

㉒RAID报道:“集团呼吁世界银行调查矿产合同;银行未成功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改革方案”,2006年2月27日;给世界银行主席沃尔福威茨的一封信,2006年2月27日, www.raid-uk.org/news.htm;“刚果资产地带”,2006年2月27日。世界银行也证实了约翰·珀金斯的对它在刚果公司的保险金分配的道德问题的评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的保险公司,2004年9月,它同意对澳大利亚安维尔矿业公司在迪库卢希的铜矿和银矿接受“政治风险”



保险。一个月之后,在基尔瓦镇有一小部分反叛势力崛起的时候,安维尔对其进行了武力镇压,在这期间,安维尔对刚果军队提供了后勤支持。被杀的激进分子已达 100 人。世界银行在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安排下调查了此次事件,但是直到非政府组织抗议的时候才公布报告。澳大利亚警方最近正在调查安维尔矿业公司,该公司声称警方霸占了它们的车辆和食物。“世界银行隐瞒了有争议的刚果矿业项目的内部报告”,2006 年 1 月 31 日,网址: http://www.chioke.org/nuevo_eng/informes/3933.html。

②RAID,《无法回答的问题:公司、冲突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行政概要》,报告,2004 年 4 月,第 2 页,网址: www.raid-uk.org/docs/UN_Panel_DRC/Unanswered_Question_Full.pdf。

③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黄金的诅咒:九、国际性组织主动发起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开采的演说”,网址: http://hrw.org/reports/2005/drc0505/12.htm#_Toc102992181; RAID,《无法回答的问题》,大湖地区和全党派国会团体,“经合组织方针和刚果民主共和国”,2005 年 2 月 7 日, www.appggreatlakes.org/cgi-bin/site/index.cgi?back=&pid=75&keywords=2005&topic=。

④给作者的电子邮件,2006 年 4 月 7 日。

⑤“OECD 的跨国公司方针:国家联络中心 2005 年年会,” <http://www.oecd.org/dataoecd/20/13/35387363.pdf>。

⑥参见 www.un.org/News/Press/docs/2003/sc7642.doc.htm。专家小组成员引用他写给作者的电子邮件,“很明显,它的目的不是做更深入的研究,而是证明列在名单上的很多公司无罪。”

⑦那些在 2002 年的钨钽矿高峰期从卢旺达得到了廉价钨钽矿的公司,宣称 2001 年以后它们停止从卢旺达购买钨钽矿意味着它们回应了伦理问题。比如说,以美国为基地的基美公司在 2003 年宣布它将要要求它的供应商“提供没有或者以后也不会有以下情况的证明: a. 在刚果非法开采钨钽矿; b. 在刚果购买含钨钽矿在内的非法的原料矿,包括钨钽矿; c. 向市场出售此类非法原料矿”(www.kemet.com/kemet/web/homepage/kechome.nsf/weben/KEMET%20Supports%20Avoiding%20Tantalum%20Mined%20in%20Restricted%20Areas%20of%20Congo)。然而,掠夺行为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有用的比喻:数年来掠夺和抢劫他们所经过的海岸的掠夺者们,不会因为“我们至少两年没有做这些事情了”的理由而赦免他们无罪。

⑧见 www.foe.org/camps/intl/unreportmeno.pdf,联合国报告、FoE 及 RAID 因公司恣意妄为而向政府官员们递送的信件可以参阅网站: www.foe.org/new/releases/84drccomplaint.html。

⑨FoE,“各团体就联合国报告中所指出的 3 家美国公司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抱怨”,2004 年 8 月 4 日, www.foe.org/new/releases/84drccomplaint.html。另见联合国专家小组 2002 年 10 月 16 日报告第 22~64 段,里面揭露了刚果和津巴布韦政府在刚果非法掠夺资源时的亲密联系。



有趣的是，国家联络中心 2005 年年报的某个标题为“国家联络中心的追踪调查”的章节里表明，“芬兰和美国国家联络中心就将一家美国公司和它的芬兰子公司从联合国小组的最终报告中删除一直在交换意见。”报告中没有直接点 OM 集团的名这一事实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国家联络中心扮演了袒护公司的角色。“OECD 的跨国公司方针：国家联络中心 2005 年年会”，www.oecd.org/dataoecd/20/13/35387363.pdf。FoE 和 RAID 在世界银行报告中还引述了 OM 集团的环境记录。该报告质疑了 OM 集团在卢本巴希的工厂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能充分地保护刚果工人使他们免受放射性污染以及该工厂的运作是否使当地的污染程度达到了一个难以让人接受的高水平。

③科林·费里曼，电话和电子邮件采访，2005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 月。费里曼在 RAID 任职之前曾与 FoE 共事。另见《五年：经合组织方针和国家联络中心回顾》，2005 年 9 月 22 日，可参见 www.oecdwatch.org/docs/OECD_Watch_5_years_on.pdf。我联络了在联合国第三份报告中所提到的美国公司，其中的两家，卡伯特和基美公司提供了回应起诉他们非法获取钶钽矿来渔利的互联网页面链接地址。卡伯特的页面上有一个 PDF 文档声明的链接，“卡伯特将不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任何非法来源购买钶钽矿资源。”但是，2001 年的联合国专家小组报告记载，“事实上，东部刚果共和国的钶钽矿至少会让反叛集团和外国军队中的一方受益。”在报告所及年份，刚果东部 60% ~ 70% 的钶钽矿都是由战俘在卢旺达军队的监视下开采的。乔治·布什的能源部部长塞缪尔·博德曼（2005 年任命），在 1997 ~ 2001 年是卡伯特集团的 CEO 兼主席，当时来自刚果的大量非法钶钽矿冲击了市场，据称是卡伯特获得了这些钶钽矿。

④RAID，“无法回答的问题”，报告，2004 年 4 月。人权观察回应了 RAID 在报告中提出的最终意见，写到：“国际团体也许想要考虑建立一个常设的可以在世界范围调查这些问题的专家名单簿，而不是成立专门小组。”阿温德·甘尼森和亚历克斯·文思，“战争武器——资源、贪婪和掠夺性的国家”，www.hrw.org/wr2k4/14.htm。

⑤此观点的更多细节请参见 <http://www.raid-uk.org/news.htm>。

⑥西摩·赫什曾在美国媒体爆出了阿布·格莱布丑闻，他在 2004 年 5 月 5 日《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文章“控制链”中引用了 CPT 的信息。在 4 个 CPT 人员在巴格达被绑架后，赫什对“现在就要民主”广播节目的艾米·古德曼说 CPT 的工作就是“刀刃”（www.democracynow.org/article.pl?sid=05/11/30/153252）。

私人军队越来越成为外国公司在第三世界运营的一部分。看一名雇佣兵是如何发现他正在抵抗尼日尔河三角洲人民以来保护壳牌公司对石油的掠夺的。

第6章 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

安德鲁·罗韦尔 詹姆斯·马里奥特

“我喜欢尼日利亚。我喜欢非洲的脉搏。非常刺激。我会想念它的。”^①
奈杰尔·沃森-克拉克有应对刺激和挑战的本事。作为一名前英国皇家海军士兵，他积极服了12年兵役。他还对跳伞运动有极高的热情，并曾作为一名英国国家跳伞队教练，花了6年时间在锦标赛中角逐。

在离开海军之后，跟许多退役军人一样，他干过许多工作。比如，他在西班牙开过一个跳伞运动学校，在英国当过贴身护卫——也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私人保镖。他的一位朋友从事海事安全方面的工作，因而沃森-克拉克结束了在安哥拉的雪佛龙公司的工作，于2002年在尼日利亚开始了新的承包入工作。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他调整了壳牌公司在—个战略性海上油田的安全需求。他的正式工作是埃科·阿尔法油田的安全联络员，其主要职责是保卫壳牌公司一个叫“海鹰”的橙色浮动采油平台，该平台离海岸大约7英里。^②他被分配到—条叫“自由之役”的250英尺长的治安船上，这条船属于美国潮汐公司（Tidewater）的一个子公司。以路易斯安那为基地，潮汐公司拥有世界上为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提供服务的最大船队。^③

沃森-克拉克在那里工作的原因很简单。尼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的小



港湾和浅滩对石油工业和尼日利亚政府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实际上，石油是政府的血液，它占了税收的80%以上，外汇收入的90%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40%。^④

尼日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是壳牌公司的核心资产，也是美国公司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的核心资产。^⑤目前，三角洲提供了壳牌10%以上的产品。同时，壳牌还控制了尼日利亚国内50%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⑥壳牌公司和尼日利亚的命运就这样被纠缠在了一起。

像潮汐公司的“自由之役”号这样的船只只是石油工业网络延伸到大陆的必要组成部分。壳牌也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没有这个网络的子公司、承包商和顾问组成的结构存在，壳牌就不可能在尼日利亚正常运转。

■ 壳牌的国际网络

控制之网是真正国际化的：荷兰皇家壳牌的全球运作是由海牙（在荷兰西部）和伦敦控制的。以海牙为基地的勘探和产品分配控制着尼日利亚海湾，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基地是拉各斯（尼日利亚经济首都）。尼日利亚壳牌和勘探公司（SNEPCO）是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的子公司之一。SNEPCO已经让埃克中尔公司（Ecodrill，它自己也是这一大型勘探集团的子公司）协助它的石油生产运营。工作在潮汐公司的一支船队上的沃森－克拉克就受雇于埃克中尔公司。虽然潮汐公司基地在路易斯安那，但它的西非业务运营管理并不在尼日利亚，而是在苏格兰的石油之都阿伯丁。

为了能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有效运营，壳牌公司的子公司及其承包商必须同尼日利亚的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军事部门的不同分支机构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经商的唯一途径。有时，这种亲密关系在公司和尼日利亚政府、军队或机动警察部队（MPF）之间表现为一种融资关系。多年来，壳牌公司一直否认任何这种融资关系的存在，但现在却承认了。尼日利亚人通常看不出政府和壳牌公司，或者壳牌公司和军队之间有什么区别，就像看不出壳牌公司和它的承包商之间有什么区别一样。对人们来说，它们都是政府利益联盟的一部分。



■ 人质扣留

2006年1月11日。在“自由之役”号上的是61岁的美国船长帕特里克·兰德里和两个工程师。两个工程师分别是来自保加利亚的54岁的米尔科·尼柴伍和来自洪都拉斯的54岁的哈里·伊拜科斯。此外，还有被安置在这条船上的12名尼日利亚海军士兵，他们是由壳牌公司支付报酬的。沃森-克拉克的工作就是保证壳牌的安全，照顾“自由之役”号上的所有人和训练那些尼日利亚军人，他们有两只充气橡皮艇，称为“肋骨”。“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万一有袭击和入侵的情况下保护油田安全，”沃森-克拉克说，“我们在‘自由之役’号上巡逻。这真是一个独特的角色——我们从来不去港口，也从来不开油田。”

在这一石油勘探网络上，沃森-克拉克本质上是一名前线士兵——他是为私营公司而不是国营公司工作的。殖民势力经常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它们在三角洲的商业财产。他扮演的角色与17世纪60年代的英国水兵，只是略有不同。那时，士兵被皇家海军雇用，并被派出保护皇家非洲公司的船只，这些船只用来从三角洲的港湾运送奴隶到美洲的殖民地。150年来，英国一直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继奴隶们来到这里的棕榈油种植园之后，现在开采的资源则变成了石油和天然气。

安全联络员的工作就是介入过去40年里盘绕在尼日尔三角洲上的暴力漩涡。暴力危机的中心就是石油——谁控制，谁受益，谁承担后果。

40年来，尼日尔三角洲的各个部族的人们都在争夺从他们脚下抽出来的石油的尽可能多的份额。他们并未从这些争夺中受益多少。一些人富了起来，但是猖獗的尼日利亚腐败告诉我们，他们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权要人物。一些石油公司也富了起来，但是复杂的税收操作使大部分利润在任何人明白它们赚了多少钱之前就悄无声息地流到了尼日利亚国外。普通人并没有因为提炼石油而变富有，三角洲的这些部族也一直很贫穷。

石油提炼地尼日尔三角洲各州最近建议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将石油税收的13%返还给它们。但事实上，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到那些部族手里。



生活在石油世界的最动荡地带，这里的人民遭受着石油过多所带来的痛苦：日常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一天 24 小时燃烧着的天然气咆哮向非洲的夜晚，腐蚀着本就不平的屋顶，灼伤着人们的颈项。

40 年来，这些部族都对自己的境遇愤愤不平。通常，这些的抗议只会招致冷酷无情的军队镇压，之后留下的就是数不清的死亡、伤残和无家可归的人们。^⑦就连年仅 10 岁的小孩都会被糟蹋或是被拷打，整个村镇成为废墟。三角洲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1999 年，奥地镇（Odi）被袭以后，尼日利亚参议院院长舒巴·奥卡迪博简单地说：“事实代表他们自己在说话。这里根本没有必要演讲，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⑧

在过去 10 年里，苦难的煎熬与日俱增，三角洲的年轻人因此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改用新的策略来回击敌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和扣留人质。由于暴力，沃森－克拉克的工作变得很危险——像他这样的承包人经常成为三角洲部族仇恨的目标。壳牌公司的高级经理们有权力，但他们远离这里，当地人见不到他们，不过承包人却可以经常看见，而且通常目标都非常暴露。所以使用承包人而不是直接雇用职员，对壳牌公司推诿责任来说是很有用的。

1 月 11 号。气氛很紧张。“自由之役”号也提高了戒备状态。那天下午，沃森－克拉克看见 3 艘载有 40 多人的快艇快速向他们接近，他和全体船员暴露得越来越清楚。这些入侵者穿着传统的伊加族（尼日利亚第四大民族）武士的标志性服装。一条海军“肋骨”被派去截击那些入侵者。“我们去截击那 3 艘快艇，但是当海军“肋骨”接近他们的时候，却发现他们超载了，也没有带枪，而且他们撤退了，”沃森－克拉克回忆说，“这只是一次策略性撤退。”

一些尼日利亚海军士兵重新登上“自由之役”号。“老实说，我认为我们是占上风的，尽管那些入侵者数量众多，但我认为我们能够应付。”沃森－克拉克说。平时所有的军事训练都很适当。

他设法让另外一些补给船离开这一水域，让浮动存储船只——“海鹰”号开出水闸。然后，沃森－克拉克命令他的人向周围实弹射击。“我



相信是我们的海军先开火的，然后那些入侵者才开始全力开火，我们向周围激烈射击。”入侵者用子弹来攻击周围装有装甲的“自由之役”号船。“那是非常戏剧性的、非常激烈的战斗，最终我们的海军被制服。”

沃森-克拉克站在舰桥上，他身边的所有工具都由于中弹而碎裂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沃森-克拉克之外没有人受伤，华特森-克拉克也仅仅是下巴上开了个口子。但是尼日利亚海军抵御不住那些入侵者的攻击——“肋骨”上的人拒绝战斗，船上的那些人只是躲藏。“紧接着，那些好战分子开始登船。我们不得不投降。‘形势不妙’，这就是我那时候所想的。不知为什么，我并不害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交火，即使是在海军舰队。那就像是身在电影之中。”

就在被俘虏之后，沃森-克拉克才意识到那些入侵者或许并不打算扣留人质。那些人就是否用火箭推进的手榴弹来攻击“海鹰”号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3小时内，人质被押往尼日尔三角洲的各个港湾。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他们就像消失在了沼泽中。有关袭击的消息使得全球石油价格的暴涨。^⑨

对于沃森-克拉克和其他人质来说，囚禁只是刚刚开始。“他们马上就把我认定为壳牌公司的代表，”他回忆道，“他们总是把每件事情都说给我。一些家伙并不喜欢我所代表的壳牌。对他们来说，我就代表着他们所对抗的：壳牌和联邦政府。”

■ 中国：一个新的经济伙伴

就在同一天——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飞往非洲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问，目的是进口非洲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满足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当然，这次访问也包括尼日利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李肇星，是中国的前任驻美国大使，他飞往非洲的各个访问国首都，只因为一个原因：非洲大陆丰富的资源。中国，像许多国家一样，需要更多的非洲石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石油消费呈指数式增长。截止到2005年，中国40%的石油需求都依靠进口，^⑩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就在李肇星访问的第二天，中国发表了关于非洲大陆的第一本白皮书。“非洲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这些都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吕国增告诉媒体。^⑪在这次访问中，李肇星略述了中国如何推进与非洲基于“互利双赢”的经济与军事合作关系的计划。^⑫

李肇星的访问在世界石油之都引人注目。一周前，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宣布其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将为尼日利亚南大西洋石油有限公司45%的股权支付22.7亿美元。这个决定让分析家们很困惑：壳牌和其他一些西方大石油公司都在回避这个海上石油集团，甚至是印度一些贪得无厌的石油天然气公司都在怀疑它的所有权是否合法，因而拒绝购买它。中国的购买表明中国为了买入海外能源而准备冒很大的风险。^⑬

中国和尼日利亚宣布了这次互惠互利的交易。“中国是一个有着庞大需求的巨大市场，我们能够满足它，”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恩戈齐·奥孔约·伊维阿拉说。^⑭“这宗（尼日利亚）交易让CNOOC第一次在非洲有了基地。我们将在非洲大陆探寻更多的机会。”CNOOC的总裁傅成玉说。^⑮仅仅在6个月内，中国公司签署的石油交易在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就已价值70亿美元。^⑯6个星期后，CNOOC在赤道几内亚又签署了另一个石油协议。

■ 华盛顿在三角洲的利益

中国对非洲石油的兴趣及密切关注的程度完全赶不上华盛顿。自从“9·11”之后，美国希望通过能源投资的多样化来保护经济安全。在过去5年里，布什政府和有影响力的主要右翼智囊团把西非，特别是尼日利亚，看作是独立于中东石油之外的一个平衡力量。非洲是“下一个海湾”——一个远离像伊拉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些麻烦国家的石油储藏地。

尼日利亚现在供应着美国10%的石油，但是美国政府官员希望供应量能快速增加。预计在今后10年内，美国30%的石油都将来自于非洲。^⑰

如果西非石油对美国越来越重要，就要随之加强保护。自从“9·11”



以后，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和报告中，分析家们主张几内亚海湾应该被宣布为美国的“重大利益”区域，须由美国军队保护。例如，共和党议员罗伊塞于2002年1月在一个石油会议上说：“我认为在‘9·11’后，为了美国的领土安全，非洲石油应优先看待。”^⑧

和罗伊塞参加同一会议的国防部非洲事务办公室副官克罗·克伦·克维亚托夫斯基，也强调了“非洲对美国国防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说明了美国最近在尼日利亚如何开展“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国防部在非洲大使馆专员的数量在过去3年增加了一倍。克维亚托夫斯基声称，军队急切想了解美国能源公司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资者面临的挑战。“我们了解得越多，就越有可能提供帮助。”^⑨

在座谈会外，一个叫做非洲石油政策倡议组的工作小组成立了。它的工作报告在2002年6月上交给了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共和党人比利·陶金说：“‘9·11’事件再度唤醒了美国公众对我们非同寻常的依赖从中东进口能源的意识。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多样化投资能源供给的价值。建立新的供给来源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期待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⑩报告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国会和政府应当声明几内亚海湾是美国的‘重大利益’区域。”^⑪

自此，其他一些智囊团也开始吹捧类似的论调：“美国在非洲西部和中北部有重大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逐渐增长的国家利益，集中但不限于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一个专责小组于2004年3月报告说，这个“复杂而不稳定的地区”对“美国能源供给的安全和投资多样化”非常关键。^⑫2005年7月，CSIS的一个新的专责小组建议美国应该“使几内亚海湾的安全和管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据明显的优先地位。”^⑬

就在沃森-克拉克被扣押为人质的那个月，很有影响力的外交关系理事会通过它的非洲独立专责小组发表了一项报告，再一次确认了非洲石油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现在中国在石油方面对美国的竞争威胁也被认识到了。“截止到这个10年”，报告称，“撒哈拉以南非洲会成为和中东地区一样重要的美国能源进口地。亚洲、欧洲还有其他国家都在相互竞争石



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也同样在美国竞争。”

这个专责小组的联席主席之一是安东尼·莱克，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助理，担任 2002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美国委员会主席，致力于人道主义援助。莱克在一次讨论那项报告的研究会上指出，考虑到石油、恐怖主义等几个主要问题，美国在非洲的利益超出了“人道主义”的界限。“在今后 2 年内，非洲的石油生产将达到全球最快的递增长。预计到 2010 年，非洲将为我们提供和中东一样多的石油进口量。”

莱克继续说，第二大利益国“是中国，中国现在 28% 的石油都是从非洲进口的，而且拥有苏丹 40% 的石油工业。因为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公司，所以中国公司能够以非常高效的方式来和美国公司竞争。例如，最近中国向安哥拉提供 20 亿美元贷款，部分贷款以今后的石油供应为担保，以此赢得了在安哥拉开采石油的特权。而且中国在我们迫切需要的石油能源上非常具有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仅遍及石油资源非常丰富的几内亚海湾，还明显包括尼日利亚。”²³

尽管莱克声称，在非洲，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敌人，但认为中国还应在非洲大陆更高的透明度、更好的商业习惯和更少的腐败方面做得更好。

专责小组的另一位主席是斯蒂芬·莫里森，他还是 CSIS 非洲项目部主任，也曾是一位前克林顿政府官员。莫里森是对非洲石油开采和商业行为透明度辩论的中心人物。他赞同华盛顿右翼智囊团的建议，认为应该将非洲石油标上美国重大利益的标签，他也声称这些交易必须透明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权保护。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态度很聪明：这么多年来，非洲的腐败交易并没有带给当地人多少财富，以至于这种现状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美国能源安全能够仅由非洲石油来保证的话，只有美国宣称非洲在石油开发中能够获利，它才能在那里进行石油开采。那时候，石油交易的透明度就成为非洲石油开采被更多部族广泛接受的一个工具。

中国进入非洲令华盛顿真的感到不安。“美国与其同盟国和友好国正在寻求一个被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民主政治统治的、信仰自由市场的繁荣非洲的远景，但这正受到中国在非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挑战，”华盛顿右翼美



国传统基金会写到，“中国同非洲刚刚萌芽的关系已经发出警报，原因不仅是因为它促进了中国能源的交易，还因为它在跟美国竞争非洲的贸易。”^⑤这个曾经创立了无情的里根经济学的右翼智囊团，现在又开始为中国这个的新经济势力的行为而紧张。与非洲的老职业杀手——美国和欧洲——它们炫耀着对非洲大陆的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良知不同，中国，这个非洲大陆的新经济伙伴，以一种颇为人称道的商业姿态进入它们的领地。

商业的军事化

“他们让我们绝对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哪儿也不能去。我知道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奈杰尔·沃森-克拉克回忆道。他和其他人质被带到尼日尔三角洲某处的小村庄。“我们四个都感觉遇到了很大麻烦，而且要找到出路将会非常困难。”

被囚禁后的第二天，沃森-克拉克被要求打电话给路透社。他照着一个手稿念出那些武士们的要求，包括：由当地人来控制石油；壳牌公司支付15亿英镑来补偿对这里的污染；释放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部队的伊加族头领阿拉吉·阿撒利；释放前巴耶尔萨州州长阿拉米叶谢加；驱逐所有外国人。

“主要要求是对资源的更多控制权、驱逐外国人和对巴耶尔萨州政府的15亿英镑赔款，”沃森-克拉克说，“他们并不是想要钱。他们并没有要求正常的人质释放条件。”近几年，在三角洲，“正常的”人质扣押意味着提高赎金——但是这次却不一样。当沃森-克拉克读到这些要求的时候，他的心猛地下沉了一下，他意识到他们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马上他就遇到了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些抓他的人正在监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以期发现由于他们的人质扣留而引发了多少公众关注。他们苦恼于只能窃听到一小段新闻报道。奇怪的是，那时候全球新闻界都把目光集中在一条搁浅在伦敦泰晤士河边的鲸鱼，“那条鲸鱼真的令他们非常恼怒。”

抓沃森-克拉克的那些人自称是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的



成员。他们被全球新闻界称为“海盗”、“游击队”和“影子”，但是他们都是些来自尼日尔三角洲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都被石油毁了，所以他们才借助于暴力反叛来改善他们的境遇。MEND 可能是一个新名字，但是他们的要求都源自石油斗争。对尼日尔三角洲的人民，特别是伊加族人民来说，他们提出的要求非常完美。一位 MEND 的成员告诉英国记者：“我们没有水，没有学校，没有电，没有工作。”另一位成员说：“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⑧

按照与斗争接触的密切程度不同的人群，MEND 代表着不同的伊加族青年组织，它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变得越来越激进。伊加族是尼日尔三角洲最大的部族之一，也是同一个较小的部族——奥戈尼族一起反抗石油工业的最大部族之一。就像三角洲的其他部族一样，这两个部族长期要求对从它们的地盘上钻取石油所获得的财富的更多控制。它们也为该地区污染和退化的补偿而斗争。

奥戈尼族的领导者——肯·萨洛-威瓦在 1995 年的一次假审判之后，被尼日利亚军队杀害，这引起了全世界媒体对奥戈尼族的关注。那次审判中的两个主要的起诉目击者后来作证说，他们接受了壳牌和其他公司的贿赂为萨洛-威瓦作了不利的伪证，^⑨这些说法壳牌都坚决否认。^⑩

奥戈尼族第一次对抗壳牌的有记录的起义发生在 1966 年，是壳牌在三角洲发现石油后的第八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一个叫伊萨克·博若的伊加族人，以 150 英镑和一面红旗，组成了尼日尔三角洲志愿者工作组并领兵起义。“如果我们不反抗，”他写道，“我们将永远成为奴隶。”博若与石油公司争论：“它们仍然对我们的人民很残暴，而且它们非常恶劣地不愿去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士兵乘壳牌公司的船被运到起义现场。不久，博若就投降了，第一次伊加族起义结束。

博若短暂的起义鼓舞阿拉吉·阿撒利在 2004 年组成了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并威胁要在三角洲全力奋战。他的威胁通过石油工业引发冲击，世界油价飞涨。他被捕后被毫不奇怪地指控犯了叛国罪。伊加族人一直强烈要求释放阿撒利。

MEND 的进一步要求是释放巴耶尔萨州州长阿拉米叶谢加。他是一个



为伊加族地区争取更多石油收入份额的英雄。但他以腐败和洗钱罪被捕。最后要求壳牌公司执行履行最近的一个尼日利亚法庭判决，并且支付 15 亿美元用来补偿在尼日利亚造成的污染，特别是伊加族地区。所以 MEND 要求的只是法院已经裁决的。确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一个尼日利亚联邦法庭也批准了那个判决，²⁹但是壳牌公司一直拒绝赔偿。

尽管博若的起义给国家的政治地图带来了贫穷和污染，但对它的反抗开创了一个先例，并且一直持续下来。石油公司勾结军队来镇压任何抗议。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一直在重复，因为人民要求一个更公平的石油收入份额及结束污染。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一次示威之后，安东尼兰镇（Andoniland）的伊可村村民被逮捕并受到虐待。1987 年，在机动警察部队（MPF）——当地人称它为杀完就撤部队，被召集来之后，两个人被杀，近 40 所房屋被毁。³⁰1990 年，当 MPF 攻击阿默开莫部族时，80 人被杀，495 所房屋被毁；壳牌公司在一次反对该公司的示威之后，特别请来了 MPF。³¹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保安部队为了报复那些反抗壳牌的起义，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奥戈尼族人。

1994 年 5 月，当地军队指挥官梅哲·保罗·奥昆提默写道：“除非那些无情的军队为了经济活动顺利展开而采取措施，否则壳牌公司不可能正常运转。”³²因此，那些无情的军队开始行动了。壳牌后来承认至少付给过奥昆提默和他的部队一次战斗补贴。³³

这场斗争并不仅仅涉及奥戈尼族人和壳牌公司。20 世纪 90 年代末，两个伊加族青年带领一群没有武装的年轻人占领了雪佛龙的油田之后被杀。MPF 又一次被召来——并且是乘雪佛龙的直升飞机到达的。几个月后，尼日利亚军队杀害了 4 个人，67 个抗议者失踪，这一次是由雪佛龙公司付的钱。已故尼日利亚学者克劳德·阿克把这种政府和公司互相勾结称为“商业的军事化”，在镇压和暴力中，私人公司和政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³⁴

2003 年 12 月，一个外泄的报告称，当壳牌员工“陪同特别的高级经理参观那些部族时，他们简直就是被机动警察护送着”。这个报告还称，壳牌的运营方式“产生、滋长和恶化了冲突”，而且“在尼日利亚，50 年后，”壳牌会变成“尼日利亚冲突系统中的一个必要部分。”³⁵



时间慢慢过去，抓沃森-克拉克的人带着死亡和枪战的谣言回来了。“那变得非常非常困难，”他回忆道，“一天天过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绝望。我本来天生是很乐观的，但悲观和感觉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强烈悲哀控制着我的情绪。这是真的。”

■ 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对埃德蒙德·道克拉博士来说，人质危机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尼日利亚石油资源部长道克拉于2006年1月1日成为欧佩克轮值主席。每一个新年之日，石油卡特尔就会轮换主席之职。现在轮到尼日利亚了。作为负责石油的部长，道克拉被任命为主席。

这是他掌管全球命运的一年，这位看上去很年轻的62岁老人期待着他作为欧佩克主席的初次露面。他是一位来自三角洲的谦虚男子，他的大部分工作经历是在壳牌石油公司。“我最初是一个石油人，”道克拉说，“在上完小学和中学后，我被壳牌公司选中，送往国外读书；我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读地质学。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回国加入了壳牌公司。我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壳牌人：先是学者，后是雇员。”^③道克拉为壳牌分别在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突尼斯，当然还有尼日利亚工作过。

这个壳牌人“一级一级地走上来，成为了第一个本土地质学家，然后成为第一个本土的总经理和勘探主管。”这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那时候的壳牌公司所能坐到的最高位置。后来道克拉被壳牌提拔为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NNPC）董事，从1992~1993年，共18个月。^④

然而，在独裁者萨尼·阿巴查将军1993年上台后不久，道克拉被NNPC解雇了。^⑤他引退了，直到6年后，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要求他做总统顾问。2005年，在他被任命为尼日利亚石油资源部长的仪式上，道克拉宣称：“我们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⑥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从壳牌出来进入政府的石油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奥戈尼族人起义的时候，壳牌石油发展公司（SPDC）前员工鲁弗斯·阿



达·乔治，是尼日尔三角洲河流州的地方长官；戈德温·欧曼斯，一个有名的 SPDC 的董事，在 2001 年被任命为尼日尔三角洲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恩内斯特·匈内坎在 1993 年领导国家过渡政府，做过短暂的尼日利亚总统，他是 SPDC 的董事。

壳牌公司的高级职员到政府任职，这扇旋转门使人们更加相信壳牌和政府三角洲是一回事。事实上，奥戈尼族激进分子肯·萨洛-威瓦曾经评论过反叛组织的主张，“它是反壳牌的。它也是反联邦政府的，因为就我们来说，壳牌和联邦政府是联合起来对付奥戈尼族人的。”

萨洛-威瓦牺牲了他的性命去反抗壳牌，然而道克拉在壳牌的职业生涯却把他带到了他在石油工业的最高峰。这两个人都出生于三角洲，都是石油塑造了他们的命运，但是他们两个人却有不同结果。这两人都成了国际新闻，萨洛-威瓦是因为他的牺牲，道克拉却是因为他被任命为欧佩克主席。

道克拉的故事赋予了公司和政府之间的这扇旋转门以人性，这扇旋转门只允许极小部分权要从石油开采中获利。但是，作为一个黑人，道克拉是这个规则中那些极少数人中的一个。直到 2004 年，在巴兹尔·欧米伊成为第一个领导壳牌在尼日利亚的主要子公司——壳牌石油发展公司的尼日利亚人之前，壳牌公司的常务董事都是白人。

欧佩克对壳牌人道克拉的任命，使他由一个尼日利亚国内的杰出人士成为国际名人。尼日利亚新闻对他大加称赞：“这次调任将会大大鼓励对尼日利亚进行投资的国际商业信心。”——《每日商报》宣称。⁴⁹

作为欧佩克主席，他的第一次露面是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该论坛每年都聚集全世界的商业和政治精英。达沃斯隐蔽地坐落于瑞士阿尔卑斯山谷里。在会议大厅外，清澈透明的蔚蓝色天空下是白雪覆盖的农舍，会议大厅内，2300 名代表开展社交活动，构成了最大的高级人际关系网。

欧佩克作为达沃斯的代表已长达 10 多年，但今年它被赋予一个以“管理构造变迁”为主题的“能源最高级别会议”的特殊主角。道克拉博士是这一高级团体的成员。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会；一些政治巨头，比如比



尔·克林顿、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也与会了。好莱坞明星诸如麦克·道格拉斯轻松地进进出出；体育传奇人物诸如贝利、穆罕默德·阿里以及摇滚明星博诺也都出现在了达沃斯。

在会议大厅内，讨论的都是重量级的商业事件。在会议日程上，中国和印度日趋增加的重要性引人注目。中国的 GNP 增长率刚刚达到 9.9%，就占据了头条。

道克拉也非常希望能缓解能源市场的紧张冲突。他在会议第二天的工作餐上发表了演讲。他从回顾过去两年的市场状况开始。“在满足来自新兴大国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以及来自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非常高的石油需求增长方面还有很大挑战。”

道克拉继续说，如果有一个显著的挑战，那就是需要去阻止未来能源市场的剧烈动荡。“本世纪前三年的市场很稳定，满足了所有各方的需求，”他说，“但是，此后，我们就处在一个非常不同而且更加动荡的环境当中。”

是否他的讲话意味着过去的尼日利亚危机，他并没有直接说明。但是人质事件也在达沃斯制造了其他新闻。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范德伟谈论了人质事件。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的范施欧·库颇洛昆肯定了代表们所说的“尼日利亚三角洲是安全的”，最近的动荡局面只是周期性的爆发的火花——像壳牌这样的石油公司已经适应三角洲了。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又一个周期。问题很快就会被解决。”库颇洛昆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把人质事件的话题转移开了的话，那就是尼日利亚和西非在开发新产品方面比欧佩克快。“拥有先进的技术，储备不成问题，”他说，“挑战在于能够足够快地开发这些储备。”^④所以，诸如难以忍受的贫穷和致命的污染之类的部族不满令人生厌，真正的挑战是尽快地把石油从地下抽上来。

CNN 把达沃斯会议的图片发到了沃森 - 克拉克被扣为人质的三角洲。在收听了奥巴桑乔和布朗之间的会见之后，MEND 成员非常高兴——“他们很喜欢那些照片，认为这肯定和他们有关系。所以他们说：‘事情起作用了’，要么我们决不会被释放。”



■ 欢迎新闻

最终，在1月30日，星期一，沃森-克拉克的父母在清晨被儿子的电话叫醒了。奈杰尔已经获释。“他说他很好。我们很高兴他还活着，而且很好。”他父亲说。

英国驻尼日利亚高级专员理查德·苟兹聂告诉BBC广播4台的《今日》节目：“我们深夜通过尼日尔三角洲巴耶尔萨州地方长官获悉了谈判成功的消息。我们在今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就见到了那些人质，他们看起来很安全，也很好。”^④

第二天早上沃森-克拉克飞到了希思罗机场，他的合伙人布莱昂·托尼凯斯和他的4个孩子在那里等着他。“回家的感觉真是棒极了。我感觉非常好。我的家人围绕着我，这太美好了。”他告诉等着的记者。^⑤

讽刺的是沃森-克拉克并没有一种放松的强烈感觉，仅是一副感激的样子。“在拉格斯参与解救我们出来的各种机构面前，我感到很渺小。”他回忆道。当问到那都是些什么机构时，他回答说有伦敦警察厅、FBI、他在国际油田服务集团的老板、潮汐公司的尼日利亚军队和“一些我不愿意说出来的参与者。”他又补充道：“大家的共同努力很完美。”沃森-克拉克并没有说秘密服务机构是否参与了解救。这并不是英国或美国的机构第一次干涉尼日利亚事务。沃森-克拉克很为摆脱了媒体聚光灯的那一刻感到高兴。他回到了自己家里。

对于道克拉博士，公众的关注才刚刚开始。就在同一天，1月31日，他在维也纳的欧佩克秘书处主持了第139届欧佩克特别会议。这是他第一次负责欧佩克的官方会议。卡特尔成员国的旗帜悬挂在代表们身后，就像安静的卫士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主会议桌上橘色、黄色、白色的花束为原本单调的会议室增添了许多色彩。石油市场“高度波动的价格”再次受到关注。道克拉博士穿着一套时髦的灰色立领西服，看上去很镇定，也很放松。至于尼日利亚正在进行的暴力是否令他烦恼，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当媒体问及欧佩克是否会在2006年增加产量时，道克拉说：“我们始



终认为，我们拥有比市场乐于接受的更多的生产能力。”他透露说，欧佩克至少有 200 万桶的闲置生产能力，并且表示尼日利亚将在上半年每天增产 60 万桶，上限是 250 万桶/天。随后他被世界石油媒体包围，他们想从此刻石油界最重要的领导者那里得知更多信息。

那些天，谁的话能使石油市场波动，谁就有发言权。被监禁的尼日尔三角洲人民志愿军伊加族首领阿拉吉·阿撒利说，释放人质是对“跨国集团的善意表示”，但是他又补充说，袭击还会继续。他挑选出英国加以特殊说明：“我们，伊加族和尼日尔三角洲人民，想提醒全世界人民，英国助长了在我们土地上进行的长达 112 年的非法的、犯罪的和非人道的占有与开采。”^④

有趣的是，阿撒利为尼日利亚三角洲的问题而谴责那些旧殖民势力，就好像新的势力如美国等正开始为尼日利亚的石油而战。毋庸置疑，壳牌受益于英国对尼日利亚的殖民统治，而且它对尼日利亚石油工业的继续统治是殖民的遗产。讽刺的是，壳牌的垄断地位意味着尼日利亚为壳牌也保留了一份致命遗产。

2006 年 2 月，美国花旗集团公布了一项关于尼日利亚的深入研究。“我们的分析家称，”该集团说，“在今后 10 年，尼日利亚是壳牌的一个主要增长区域。”虽然壳牌的增长大多数将来自深海油田，但沃森－克拉克的经历表明海上开采并没有消除部族对石油工业不满。花旗集团断定壳牌是“非常依赖尼日利亚的。我们估计截至 2010 年，尼日利亚将会从现在占壳牌产量的 11% 增长到 17%。”更重要的是，报告断定这个区域占了壳牌到 2010 年的预期产量增长的绝大部分。^⑤

暴力的漩涡看来还会继续，壳牌处于它的中心。2 月份，MEND 扣押了更多的人质，尽管后来这些人质都安然获释。在沃森－克拉克被释放两周后，尼日利亚的军用直升机袭击了那个地区，杀死了大约 20 人。政府宣称它的目标是走私石油的驳船。MEND 谴责军方不应将目标指向平民。壳牌再一次卷入了暴力事件中——有消息称军用直升机用的是壳牌公司的飞机跑道，并且壳牌再次试图使自己与军事行动拉开距离。“武装干涉通常都是当局的决定，而不是私人公司比如说壳牌的决定。”一位发言人说。^⑥



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美国资深海军情报分析家查尔斯·乔各奥尼特说，壳牌已经向美国军方寻求保护。乔各奥尼特把伊加族叛乱和奥巴马乔总统试图继续执政引发的冲突作为为什么“尼日利亚三角洲的状况没有改善，当然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能很快改善”的原因，并且得出结论认为“尼日利亚的石油产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能保持稳定。”^①就在壳牌提供船只镇压伊萨克·博若起义的40年后，该公司仍然一如既往地搅进尼日利亚的军事和石油冲突中。

中国的参与只是刚刚开始。有趣的是，花旗集团的报告指出“壳牌希望在尼日利亚分散它的投资风险”，潜在的买主将会是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

回到英国以后，沃森-克拉克向埃克中尔公司递交了辞职信。因为公司能提供给他的唯一安全职位就是回到埃科·阿尔法油田。“每一个尼日利亚人都知道，惊人的财富正从尼日利亚以及创造它的沿海各州流出，这与在阿布贾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协调的，”他说，“虽然我对 MEND 对我们所做 的事没有太多同情，但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他们被迫做他们所做 的事。那么多的人都没能从国家的财富中受益。他们一无所有。”他指出，在非洲，石油就是黑色的咒语。

【注释】

①奈杰尔·沃森-克拉克，安德鲁·罗韦尔的电话采访，2006年4月21日；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关于沃森-克拉克的引用部分都来自这次采访。

②参见 www.news24.com/News24/Africa/News/0,,2-11-1447_1865650_00.html。

③参见 www.news.moneycentral.msn.com/ticker/article.asp?Feed=BW&Date=20060130&ID=5457691&Symbol=US:TDW。

④尼日利亚壳牌石油发展有限公司，《2004年人类与环境年报》，2005年5月。

⑤M·恩菲尔德，《三角洲的石油工业》，能源咨询顾问公司，尼日尔三角洲地区会议的介绍，默里迪恩国际中心，2005年2月15日。

⑥J·比尔曼，“壳牌开始再次在尼日利亚天然气领域崛起”，《非洲能源》（African Energy），2005年6月，第8~9页；恩菲尔德，《三角洲的石油工业》。

⑦麦克·弗莱士曼，“尼日利亚报告2”，《尼日利亚过渡期观察》（Nigeria Transition



Watch) 第9期, (纽约: 非洲基金 [Africa Fund], 1999)。

⑧卡尔·迈尔,《危机中的尼日利亚已经倒塌》(哈蒙兹沃思: Penguin, 2006)。

⑨“诱骗和破坏削减尼日利亚原油产量”,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 2006年1月12日。

⑩见网址 <http://english.aljazeera.net/NR/exeres/5F9B91A6-C289-446B-A08E-FF9A2BA73791.htm>。

⑪新华财经新闻网,“中国为非洲政策辩护, 陶特与中海油集团接下来的石油交易是互惠互利的”, 2006年1月13日。

⑫“中国揭开与非洲合作关系计划的面纱”, 亚太金融新闻社 (AFX News), 2006年1月16日。

⑬T·皮特曼,“中国外交部长前往非洲进行为期一周的关于非洲大陆丰富的石油资源的访问”, 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2006年1月11日。

⑭A·R·米哈伊列斯库,《合众国际社能源观察》(U. P. I. Energy Watch), 2006年2月7日。

⑮参见 <http://cnoc.com.cn/defaulten.asp>。

⑯J·麦克唐纳,“中国在进口石油上花费数十亿, 却在竭力遏制自己的胃口”, 美联社, 北京, 2006年2月6日。

⑰参见 <http://api-ec.api.org/filelibrary/BacApr5.pdf>。

⑱参见 www.israeleconomy.org/strategic/africatranscript.pdf。

⑲同上。

⑳参见他在 <http://usembassy.state.gov/nigeria/wwwhp061402b.html> 上的评论。

㉑参见 www.israeleconomy.org/strategic/africawhitepaper.pdf。

㉒报告出自 www.csis.org/africa/GoldwynAfricanOilsector.pdf。

㉓参见 www.csis.org/africa/0507_GulfofGuinea.pdf。

㉔参见 www.cfr.org/publication/9317/more_than_humanitarianism.html。

㉕P·布鲁克斯和J·海耶·希思,《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暗示美国》, 美国传统基金会背景材料第1916号, 2006年2月22日。

㉖K·哈瑞尔德,“我与河流州叛军的汇合”,《每日邮报》(Daily Mail), 2006年3月22日。

㉗M·伯恩鲍姆,《尼日利亚: 基本权力被剥夺——肯·萨洛-威瓦和其他人的审判报告》, 第19条, 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权委员会审讯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律师联合, 附录10: 指控贿赂宣誓书总结, 1995年6月。

㉘S·伯克给安德鲁·罗韦尔的电子邮件, 2005年7月11日。



⑲参见 www.guardian.co.uk/oil/story/0,,1717598,00.html。

⑳环境权力运动,《伊可村的地狱——双重标准的故事》,1987年7月10日;安德鲁·罗韦尔,《绿色反弹——环境运动的全球破坏》(伦敦:Routledge,1995),第294-295页。

㉑法官洪·O·伊可·塔瑞哈,长官J·阿黑阿斯沃, B·阿拉米那,长官G·阿马蒂,《调查发生在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河流州艾池政府地区的阿默开莫油田动乱原因和环境委员会》,1990; J·R·阿都非亚,“阿默开莫集团成员给油田的石油运营的破坏带来的威胁”,给警务处处长的信,1990年10月29日。

㉒保罗·奥昆提默中校,“RSIS 运作——在奥戈尼和其他族里的法律和秩序”,河流州内部保安专责小组组长给军事管理员的便笺,1994年5月12日。

㉓A·罗韦尔,“壳牌震惊”,《新西兰听众》(New Zealand Listener),1996年12月14-20; A·罗韦尔,“壳牌破裂”,《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1996年12月11日。

㉔A·罗韦尔, J·马里奥特和 L·斯托克曼,《下一个海湾——伦敦、华盛顿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冲突》(伦敦:Constable,2005)。

㉕WAC 全球服务,《尼日利亚三角洲的和平和安全:冲突专家组》,基线报告,壳牌石油发展公司的工作文件,2003年12月。

㉖引自 www.winne.com/nigeria/topinterviews/edmund_daukoru.php。

㉗同上。

㉘P·亚当斯,“尼日利亚提供证据的责任——虽然拘捕事件已经发生,但是国家石油公司仍然必须满足那些正在进行改革的行业的要求”,《金融时报》,1993年11月3日,第34页;《经济学家》(Economist),“给巨轮注油”,1993年11月6日,第107页。

㉙参见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507150045.html>; www.odili.net/news/source/2005/jul/17/201.html 和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507250536.html>; “石油开采:我们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今日报》,2005年7月24日。

㉚M·乌马,“利害关系方赞同道克拉任欧佩克主席”,《每日商报》(Business Day),2006年2月13日。

㉛参见 www.weforum.org/site/knowledgenavigator.nsf/Content/_S15722?open&event_id=1462&year_id=2006。

㉜参见 www.timeonline.co.uk/article/0,,3-2016701,00.html。

㉝奈杰尔·沃森-克拉克,引自 www.newsandstar.co.uk/news/viewarticle.aspx?id=326757; <http://news.bbs.co.uk/1/hi/england/somerset/4666186.stm>。

㉞阿拉吉·阿撒利, www.timesonline.co.uk/article/0,,3-2017164,00.html。

㉟花旗环球金融(Citigroup Global Markets),“三角洲部队”,《泵报》(The Pump),2006



年2月27日。

④ “壳牌为武装直升飞机使用的是尼日利亚机场辩护”，法新社，2006年2月16日。参见 www.coaneas.org/tiki/-read_article.php?articleId=738；<http://quote.bloomberg.com/apps/news?pid=10000006&sid=aEmm3EpJnEh4&refer=home>；www.theallineed.com/news/0602/16185243.html。

⑤ 参见 www.fin24.co.za/article/markets/display_article.asp?Nav=ns&lv12=markets&ArticleID=1518-25_1903224。

都是石油惹的祸。伊拉克被迫签订的石油共享协议将使伊拉克人们付出数百亿美元的代价。格列格·穆特发现了幕后的真凶。

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 经济杀手在行动

格列格·穆特

■ 最终的“战利品”

一年前，当哈利伯顿公司的 CEO 迪克·切尼成为美国的副总统时，他曾描述过美国在强制石油供给方面的政策前景：“到了 2010 年，我们每天都要额外消耗 5000 万桶石油，这些石油将从哪里获得？……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提供非常好的获得石油的机会，中东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廉的开采成本，这仍是美国最终想要得到的‘战利品’的地方。”^①

迪克·切尼的问题是这样的“战利品”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大多数中东国家将本国的石油工业进行了国有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外国石油公司投资的部分，伊朗的宪法禁止外国公司控股本国的石油公司。科威特政府试图把外国公司带进北部石油地区却遭到了国会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拥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石油储备，好像是最早开始转变的。如果伊拉克对外开放，那么它的邻居们也许在压力之下也会跟从。

这是西方石油公司渴望许久的景象。就在美国 2003 年入侵伊拉克不久前，康菲石油公司宣布，“我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储备（伊拉克），我们已



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分得一份。”^②壳牌石油公司则表示它的目标是“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实质性的确保能够长期存在的市场。”^③

丹·威特，一个个子不高的热情美国人，有着一头漂亮的经过精心梳理过的头发，看起来不像是个经济杀手，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如果不是他穿着正式的西装，你一定以为他还是个学生。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总是干劲十足”。对他来说一周之内去3个甚至是4个国家是家常便饭。他穿梭往返于华盛顿的家、伦敦的办公室、俄罗斯哈萨克的项目、利比亚以及别的什么地方。

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ITIC）是一个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宣传共同税务和投资政策的组织，作为它的领袖，威特表示：“我们的理论是能够吸引投资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比封闭性的政策对繁荣来说更有利。”

现在，在85个共同发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万的营业额。尽管展现了这样的商业利益，但ITIC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发展和教育基金”，并且在美国国内税务署是作为一家免税、无商业目的的组织注册的。“我们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和政策决策者分享我们的知识。”威特解释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个介于投资者和立法者之间的支持者。然而这家组织只对它的共同发起人负责，这些发起人赞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会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所掌控。

在ITIC纯粹的“教育基金”的范围内，金权政体是明显的教育者，而政府则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都和威特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专家建议”来帮助它们的改革进程，把它们带入“最佳国际模式”的轨道。它们认为在经济上和下层基础上的决策已经不是政治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技术问题。并且激进经济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游说，而是简单的建议。

有时，这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道歉的话从来不会对伊拉克说。威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一个会面者说：“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会得到其中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伪善。”^④这句话突出的是“分享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通常令人感到尴尬的行为。在伊拉克，由于提出的建议有15万军队的支持，所以很难被拒绝。



ITIC 并不是从事于公共教育，而是把焦点集中于官员和政治家身上。
“公众总是很难被说服的，”威特解释道，“你知道，我们不做媒体工作。”

然而，ITIC 的方法是非常系统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经验。他们并不单单停留在当前的政府层面上，而是将目标扩大到未来的潜在政府客户。这项工作在前苏联身上得到体现。根据 ITIC 的十年回顾，“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的高级税务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没必要了解我们，因为当他们作为杜马代表或政府部门的低级比官员或地区管理者的听众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了。”^⑤肯·波特，雪佛龙海外公司的副主席，这样评价 ITIC 的角色：“在许多方面，ITIC 就像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私人版本。”^⑥

ITIC 的角色和它们的确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
“所有这些参加过世界银行项目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的顾问们全都没有真正在工厂工做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那么做了，他们就不会在一个捐赠代理部门做每年只有 4.5 万英镑（8.5 万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对那些年薪仅仅只有 8.5 万美元的人的轻视使人想起了他对那些他宣称要努力帮助的国家的态度。

■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个富国，但它的人民却是穷人。”当我和哈桑·朱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间小房子里时他这样对我说。这种说法我也同意。尽管这座房子经过了精心的整理，但现在也很难租出去。一些墙上的墙皮已经脱落，有一些还有了裂缝。哈桑真的是相当的幸运，他已经在石油工业干了 32 年，月薪大约在 200 美元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付房租和维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据伊拉克计划部门的统计，半数以上的伊拉克人现在正处于失业状态。^⑦同时，劳工部在 2006 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 万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 1 美元。^⑧

哈桑是一个粗壮的石油工人，50 多岁，说话的口气平静中带着威严，



使人有一种想倾听的冲动。他对伊拉克的贫富状况的说法是对的。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土地——被称为“文明的发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富饶的土地上。现在的伊拉克就处于人类最先学会写字、发展农业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尽管水曾经是伊拉克致富的资本，但现在却是石油。所有的现代经济都依赖于此而建立。

伊拉克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将成为西方国家达成丹·威特的目标的主要障碍。哈桑·朱马是一个行业协会的领袖，这个行业协会是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区代表着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现在石油工人总工会正在第一线为守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同掠夺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跨国公司对抗着。哈桑认为，掌握本国石油储备的主权对伊拉克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石油必须掌握在伊拉克手中，因为石油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有巨大价值的自然资源，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要依仗于它。”

■ 威特的提升以及 ITIC 的诞生

尽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储备，这一点有大量的政策文件为证。^⑨但他们却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们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结果，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被发现他们对战后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变。而他们的那些私人伙伴和基金会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丹·威特也从以前束缚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转变为右翼基金会和智囊团的一分子，在那儿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说出自己的强硬观点。

由于拥有一个西密歇根大学的 MBA 学位，威特动身去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几乎成了反管制的代名词。在他回到美国两年之后，他在里根政府那里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然后是总统为私有化成立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了美国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策的转折点。它提出的建议包括一些传统的国家公司和财产的私有化，这其中包括美铁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和两个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并且还对邮政服务进行公开竞标。它的长远目标是有效地把美



国公民转变成消费者。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提供学校、公共住房和医疗，而消费者只要凭单对此进行支付。它同样呼吁国际开发总署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

尽管与里根政府在政治上的联系后来证明对他的前途非常有用，不过里根的经济政策看起来对他并不起作用。一个委员会成员，理查德·芬克给他提供了全民经济委员会（CSE）副主席的工作，这是一个反规制的游说组织，于是威特很高兴地接受了。芬克于1984年利用科赫家族的赞助创立了CSE，这个家族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的多样化投资的石油公司。

在CSE工作的两年中，威特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税务基金会是一个社团领导的组织，它自从1937年起就致力于国内低收入者的交税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大约有5亿美元的债务。威特成功地说服CSE做出一个“友好的收购”，然后他就调到这个基金会工作。1991年4月，他成了那里的直接领导者。

与此同时，苏联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而这也是威特把目标从美国国内转移到国外的阶段。

在威特成为基金会的直接领导者7个月之后，税务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参加了1991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贸易经济双边会议”。苏联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的代表团成员有大使罗伯特·施特劳斯、劳工部部长林恩·马丁以及代表财政部的约翰·罗布森。当然还有基金会邀请来的许多大公司的CEO们。这次会议标志着威特人生新方向的开始。这次会议时间选在苏联政权正式解体3个星期前，也标志着对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国家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会接待了一个由公司主管们组成的11人代表团。“花旗银行、埃克森、菲利普主管税务的副主席们，这些家伙对去当时那些疯狂的地方很感兴趣。”——去俄罗斯，去给俄罗斯财政税收部门的外国投资税务方面提建议。

基金会委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查尔斯·麦克卢尔执笔一份由代表团发表的声明。麦克卢尔曾经在1983~1985年期间代表财政部工作



过。他负责提出的建议最终变成了里根政府 1986 年的税务改革法案的基础。这项法案削减了顶层税率的税额，同时也增加了低层税率的税额。这就把税务负担由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

麦克卢尔的声明对俄罗斯的税务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低收入者的税率，还有强烈建议在通过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国投资者们商量。威特在基金会的时事通讯中评论道：“他对仅仅在提交声明 3 天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由 60% 降至 40% 感到满意。”^⑩

一系列的访问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相继进行，在 1993 年基金会和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们签订了合作协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渴望摆脱旧的苏联体制，而威特也愿意用适合美国合作的方式来填补它们的政策真空。

威特和麦克卢尔认为是成立一个新组织的时候了。于是，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在基金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而威特成了它的主席。基金并不难找，这个机构刚刚创立的时候，就吸引了 20 家美国大公司来做发起人，包括柏克莱、雪佛龙、花旗银行、波音、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

下一步要做的是在重新分开的铁幕两边构建政治基础，为了确保 ITIC 的联合席位，他们推荐了约翰·罗布森和彼得·沃克勋爵。罗布森曾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任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主席，因他的坚韧和他在航线制定上的反常规而著名，随后，在成为乔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前，他成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安士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伙人。

彼得·沃克同样因为强硬而出名。作为撒切尔首相手下的一名精力旺盛的部长，他曾经打败过全国矿工联盟。同威特和麦克卢尔曾经在里根政权和低税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沃克对矿工联盟坚决的斗争使得撒切尔削弱了英国贸易联盟运动的力量。

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ITIC 在影响税制政策方面都获得了成功。ITIC 声称他们在俄罗斯推行的原则成为了“国家税法的基础”。^⑪1999 年，俄罗斯引进了一套新的税务法则，废除了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公民都统一使用 13% 的税率，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而在哈萨克斯坦，ITIC 的影响更加深远。1995 年的国家税务法则是依据麦克卢尔编写的白皮书。这套法则实施之前甚至不需要国会的审查。原因很简单，



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国会。就像俄罗斯的税务法则一样，它的目标也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把个人所得税率由 60% 降至 40% 以及废除出口税。“这是简单的、包含广泛的、具有商业导向的改革，我们当然欢迎。”雪佛龙的高级财政官吉恩·汉德尔拍掌叫好。^⑫

汉德尔和他在雪佛龙的同事们无疑对 ITIC 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采用特殊的税制感到高兴。1998 年，ITIC 的哈萨克斯坦矿物税制委员会提出的 11 条建议中的 6 条被采纳，并作为税务法则的修正法案或指导颁布实施。

■ 聚集在石油和天然气上的焦点

石油和天然气在 ITIC 议程里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超过 10 年的时间里，ITIC 执行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代表着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国燃气公司。

在这个意义上说，ITIC 和美国、英国政府有着共同的政策兴趣点，这两个国家近 100 年的对外政策几乎都围绕着保护那流淌着的石油。在 20 世纪的前 50 年，石油更多地展示了它的军事价值，技术上的优点，使得它作为一种初级原料能够被轮船、坦克和其他陆地上的交通工具以及飞机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输给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控制了阿塞拜疆地区的石油资源。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偷袭珍珠港激发了两边控制太平洋和从印尼的石油供应线路的愿望。两边的军事领导者们都明白，如果他们不能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的战争机器就会停下来。

从那时起，石油的军事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高。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军队每天要耗费 140 万加仑的燃料。^⑬但自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石油的经济价值逐渐取代了它的军事价值。用石油工业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尤金的话说，就是“不管全球政治格局怎么变化，也不管是帝权力量的衰退还是民族自豪感的涌动，有一种趋势在二战后 10 年以一种笔直的轨迹迅速上升——石油的消费……石油俨然就是一个得意洋洋、不可质疑的国王，一个身着绚丽服装的君主。”^⑭



在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者。然而，随着美国供应量的下降以及石油消费在北美、欧洲和后来的亚洲的上升，在石油消费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家的地理断层变大了。石油是国际地理政治学的中心要素，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中东的石油还要多，中东的石油储备超过了全世界总量的 60%。

1980 年的卡特政策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有力的政策。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宣称：“要让我们的位置绝对的清晰，任何试图以外部力量获得对波斯海湾地区的控制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要利益的入侵，对于这样的入侵，我们会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还击，包括动用军事力量。”尽管他提到的是“外部力量”，但这项政策也对中东地区本身有效——就像我们看到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一样，现在美国又把矛头对准了伊朗。

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在 2005 年，也就是伊拉克战争两年后。在那里我受到了哈桑·朱马和石油工人总工会的热情款待。在巴士拉夏天的热浪中，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来拜访他的石油工人伙伴和他们的工作地点。通过亲自为一家伦敦本地的叫“PLATFORM”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了解到了近八年来遍布在世界各地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影响，并且看到了自从 2003 年以来，伊拉克的石油政策有哪些改变。

我在 2005 年 5 月拜访的一个地方是巴士拉精炼厂。这里遍布错综复杂的管道连接着形状不规则的建筑，并且到处弥漫着一股硫磺味。巨大、闪光的烟囱高高耸立，带着火星的热浪喷涌而出，这样的温度简直能把大地熔化。和别的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東西显得特别陈旧。控制室里的电脑显示屏看起来像是 70 年代电影里的东西。房屋破旧不堪，连管道也锈迹斑斑。

当我走过这些设备时，我开始感到一丝不安。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的精炼厂这种老的管道和阀门往往不堪重负，极易造成事故。这样想着，我不知不觉又转了一圈。

当我问精炼厂的经理这些设备是否存在着安全问题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事故是十分罕见的，他说，因为每一项设备都会定期检查。“对于这些



操作员来说，精炼厂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解释道。我把这里的情况和英国、美国的精炼厂令人胆寒的安全记录做了对照，在那些精炼厂里，工人们被资产管理者们看作成本的一部分而要使其最小化。由于劳动力被大量削减以至于机器设备很少做检查，而损坏的部分也不会被修理或被替换，比如 BP 在苏格兰的格兰奇茅斯精炼厂，我还曾经在 2002 年去过那儿。两年前，那里的设备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故，包括爆炸、气体外泄，还有火灾。因为这些事故，这个精炼厂收到了苏格兰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健康安全罚单。50 名消防员用了 14 辆消防车花了 7 个小时才把火势控制住，而在灭火的前期还由于一个定点灭火设备的损坏阻碍了整个灭火过程。经济分析师和当地的议会人员纷纷指责工厂缺少有技术的安全人员。^⑤在 1998 年，这家精炼厂就裁掉了 200 人，到了 1999 年，裁员人数又扩大到 400 人。在 2000 年 6 月这场火灾前，BP 又一次裁员，这一次裁掉了员工总数的 40%，使得员工人数由 2500 人下降到 1500 人。

反观巴士拉精炼厂，“自从 2003 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火灾事故。”厂里的消防员法拉杰·拉巴特很自豪地告诉我。但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这里却发生了 23 起火灾。这其中有一次是由于一个储油罐被一架 F-16 击中而引起爆炸。

法拉杰身体瘦长结实，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自从 1976 年就在这家精炼厂工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法拉杰还是个演奏卡南（一种中东地区有弦的乐器）的乐师，他所在的乐队很出名，经常被一些国际旅行团邀请去演出，但他却不能加入它们，因为他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因此他被禁止出国旅行。

法拉杰的经历是伊拉克人民长期的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由于地处伊拉克的东南部，在伊拉克三次最近的战争中，他的精炼厂总是处于战争的最前线。在 1980~1988 年两伊战争中，在持续的炮弹轰炸中，法拉杰失去了几个同事。在那场战争结束的两年后，侯赛因·萨达姆又入侵了科威特。接下来是 1991 年的海湾战争，法拉杰回忆道：“那真是一场恐怖的战争，因为我们使用了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武器——F-16、隐形飞机、‘狂风’战斗机、巡航导弹。所以那时候不管男人、女人、小孩甚至是动物，只要



一听到飞机出发的声音，他们就吓得半死”。^⑧对于法拉杰来说，儿子的受伤无疑是个灾难性的打击。在战争期间，一枚导弹落到了他家房子的附近，导弹的碎片击中了在附近玩耍的儿子，15年过去了，他的儿子至今还卧床不起，需要有人照顾他的起居。

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打击下，萨达姆的部队被赶出了科威特。之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回教徒组织开始动员大家反对萨达姆，并且美国方面也表示愿意给予一定支持。而萨达姆用几次近乎残忍的镇压做出回应。法拉杰也因为曾参与一些反萨活动遭到了逮捕。他在监狱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待了3个月。

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受到了国际制裁，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儿童，死于药品和食物的匮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1991~1998年期间，实际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比根据之前数据推测的死亡人数还多出了50万。^⑨许多死亡原因是由于不能获得干净的饮用水。自从氯被认为在商业上具有“双重作用”，它的进口就在制裁期间被禁止了。

当美英联军在2003年3月入侵的时候，大部分伊拉克南部的人民，甚至全国很多人，都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萨达姆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但是，当美英联军占领的现实开始时，希望就变了味。法拉杰回忆了一件事，当他和他的同事在一次轮班后准备回家时，他们碰到了一些美军士兵，并向他们致意。这些美国人看起来精神十分紧张，他们关闭了大门，拒绝让工人们回家。当一个高级工去询问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被扔到了广场上，头上还有被打过的痕迹。

很多美军士兵都还没有成年，但他们被告知任何一个伊拉克人都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这种论调不仅仅局限于告诉那些未成年的士兵，而是深深影响到了那些高级官员和那些顾问们。而这些所谓的顾问们就只知道提一些如何发展经济的“建议”，其他什么都不管。

很多这种建议的潜台词就是伊拉克现在没有能力经营自己的石油工业，而只有跨国石油公司有这样的能力和技术来经营。而我在这家精炼厂的经历却使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就像哈桑·朱马评论这些跨国公司说的那样：



“它们的机器设备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的技术就不敢恭维了。”

2003 年 5 月 20 日，就在萨达姆下台的几天后，哈桑·朱马通过一次会议组建了石油工人总工会。外贸联盟自从 1987 年就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当时的独裁者宣布除了他自己组建的联盟，其他任何组织都是违法的，这是他确保自己政权安全的一种手段。工人们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这次占领一开始，许多联盟活动者都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石油工人的联盟，因为这样一个组织可以保护国家的经济，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就是为石油来的。”哈桑说道。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一个 9 人的委员会就成立了。起初，许多工人都是很勉强地加入这个组织的，因为他们想起了萨达姆镇压的手段。在那个时候，美国刚刚占领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关于战后重建的计划。所以这个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工人们重建和修补那些在战争中被损害的设施。当这些工作被证明有效的时候，工人们便被这个委员会所吸引了。后来，他们又成立了南部石油公司联盟，并进行了选举，结果哈桑·朱马被选为主席，而法拉杰也进入了执行委员会。

总工会另一项工作是改善占领下工人們的待遇。在占领最先开始的两个月里，工人们没有领到任何报酬。到了 2003 年的 6 月，他们觉得已经足够了，法拉杰、易卜拉欣·贾伊迪（另一个精炼厂的工人）和另外 100 名工人用一辆起重机堵住了为英军坦克提供燃料的征收点，并坐在卡车周围示威。

很快，镇压的装甲车就开来了，并且士兵们已经把他們手里的枪瞄向了那些示威者。但是工人们不为所动，仍然勇敢地、平静地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喊着他们的老板是骗子，并且告诉那些士兵们如果他们想开枪就开吧。示威者们言辞激烈，并通过谈判在几个小时之内得到了他们被拖欠的薪水。英国军队的长官认为工人们控制了燃料的供给就像控制了占领中的生命线。经过这次抗议之后，这个总工会立刻成了大家谈论的焦点，会员人数由原来的 100 人一跃变成 3000 人。

然而，当入侵的英美两国想要通过哈利伯顿公司整个控制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时，伊拉克的石油工人们继续被边缘化。这个石油服务公司像它



的政治和军事主人一样，对这项任务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它想要经营和重建这部分当然就不可能成功了。

在2003年的8月，总工会又组织了一次罢工，整整两天之内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几乎全部被中断。就像上次的抗议一样，这次罢工对于总工会随后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随后的一个月中，美国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为伊拉克的工人们准备了许多工资条款。先是提出每个月工人的工资为69000伊拉克第纳尔（约为40~45美元），但这些钱工人们根本就不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于是总工会威胁说要组织更久的罢工，两边就又坐下来开始谈判。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在每个月10万第纳尔这一点上终于达成了共识。从那以后，总工会也取得过其他一些戏剧性的成功，这包括给哈利伯顿公司的一个转包商施加压力，使得他把1200个外国员工的职位换成了伊拉克人；游说公司为工人们建造住房；强迫公司为石油学院的新毕业生们创造工作的机会。同时，联盟的会员也已经超过了23000人，并通过联合9家石油公司的10个外贸联盟委员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9家公司分布在巴士拉、阿马拉、纳西里耶、塞马沃四个省，虽然它们在伊拉克十八个省中处于最南部，但伊拉克大部分的石油都在这里。

■ ITIC 在伊拉克

2003年的夏天，丹·威特决定动身前往伊拉克。威特认为当伊拉克重建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时，那也是ITIC的机会，这就像他们如何在前苏联工作一样。当时ITIC在苏联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并且在什么都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展开了自己的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不试着像1993、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那样开始呢？我们只要把那个‘剧本’中的几页拿出来用于伊拉克就行了。”

威特的董事会十分赞成。在2004年末2005年初的政策计划会议上，ITIC的专家和发起人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大跨国公司的代表）都在争论所制定政策的目标应是为了使伊拉克能够走出去，并且恢复石油公司进入该地区其他盛产石油国家的权利。ITIC选择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发表



了及其露骨的言论：“伊拉克的工作应该继续，并且要把它作为一个将来向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扩张的‘跳板’”。^⑧很明显，他们提到的盛产石油的国家是指伊朗和利比亚。

威特获得了 ITIC 一些发起人的支持，这些发起人都愿意把伊拉克项目作为现在 ITIC 的头等大事来处理。6 家石油公司也参与进来：BP、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埃尼化工。

为了给这个项目找一个好的领导者，威特雇用了布赖恩·奥康纳，他以前是 BP 石油公司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又为英国的国际发展部出谋划策。自从 2000 年以来，布赖恩·奥康纳就作为石油税的顾问在 ITIC 供职。当时他曾负责一个欧盟的项目来改革俄罗斯的税务体系。尽管这个欧盟项目属于大众投资，可 ITIC 还是很热心地在它的时事通讯中写道：“在这个项目中立法范围会包括许多由 ITIC 发起人来确定的优先权。比如，转移定价、石油天然气税、增值税、环境税、利润税……当这个项目向前推进时，我们就能经常发现我们发起人的信息。”^⑨

奥康纳和威特组织了一个“专家组”，成员还包括了其他 9 位为伊拉克项目工作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只有穆罕默德·阿里·赞尼是伊拉克人，他现在在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工作，CGES 是伦敦的一个智囊团，由前沙特石油部长谢赫艾哈迈德·扎基创立。另一个专家组成员里奥·杜拉斯也来自 CGES，他还是以前奥康纳在 BP 公司的同事。

专家组的主要工作是做出一个报告，能够使大多数跨国石油公司能够参与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而石油生产作为伊拉克的公共部门已经超过了 30 年。

西方国家想得到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明确表示，伊拉克是自己的重要的石油资源基地。战争内阁大臣汉基爵士在给外交部长亚瑟·贝尔福写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从英国方面来说，我们能够抢过来的大的潜在石油供应地就应该是伊朗和伊拉克了……控制这些石油供应地已经成为英国参加战争的首要目的。”^⑩

通过这场战争，英国以委托托管权的方式占领了伊拉克，并且达成了汉基爵士控制该国石油供应的目的。1925 年，伊拉克的英任君主费萨尔国



王与一个叫土耳其石油公司（IPC，1929 年更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西方财团签订了一份妥协合约（后来经过一些人员变化，这个财团包含的公司最后变成了 BP、壳牌、道达尔和埃克森美孚）。

这份让步合约成了一个样式被广泛的推广到英国的其他殖民地。这是一段长达 75 年的时期，在此期间，所有条款都是冰冷的。结合两个 20 世纪 30 年代获得的受让权利，IPC 获得了伊拉克所有石油的处置权。伊拉克曾经想保留 20% 的石油支配权，但是被否决了，尽管在早期的协议上还曾被提起过。

尽管伊拉克在反抗这些不平等的合约方面屡屡受挫，但这些合约还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感受到了压力。主要的问题是在公司和国家的利润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外国公司获得了太多的关于石油发展的控制权。它们限定一种产品从而推进其他产品的生产，并且利用它们在信息上面的垄断来控制价格以剥夺伊拉克人民的收入。这种手段几乎在所有的石油生产国家同时都能见到。这些争论的结果是许多石油工业的国际化。就拿伊拉克来说，它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 1961 年和 1972 年进行。^②但这种局面是丹·威特和他的石油公司发起人们现在想要颠覆的。

20 世纪 70 年代是伊拉克历史上石油工业最成功的时期。挣脱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控制，在 1970 ~ 1979 年期间，伊拉克国际石油公司的产量从每天的 150 万桶增加到 370 万桶，并且通过勘探，发现了现有石油两倍多的储备。这种成功的势头在 1980 年渐渐接近尾声，当时萨达姆入侵了伊朗，发动了一场八年的战争，并造成了 100 万的人员伤亡。

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萨达姆 1990 年入侵科威特前得到了短暂的复苏。而在随后 12 年的制裁期间，石油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基础设施支离破碎。到了 2003 年英美联军占领伊拉克的时候，石油工业又被它们打着需要重建的幌子所占领。

伊拉克石油工业的状况每况愈下。在占领初期，那些石油设备，像这个国家其他的财产一样被掠夺。伊拉克钻探公司（ID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钻探是在广阔的南鲁迈拉地区，那是在距离巴士拉两个小时车程的西南部的炙热沙漠。纳西尔·莫哈辛·莫汉是工地的主管，



他在活动屋向我描述这一切：“机器设备全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了钻塔的架子。”这不是一两天的快速入侵而造成的混乱，这样的掠夺持续了4个月，一直到2003年7月才结束。“所有的掠夺都是在联军的注视之下进行的，”纳西尔说道，“他们根本就不管这种情况。”最后IDC损失了大约2.4亿美元。

与此相对照的是，位于巴格达的石油部大楼被美军严密保护，而城市里其他建筑都遭到了被掠夺的命运。其他物资设备，比如说桌子、摩托车、各种仪器，只要有资金就可以找到替代品。但石油部里有不可替代的石油区域的地理数据。

在这场掠夺之后，伊拉克的石油工人们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建他们的石油工业。2003年8月，IDC的工人们开始重建他们的设备。他们找出每一处需要修理的地方并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把它们修理好。工人们最先修好了钻探塔并在45天之后开始运转。几个星期之后，已经有12个钻探塔可以开工。

在一间临时房里，哈桑·朱马坐在纳西尔旁边，高度赞扬了这次成功：“伊拉克钻探公司的工人们是真正的勇士，面对废除IDC的阴谋他们不为所动，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了公司。”另一个石油工人评论说这是伊拉克工人第三次面对极度的不幸，重建遭战争重创的工业了。正是凭借着这种强烈的对石油的主人翁感，他们才会永不放弃。

丹·威特的挑战是在面对伊拉克人民对石油强烈的主人翁感和发展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的愿望时，还要给它的发起人们想要的石油控制权。他也不得不承认：“把外国人放进来还要允许他们提取碳氢化合物，这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②

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让伊拉克人觉得石油控制权好像还握在自己的手里。

■ 产品共享协议

威特和他的团队在2004年的秋天完成了报告。他们建议伊拉克的石油工业还是要靠外国的公司来发展，可以运用一种叫产品共享协议（PSA）



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协议最初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在印度尼西亚实行过，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在那些石油生产国家气势很盛。尽管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公司最终被收归国有，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避免了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的发生。独创性的 PSA 明确了石油资源是国家合法财产的一部分，但同时也说明了外国公司的角色是“承包者”。实际上，外国的公司维持了控制权并拥有所得的大部分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PSA 同老的妥协合约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托马斯·瓦尔德解释了这种观点，他是威特最欣赏的理论家之一。瓦尔德是石油天然气法律方面的专家，在苏格兰东北部的邓迪大学任教，他把这种方法看作是“一种简易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在具有政治象征性的产品共享协议（这个服务合约表面上显示国有公司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和该协议模式在所有重要事务方面以许可证制度的方式所规定的物资平等性……表面上政府主导这场游戏，其实是公司在国家所赋予其合法权利这种伪装下，控制着这场游戏。”^{②3}

对丹·威特来说，PSA 必须让听众觉得完美无缺。

我第一次对丹·威特有印象是在广播里。当时 BBC 的世界服务广播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节目，叫“大家说世界”，参与者就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听众也可以通过 E-mail 发表自己的观点。2005 年 11 月的一个周四晚上，我被邀请去了位于布什大厦的演播室。威特是另一位被邀请的嘉宾，虽然当时他也在伦敦，但他拒绝去演播室，所以只好以电话的方式参与。

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却知道 ITIC，我在 2004 年的夏天看过他们写的伊拉克报告，对于里面的观点，我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打从一开始 ITIC 的报告就宣称产品共享协议现在是“OECD 以外许多国家的标准”。^{②4}PSA 在很多国家都在用，这是事实，但那些都是一些石油储备很少或很难开采或开采危险系数很高的国家。这些条款从不用于像伊拉克这样拥有大量开采起来既简单、成本又低的石油储备的国家。实际上，他们只关注如何共享世界的石油储备而没有注意使用国家的数量。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只有 12% 的国家使用了 PSA，而 67% 的国家选择单独发展或依靠国际石油公司来发展。^{②5}



但也许 ITIC 的报告中最具误导性的是它提出的经济模式只到 2010 年。在这个时期，这个模式会显示外国石油公司的投资成效，因此会对伊拉克的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然而，在石油还没有开始流淌之前，也就是收益未被分配之前，这个模式已经停止了。

虽然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可以让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的目标，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个基本错误。这种时间结构掩盖了石油公司的投资将在石油开始流淌时从石油收益中取回的事实。这就像我从银行贷了一笔 5 年还清的贷款，然后看看我未来 4 年的财政状况，当我的贷款还清之前，我的状况当然会很不错。

我在广播节目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并希望得到威特的解释。但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就投资的重要性做了回答。我肯定了伊拉克需要投资，但真正的问题是以什么形式和由谁来投资。“丹·威特，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呢？”主持人问道。丹·威特沉默了一会，然后终于开了口：“嗯……大卫·霍根，你还在线上，对吗？”第三位嘉宾是一个爱尔兰公司的老板，他刚刚在伊拉克获得了一份小型的石油合同。我在演播室里继续这场讨论，但威特却不再参与了。

我很吃惊！这儿有一个人在主席的位置上做了很多年，在世界上许多大公司面前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现在竟然因为我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逃避开了！

正当我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侯，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吃惊。实际上，我开始明白，这正好是因为他做过主席的缘故。在辩论之中，他始终保持着说话简洁的特点：“这就是伊拉克如何引进投资的过程。”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也应该说一说引进投资的成本，可是他没有。这也就是他无法向普通大众解释那个问题的原因。

把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拿来作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ITIC 并没有提到最为重要的收入问题。伊拉克政府超过 90% 的收入来自石油，如果牺牲这么一大块收入，势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伊安·劳特里奇是来自北英格兰设菲尔德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精力充沛的经济学家。我和他将一起去纠正 ITIC 的疏漏。我欣赏他的工作作风已



经好几年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石油公司极力反对对北部海域的石油产品增加任何税。它们声称，这种行为会使北部沿海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生存，而它们也会集体地从那里撤离。但劳特里奇的研究却表明，尽管一些公司做出了这样的声明，但实际上北部海域对于它们来说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哪怕是在交了税之后。最近，劳特里奇写了《沉溺于石油》一书，^⑤这是在国际能源动力学界和有关伊拉克战争政策方面最好的书之一。

通过对伊拉克石油领域的现金流动构建经济模型，我们可以看到石油收入是怎样被分割的。最终结果的得出依赖于 PSA 条款的准确，有一些 PSA 条款对于石油公司非常有利，而有一些就不那么有利。

我们挑选了一系列的 PSA 条款，这些条款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已经被使用过了。从最严格的利比亚合约到比较慷慨（当然，是对石油公司来说）的俄罗斯合约，我们都收录在内。我们假设石油的价格是每桶 40 美元，然后对 12 个使用 PSA 条款的国家按照发展程度排序（除去 60 多个贫困国家）计算，最后我们得出结论：相比把石油资源作为公共物品，这种由外国石油公司承包的模式从伊拉克掠走了至少 74 亿美元（最高 194 亿美元）。^⑥当然，如果石油价格更高（就像我写的那样，在 70 美元左右），那伊拉克的损失就相应的更大。

PSA 条款通常会持续 25 ~ 40 年不等，在此期间条款会进一步的进行修改。

当我在 2006 年夏天就 PSA 条款问题采访丹·威特时，他也承认以往发生的一些事看起来是不太公平。“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有点矛盾，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坐下来商谈是很容易的事，我曾经和哈萨克，和伊朗的阿泽里斯人（Azeris）就此讨论过，‘是不是我们让步太多了？或许我们没有给政府足够多的好处，也许外国投资者不会做到公平分享利润……’”但是，他又争辩道，“你也看到了这是存在政治风险的，其他工业在一种不稳定的政治风险中会做怎样的投资？”

我向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风险环境得到改善，那伊拉克政府能否就原来的条款展开重新谈判？原则上，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政府就



是政府……如果政府方面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时，他们就会被迫与另一个政党展开谈判。”

然而，在哈萨克斯坦，威特又曾发表了一套与之完全相反的言论。在2001年和2002年期间，正当该国政府根据国内出现的新的情况想要对PSA条款做出调整的时候，威特的ITIC通过向它施加巨大的压力维护了原条款。ITIC的手段包括通过外国公司威胁撤离资金使哈萨克斯坦政府处于高危状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游说各位部长和国会议员；动员其他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条款的稳定问题就像漂浮在哈萨克斯坦上空的一块乌云，这将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于他们未来投资前景的展望，当然，还包括新投资者。”这是威特在2002年发表的威胁哈政府的一套言论。^③

最终威特赢了，PSA条款维持原样。

因此，由于伊拉克的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实力与外国抗衡，况且国内的安全形式也令人担忧，再加上现在还处于军事占领期，所以伊拉克签订一份长期的PSA条款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石油公司会要求得到巨大的利润来补偿它们所冒的风险，而伊拉克政府在讨价还价方面将很难有发言权。

这种不公平的条款恐怕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这种前景也将使许多伊拉克人受到打击。这就像一个四处炫耀的小偷，在重复其他小偷曾经在伊拉克旧殖民时期的行为。

然而，PSA条款经常会使外国石油公司对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利润的新颁布法律具有豁免权。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稳定性条款”。条款里经常会有这样的规定：出现争议时不能通过本国的法庭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国际投资法庭来解决。而国际投资法庭会依据商业背景来做出判决，而不是依据国家的利益或国家的法律。伊拉克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决定自己国家资产损耗率的权力，这对于一个经济上依靠石油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权。同样的，伊拉克也会失去控制石油甚至是制定一部新法律的权力。实际上，伊拉克被剥夺了对它大部分重要工业的民族自治权。



■ 目标：民主政治？抢劫？

尽管美国政府一再鼓吹要把民主政治带到中东地区，但丹·威特好像与此无关。2005 年末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备受指责的阿塞拜疆选举，ITIC 在那儿恰好有办公室。威特说道：“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在那些出现的民主政治中，当地的反对派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来赢得选举。即使是媒体，也对报道反对派没兴趣。真正的挑战来自选举之后要进行的改革——经济、社会、政治……西方国家应该欢迎他们而不是疏远他们。”^②

在完成伊拉克报告后直接把它交到掌权者手中，这倒是符合威特对民族政治愤世嫉俗的态度。与伊拉克决策制定者会面的最直接的路径是通过占领他的军事力量，而英国政府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04 年 9 月当报告完成的时候，ITIC 的成员会见了来自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官员们，探讨了最有效的策略来说服伊拉克人接受签订的条款。当时是财政部长（现在是副总统）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接受的报告。但这不是由丹·威特送去的，而是由英国驻伊拉克的大使爱德华·卓别林送去的。由于英国的 8500 名士兵还驻扎在伊拉克，因此这是一位阿迪勒和他的同僚们都不敢轻视的大使。

英国政府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伊拉克的石油部表达了和 ITIC 同样的观点。在英国的“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常用规则”中，开篇就逐字逐句地复制了 ITIC 的言论：“伊拉克石油的复兴和发展需要注入大量国际投资……伊拉克必须要授权国际石油公司利用这些投资来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③

2005 年 1 月，在贝鲁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中，ITIC 向伊拉克财政部、石油部、计划部的大小官员们介绍了他们的观点。这次会议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起的。尽管威特在他的会议中一再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起的作用——“从技术上讲，这是两家相互分离本质不同却又掌握在同一种人手里的组织。”但这两个机构的存在无疑磨砺了伊拉克人的大脑。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拥有外国负债最多的国家，这包括因入侵科威特而需支付的赔款和未支付的别国贷款。这其中大部分是萨达姆的负债，他把借来的钱用于修建自己的宫殿和购买武器，并没有使伊拉克人民获得利益。2004年11月，巴黎俱乐部的债权人国家同意免除伊拉克未向它们支付的80%的欠款，但条件是IMF必须保证伊拉克的经济在2005~2008年健康发展。另外，为了使这个条件能够成立，伊拉克也需要获得世界银行和IMF的支持以确保未来的财政上得到进一步的让步。无论如何，只要有这些个机构参与，威特的建议就很难被拒绝。

英国政府也帮助ITIC组织这次会议，还特意从巴格达大使馆招来一名外交官。克里斯·布朗是大使馆的第一秘书，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能源问题。威特是这样评价他的：“这真是个出色的家伙，也许在石油方面是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总是能够带来最棒的实例。”^③布朗建议威特邀请一些伊拉克的官员出席这次会议，并且还帮着与巴格达的高官们交流了一下意见。

贝鲁特会议之后，在2005年大部分时间里，威特都牢牢地控制着他的项目，他在等着看伊拉克的转变过程中，那些政治家们有什么反应。威特的工作开始有了成效。在2005年的11月，沙拉比宣布伊拉克将实行PSA条款。五角大楼以前的密友现在代表着总理和能源委员会，这是在伊拉克石油工业任何决策都有重大影响的人。“为了使石油产量的增长，我们需要产品共享协议。”他说道。^④

在2006年初，威特的成就进一步得到体现，现在已经凌驾于英国之上和美国政府平起平坐，当然，这里的“美国政府”是指外贸发展局。

在他所有的这些宣传工作中，威特宣称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只是为了推广“最好的模式”。他也一再坚持伊拉克项目的辅助资金对清算账目是没有限制的。尽管那些发起人明白这还得取决于伊拉克项目，那里对ITIC来说没有法律上的要求去那么做。这一点对威特来说很重要，因为ITIC要是表面上看起来像个公司，它的免税地位将会被取消。

然而，威特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不像为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很明显他使所有的西方石油公司都获益。6家在工作中的公司看起来已经要获得收



益了。在 2005 年夏天，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他们已经和其中的 4 家公司就将来的合作展开初步的谈判。这 4 家公司是 BP、雪佛龙、埃尼化工和道达尔。^③

丹威特对至今他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我敢说这些报道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 PSA 条款在伊拉克的存在，会使得人们对石油的热情持续下去。”^④

他想要影响的那些决策不久后就出台了，这也同样是那些石油公司盼望已久的决策。没有一家公司会在伊拉克建立起完备的法律框架前注入资金，因为它们都害怕在国际法庭那儿蒙受损失。首先，伊拉克需要制定一部宪法。尽管已经在 2005 年 10 月的全民投票中通过，但还需在 2006 年至 2007 年试施行半年。一旦宪法定案，那么伊拉克政府就能制定一部石油法，这样就可以展示石油工业未来发展的框架，任何外国投资可能发生的行为也可以被写进法律。只有当这么一部法律出台，长期合作协议才会签署。

2005 年 11 月，伊拉克政府同 IMF 签订了一份备用协议。IMF 给予伊拉克一定的财政便利，并同意减少外国负债。作为交换条件，IMF 规定了对伊拉克经济环境的要求。这份协议存在的最大争议之处在于 IMF 要求伊拉克政府大量削减对于燃料方面的补贴。包括做饭用的天然气、煤油、柴油机和对保持发动机运转至关重要的汽油。自从每天限制用电 4 个小时以来，电价立刻涨了 3 倍。由于没有相关的对策出台，这导致了伊拉克人民举行游行进行抗议，石油部长乌卢姆也因此递交了辞职信。协议上有一处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在 2006 年底之前伊拉克必须出台一部石油法，而 IMF 必须参与这部法律的起草。

威特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能为促成投资者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做出贡献，这样它们就能被最好的国际模式所引导，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加速这个过程。”^⑤但是他现在谈成功好像早了一点。通过研究全球石油工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石油生产国家和西方石油公司之间存在着一个能量的转移。一个国家总是会被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所影响。一旦伊拉克石油的未来被决定，那么这种趋势也可能向西方的石油公司蔓延。委内瑞拉，世界第六大石油储备国，两次要求和外国石油公司



重新谈判来获得更公平的合同，否则就让它们离开这个国家；玻利维亚也复制了这一办法，而且声势更为浩大，2006 年 5 月，他们直接把军队开进了油田；俄罗斯是世界第七大石油储备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它开始颠覆发展迅速的自由主义化和私有化，而政府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那些通过窃取国家的公司致富的人；在科威特，政府想要引进外国公司，而国会则坚决反对。很明显，西方利益集团希望，如果伊拉克允许跨国公司控制他们的石油工业，那么就会给伊朗、科威特和那些石油生产者们带来压力。相反的，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也会使伊拉克改变主意。

威特在伊拉克工作的更加起劲，他想得到英国政府的进一步支持。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伊拉克新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普通伊拉克人对此的反应。许多人都坚决反对把石油的控制权交给那些过去对他们进行盘剥的外国公司。

威特的野心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些石油工人们。当丹·威特在豪华酒店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大献殷勤时，哈桑在钻探现场、在泵站对联盟 23000 名成员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如果联盟组织一次罢工，整个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将被迫停止，而且还会使整个国际油价产生震荡。联盟正在努力地 and 世界上所有的外贸工会和反战组织构建稳固的关系，这些机构将在联盟需要帮助时站出来援助它们。

很明显，这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来阻止外国石油公司把伊拉克的资源抢走。对伊拉克石油的争夺也将是 21 世纪初期最重要也是最艰苦的经济战争。

正像哈桑·朱马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伊拉克石油工人都认为他们是在同私有化作斗争。我们把私有化看作经济殖民主义。总是有权威人士在说，私有化将有助于我们的发展，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看到发展。任何试图私有化的计划在我们看来都是灾难。”

【注释】

①1999 年 11 月 15 日，迪克·切尼在伦敦石油学院秋季午餐上的演讲。



- ②卡罗拉·霍约斯，“权威预期伊拉克将再一次失败”，《金融时报》，2003年2月15日。
- ③《壳牌在中东》，壳牌联合杂志，2005年5月。
- ④安德鲁·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Al Khaleej》，2006年6月4日（阿联酋）。
- ⑤“ITIC十年回顾，2003”（华盛顿：ITIC，2003），第4页。
- ⑥“1997年ITIC年度报告”。
- ⑦迪帕·巴宾顿，“伊拉克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官员”，路透社（Reuters），2006年2月9日。
- ⑧“五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法新社，2006年1月25日。
- ⑨比如，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2001年5月，第5~8页；杰克·斯特劳，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的国务大臣，在2003年1月6日的演讲，“英国外交政策的政策优势”；英国国防部白皮书：《对应当今世界的当代军事（政策防御回顾）》，1998年7月，第2章，第40段；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英国的国际优先权：FCO的政策》，2003年12月；美国商务部，总统备忘录，美国和英国的能源对话，2003年7月30日。
- ⑩丹·威特，“适合俄罗斯经济的税务原则”，《税务专题》（Tax Features），1992年9月，第七页。
- ⑪“ITIC十年回顾，2003”，第3页。
- ⑫爱德华·拉奇卡，“投资者对哈萨克斯坦新税务系统大加赞赏”，《亚洲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5年5月7日。
- ⑬美国国防部，“管道支撑业务”，新闻稿，2003年9月4日。
- ⑭尤金，《获奖作品——探寻石油、金钱与力量的史诗之旅》（伦敦：Simon & Schuster，1991），第541页。
- ⑮“BP，英国调查格兰奇茅斯疾苦”，《辛烷周刊》（Octane Week），2000年7月24日；菲奥纳·奥布莱恩，“BP，英国失误后的安全聚光灯”，路透社，2000年6月15日。
- ⑯大卫·培根和玛撒·曼迪的采访，巴士拉的国际代表团，2005年5月。
- ⑰UNICEF，《儿童和产妇死亡率调查：伊拉克》，1999年7月。
- ⑱ITIC，未来的政策问题（华盛顿：ITIC，2004）。
- ⑲《ITIC公告》（ITIC Bulletin），2003年1月，第3页。
- ⑳莫里斯·汉基爵士写给亚瑟·贝尔福的信，1918年，被尤金收录，第188页。
- ㉑让步的最后剩余是国有化，1975。
- ㉒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
- ㉓托马斯·W·瓦尔德，“国际石油投资的当前形式：调节、许可、税务和合同”，《CEPMLP》1，no. 5（1995年7月），邓迪大学出版。



②ITIC, “石油和伊拉克的未来：财政选择和挑战”, 2004 年秋季, 第 10 页。

③德南·沙拉比 (国际能源机构), “中东/南非地区的投资展望”, 介绍给 OECD, 伊斯坦布尔, 2004 年 2 月 11 至 12 日, 第 7 页。

④伊安·劳特里奇, 《沉溺于石油——美国对能源安全无情的驱使》(伦敦: I. B. Tauris, 2005)。

⑤这些数字是真实的 (2006 年价格)。计算是基于伊拉克石油部和哈勒法耶、纳赫尔乌姆尔、马基奴、西库尔纳尔、加拉夫、纳西里耶、阿马拉、图巴、糠塔维、东巴格达和阿赫代布地区的工业数据。现金流动模型也是建立在这些地区之上, 应用了用在俄罗斯、利比亚和阿曼的 PSA 条款。做了一系列的标准模型假设。所有假设和方法论的细节来自格列格·马迪特的“原油设计——偷窃伊拉克的石油财富”, 伦敦: 平台 (PLATFORM), 2005 年 11 月。网址是 www.carbonweb.org/cnadedesigns.htm。经济学家有一个观点就是, 现在的钱要比以后的钱更值钱。因为现在你手里的钱可以拿去投资, 可以获得增值。按照这个观点, 我们把现在的钱成为“净现值”, 对比同等数目以后的钱, 净现值更有价值。在这些条件下, 按照 2006 年的净现值和 12% 的折旧率, 伊拉克的净损失 (总支出减去总收入) 将在 160 亿~430 亿美元之间。这个方法在“原油设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

⑥丹·威特在第二次欧亚大陆政府首脑投资会议上的讲话,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2002 年 4 月; 《ITIC 公告》, 2002 年 4 月 19 日, 第 1 页。

⑦丹·威特, “民主化进程放缓将使每个人都受益”, 《亚利桑那明星日报》(Arizona Daily Star), 2005 年 11 月 12 日。

⑧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 (FCO), “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常用规则” (2004 年夏), 第 4~5 页。

⑨罗韦尔, “不适当的影响”。

⑩“2006 年伊拉克出口将达到战前水平——沙拉比”, 路透社, 2005 年 11 月 12 日。

⑪“伊拉克同 IOCS 谈判的快速轨道合同”, 《中东经济调查》(Middle East Economic Survey) 48, no. 25 (2005 年 6 月 20 日)。

⑫罗韦尔, “不适当的影响”。

⑬同上。

世界银行推出了债务引导经济发展计划，银行贷给发展中国家数百亿贷款，希望能给它们带来发展。但那些钱最终去了哪里？

第8章 世界银行和 1000 亿美元问题

史蒂夫·贝尔克曼

只管把贷款贷出去，而不管结果怎么样。世界银行的管理层对他们的贷款业务进行伪装并对人们加以误导，从而创造了一种世界在健康的发展着的幻想。同时在隐藏了惊人数目的失败贷款后，他们还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话，那就是他们站在发展的“刀刃”上。这些银行高层放出的失败贷款使第三世界的统治权贵们发了财，而他们的国家却背负着大山一般沉重的还不清的债务。银行的人可不管这个，他们只顾为自己大唱赞歌，因为他们使银行完成了远远超出起初目标的任务。当他们只顾自身的发展时，却忽略了职业守信的原则，那些他们曾经答应要帮助的人们现在却仍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

■ 那 1000 亿美元出了什么问题？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积累的贷款：3940 亿美元。

国际开发协会（IDA）积累的贷款：1510 亿美元。

这是世界银行在 2004 年年报中披露的数字。这些数字质疑了银行把贷款贷给第三世界的目的还是不是为了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和脱离贫困。^①银行



的评论家指责说，在银行放出的超过 5000 亿美元的贷款中，大约有 1000 亿美元在贷给那些腐败政府后就不见了。把钱借给声名狼藉的腐败政权，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比如菲律宾、扎伊尔、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海地。他们描绘了一幅有关贷款制度的迷人的图画，而不管是贷给谁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世界银行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本想促进它们发展，可这种规划总是难以实现。穷人们依旧很贫穷，而它们的统治权贵们却已经聚集了大量财富。

与这种断言相反的是，银行的管理层宣称他们信托保护措施能够使贷款损失达到最小值。在我们做深入分析之前，让我先把银行的管理层说清楚，因为这对于把贷款制度和管理这种制度的人分开来说很重要。像银行这种受保护的官僚机构，他们关心自己的福利多于银行任务的成功。这些管理者们隐藏在银行背后，支付数十亿美元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变得更加腐败和混乱。他们不向任何人负责，他们所信奉的职业准则是贷款胜于结果。管理者们甚至会对那些糟糕的贷款大加赞扬，但作为银行来说，这应该是值得羞愧的事。银行管理者们也许会对支持失败的项目负一定的责任，但却忽视了几十年来一直偷窃银行资金的行为和背负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的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对此银行管理者们从不做出自己的回应。所以这些也是任务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同时使银行获利的人却还可以获得奖赏。

银行管理层试图从财政方面说明贷款合约的保证条件、取得资金使用权的方针、贷款监督机构、定期稽核等方面都证明了银行制度的完整性。他们还说在过去的 10 年间，银行的反腐败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一个完整制度，一个专门负责欺诈行为研究的部门，一条专门报道欺诈和腐败的热线，一个专门负责解释的研究单位和一套处理那些因收受贿赂和回扣的公司的程序，这些都证明了银行在打击腐败方面的承诺。他们甚至还罗列了很多关于反腐败和他们贷款中反腐败计划的理论来回应那些银行评论家们。尽管如此，银行还是没有说明这些行动对高层的腐败行为到底有多大效果。

当银行和银行评论家们的辩论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两边都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评论家们指出，那些失败的银行贷款只是



为了完成银行的目标，把贷款贷给那些腐败政权是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他们没有特别有力的证据来说明此论断。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推断马科斯、苏哈托、阿巴查、阿里斯蒂德和类似政权一定把那些银行贷款据为己有。但是除非这样的推断有证据证明，在此之前我们也只能推测。

所以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回答。银行过去几十年间损失的这1000亿美元是被骗了吗？还是这只是评论家们在没有掌握实际情况之前做出的一个轻佻的声明？很不幸，根据我16年的银行贷款业务的经验和反腐败研究的结果来看，我敢肯定那1000亿美元甚至是更多的资金被骗了，所以那些评论家并非完全在没有证据地夸夸其谈。在这一章，我会列举一些欺诈和挪用资金的例子，这些都是这些年来我在银行贷款业务中观察和研究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银行贷款部门高层充满了腐败，这将导致银行使命和信用在某种程度上大大降低。这些都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同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银行损失的那1000亿美元，很有可能被欺诈和挪用，这些也都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据。

■ 利比里亚：你借钱吗？

前一天晚上，泛美航空公司飞往蒙罗维亚的航班在我看来好像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不过现在，当我们走在市政大厅的台阶上，洒在我们身上的是早晨太阳那一缕温暖的阳光，我又重新恢复了精神，感觉好像所有事情的真相都仿佛要被揭开。现在是1983年的11月，这是我第一次接手世界银行的国外业务。我急切地想要开始工作，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作为推销员不停地敲着别人家的门，不停地发展我的业务，这些都令我感到厌恶。正在这时候，有一个极其聪慧的人，不计后果地雇用了我。要知道，我在国际银行业没有一点背景，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过我在海外业务方面有一些经验，而且我受过的技术培训对于作为一名银行职员也正用得上。几天之内我就和世界银行的西非区分行签订了一份一年的咨询合同。现在我正走进蒙罗维亚那有些陈旧的市政大厅。蒙罗维亚是西非小国利比里亚的首都，现在正处于塞缪尔残暴、腐败、混乱政权的统治之下。



白石台阶处处都能显示岁月的痕迹，损坏、缺失的部分随处可见。当我走进大厅的时候，我看到了更多这样的景象，使我不由得在想象早些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的，那时它一定被建造得很漂亮，并在过去的那个时代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但悲哀的是，它现在正被这个无为、腐败的政府和可憎的政治家们所毁坏，上帝知道还有些别的什么也在摧毁它。在随后的这些年里，我多次看到类似的情景。这些情景会激起一种挫败感，那是一种努力想要完成一个银行在非洲投资的项目，最后却什么也做不了的挫败感。还有一些我们的非洲同行们和一些好心的捐赠者们想给这块神奇的土地带来一些变化，但最后却都发现无能为力。

当我和邦尼以及两个顾问在大厅中溜达的时候，阳台上一个人冲我们打招呼。邦尼是这次任务的组长，也是我的主管和导师及多年的朋友。让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他在银行商业这一块非常有经验。在我刚刚得到这份工作时，由于我对银行商业和这次任务本身缺乏信心，我经常会很紧张得打哆嗦，是他使我平静了下来。他是一个加拿大籍的意大利人的后裔，在乌干达长大，能讲英语、法语、斯瓦希里语和他的母语意大利语。邦尼在任何环境中都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工作起来能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在银行里还有一些像邦尼这样的人，他们努力工作，为银行做出贡献，并且能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展开工作。但不幸的是，我很快知道了对于在非洲的银行基金项目来说，努力工作多做贡献并不一定能换来好的结果。

我们在这儿主要是为了检查蒙罗维亚城市发展项目（MUDP）的执行情况，这个项目是由国际开发协会（IDA）提供的经费，并且由世界银行提供无息贷款给那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笔1000万美元的特殊贷款就是提供给利比里亚政府用于改善居住在蒙罗维亚的贫困人们的生活环境的。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很多道路都不通行，连卫生设施和排水系统都没有，垃圾堆随处可见。这个项目至少会稍稍改变上述情况，而我的职责就是帮助当地的权威人士举办培训项目，以确保市政管理者、监督者、雇员都能有效地坚守自己的职责。

我们走在去第二层阳台的台阶上，随后路过了几个办公室。整个地方



出奇的安静，当我走过每个办公室的时候，我都在想象在各种情形下员工们无生气的样子。他们唯一能干的就是趴在桌子上睡觉或是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在大厅的尽头我们被领进了市长的办公室，一个不知何故我总想在我们小组面前表现的地方。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市长正从办公桌后走过来，他个子不高，稍微有一点胖，由于压力过大看起来有一点疲惫。他的衣领上挂着一块海军上校的勋章，腰里别着一把手柄装饰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一副牛仔装扮，看起来非常严肃。他走向我，我却一直盯着他的手枪。突然他张开了手臂，脸上露出了笑容，说：“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欢迎，欢迎！”当他抓着我的肩膀时，他的表情又恢复了严肃，他盯着我们装满项目文件的皮包，说：“你们带钱来了吗？钱在哪儿啊？”

我开始有点紧张地说，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些旅行经费。幸运的是，邦尼过来替我解了围。他平静地解释道，银行会直接把钱支付给承包项目的厂商，我们并没有带钱过来。那个市长明显地感觉到了失望，在请我们入座之前毫无表情地盯着我们看了几秒钟。在坐下后我们开始讨论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工作计划，我开始很认真地看待手上的这份工作。

除了极个别项目之外，非洲所有银行出资的项目要想开展，都必须首先假定当地的政府部门的人员，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经过培训使他们从事正确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使这个培训项目能够完成这个目标。我开始明白有些事情并不像它们出现时那么简单。在以后的那些年里，我才明白了培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尤其是这些国外的培训，仅仅是为那些国家公仆们从生活津贴和其他安排中获益的一种手段，这可比他们上班赚得多。对于一个月薪 300 美元的政府官员来说，从学费和永远也说不清的生活津贴上获得上千美元是不正常的。而通过向高官多送点钱就能轻易支配好几万美元的资金。

在那个早晨后来的时间里，我们随着项目的利比里亚主管参观了公共工程部门，看一下工程进展情况。当我们穿过不同的办公室时，我注意到在这些员工之间同样的无生气。他们没有刻意掩饰他们根本就不在工作：一些人趴在桌子上或躺在椅子上睡觉，还有一些人干脆就坐着发呆。我同样注意到了令人吃惊的物质环境：陈旧的照明系统、残缺不全的窗户、破



烂不堪的家具，办公室里的设备基本上都不能用。我们又看了一下车辆调配场，更准确的说是汽车处理厂，在那里有同样的冷漠和恶劣的环境。工人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聊天，偶尔也会在车间发现有一个人在指导年轻的学徒工做修理轮胎、给车上油等一些半技术含量的活。

为了完成道路改造、排水、垃圾收集等项目目标，就需要卡车、分类机、拖拉机和和其他一些好用的设备。现在这个项目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设备可用。车辆调配场里的车要么没有车轮、要么发动机被移了位，其他那些都处于失修的状态。我们同负责这些工作的主管谈了这个问题，他向我们罗列了各种工作没有进行的原因。他们没有资金用于运营支出；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零配件；他们还欠着当地燃料供应商的钱，而那个供应商拒绝接受赊账；员工们也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钱了；就连少数几辆能用的车都被政府管理部门“借”去了。尽管银行提供的资金现在可以使用，但在这些事当中，因为没指定人，所以就没人去买零配件。政府也提供了日常营运所需要的费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一直没开工。结论就是：惯性。

当我4个月后来到了供水二期工程的最终评估重返利比亚时，我逐渐意识到惯性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银行在非洲做的事还是像刚开始一样，充满了敬畏。我慢慢学会了如何解释我们说的写的和我们实际做的之间的区别。利比亚供水及水道公司（LWSC）在1978年接受了国际开发协会800万美元的贷款，现在银行打算再提供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同样的，我的工作是确保用于培训的资金要使用的有效率。但是从哪儿开始？尽管有了银行和其他捐赠者对当前项目的援助，但利比亚水道公司的制度问题看起来还是难以解决。

作为一家政府公共机构，它一半的开支来自于向大众收取的服务费，LWSC被认为有一定的商业基础。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小组发现了它严重的财务问题。

尽管LWSC每月有固定的13000名私人客户，可只有大约3000名客户付费。幸运的是，比较大的客户大都能按时缴款，所以总的算下来，大概有50%的私人客户的账款能够按时收齐。LWSC糟糕的账款收集率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缺少可靠的账目回收记录。尽管LWSC的服务处做了一个报告，



并声称这是每年的账目回收记录，这份报告记录了 22000 个账目，但实际上每年的客户大约只有 13000 名。而且报告里记录积累的欠款总数已经超过了 1700 万美元。^②

LWSC 的欠款比银行打算提供给它的新贷款的 3 倍还多。而且这笔欠款还没有包括政府各个部门和国有公司欠下的约 4600 万美元。

此外，我们的报告还显示：

LWSC 糟糕的财务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管理的无效率，机构臃肿给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小组还发现了其他原因，包括：

1. 缺乏有效的化学药品配置监督制度，导致服务人员有过度使用药品的可能。
2. 设置了工厂的水泵抽水率与其他机器运作率，尽管夜间的需求有所减少，但这导致了过度消费和浪费。
3. 繁琐的服务过程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修理车辆、机器等的等待时间过长，这需要改进。
4. 过高的化学药品价格导致不能确保收回货款。
5. 车辆的私人使用。

现在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很难找出怎样才能使 LWSC 走上正轨。一个连顾客的服务费用都收不上来的机构，我们为什么要贷款给它？当它刚刚遭受一个如此糟糕的失败时，这笔新贷款怎样来帮助它？对所有这些我都不是太了解，所以在我做完我负责的培训项目之后，我决定继续关注这些事。

贷款毫无疑问地被批准了。3 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来看这个工程的效果时，我发现 LWSC 比以前更加管理不善和无效率。出现这种情况一部分要归因于整个国家恶化的政治环境，但更主要的是银行一直忽视的一种情况：机构里面的垄断和腐败。

我的第一年合同到期后又续签了 3 年，然后继续在利比里亚工作。1985 年 6 月，我被要求去查看蒙罗维亚职业培训中心（MVTC）的进展情况，这是第四期教育工程的一部分。这个 1260 万美元的工程是 1972 ~ 1988 年总共贷款 3000 万美元的一系列教育工程的最后一个，其目的在于提高职



业培训的质量。

我同教育部的项目主管见了面，然后开车去位于郊区的 MVTC。它征用了一个学校的建筑并占用了很大一片地，环境相当好。在同中心的管理层和教员们讨论了课程发展情况，学徒工教学计划，获得的设备、会员情况后，我又巡视了利用工程基金所做的设备改进情况。把这些都做完后，我又饶有兴致地看了看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和当地建筑用的材料是什么。

安装大门和窗户的防盗系统与校园周围的栅栏墙双方分别签订了合同。我挑了一部分条款来看，因为看起来它们比先前缺乏资金的项目还要严谨，并且合同上所花费成本比其他也要高。防盗系统合约超过了 6 万美元——在一层所有门上和窗户上装上了钢条。按照工程主管的说法，这是为了防止小偷偷窃学校的设备所必须安装的。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我发现，在西非的公共建筑上安装防盗系统是很平常的事。

在视察了铁窗护栏和门框后，发现使用的材料质量都不怎么样。于是我又去了几家当地的商店对比一下成本。我假装是一个将要来本地区开公司的外国人，我用 MVTC 安装的统一价格四处打听，令我吃惊的是，根据我在这些商店打听的价格，MVTC 只需用原价格的四分之一，即不到 1.5 万美元就能完成那些安装。如果没有其他事，作为一个好心的外国人，我当然希望他们的报价要比 MVTC 的价格高。但是当我和工程主管探讨此事时，他笑着向我保证，这是政府获得的最低的出价合同。同时他也解释道，因为政府拖欠付款的名声在外，所以供货商们就提高了价格来补偿因延期付款得到的损失。但这种解释看起来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有些矛盾——工程记录显示在供货商提供了发票之后马上就能得到货款。当我指出这点时，那位主管笑的极不自然，并说这没什么。那么这多出的 4.5 万美元哪去了，也许只有上帝、供货商和一部分“人民公仆”知道。

围墙的合同就更加有趣了。MVTC 距离蒙罗维亚有一段路程，占据了好几公顷的土地。但是除了那栋建筑大楼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是空着的，校园后面有一小片窝棚。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他们绕着校园修了一道墙，即不准当地的居民通行，也不让他们的羊在这里吃草。这道墙用混凝土建



造，绕着校园延伸，看起来大概有两米高，上面每隔 20 米都有一盏电灯，这些的成本超过了 25 万美元。这道墙被建造的很糟糕而且还没有完工，铺设电路的工作也没有完。尽管这样，工程账目显示承包商根据他提供的发票已经得到了全部账款。当我把我观察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主管时，他立刻转移了我的话题，并说这里没有任何问题，他会让承包商完成这些工作的。

有意识地，我去当地的材料供应商那儿打探价格，并和几个当地的泥瓦匠聊了几句。同样的，我获得的报价比 MVTC 得到的“最低价”要低得多。利用我获得的报价，我估算了这个合同的真实成本，大约是 7.5 万美元，这与合同上的价钱存在着 17.5 万美元的差距。然后我还发现承包商修完那堵墙后竟然留下了一个 10 米的缺口，这个缺口就被当地居民当作小道走来走去。因为学校周围的地形比较湿软，如果真要把这个缺口堵上的话，当地居民就没有路可走了。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可以自由的穿梭于校园之中，而山羊也可以继续在这儿吃草，什么也没有改变。这无疑使我对非洲的经济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

我在利比里亚一共执行过四次任务，1987 年 9 月的那一次则是最后一次。当时整个国家的环境恶化到连银行都不愿意继续贷款给塞缪尔政府。为什么银行用了那么长时间才意识到对这个腐败政府做什么都是毫无希望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理解。我不知道停止贷款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个政府不可相信呢，还是出于官僚政治的需要。我相信我和那些银行的新人还是有差别的，而且我们的工作肯定会比他们做的要好。我也相信那些我们曾一起工作的国家公务员和政治家们大部分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努力地工作着。

通过银行项目看到的欺诈和腐败行为只是特例，绝不是一般规律。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我开始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对银行的项目有足够的了解，你会发现他们对政府官员个人致富的关注多于对非洲人民贫困和恶劣的生活环境的关注。

通过早期我对银行在利比里亚资金的运作的观察和体会，我觉得在银行描述的非洲发展前景同实际存在的混乱与腐败之间存在着矛盾。尽管所有的事实都显示实际发生的与银行的计划有多么不一致，但在任何时刻，



银行都不会承认它的贷款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它也不会承认它借出去的钱和提出的建议都被那些政治家、无能者和腐败分子统统浪费掉了。尽管一再增加的贷款只会加重非洲人民的负担，尽管银行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因素会抵消掉非洲经济发展向好的形势，但它在任何时刻都不会减少贷款。所以这个游戏终将会继续，一年又一年，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

■ 腐败：“给车轮上油”

我在利比里亚早期的工作只是我对世界经济发展认识的开始。我在非洲大陆工作过的每一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整个的贷款业务是个好事——通过银行和当地官员们带来的虚幻和真实的事情使每一个人都开始相信只要银行投入数十亿贷款，就能减轻第三世界的贫困。但通过我们提供的钱来发展或完成什么东西时，实际上却很少真正能使穷人们受益。一年又一年，尽管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但银行还是会写一个又一个的漂亮的报告，继续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中投资、贷款，因为只有这样，银行经营者们才能在众多批评声中保护自己。

那么这些漂亮报告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否有所提高？银行的管理层是不是故意掩盖贷款给腐败无序政府的失败政策？他们曾经对他们的顾客承诺会改变他们国民的生活状况，但他们做到了吗？很不幸的是，银行想要往外贷款的欲望使他们看不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握钱在手的贪污政府的官员们一旦开始偷窃银行项目基金，就会变得没完没了。

通过日常的现金账户，每天有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资金转移。负责项目的官员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挪用项目资金。不管有没有外面同伙的帮助，他们建立皮包公司，以便于支配竞标。他们还假造一些文件建立隐秘的项目账户，用较高的价格支付货物和服务的账款，再加上其他一些手段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一些银行的辩护家们竟然声称这些犯罪行为是“进行商业活动的成本”，或者“只是给车轮上油”，实际上它们阻碍工程进展的程度远甚于实际的美元损失。如果忽略了偷窃 100 美元会造成 1000 美元损失的



事实，那么那些银行的支持者们就能够找借口称腐败行为没有阻碍银行任务的完成。无论工程账目上有多大比例的资金被偷，其过程都像是从一辆价值 2 万美元的新车身上偷了价值 20 美元的燃料。车还是你的，但你哪里也去不了。

尼日利亚：一笔小额佣金

和同伴结伴去旅行，来自英国大使馆的一个人谈到了一个英国图书发行商出版教科书的事。在尼日利亚，世界银行出资 2500 万美元搞了一个大学教科书的项目，这个人就说到了这个合同的事，好像是说一个英国图书发行商已经认识了一个自称能代表全国大学委员会（NUC）政府官员的人，他有权把合同给使他高兴的人。这个“代表”还列举了一些机密计划文件，以证明他和 NUC 官员的关系，并且说如果给他一定的佣金，他就能帮着得到那份合同。这个佣金的数目是合同金额的 15%（375 万美元），而且这笔钱还要和项目官员分享。这个发行商表示他不会支付这笔佣金。不久，这个代表又联系了发行商，说项目官员愿意接受 10% 的比例（250 万美元），但这是底线，不能再少了。在再次拒绝了这次敲诈意图后，发行商试图通过英国大使馆得到银行的帮助。

在得知只有几家国际公司有资格参与竞标这个大的图书订单后，这个发行商十分渴望得到这份合同，于是他投了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标。9 天后，当我通过英国大使馆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一个美国发行商的代表联系了我，他说他们也投了标，并且有一个不知名的顾问告诉他说，他们的公司很快就会被邀请到尼日利亚来商谈竞标的事宜。10 天之后，那个美国公司的代表又一次找到了我，并告诉我说，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告诉他们“银行的程序已经阻碍了中标的谈判”。但是，在得知只有 3 个投标者入围后，尼日利亚人决定把合同分为 3 份。

整个的交易过程听起来十分可疑，于是我把我的疑问告诉了我的同伴和银行的管理层，他们轮流介入竞标过程来使其回到一个透明的轨道中去。但是尼日利亚的官员们，还是决定使用其他方案，以分开和可控为中心，使用了一份转包合同。这样，这个合同就成了他们致富的工具。



这次采用的是国际竞标法，谁出价最低谁就可以获得合同。如果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哪个投标者决定使用转包商，那么这个转包商的实际情况就要在竞标的时候说明清楚。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这么做。不久，英国和美国的发行商都接到了 NUC 于 1991 年 2 月 15 日发出的同样内容的信，内容如下：

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我们根据信用工具对您申办采购书籍代理进行了评标，您的公司成功了！请贵公司的代表于 2 月 25 日星期一和全国大学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就具体事宜进行商讨。

贵公司派谁出席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他必须有代表贵公司做重大决策的权利，因为对他来说，可能没有时间就某些问题回去再与公司商量。

接下来，故事进入到行动阶段。10 天之内，两个发行商都来到了拉各斯，都想着自己已经拿到了那份价值 2500 万美元的合同。他们拿着发出日期都是 1991 年 2 月 15 日的信到了 NUC，才发现他们的信几乎都是一样的，除了一点不同：第一封信上写的是“您的公司成功了”，而第二封信上写的是“您的公司已经入围了”。多么不同的一句话啊！现在在同样的房间里，面对着 NUC 的官员，两家还没有完全获得资格的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发行商终于明白，如果他们想要和 NUC 合作，就必须和另外的竞标者分享这份合同。

这两个发行商为获得这份合同努力了两个月，同时还为世界银行的协助进行辩护。世界银行起初也努力地想让整个竞标过程透明化，但最后还是允许那些官员们自己来安排整个过程。他们用不太明显的欺诈手段使英国发行商得到了合同。

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那个英国发行商明显的是中了标，而 NUC 在向银行做的报告中也说明了是谁获得了这份 2500 万美元的合同。银行对此也表示了赞同。但银行不知道的是这份合同还有其他 3 个中标者——那家美国的公司和两家尼日利亚本地的公司，这 3 家公司作为转包商会分享这份合同。英国公司获得了合同金额中的 50%，美国公司得到了 15%，两家本



地公司各自获得了 20% 和 15%，而那些 NUC 的官员们则从那两家本地公司得到了 35% 的金额（875 万美元），比起初他们要的佣金的 2 倍还多。最后，那两家尼日利亚公司为大学做了什么最终也没有说明，而它们到底得到了多少钱也不得而知了。

阿根廷：氧气与金钱

世界银行的资金被偷窃并不只是发生在非洲，从我这么多年遇到的银行项目来看，腐败总是伴随着银行的投资项目。这些年来我已经看惯了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同伙们为欺诈、挪用资金而使用的各种手段。下面就举一个阿根廷的 1 亿美元的健康项目的例子。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几个省的健康服务。而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是用来购买康复医院的设备和提高健康政策管理部门的咨询服务的。这个项目的实施是以省为单位，然后再报告给政府的一个中央小组。项目合同也是由各个省分别签订，但需要中央小组的批准。这样，这个中央小组就掌握着银行资金的使用权。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个多层合同的签订过程，而每一层的官员都会想办法使自己获利。

医院康复计划包括大量的公民工作合同和医疗设备合同。在这些合同中有一份价值 75 万美元的为两家医院提供制氧机的合同。在听了一个竞标失败者的抱怨之后，世界银行调查人了解到合同给了一家当地新成立的公司。这家公司声称它是美国一家著名的制氧机生产公司的唯一代理商。而那个抱怨者则声称中标者暗中和中央小组有联系，应该被剥夺竞标资格。并且按照竞标的要求，也没有提供最近 3 年的财务状况声明。

世界银行通过新成立的反腐败和诈骗调查小组对上诉情况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以下结论：

这家当地的企业是为了获得制氧机的合同专门成立的，而且在递交了标书后一个月内也没有正式组成一个公司。企业的负责人之前也没有在医用氧气这个特殊领域的任何从业经验，而且证据显示他们和项目小组的官员有联系。

中标者声称它是美国一家著名制氧机生产公司的唯一代理商，这也是



伪造的，因为这家制造厂商已经声明它会通过这个国家的任何代理商来出售它的产品，而它也仅仅为了参与竞标过程给了这家阿根廷公司一个折扣价。

尽管世界银行获悉当地企业应该是当初的中标者，但项目小组最后还是把合同给了美国的一家制造厂商。当有人质疑这与世界银行的方针有出入时，项目官员则找了一个没有任何说服力的理由：我们把合同给这家美国公司的原因是这家公司能够提供3年的财务报告。尽管这个理由根本就不能说明当地的竞标者没有获得合同的资格，但至少不会使世界银行管理层起争议。

这份合同里面还包含了一份价值10万美元的劳务合同，用于在医院建造放置制氧机的两个建筑物。实际上，那家被要求实施建筑工程的美国制造商在阿根廷没有代理处，也没有任何的建筑业的背景。当这家厂商拒绝履行建筑责任时，工程官员们就告诉他们：“这是世界银行要求写进去的合同条款”。制造商还被告知，当地的公司会负责这个建筑工程，但必须由它付钱。于是这家制造商就把10万美元交到了当地建筑公司手里。

银行负责调查其他异常合同的人反映说，建造放置制氧机的设备房的工程已经包含在医院其他劳务合同中了，而得到这些合同的阿根廷公司也已经在建造了。这些双重的劳务合同无疑是充满智慧的项目官员们和美国制造商当地“代表”的负责人一块搞的鬼。这样他们就得到了10万美元的横财而不用付出任何劳动。

尽管制氧机已经由美国的制造商运来，新的设备房也已经被建好了，但后来才发现这些设备根本就与当初竞标要求的设备不符。这主要是因为负责给美国制造商提供型号的那些当地“代表”们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那些项目官员们则是同谋。最后医院又多花了18万美元试图来改正这个错误。

在这个合同给这家皮包公司的几年后，这两家医院的这些设备仍然不起什么作用。政府官员们也没能够使当地的“代表”和美国的制造商更换设备。尽管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当地的企业和一些项目官员串通，但政府还是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被揭示的层层骗局

如果你认为制氧机的事件在这 1 亿美元的项目中只是个别异常现象，那你未免也太天真了。金钱的诱惑对那些项目官员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们根本无法抵制。银行调查组披露的其他几个咨询合同和劳务合同的案例则充分显示出那些官员在如何挪用项目资金方面的创造力。

一个当地的咨询顾问获得了一份负责监督一家医院建筑工程劳务活动的价值 21.6 万美元的咨询合同，尽管银行方面也认可了他，但一个项目官员对他说，要想获得最终的认可，必须得支付 10% 的“佣金”。在当地的一个酒吧里，这个顾问和这个官员讨论了佣金的事。他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秘密的录了下来，并假装同意一旦得到合同就支付佣金。但在他真正获得了合同之后，他拒绝支付 10% 的佣金，随后他的合同也中止了。尽管他拿着录音带去向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但他的合同还是没有再继续。

在调查这个咨询顾问的申诉的同时，这份合同马上就转给了一个和项目主管联系紧密的人。虽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竞标的完整性，但整个过程还是打了折扣。结果，建筑工程的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导致在原来的劳务合同上之又多花了 60 万美元。同样的建筑咨询问题也发生在另一家医院的价值 2500 万美元的劳务合同上，这一次，多花了 80 万美元在那些永远也解释不清的支付变动上。

在调查组对建筑咨询合同调查的期间，他们了解到一家当地的建筑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 510 万美元的一家医院的劳务合同。这家公司是所有参与竞标者中出价最低的。这时候政府方面发生了人事变动，选举出了新的总统。这家公司在合同上签字之前，项目官员用欺骗性的手段使这家公司和出价第二低的公司丧失了资格。然后把合同给了竞标价为 590 万美元，也是所有竞标价中的第三高价的一家公司，这比那家公司足足高出了 80 万美元。尽管这事很可疑，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最后得到合同的这家公司的老板和项目主管与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有关联。

像这种有问题的合同在整个阿根廷的项目中多次被发现。竞标的黑箱操作、敲诈勒索、假造发票、操纵免税，那些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同伙们几



乎用了所有他们能想到的方式来挪用项目资金。上文提到的1亿美元的项目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小数目，我们不要忘了世界银行每年都会资助阿根廷各种项目，从而带来成千上万份合同。当我们发现在某些方面没有出问题时，这绝对是非常少见的例外。

■ 从一个骗局到1000亿美元

这少数几个世界银行资助项目欺诈行为的例子只是过去几十年里银行损失的那1000亿美元当中的几个事例。世界银行每年都往第三世界国家投入数十亿资金，而这些国家的官员们则把这些资金当作了他们的私人银行储蓄。实际上我所看到的第一手资料远远多于我在这一章所列举的例子：修路用的数百万美元不翼而飞；重建基础设施用的数百万美元没有被落实；提高服务用的数百万美元无论如何也到不了穷人手里；还有为了推动更好的经济政策的几百万美元和提高统治力的几百万美元不知所踪。这些被申请资助的资金永远打着经济发展的幌子，永远以摆脱贫困为借口。

也许有人认为以上我列举的这些欺诈的事例只有轶事一样的证据，并不能充分地证明世界银行高层就存在腐败现象。实际上银行是在进行自我伤害，因为它拒绝那些现实中已经被揭露的证据。现实是银行把那些资金委托给那些政府官员来管理，而那些政府官员则疯狂地诈骗和挪用这些项目资金，并且被诈骗和挪用部分的比例已经完全失衡。这部分的比例有多大？又有多少？

我敢肯定的是世界银行的辩护者宁愿选择做理论分析和细节研究也不愿意去证明那些腐败分子正在抢劫穷人们的每一元钱。我敢保证我所描述的每一个案例和许多我没有写出来的，都有充足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从头到尾的项目资金被挪用的过程，我也曾经揭露过超过原始价值10倍的支付款，不管是用于商品还是劳务，这些钱根本就没有完全被使用。我也听到过各种对挪用项目资金行为所能想到的狡辩。这么疯狂的腐败行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银行高层中欺诈和挪用公款绝不是个别行为，而是一种规律。



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银行是否因为腐败损失了1000亿美元？那些口口声声称在世界银行历史上“看不到罪恶、听不到罪恶、不讲罪恶”的世界银行最忠实的拥护者，即便是那些极端保守者，也不得不承认平均每年的损失有10%，每年的损失有20亿美元，^③这个数目即便是对世界银行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同时我也很乐意提供一些证据，证明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已经高达30%~40%。这些都说明，每年损失的比例至少是20%，这是一个不需争论的数字。站在保守者的角度上设想一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银行的5000亿美元贷款中，如果给我们1000亿美元用于那些银行批评家们主张的地方……是的，世界银行因为它的高层欺诈和腐败而损失了1000亿美元，而将来它很有可能会损失更多。

所以，尽管银行百般解释，腐败行为依然存在。那些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同谋们继续每年挪用数十亿美元而不用担心会受到什么惩罚。而银行和其他一些捐赠机构仍旧憧憬着会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一些改变。穷人们继续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他们国家的领导人们则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

我们也要看到整个事情中的不同的方面。银行管理层的很多人和一般的社会捐赠机构也努力地忠于自己的职责，确保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能够给穷人们带来直接利益。其实他们可以少一些贷款，而多做一些监督工作。他们不需要学得太多，但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他们需要诚实、完整地汇报贷款项目的失败。他们需要充分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给政府施压，以调查、起诉和惩罚那些腐败的官员，就像他们对待其他罪犯一样。如果我们信守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那么上帝的贷款绝对能派上大用场。

【注释】

- ①贷款利率由银行制定，但提供给最穷国家的贷款是免息的。
- ②办公室反馈报告，1984年3月13日，附录A，第2段。
- ③根据近几年支付的平均数是200亿美元。

世界银行将菲律宾作为一个以贷款为基础、以发展出口战略为导向的试验案例，但是结果却造成了专政、贫困和沉重的债务负担。

第9章 菲律宾，世界银行， 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

埃伦·奥古斯丁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战争几乎是每天的新闻头条。大量的战争消息震撼着世界。政策制定者从多米诺效应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在菲律宾，势力强大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把持着政权，但是在乡村正滋生着一场愈演愈烈的叛乱。在美国与世界银行的眼中，马科斯是冷战中唯一一个可以阻止让更多国家落入红色集团的势力。一个能使马科斯保持政权的方法是直接援助，另外一个独出心裁的方法就是世界银行的贷款，但是要在它的看管和制约下进行。由于美国经常代表着世界银行的意志，所以美国得到了它想要的——对于菲律宾来说是损失惨重的结果。但是这次，我们可以借助世界银行内部的鼓噪声，从内行人的角度看出“发展”的游戏是怎样操作的，并且为什么结果总是跟领导者的初衷大相径庭。

▣ 美国的隐性殖民往事

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少人还记得在 1898 年，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以西班牙告败结束后，美国“收购”了菲律宾。菲律宾曾经被西班牙殖民统治了 300 年，所以菲律宾人民不希望迎来另外



一个统治者。事实上，埃米利奥·阿奎纳多在协助美国力量战胜了西班牙之后，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来执掌政权。但是菲律宾人民的意愿被放在了一边，接下来爆发了一场惨烈的起义。几年之后这场起义最终被镇压，25万菲律宾人失去了生命。美国与菲律宾之间建立了一个典型的殖民关系，其中菲律宾出口农产品例如蔗糖，并且进口美国的工业品。在1946年，美国允许菲律宾独立，但是保留包括克拉克平原的和苏比克湾的20个美国军事基地。

在美国统治期间，它占有了菲律宾这个国家的财富的精华，这些财富在菲律宾独立之后供养了菲律宾的政治力量。费迪南德·马科斯就是来自这股政治力量的一员，他在20世纪60年代接任了菲律宾总统职位。在一场极度腐败、暴力的竞选中，1969年，马科斯稳当地连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用尽了政府的外汇储备。没有了外汇储备，菲律宾就没有了去填平巨大的贸易逆差并偿还大量的外债利息的能力。

于是马科斯向世界银行伸出了求助之手。但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比索贬值60%。

在20世纪70年代，货币贬值是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发放贷款的标准方法。在理论上，一方面通过菲律宾便宜的货物出口增加贸易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昂贵的进口控制现金的流出，这会使贸易差额趋向平衡。但实际上，货币贬值给菲律宾的商业和工人等带来了巨大灾难。大量工厂破产，因为它们突然要应对产品中需进口构件的更昂贵的进口费用。^①城市工人工资降低了50%之多。

几年之后据内幕人员披露，贫困地区报告的第一份底稿指出这个银行强加的货币贬值政策正是菲律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内容在最终版本中被删除掉了。^②

■ 美国与世界银行推行的自由化

世界银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人民现实生活的冲突是血淋淋的，并且造成了大量人口伤亡。货币贬值是自由化宽容政策的一部分（有时也叫做新



自由主义)，并且是结构调整贷款和结构调整一揽子交易中一个持续部分的标准体。自由化处于世界银行交易政策的核心，对于菲律宾和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

自由化是一个容易引起困惑的词。在平常的使用中，自由化的意思是“进步的，对不幸的人充满了怜悯之心，有将政府资源用于对过去危害的纠正并且建立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愿望”。但是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由化的意义相当不同。道格·亨伍德，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是《左翼商业观察员》的创建者，他这样解释自由化：

“自由化的意思是去除任何影响市场功能有效性的障碍。那意味着剔除交易壁垒，剔除外国投资的障碍，减少政府干预的范围，并且减少经济规制。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里根主义：‘释放市场的魔力。’这或许对于美国人来说具有吸引力，特别是许多美国人反对国家干预，并且不信任社会福利制度。”^③

作为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模式，它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使用它的国家获得了成功发展。

“在过去40年间，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基本是那些东亚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计划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它们规制进口，限制资本流动，规制利率，并且指导资金进入对于发展有利的领域。中国就是现在的焦点，它在国家巧妙的发展策略下取得了成功，并且没有采用任何一个标准的政策方法。所以自由化的运作纪录看起来非常糟糕。对于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来说，没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制度是极不正常的。”^④

不久以前，美国自己也曾是个发展中国家。是否美国的崛起是遵循了世界银行推荐的方法呢？

亨伍德简要说明了美国的历史：

“我们曾经违背了今天我们强加给国家的法律。我们曾经依靠的是20世纪早期的保护性关税。我们同样曾经违背了现在我们视同神圣不可侵犯的知识产权。当美国窃取了德国的专利之后，美国的化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在19世纪，美国的出版商因为没有得到许可或者授权重新出版国外作家的作品而臭名昭著。正统的经济学坚持让市场发挥作用，并



且提出国内生产者参与国际竞争。但是这也是一种实力强大者的不切实际的空想。你想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化，但因为你是最强大的个体，没有人可以跟你竞争。所以在前进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贸易保护论者。一旦你到达了顶端，你就是一个自由贸易者。对于富裕国家，例如日本、西欧、美国、加拿大，对外自由贸易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努力寻求发展的贫穷国家来说，它们不能承担自由贸易制度。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竞争，它们没有办法去发展自己的产业。那样做是不可能的，并不能使贫穷国家的状况得到好转。”^⑤

■ 出口加工区：对跨国公司的补贴

世界银行给予马科斯贷款的另外一个条件是将菲律宾以出口加工区（EPZ）的形式对外资开放。一个主要区域是跨越始自马尼拉的海湾。对外国公司的鼓励包括：

1. 允许100%的外国所有权。
2. 允许支付低于马尼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3. 免税。
4. 低房租和低水费。
5. 可以低价租用或者购买政府融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与工厂建筑。
6. 加速折旧固定资产。^⑥

这些工程对于菲律宾并不便宜。单是巴丹半岛出口加工区，就耗用了1.5亿美元，包括一个大坝和一个给水处理厂。政府总共花费了借来的几十亿美元资金用于能源、交通、通信和水利设施建设，这些都怂恿了外国公司进入。^⑦在这些出口加工区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公司包括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仙童（Fairchild）、摩托罗拉、美泰（Mattel）。^⑧外向型发展的代价对菲律宾来说是昂贵的，但是跨国公司承担的义务却是有限的。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跨国公司面对工人要求更合理的工资时，可以相对容易



地离开，而且跨国公司正是这样做的。

■ 按照规则运作，最终失败

外向型发展战略是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标准处方的核心。但是把大部分的国家贷款用于支持外向型发展，就意味着只能有很少资金用于满足急迫的国内需求。

道格·亨伍德阐释了在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它是怎样破产的：

“外向型发展仍然是正统发展理论的绝对核心。在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中，巨大的国内需求应该比外向型发展更值得优先考虑。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没有办法满足人口的需求。这在经济上是相当不明智的，并且将一些超越需求的商品出口给那些饥饿、贫困、缺乏教育的人是一种违背人性的一种行为。

“我们盼望的是——并不是实际发生的——跨国公司能够传播一定程度的技术和科学，比如该聘用菲律宾本地的工程师，而不是从自己的国家带来自己的工程师。希望它们能够开始培训工人从事越来越有技术性的工作，而不是一些常规的组装任务。希望它们能在当地培养供应商，这样产品的组件就可以在组装地进行制造。这才是一个国家利用国外投资作为发展战略的真正途径。这样还会供应硬通货来偿还贷款——因为世界银行的贷款是不能够用本国货币来偿还的。当地政府并不能从这些跨国公司那里得到丰厚的税收，因为这些跨国公司通常获得免税资格并且支付给工人们非常低的工资。

“那就是为什么很少有国家在这场游戏中成功，尽管它们对外国投资开放并且按照要求做了每件事。这对它们来说相当的复杂。有120~150个国家在竞相使用这个模式。它们不能光靠出口来提高它们的偿债能力，这不会给它们带来繁荣。对于富裕国家，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好的，因为所有的贫穷国家都拼命地相互竞争，看谁生产的货物最便宜。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只有少数国家成为赢家。”^⑨

显然，菲律宾不是赢家中的一员。



■ 全球化的阴暗面

那些在出口工业工作的工人工作条件是恶劣的：

电子工业的工人在受雇用3年之后，有患眼疾的趋势。还有一些抱怨酸烧伤，环氧树脂涂层引起的皮疹，以及其他一些类似三氯乙烯溶剂引起的反应。即使工人们拥有了手套和面具，他们也不会使用它们，因为那会降低他们的工作速度，进而很难完成他们的定额任务。公司也不要求他们使用手套和面具，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被告知需要保护用具。^⑩

在金枪鱼罐头出口业，95%的工人在为临时订单工作，并且85%是妇女。当订单多的时候，工人们被迫连续数天每天工作12小时；当需求小的时候，他们几乎停工。并且工作处在严厉的控制之下。工人们在工作时间内不允许与别人说话，他们没有水喝，没有病假和节日，并且工资非常低。^⑪

机密档案显示，世界银行坚定不移地表示“利用有技术、低工资的劳动力是菲律宾的相对优势”。^⑫屈服于银行的压力，马科斯颁布了一套新的劳动法，这部劳动法允许雇主对在6个月试用期之内的新雇员只支付75%的最低工资标准。^⑬这直接导致了大批雇主在新雇员试用期结束之前就把他们解雇了。雇主们通过只招一些短期合同工而不是长期工避免了交纳一些法定费用，如健康保险和养老金。^⑭按照世界银行自己的报告，在1972~1978年间，那些无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了30%，而那些有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下降了25%。^⑮

■ 戒严：对谁有益？

除了自由化和工资被压低造成经济混乱外，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人们也使菲律宾处于动荡之中。他们通过罢工、集会的方式来反对马科斯及其政权以及美国的控制。^⑯而马科斯的回应是在1972年9月宣布全国处于戒严状态。美国商界对此大加赞赏，并发来了贺电：“美国商会祝贺你在恢复和平秩序、商业信心 and 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我们确信你给了我们合作的信



心……我们谨代表我们在美国的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表达我们的祝贺。”^①

但美国公众对此并不持同样的观点。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民意测验显示，有 87% 的人赞成减少对菲律宾压制政权的援助。^②但是马科斯的独裁统治有利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利益，并且世界银行也支持马科斯，这样一来还能发挥银行的影响。但美国政府还是把援助从 1972 年的 1.25 亿美元减至 1979 年的 7200 万美元（此举反应了民意）。^③世界银行秘密统计出在 1973 ~ 1981 年间，它共投资了 26 亿美元用于 61 个项目。^④这么多的资金流入使得马科斯能够调动比国防预算 3 倍还多的资金来进行镇压活动。^⑤镇压措施不仅在国内使用，而且还扩大到了国外，特别是在美国——他们在西雅图暗杀了反马科斯活动家萨尔默·明戈和维阿奈斯将军。^⑥

戒严初期所取得的成效给银行的那些官僚主义者留下了深刻印象。1973 的 GNP 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吸引的外国投资者所带来的 5500 万美元，而农产品出口价格的提高则使得 1972 年还有的 1.2 亿贸易赤字，到了 1973 年则出现了 2.7 亿的贸易盈余。此后 3 年经济都在平稳地发展。然而，在 1977 ~ 1981 年期间，“计划开始以壮丽的方式被分开”。^⑦经济发展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日本、美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单在 1978 年和 1980 年两年，就有 33 项针对菲律宾出口的限制被设立。^⑧

世界银行看到这种趋势并停止向贫困国家推广出口导向发展政策了吗？完全没有。那世界银行有没有向发达国家施压，停止它对菲律宾出口商品设置障碍？当然，也没有。

▣ 这里有 10 亿，那里有 10 亿……

当经济发展一蹶不振时，国家的对外负债却呈直线上升。当生活对于菲律宾的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越来越困难时，马科斯和他的妻子伊梅尔达却大肆挥霍着本应用于项目建设的数十亿资金。他们到底贪污了多少公款并没有精确数字，因为他们藏钱的那个国家有着严格的银行保密法。但为弥补损失而建立的政府委员会所估算的“100 亿美元”被大家广泛接受。



1966年，也就是马科斯刚上台的时候，菲律宾对外负债是10亿美元，到了20年后他下台的时候，这个数目已经变成了280亿美元。^⑤而这些负债最后还是要依靠菲律宾人民来偿还。

马科斯家族用各种可能手段来聚敛财富。他的亲信们分布在国家各个最高级别的部门里。一个特别让人震惊的事情是，巴丹半岛核电站是由马科斯的密友赫米尼欧·狄斯尼掌控的，而狄斯尼只是马科斯一个固定的高尔夫玩伴，他宣称：“他有权以他喜欢的方式做出任何改变。”^⑥这个核电站竟然被错误地建造在一座活火山的底部。马科斯选择了西屋公司（Westinghouse）来建反应堆，即使这样，它的造价还是比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2倍还多。狄斯尼还打着“协助获得合同和执行服务”的幌子，从西屋公司拿了8000万美元，他把其中的95%都给了马科斯。^⑦菲律宾的原子能委员会拒绝颁发许可证，除非这个电厂真正在建造。但最终委员长利夫拉多还是颁发了许可证，并随即移民去了美国。据他后来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如果抵制马科斯时间太长是很危险的。^⑧

伊梅尔达同时还负责大马尼拉地区的发展，这是外国投资最集中的地区。因为她管辖的地区腐败弥漫，她被称为“10%女士”，这是由于她总是从政府的最大合同中拿取一定的份额。作为安置部的部长，她掌管着大批资金，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援助款。^⑨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正当马科斯和伊梅尔达忙于扩充他们的财富时，他们也要确保银行委托的工资打压政策被严格执行。罢工被禁止，劳工领袖被投进监狱，受尽折磨，最后被杀害。但这种镇压是要付出代价的——越来越多的工人站起来反抗，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不用担心会失去什么。^⑩

很多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们也加入到反抗行列。安尼塔是菲律宾大学的毕业生，自从政府实行戒严以来，她的兴趣就从争论转移到直接参与。

“全国民主阵线的人要我建立一个有教会基础的组织，实际上，这是一个新想法——引导中产阶级去帮助大马尼拉地区那些可怜的工人。我们教



授外贸联盟课程，并当罢工变得不合法时组织工厂在某一时刻集体罢工。我们的两位律师懂得什么是合法的。我们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消除戒严的恐怖影响。1975年，我们接触了一个轧棉机生产厂的工人组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工厂工作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得到提升。他们想组织一次罢工。我们试图阻止他们，因为一个联盟单独举行罢工的话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攻击。我们建议他们等到其他联盟一起罢工的时候再行动。但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自己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单独行动。

“于是我们动员了所有我们能接触到的人——神父和修女们、神学院的学生们、男女执事们和整个社会。这家工厂位于通都地区，这里的人们同世界银行做着坚决的斗争，因为世界银行有一个拆掉这里的房子以扩大跨国公司港口的项目。工人们在1975年10月24日举行了罢工。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锁上了工厂大门并拒绝让管理层进入。在第二天晚上，地区长官带着20辆公交车来了，他们把大门砸开，把所有工人都拖了出来并带上了车。作为回应，我们发动所有人站在公交车前面，但汽车最后还是向我们冲了过来，我们不得不把路让开。两个菲律宾修女和一个意大利神父坚决不肯让路，最后被强行拖离了马路。所有人开始大声尖叫，最后公交车停了下来，他们把那两个修女和神父也一并带上了车。

“令我们非常吃惊的是，第二天的《每日快报》上竟然出现了照片，这份报纸是由马科斯的妹夫控制的。这些照片拍的非常搞笑：修女和神父被强行拖到一边，周围的人都在大叫。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过了没几天，人们开始陆陆续续举行罢工，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份。有一天竟然有六起罢工——这些运动甚至已经延烧到我们的办公室里。”^④

像安尼塔、工人联盟、社会团体所采取的行动已经慢慢的扩散到了整个国家。

■ 减轻农村贫困：为了地主们

农村地区同样是极度贫困和世界银行不平等利益的温床。世界银行出



资资助的农村项目是银行宣称的减轻贫困计划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它的真正目标是压制农村的动荡局面。^③大部分项目的利益都不会让穷人们受益，“所以不要和特权阶层作对，这些银行项目早就设计好，会使项目利益落入到特权阶层手中。监督报告和项目后的评估工作反映出很多项目，比如小户树种种植项目和农村信用项目，实际的受益者是大地主、中介机构、大农场主和外国农业公司。”^④按照世界银行自己的农业发展政策文件，“如果认为超过一半的项目利益会落到农民身上，那就太过于乐观了。一般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⑤

绿色革命计划被吹捧为是最能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但是他们只说了一半，“银行对提升小农户生产率的最基本处方的成本是一定程度的喷药、机械的普及和依赖化肥的水稻技术，这导致了很多小农户破产，同时给农用设备制造商、化肥生产商和美国杀虫剂工业带来了一大笔横财。”^⑥在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国家推广机械化政策，是不会给当地人带来好处的。

■ 结构调整和腐败

当经济不断处于衰退之中，而国家也处于混乱状态时，很多世界银行官员都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已经失败了。^⑦与此同时，马科斯在压力之下终于取消了戒严。在9年的专制统治之后，马科斯于1981年1月17日取消了戒严。不过之后他又颁布了几个总统令，以确保大权在握。^⑧

银行也加紧了它的权利控制。6月，它最信任的代言人塞萨尔帕（César Virata）成了菲律宾总理；8月，代表银行的那些技术统治论者控制的内阁也已经到位。^⑨马科斯的顺从也得到了奖赏——一种新型贷款：结构调整贷款。与之前的项目贷款不同，结构调整贷款是一种计划贷款。“它包括通过关税改革对工业结构进行调整，这对外国投资者和出口商来说，就更具吸引力。打造更多出口加工区，这样希望减税的外国公司就能够进来，从而获得菲律宾的廉价劳动力。”^⑩这个贷款实质是“使世界银行对整个经济的监督和控制具体化。”^⑪



一位评论员写道：“世界银行很清楚大部分贷款已经转移到马科斯和他的党羽们的私人银行账户中，但银行认为这是支付给强有力政治支柱的必要贿赂。”^④

尽管马科斯明白银行贷款的目的是使他的国家维持现状，但他也要应对国内的呼声。为了打造实质的重工业基础，马科斯投入了110亿美元构建了一个首都项目，其中包括建造一个钢铁厂、一个石化复合厂和一个警察训练基地。这使得世界银行“发布了严重警告：很多项目‘与政策改革不一致’”。^⑤如果菲律宾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基础，这个国家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就不再是商品集散地了。

最终，“那些明白银行具有否决权的金融预言家们泼的冷水”使这些项目转让出去。^⑥

反对马科斯的人越来越多，尽管这样，“世界银行还是决定继续支持这位独裁者……甚至进一步提高了贷款数目：1983年达到了8亿美元（比前一年的2.51亿美元的2倍还多）”。^⑦

但到了最后，即便是世界银行的支持也不能维持马科斯的统治地位了。1986年2月，来自各个阶层的成千上万人冲向街头来展现“人民群众的力量”。马科斯家族逃到夏威夷避难，而科拉松·阿基诺，即被暗杀的菲律宾反对党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的遗孀，宣誓就任总统。尽管后来一些细节发生变化，但马科斯时代世界银行提倡的自由化和结构调整的基本政策和构造继续在菲律宾实行。

■“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真面目

世界银行利用结构调整贷款想要调整的一个最主要目标就是纺织业。^⑧根据银行自己的估计，大约有10万名纺织工厂里的工人会因效率低而失去他们的工作。^⑨这个数字是整个纺织业工人总数的46%。^⑩

对于那些足够幸运保住自己工作的人来说，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埃尔韦拉这样描述：

“工作任务变少了，而我们的联盟也不能要求加薪或者其他福利。公司



老板告诉我们，很多原来的客户把生意转向了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当工厂不得不关门时，很难再去找一份工作。而那些可以找得到的工作大都是一些转包商提供的一天干 12 个或 16 个小时，报酬非常少，而且是计件工资的工作。在我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之前，我曾经为 3 个这样的转包商干过活。我支持年轻的同胞们都去学习，现在的工作待遇好了一些，但物价也随之上涨了。

“我曾经深受我们主管的喜爱，也曾被公司高层谈起过，这仅仅是因为我的工作质量超过了他们的标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没什么用。这个标准意味着你同意生产一件衣服一毛钱，你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工作，你也从不要什么额外福利，忍着不去厕所，在间歇时间里吃饭，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要完成配额。我甚至在患流感时还工作，所以我的工资从来没有被扣过。

“工作车间又热又脏。老板们说：‘如果你不喜欢让你做的事，你随时可以离开，外面有的是找不着工作的人。’按件计酬的工人们每周只能得到 500~1000 比索。1 公斤鱼就要 150 比索，1 公斤西红柿是 80 比索，而番木瓜则需要 25 比索。即便是我想支持菲律宾当地的生产者，我也有心无力。其他国家的物价要低一些。但如果你没什么钱，那你就不要整天想着当地农民和当地经济的影响。”^④

另一位工人麦瑞韦科的经历和埃尔韦拉有相像之处。她是一个寡妇。当她还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去世了。虽然她要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但她还是花了很多时间用于加固她的社团和她的联盟。她向会员们阐述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全球行为守则被跨国公司过分的夸大了：

“行为守则被张贴在董事会却从不遵守。而当总公司派人来检查守则条例是否实施时，公司的管理层会要求工人们注意自己的言行。监督者告诉工人们：‘如果你被问到你的工资是多少，你就告诉他们工资很高。’工人们被迫说谎，而且如果你不配合他们的话，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惩罚你，直到你肯乖乖听话为止。我所了解到的大部分工人的工资都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我们其实都是缝纫方面的专家，但公司管理层却按学徒工的身份给我们分类，这样他们就能以比最低标准还要低的工资打发我们。对于



纺织业的工人们来说，公司全球化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它带来了更大的贫困，用更多的合同工取代了那些正式的长期工人，并且还威胁到了工会地位。这与政府对待那些纺织业的老板们大大不同，他们反而获得了支持。”⁴⁹

就像埃尔韦拉和麦瑞韦科讲述的那样，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失业团体。而就因为如此，工会的作用大大降低。很多人陷于绝望之中，对于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和恶劣的环境也能够忍受。虽然罢工不再是非法的，但必须提前几个星期就向有关部门申请。⁵⁰

这个最低的工资仍是世界银行自由化政策核心理论——出口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

■ 13 美元 VS 15000 美元：同一级别？

对于在乡下种植花生的农民来说，细节虽然不同，但斗争是一样的。里扎是森稠萨卡（Centro Saka）的小型农场和农产品贸易中心的项目协调员。这个中心与一些小农户合作，并且关注农业政策和农产品贸易，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都对他们有影响。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在 GATT 上签了字。世界银行是 GATT 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也导致了自由化的泛滥。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里，人们反对条约的行为都很激烈。WTO 就是经过行政武装的 GATT。里扎描述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现状：

“当你和一些小农户交谈时，你就会感觉他们的生活状况变得更加艰难。当我们加入了 GATT 后，大多数的政府官员和 WTO 官员们都说将来一切会好起来的，因为我们将打开或扩大出口市场，这将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他们根据预测得出了实际的数字：‘我们每年将有 50 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以前，我们有一个农业贸易平衡。但是 10 年以后，我们的进口远远超过了出口。很多国家的市场都不对我们开放。

“农业安全网络调整调查发现大多数的支援服务，比如灌溉设备，都和马科斯时代的一样。路易斯·洛伦佐部长说一个典型的菲律宾农民每年只



能得到 13 美元的补贴，而美国和欧盟的农民则能得到 15000 ~ 20000 美元。面对如此大的劣势，我们的农民怎么去竞争？有限的公共投资和我们的市场开放使得我们的小农户们必须联合起来。”^⑤

WTO 是个“矛盾体”，这是聚焦南半球（Focus on the Gobar South）的执行理事沃尔登·贝洛的说法。“WTO 是这样一个组织，一方面它通过消除贸易配额和较低的关税来推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它的很多中心协议，如那些关于农业、知识产权和投资方式等的协议，实际上并没有自由贸易导向。它大谈自由贸易，却对北半球国家的公司补贴和垄断进行保护。自从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对本国公司的保护更加具有侵略性。布什政府一直奉行双边政策——对美国实行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就要推行自由贸易。”^⑥

▣ 牺牲的国家工业

当地工业也成了自由化的牺牲品。乔伊·查维斯解释道：“在自由化和缺乏政府支持的工业中，我们常常提到的是钢铁工业。当大量进口时，政府就放弃了工业支持计划，而且工业基础设施也不怎么好。这不仅是为了出口工业，也是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钢铁工业已经名存实亡了，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有一定的工业野心，但缺少了钢铁工业则是一个重大缺陷。其他一些工业如化工、玻璃制造和自动装配都处于垂死状态。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自动装配工业，在大马尼拉地区还曾经存在过一个非常繁荣的制鞋业。”^⑦

纺织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还有大约 200 家公司，但到了 2003 年还剩下不到 10 家。^⑧

国内食品业也同样受到了自由化的冲击。海伦和吉米有一家小型罐头加工厂，马安纳萨公司，售卖新鲜的罐装小玉米和芦笋。他们从距离马尼拉较远的地方进货，然后分类包装，再运到各个销售点。因为汽油和化肥都涨价了，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再按照原来的价钱出售他们的商品。而当他们涨价时，原来购买他们产品的顾客都不再光顾。此外，他们也竞争不过



来自中国台湾的产品，因为它们都是免税的。随后他们在隔壁开了一家五金器材店，尽管这个商店经营得相当不错，但他们还是买不起房子和汽车。最后他们卖了这家商店，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移民去了新西兰。因为他们觉得在菲律宾永远也过不上富裕生活。^⑤

银行推行的自由化的另一个受害者是橡胶工业。

弗雷迪·里奥的家族生意就是做橡胶。他从小在菲律宾长大，1969年，在他拿到了沃顿的MBA学位后回到了菲律宾。随后他开始在他们家族的公司上班并最后接管了整个公司。

但是在2003年公司倒闭了。那么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成本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进口材料的成本也提高了，特别是在货币贬值之后。现在，在市场上，便宜的进口轮胎大量涌入，我们的产品直接和那些新品牌轮胎竞争。我们公司主要做轮胎翻新，当那些旧轮胎受到磨损，我们把它们翻新使它们看起来像新的一样。但由于贸易自由化，大量便宜轮胎涌入国内市场，我们正逐渐失去我们的市场份额。而且我们还不能提高价格，即便是早就该提价。即使没有这些进口轮胎，这里的市场竞争也很激烈。这里有很多的轮胎翻新公司——几家大公司和很多的小公司。特别是在1995~1996年间，我们加入WTO之后，橡胶工业开始面临真正的问题。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货币进一步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也随之上涨。起初我们认为贬值有利于我们，因为进口轮胎的价格会上涨，但我们的想法落空了。进口轮胎仍然维持在低价，反倒是我们的成本提高了。这些年来，我们的经营累计亏损，最后不得不关闭公司。实际上，整个工业都很失败，很多轮胎翻新公司都关掉了店铺。这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我们的工业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如果你要生产一种新品牌的轮胎，那要比从事翻新使用更多的石油。被丢弃的轮胎变少了，整个大环境影响了我们的工业。

“解雇和你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雇员是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一共雇用了205名员工。但不断地解雇就是菲律宾整个工业正在发生的事。WTO掏空了整个国家的生产性企业，这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们很不利。每个人都



想离开这个国家，我们进口商品却出口劳动力。这些政策必须转变过来，任何明智的国家，任何有智慧的国家，都应该投入到产品生产中去。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正在做的事。我们应该重新考虑WTO的全球化计划。如果那些穷国不能从这些政策中受益，那么WTO的官员们应该考虑集体辞职。他们应该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以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受益。”^⑤

弗雷迪现在在做什么？

“我和几个朋友准备成立一家公司为海外外籍工人们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在菲律宾投资。”^⑥

路途遥远

弗雷迪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就像沃尔登·贝洛说的那样：“10个菲律宾人里面至少有1个人出国找工作，他们在欧洲和中东与在国内一样。他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去做海员，国内有800万个家庭靠这些人把钱寄回来维持生计。经济压力和出国工作的可能性的双重影响，使得菲律宾的政治斗争滋生了沮丧情绪，很多人宁愿选择离开这个国家，也不愿意留下来为了争取更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而斗争。”^⑦费勒米诺·斯达·阿纳三世是经济改革行动的协调员，她补充道：“所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好的工作很难找到，所以人们就只好选择出国。这会造成很多损失，不仅使我们国家失去了很多技术工人，而且还造成了家庭的破裂。”^⑧

“袖珍型的我”

海外工人正处于严重的贫困之中。按照非盈利组织社会气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的调查显示，在2005年的第四季度，有16.7%的菲律宾家庭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而自测的比例则达到了57%。自从2004年年初以来，这个比例一直在46%~58%之间浮动。^⑨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人类发展指数和非洲的撒哈拉地区几乎是一样的。^⑩菲律宾的研究杂志中心发现了一种新的“袖珍型的我”的现象。“宝洁公司的经理乔纳森解释道：‘包装瘦身，是为了回应消费者的应对行为。’随着菲律宾人的可支配收入几乎每



周都在萎缩，100 克或 200 克装的罐头食品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数量，^⑥穷人们只能买得起少量的食品。”

为什么菲律宾政府不把更多的钱用于缓解贫困或是支持自己的工业发展？这个国家的钱只为外国负债服务。在马科斯于 1986 年下台之后，科拉松·阿基诺总统放弃了就不合理的负债进行重新谈判的机会，相反，她还向美国议会保证：“我们会还清所有债务。”

▣ 90%意味着“适度的负债”？

债务大赦组织南方分部（Jubilee South）是解决债务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国际协调员莉达·纳皮尔致力于帮助普通人民群众，她明白经济政策对他们有怎样的影响，并鼓励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斗争。她热情的承诺可以用实例来证明：她的丈夫，也是一名活动家，在 1987 年被军方暗杀，当时他们的女儿只有 6 个月大。

“如果用税收收入来偿还债务的话，要用所有税收收入的 80% ~ 90%，只剩下 10% ~ 20%。政府预算其余的部分就要通过向国内银行和跨国机构贷款来完成。现在菲律宾还在偿还一些马科斯时代的贷款，包括为建造巴士拉核电站所贷的款。菲律宾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贷款债务减免。在 2005 年 9 月举行的世界银行年会上，银行同意免除 18 个国家的债务，这些国家都是债务沉重的贫穷国家，在银行的计划下实行结构调整政策（自由化、私有化、反常规）。但银行免除的这些债务对于南方国家的大量债务来说，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债权人说只有极度贫困和举债过度的国家才能获得债务减免。菲律宾被认为‘中等收入，债务适当’——90% 的收入要用于还债竟然被称为‘债务适当’！它们说答案是较好的税收政策。我们不得不增加我们的税收并贷更多的款。我们被认为是可维持的债务人，一个‘可行的市场经济’，因为我们有一部法律能够自动生成债务——我们的税收收入只有 10% 剩下做其他事情，它们不会关心我们在健康服务和教育上投入多少钱，它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的金钱。



“按照那些债权人和大国际投资者的观点，‘可行的市场经济’的定义就是世界银行所举的范例。这种经济就是贸易和资本账户要全部开放，政府对经济也不要加以管制。这样，当然会转变成私有化。它们希望政府离开那些存在潜在高利润的区域，比如说水能——因为它是重要的日用品，而且没有替代品。”^③

电和水在菲律宾已经私有化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又为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 海啸般的私有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菲律宾大面积的缺少电能，因为大部分的资金都被用于偿还债务，根本就没有资金用于能源的基础建设。南半球焦点的乔伊·查维斯研究了这个问题：

“世界银行推出的能源部分的改革极具侵略性。菲律宾政府和独立的能源生产商签订了合约，包括安然公司。这实际上已经是私有化能源了，就因为国有的全国能源公司不再投资兴建新的发电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每千瓦小时的电要用 1.83 比索，到了 2004 年，这个数变成了 5.58 比索。水在大马尼拉地区也已经私有化了，与此同时它还把目标瞄向了其他地区。私有自来水公司的比例比私有化之前的水平高出了 4 倍。在很多地区服务质量都有所下降，因为私有公司都不在往服务方面投入资金。水和电被认为是第二波的私有化。

“而第一波的私有化是政府拥有和控制的公司。其中包括石油公司（从事炼油买卖，是国内业绩最好的公司之一）、国家钢铁公司、菲律宾国家银行、菲律宾航空、菲律宾造船设计公司、菲律宾联合熔炼公司。很多采矿、水泥和制糖公司也被私有化了。公私混合经营的健康、教育和保险基金是下一波私有化的对象。”^④

■ 一切只是空谈

尽管菲律宾现在没有被列入正式的世界银行或 IMF 计划，但它仍然实



行同样的经济政策。小型农场和农产品贸易中心的里扎解释道：

“有很多压力迫使菲律宾自由化。首先是 GATT，然后世界银行通过研究表示自由化是国家必须要适应的经济管理模式的一部分。最后，我们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是在西方大学受的教育，那里新自由主义盛行。他们信奉的思想就是，当你实行自由化时，生产者就会变得更加有效率，而消费者的价格就下降了。但实际上消费者价格并没有降低。菲律宾的生产者没有了工作，我们的生产基础被进口所侵蚀。一切只是空谈。”^⑥

债务大赦组织南方分部的莉达·纳皮尔阐述了下面的动态：

“对贷款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关系，这样它们就能推动其他政策，它们就能赚取比从债务上获得的更多的利润。这不仅仅是我们支付的利息，还有从我们因为欠债而被迫实施的政策上赚取的利润。单单削减关税这一项政策我们就损失了多少？自从 1995 年以来，已经超过了 1000 亿比索。最后我们要问，到底是谁欠谁的？你们从我们身上赚取了那么多的利益——这就是殖民化的整个历史。”^⑦

现在世界银行不再把结构调整贷款强加在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这种贷款名声并不好，因为很明显，它并不能真正帮助那些国家脱离贫困。它是要放弃这个糟糕的错误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它再次启动了“减轻贫困政策计划”，这次它只是把“好的治理”、“社会影响的应对”等新名词加了进去，但实质上是一样的。^⑧不仅仅只有非政府组织的人民党党员相信银行的政策制定出来绝不是为了减轻大众的贫困。美国的财政部在内部报告中也指出“美国参加多国发展银行”，把世界银行定义为“一个由美国牢牢控制的机构，不仅要坚定地推行美国的经济目标，还要推行短期的政治目标。”^⑨

■ 希望在前方

对于菲律宾来说，是否还有希望获得自我决定的更好方式，还能不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国家工业的支持？乔伊·查维斯发现人们变得“更加主动，为了实现目标而做更充分的准备，



已经准备好了行动并要求获得政府的更多支持。他们有了更多的社会组织
和联合行动。”^⑧

公民行动党是一个新的更加积极的政党，在国会中有3个席位，并且在菲律宾79个省中的64个省扎下了根。它在社会运动中产生，而且它的
领导人都比较年轻（都30多岁）。它是一种新的政治组织，以计划为基础，
而不是个人主义。^⑩

莉达·纳皮尔为南美发生的一切而感到振奋：“那里出现了一批进步的
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古巴、智利。我们
不能仅仅改变一项政策，我们必须一起改革。这是一个全球化问题，那我们
就应该用全球化的方法来解决。”^⑪

那么这种美丽的新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纺织工人埃尔韦拉有这样的
梦想：“一个提供人们基本需要的社会，那里有充足的食物、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房子，所有的孩子都能去学校接受教育，医院对每个人开放，每个人
都有工作——这种工作能够帮助人们实现更美好的愿景。”^⑫

【注释】

①沃尔登·贝洛，戴维·肯奈，伊莱恩·埃林森，《发展崩溃——世界银行在菲律宾》
（旧金山：食品和发展政策研究所），1982，第22页。

②同上，第59页。

③道格·亨伍德，经济学家和《左翼商业观察员》（*Left Business Observer*）的创始人，
2006年1月21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以下将称为“亨伍德访谈”。

④同上。

⑤同上。

⑥贝洛等，《发展崩溃》，第140～141页。

⑦“马尼拉出口地区引诱商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80
年9月18日。

⑧贝洛等，《发展崩溃》，第146页。

⑨同上，第143页。

⑩菲律宾人权法庭，“一个工人的证词”，《菲律宾：镇压与反抗》（伦敦：KSP，1981），
第89～90页。



⑪玛连法莫，菲律宾活动组织者，2006年2月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

⑫贝洛等，《发展崩溃》，第142页。

⑬同上，第143页。

⑭费勒米诺·斯达·阿纳三世，协调人，参与经济改革行动，2006年1月20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以下将称为“斯达·阿纳访谈”。

⑮《菲律宾：国内外资源发展》（华盛顿：世界银行），1979，第12页。

⑯贝洛等，《发展崩溃》，第20页。

⑰引自萨姆·巴亚尼，“菲律宾发生了什么”，《远东经济报道》（*Far Eastern Economic*），1976年11月。

⑱萨维瑞拉·里维拉和沃尔登·贝洛，“4年后的反援助运动”，《抑制物流》（华盛顿：菲律宾人民之友 [Friends of the Philippine People]，1972），第4页。

⑲贝洛等，《发展崩溃》，第21页。

⑳世界银行1976、1979、1980、1981年的机密统计。

㉑贝洛等，《发展崩溃》，第37页。

㉒宗·苏·汗，苏·真，罗·丘，罗伯特·希曼布库瑞，大卫·诺卡马，“无名英雄”，《Colorline》4，no.3（2001年秋）。

㉓同上，第43页。

㉔同上，第48~49页。

㉕www.probeinternational.org/probeint/OdiousDebts/OdiousDebts/chaper13.html。

㉖同上。

㉗同上。

㉘同上。

㉙同上。

㉚贝洛等，《发展崩溃》，第54页。

㉛安尼塔，菲律宾组织者，2006年2月18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

㉜贝洛等，《发展崩溃》，第15页。

㉝同上，第45页。

㉞《农村发展：部门工作文件》（华盛顿：世界银行，1975），第40页。

㉟贝洛，《发展崩溃》，第45页。

㊱同上，第92页。

㊲同上，第183页。

㊳同上。



⑳同上,第59~60页。

㉑同上,第166页。

㉒埃里克·杜桑,“世界银行和菲律宾”,www.cadtm.org/article.php3?idarticle=1732,
以下称为杜桑。

㉓“工作层面决议CPP(国家计划文件)”,布鲁斯·琼斯备忘录,华盛顿,1980年8月29日,第7页。

㉔贝洛等,《发展崩溃》,第61页。

㉕杜桑。

㉖《菲律宾工业发展政策和方针》,报告,no.2513-PH(华盛顿:世界银行,1979年10月29日),第31页。

㉗《IBRD主席关于菲律宾结构调整贷款的报告和建议》,报告,no.2872-PH(华盛顿:世界银行,1980年8月21日),第31页。

㉘贝洛等,《发展崩溃》,第170页。

㉙埃尔韦拉,菲律宾贸易联盟组织者,2006年2月12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以下称为“埃尔韦拉访谈”。

㉚麦瑞韦科,菲律宾贸易联盟组织者,2006年2月12日艾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

㉛斯达·阿纳访谈。

㉜里扎,森稠萨科的小型农场和农产品贸易中心的项目协调员,2006年2月5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以下称为“里扎访谈”。

㉝沃尔登·贝洛,聚焦南半球的执行理事,2006年1月22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以下称为“贝洛访谈”。

㉞乔伊·查维斯,资深协理,聚焦南半球和菲律宾计划的协调员,2006年2月5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以下称为“查维斯访谈”。

㉟《停下的非工业化——重新校准菲律宾关税》(马尼拉:公平贸易联盟[Fair Trade Alliance],2003),16页。

㊱Madge Kho家庭,2006年1月30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

㊲弗雷迪·里奥,商人,2006年2月12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

㊳同上。

㊴贝洛访谈。

㊵斯达·阿纳访谈。

㊶社会气象站调查(Social Weather Station Survey),2005年第四季度。

㊷斯达·阿纳访谈。



⑫Avigail Olarte 和 Yvonne Chua, “袖珍型的我”, 菲律宾研究杂志中心 (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2005 年 1 月至 3 月, www.pcij.org/li-report/1/mini-size.html。

⑬莉达·纳皮尔, 债务大赦组织南方分部的国际协调员, 2006 年 2 月 17 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 以下称为“纳皮尔访谈”。

⑭查维斯访谈。

⑮里扎访谈。

⑯纳皮尔访谈。

⑰贝洛访谈。

⑱贝洛等,《发展崩溃》,第 198 页。

⑲查维斯访谈。

⑳乔伊·罗卡莫拉, 公民行动党的共同发起人, 2006 年 1 月 29 日埃伦·奥古斯丁的采访稿。

㉑纳皮尔访谈。

㉒埃尔韦拉访谈。

悄悄地，那些资助军售、建造核电厂和造成环境污染项目的出口信用机构已成为这场杀手游戏中最肮脏、也最具实力的玩家。

第10章 出口 灾难

布鲁斯·里奇

想象如下场景：工业化国家决定成立残忍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扩张本国经济。这些机构的行动绝对保密，不仅为这些行动买单的公众不知道，就连国家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也都蒙在鼓里。这些机构的任务是帮助本国公司更容易地向贫穷国家出售商品和服务，以增加这些公司的财富，却不考虑这样做对环境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

它们无视国际环境条例。在过去 15 年间，联合国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它们却对此熟视无睹。它们资助核电站、大宗武器购买和捕获白象的计划，而这些项目是没有哪家私人银行或国际发展机构愿意碰的。因它们的资助，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民被迫离开家乡，流离失所。它们为发展中国家资助的一半的新建基础工业，都是能源密集型的、通常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而它们完全不考虑这样做对气候的影响。而且，为方便做事，它们每年拿出数十亿美元贿赂贫穷国家的官员和商人，削弱这些国家的民主，阻止它们的发展。

不幸的是，上述场景并不是想象，而是对典型出口信用机构（ECA）的准确描述。出口信用机构是政府资助或政府提供担保的金融机构，由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和最活跃的新兴经济国家如巴西等，参与运行。作为一个



整体，出口信用机构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每年通过出口信用机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要多于全球发展所有的双边和多边援助之和，包括来自联合国机构和世界银行的援助。但它们不是对外援助机构，而是被设计为国内救援机构。它们通过提供直接贷款和为私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帮助贫穷国家购买第一世界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来实现促进本国跨国公司在海外销售的使命。

■ 出口信用机构的运行

在某个发展中国家建大坝，比如说，孟加拉国，也许涉及出售涡轮和工程维修服务，这是一份典型的出口信用机构交易。由美国进出口银行（该银行由美国纳税人供养）提供给孟加拉国政府一笔贷款，再由孟加拉国政府向一家美国企业购买涡轮和工程维修服务。如果不出问题，美国公司将从这笔交易中牟取暴利，而贷款由孟加拉国人民偿还，美国纳税人补贴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项目出了问题，孟加拉国政府拒绝支付贷款，或想重新商谈该笔贷款的条件时，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对孟加拉国施加压力，迫使其按原定条款进行偿付。这类交易多如牛毛，细节也千变万化，但其基本机制却相当简单。作为全球最大的企业福利的提供者，出口信用机构受到攻击，并非没有原因。

私人银行不愿贷款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对环境和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的项目，除非第一世界的纳税人通过出口信用机构承担金融风险。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最近 10 年的初期，出口信用机构对世界 70 个最贫穷国家的贷款占了其资本市场的 80%。1997 ~ 2002 年间，每次私人国际商业银行贷给这些国家超过 2000 万美元时，都有工业化国家政府出口信用机构提供的担保。^①

双边发展机构和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银行在审查贷款项目时，通常选择对环境和社会危害最小的项目。^②与它们不同，出口信用机构直到最近还在坚定地宣称，它们不关心这些事。它们常常无视国际环境条约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毫不夸张地说，出口信用机构就是无赖机构。与它们相比，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世界贸易组织看起来倒都像是仁慈和负责责任的模范。

全体出口信用机构现在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金融机构。2004 年，它们共贷款、担保、承保了价值 7880 亿美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其中，长期贷款占到约 760 亿美元。大约 70% ~ 80% 的长期贷款是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大量的项目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较为严重的项目有：大坝、火电站和核电厂、采矿、在人口浓密区修路、石油管道、化学和其他工业设施、伐木和种植企业。20 世纪 90 年代末，印度尼西亚 24% 的贷款来自于出口信用机构，约 280 亿美元。这些贷款主要投资于发电厂（建设大型的火力发电厂）和造纸工业（大型造纸厂和伐木场）。^③

越来越多的出口信用机构项目会产生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率问题，这些问题非常严重，使得世界银行都拒绝为这些项目提供贷款。事实上，出口信用机构所资助的项目中，许多是国际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着想而拒绝提供贷款的。自由贸易的拥护者鼓吹全球化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佳路径。然而，与之相反，出口信用机构的唯一目的只是补贴出口，促进本国的经济福利。

过去 20 年间，出口信用机构筹措的资金翻了两番还多。而同期工业化国家的援助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几乎没有增长。过去 5 年中，富裕国家政府和国际公共机构提供的对外援助平均每年大约 650 亿美元，这正与同期出口信用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大型项目的贷款数相当。21 世纪初，向出口信用机构的借款占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官方债务（政府和政府支持的机构）的 40%，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之和。尼日利亚、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几个动荡中的转轨经济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超过一半的债务是向出口信用机构借的。^④过去 20 年间，在放出贷款方面，出口信用机构居于主导地位。但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公开市场的胜利，而是“新商业主义”的盛行。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新兴市场，强大而富裕的国家和大型公司的结盟的情景重现，完全不考虑这样做所造成的后果。



根据分析，出口信用机构所资助的项目有着金融和政治风险，公司不会承担这样的项目，私有银行也不会资助这样的项目。但古典经济学并没规定富裕国家的出口信用机构应该为私人部门投资承担风险。相反，这种风险承担明显干预了市场运行。结果是，出口信用机构的行为通常导致了不良的经济结果，更严重影响了环境。印尼是个典型例子，其动荡而腐败的政府和亚齐、西巴布亚等地区的内战，加剧了上述后果的影响。面对印尼内战动荡不安的局面和风险，过去 10 年中，有一半的出口信用机构伙同跨国公司一起贿赂前总统苏哈托的子女和亲信，成功为印尼纸浆生产等核心部门提供贷款，建设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纸浆生产的扩大加剧了对雨林和保护区域的大面积非法破坏，而工厂的糟糕管理又造成了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信用机构在上述行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摧毁印尼环境，扭曲其经济发展以及减缓民主改革的政治压力。

尽管成本由穷国人民来承担，这些项目对穷国的意义也不过像一个下流而巨大的政治玩笑。富裕国家之间庄严地签订环境公约，通过由纳税人买单的双边援助机构和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等多边机构，把自己装扮成政治上的积极形象。但是它们的出口信用机构不仅忽视这些政策和目标，事实上根本是在处处违反它们。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市场和加强管理的透明度，相反，它们的出口信用机构却偷偷摸摸地在国内实行贸易补贴。出口信用机构最重要的交易是被排除在 WTO 的要求之外的，它们借口商业机密使自己处在灰色区域中，它们中的大部分甚至拒绝公布“正在做什么”这样最基本的信息。

除了出口信用机构之外，许多国家还有公共投资保险机构，为本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提供政治和金融风险投保。这些机构包括：美国私人海外投资公司，日本的国际贸易和工业投资保险部门（传奇的 MITI）。在一些国家，出口贷款和担保以及投资保险这几种功能集中在同一个机构。

最早的出口信用机构可能是英国出口信贷担保部门，它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促进英国的出口。美国进出口银行成立于 1934 年。大部分其他的机构，像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法国科法斯集团（COFACE）、德国赫美斯（Hermes Guarantee）、意大利外贸保险服务公司（SACE）和日



本进出口银行（现在是日本国际合作银行的一部分）等，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每个机构都是贷款、借款担保和偶有的风险保险这三种职能的独特组合。一些最大的出口信用机构，如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出口信用机构，近些年批准的新贷款和提供的担保平均每年有 150 亿 ~ 200 亿美元。

▣ 档案：社会分裂、环境危害和腐败

在出口信用机构近些年忽略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档案中，它们通过大规模补贴腐败、军售、危害环境和社会的工程，所导致的全球政治不稳定引人注目。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全球首脑会议上，多数国家通过了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诺实行可持续发展。但出口信用机构的行为正逐渐危害出口国家的承诺。例如，出口信用机构和国家投资保险机构大规模地支持矿物燃料发电站的建设，而不考虑这样做对气候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能源密集型部门的新贸易和项目，中，约有一半是由出口信用机构资助的，也正是由于出口信用机构的资助才会建设的。^⑤

出口信用机构的贷款和担保扭曲了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和风险分担，推动了一些国家危害环境工业的大量扩张。例如，出口信用机构通过补贴核反应堆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来确保了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美国核电建设行业的正常运行。相反，就连世界银行也由于纯粹经济原因而拒绝贷款给核电项目，那实在是一个愚蠢的投资。

印尼纸浆和造纸工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和经济问题，上文已经提过，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电力行业。20 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日本和瑞典的出口信用机构贷款 40 多亿美元，在苏门答腊岛建了 3 个巨大的纸浆厂。根据博果尔和印尼国际林学研究中心的报道，上述工程的结果是相对于国际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向工厂提供木材原料的沉重压力。由于没能培育出人工林，以满足工厂的需要，意味着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木材供给来自于对天然林的非法砍伐，而这片林地是世界上物种极



为多样的保护区。纸浆生产能力的增加将降低产品价格，价格的降低又促使人们更多地砍伐木材，这是不能持续的。^⑥

上述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建在河边的制造厂向河中倾倒废水，造成附近成千上万的居民中毒。这些行为在富裕国家是非法的。在苏门答腊岛，大部分偏远村落的唯一用水来源是河流。河下游村庄的小孩们在河中洗澡，全身溃烂结疤，疼痛难当。当地居民世代居住的土地被毫无补偿地夺走，以用来建设工厂和人造林。

至于发电厂的例子，爪哇第一代和第二代 Paiton 电厂共投资 37 亿美元，主要是德国、日本和美国出口信用机构提供的贷款和担保。它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告诉人们出口信用机构是如何补贴私人收益和助长腐败的。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它们借助政府力量单方面实施交易。在这个事例中，它们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贿赂来达到目的的。就连世界银行也不愿资助电力项目，在它的可行性分析中提到：当地电力需求不足；Paiton 和它们的西方投资者达成协议，向印尼国家电力局索要高昂电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Paiton 公司的电价，在按当地购买力调整后，仍比邻国菲律宾高出 60%，更是美国消费者所支付电价的 20 倍。^⑦Paiton 电厂和电力购买协议的谈判进程是在前苏哈托政权的裙带资本主义的腐败体制下进行的，没有竞争性的竞标过程。所有的腐败行为中，包括无偿赠与苏哈托裙带集团 Paiton 公司的 15% 股份以及给苏哈托某个女儿 0.75% 的股份。这些股票份额表明了惊人的贿赂数额，但这些贿赂是由出口信用机构支持的投资者提供的贷款支付的，而这些贷款由项目的利润来偿还。电厂的燃煤供应商也是在没有竞争性投标的情况下，指定给苏哈托裙带集团拥有的一家公司，而且他们还可以得到 15% 的资产收益。因此，煤的成本比世界市场价格高了 30% ~ 40% 也就毫不奇怪了。^⑧

1998 年，苏哈托政权被推翻，印尼新政府请加拿大的审计员对派顿公司进行独立的财务审查，结论是项目成本高出正常成本 72%。新政府指出电力购买协议是通过向苏哈托家族提供高额贿赂而达成的，是腐败的、非竞争性的交易，因此希望就此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原协议要求印尼政府以每千瓦时 8.6 美分的价格支付电费 30 年，而印尼消费者只能承担每千瓦时



2 美分的价格。美国、德国、瑞士和日本出口信用机构的代表们奔赴雅加达，劝说挣扎中的印尼新政府不要食言，擅改协议。若不然，则各家出口信用机构背后的 G7 政府将宣布印尼为国际债务贱民，并限制其从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新的借款渠道。印尼政府屈服了，做出让步，一份出口信用机构和西方投资者更能接受的协议达成了。^⑨

采矿业是出口信用机构忽略其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又一个关键行业，这里最活跃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出口信用机构，因为采矿业是这两个国家的重要出口行业。1995 年在圭亚那发生的案例，可视为其中的一件较为臭名昭著的案例。由加拿大出口信用机构资助建设的巨大的奥迈（Omai）金矿中，发生了尾矿坝爆炸事件。约 10 万加仑含有氰化物的废物溢出，流入圭亚那最重要的河流。其后果是：数不清的鱼被毒死，人们的生活陷于危险之中，该国首都的饮用水供给面临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责该项目缺乏环境监控措施，而且诉讼事件至今不绝。

澳大利亚出口信用机构，即出口金融和投资公司（EFIC），资助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采矿业务，这些业务对环境和社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EFIC 提供了 2.438 亿美元，支持由澳大利亚采矿业巨人 BHP 牵头的国际财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飞河的支流澳柯泰地河附近，建设巨大的铜金矿。美国和日本进出口银行也资助了这个项目，只是贷款额较小。在过去的 45 年来，这个矿造成了一起全球最严重的环境灾难。1984 年堵住残渣的大坝倒塌之后，BHP 每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飞河和澳柯泰地河中倾倒 3000 万吨的有毒矿渣和 4000 万吨的废弃岩石，使这两条河几乎生物学死亡，严重破坏了河流下游 120 个村庄 5 万人口的生计。2000 年，世界银行提出必须立即关闭澳柯泰地矿，但是 BHP 已经将其资产转入一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府实体中。BHP 支付赔款了结了一场由受害村民提起的诉讼，同时获得了对将来受害索赔的法律豁免。^⑩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 EFIC 担保，私人银行提供了 2.5 亿美元贷款给矿业巨人里奥廷托锌公司（RTZ），加拿大 EDC 也担保了 2960 万美元作为补充，资助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该矿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海岸旁的里尔岛上。该矿每年向海里倾倒 1.1 亿立方米的受氰化物污染的废物



以及 2000 万吨的废矿石，产生了几英里长的海底有毒废物带。所有这些都明显违反了禁止在海里处理有毒废物的《伦敦倾倒公约》。这个项目的影
响如此恶劣，以致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出于环境考虑拒绝为其提供资助，
虽然该公司在环境方面名声也不怎么样。^①

也许 EFIC 所有交易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 20 世纪 80 年代，担保 8000
万美元给臭名远播的里奥廷托锌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的布干维尔岛
上建潘古纳铜矿。该矿污染了岛屿周围主要的河流和海湾，摧毁了数万居
民的土地、森林和渔业资源。岛上大部分居民丧失了生存手段，由此引发
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并直接导致了内战爆发，致使 1.5 万人死亡。^②

根据其出口策略，欧洲主要出口信用机构的下一步行动自然是广泛参
与到武器出口之中了。出口信用机构的武器出口行为，已成为欧洲教会和
人权组织的攻击对象。这些机构目睹了本国政府每年挥霍数亿美元，去补
贴武器出口，并导致国际悲剧。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出口信用机构预算的约
30% 和法国出口信用机构担保的出口信贷的三分之一，都用于补贴武器出
口。1999 年，印尼军方向英国出口信用机构担保借贷购买英国高空战斗
机，并在对东帝汶的战争中使用，引起了国会的强烈抗议。而印尼政府购
买战斗机时，曾允诺不将其用于国内镇压。当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
时，印尼拖欠了用于购买战斗机的 2500 万美元贷款，英国私人银行则要求
出口信用机构立即归还贷款。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这家出口信用机构
为支持军售向印尼共提供了 13 亿美元。相比之下，上述 2500 万美元不过
是一小部分罢了。^③

德国的出口信用机构提供了 4.7 亿美元的出口担保，以使印尼政府能
够购买价值 10 亿美元的原民主德国 39 架过时的驳船。因抗议此次购买，
几家报纸被苏哈托政府关闭，许多学生也被关进监狱。尽管印尼公众抗议
这种购买过时技术的浪费行为，这笔交易仍顺利进行，因为当时的科技部
长是时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的私交。科尔还想将东德过时的柴油
潜艇卖给印尼，同时出口信用机构另外担保 3.873 亿美元支持这笔交易，
但最终没能达成。^④

美国进出口银行假惺惺地宣称自己没有资助过军事武器出口，但这仅



只是因为已经有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在专门做这件事罢了。

驳船交易中涉及的腐败只是出口信用机构无视伦理道德的一个小例子。考虑到出口信用机构运作过程缺乏透明度，它们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贪污和其他腐败问题的最大的官方支持者。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出版的工作论文和其他文件表明，主要欧洲出口信用机构在系统保险和担保金融交易的过程中，普遍和贪污受贿联系在一起。透明国际估计腐败金额至少占到许多交易的 10%。经合组织的反贿赂公约于 1999 年初开始实施，但出口信用机构们从未就其涉及的受贿事件加以有效的陈述。^⑤

对社会和环境不负责任的一系列行为中，自然少不了核能问题。核能是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美国最大的出口补贴部门之一。近 20 年内，这些工业化国家没有建设过新的核电站，主要是出于经济和环境方面的考虑。但这些国家的出口信用机构无视这些现象，通过补贴有利的出口交易，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新建和翻新核电站，以养活本国的建造商。

加拿大的出口信用机构于 1997 年资助土耳其两座被提议的反应堆以及 1998 年额外提供 10 亿美元资助罗马尼亚完成切尔纳沃德核反应堆。这个罗马尼亚的反应堆是由之前的出口信贷资助的，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建造一半就停下了。其建造者部分是强制征召的劳动力，居住在没有暖气的木板房中，分配的食物也很少。

更令人震惊的是，2000 年 4 月，此时德国绿党作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盟的一部分，正处于其权力巅峰。该党领导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支持向某新兴国家将要建设的新核电站提供出口信贷，而绿党的立场在过去 15 年中是反对核电的。很明显，新商业主义践踏了政治和商业原则。

2006 年 3 月，美国总统布什出访印度，打开了对其核出口的大门，宣告了已实施多年的国际核禁运无效。这项行为注定将鼓励美国、法国、加拿大和德国出口信用机构采取更恶劣的行为。

至少在理论上，美国的出口信用机构表现的更关注环境。进出口银行和其姊妹机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被要求对大型项目进行基本的环境评估，包括对当地居民重要影响的评估，以减轻有害影响，如对被迫迁



移的居民加以补偿。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环保组织多年来不断游说的结果。OPIC 的前身是美国国际发展机构，所以还有促进发展的要求。进出口银行受法律约束，需要对敏感性项目实施环境评估，而且也比其他出口信用机构更透明些。但寻找最透明的出口信用机构，就像在妓院中寻找纯情的妓女一样，是不可能的。进出口银行确实在其网站上列出了将要实施的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在其年报中进行环境评估和对交易加以描述。对纳税人资助的机构来说，这点公开性是应该的。但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出口信用机构，直到今天仍未公开关于其已资助项目和交易的评述，这使得很难清楚地评价其行为。

进出口银行和 OPIC 在减轻其投资项目对环境和社会危害方面，其真实的档案却并非如所宣称的那样冠冕堂皇。事实上，德国出口信用机构 Hermes 就曾讽刺道，美国出口信用机构宣称自己的环境和社会评估标准更加严格，但这并没有使其环境和社会的档案比德国出口信用机构的档案更清白、更体面。

OPIC 的档案表明德国人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与进出口银行相比，OPIC 相对影响较小。和其他大多数公共出口投资保险机构不同，OPIC 不仅有不危害环境的指导方针，还积极报道东道国的发展收益。OPIC 的 2002 年年报中有许多花言巧语，陈述 OPIC 如何许诺去促进这些发展利益。然而，2002 财政年度 OPIC 新保险和承诺的贷款中，57% 被用来资助跨国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建设的大型工程。其总承诺的 12 亿美元资金中有 6.85 亿都流向了大型石油项目。2002 年总资金的 30%，共 3.5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庞大的优尼科行动，以开采海上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气，该项目毗邻印尼东加里曼丹省的一个陆上石油和天然气码头。在虔诚的穆斯林区，当地居民和人权主义者发动大规模的非暴力抗议活动，抵制优尼科行动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

那么，OPIC 另外 43% 的承诺贷款又如何呢？以下是 2002 年的几个例子：贷款 1500 万美元给国际钻石区以开采纳米比亚的海上钻石区；16.8 万美元给 B&C 管理公司，用于加纳的沙砾采掘场；25 万美元给李·卡谢尔和他的公司——蒙古度假村，在蒙古建立旅游营地，向旅客提供探险活动；



60 万美元给泰国的水下潜艇旅游项目；434.9 万美元给佐治亚州万豪第比利斯公司和万豪庭院酒店；5600 万美元给埃尔帕索能源（在巴基斯坦建两座燃气电厂，埃尔帕索能源之前曾因加利福尼亚能源贸易崩溃事件中的欺诈行为受到联邦政府的指控）；121.9 万美元用于 Wend - Rey 餐厅连锁的扩张；15 万美元给一家广告公司，用于尼加拉瓜的户外广告宣传。

由于 OPIC 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最强势客户的控制，所以其许多项目都有着明显的环境问题、劳工和人权问题以及腐败事件的发生。2002 年《华盛顿邮报》曾头版报道安然公司古巴到玻利维亚的管道工程，OPIC 于 1999 年批准向该工程提供 2 亿美元贷款。报道称，游说活动和美国的贷款将使该项目建筑在“死亡之路”上，对南美造成严重伤害。邮报文章如下：

和环保组织预测的一样，管道及其支路将对森林造成危害。“入侵者”沿着支路砍伐古老的树木；打猎者捕食野味；牛也非法放牧。一个被遗弃的金矿重开，工人们沿着管道宿营。

但是许多联邦雇员在回顾这个项目时，最感吃惊的是安然公司是如何劝说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承担保护脆弱森林系统的情形下，资助此管道项目的。

前财政部高级环境顾问，现为一家公司咨询师的麦克说：“这个项目本不该完成，上述森林已被世界银行宣布为拉美两处最具价值的森林之一。但 OPIC 却选择忽略该信息，因为他们打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资助这个项目，所以被驱使着导致了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⑩

2001 年 9 月，OPIC 撤销了其对管道的贷款，但是它在管道建设关键阶段时的介入和财政承担，也推进和加速了工程进度。

印度的安然达博伊燃气电厂是另一个例子。OPIC 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一起提供 4.6 亿美元贷款和 2 亿美元的贷款保险，资助了严重危害人权的事业，并助长了腐败。结果，美国人权观察组织要准备一份 166 页的报告，以证明安然公司及其合作者为非法从村民手中夺取土地所采取的殴打、逮捕和其他虐待村民的方式；安然给予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官员的大量贿



略。世界银行又一次拒绝资助这个项目，原因是该项目太大、太费钱和经济上不可行。但主要原因却是州政府向安然公司批准的片面条款。^②

总之，根据政策研究机构的消息，OPIC 在 1992 ~ 2001 年底这段时间内，共为与安然有关的 14 个矿物燃料项目提供了 26 亿贷款和保险。这个数目占了 OPIC 9 年间贷款总额的相当大一部分，约为 15% 强。

■ 阻止出口信用机构进行破坏行为的全球运动

幸运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抗议出口信用机构不负责任行为的全球基层运动正日渐高涨。全球基层运动从一开始就取得了胜利。在 1998 年和 1999 年，当时德国主要的几家公司和银行正从德国出口信用机构 Hermes 那里寻求金融担保，帮助修建印度纳尔马达河的马赫施瓦（Maheshwar）大坝。但德国发展组织、教会和环保机构结成广泛的联盟，成功抵制了它们参与上述项目。如果要修建大坝，那么修建工程将会迫使 61 个村庄 3.5 万名贫困农民迁移，并且对这些移民也不会给予足够的补偿。按说这项工程将被作为整个印度的私人修建大坝的范例，没想到的是自项目之初对腐败和不正当干预的谴责就从未停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管理这个项目的私人企业克朗·库马西，是一家纺织企业，完全没有建筑和管理大型水坝的经验。^③

20 世纪 90 年代末，大坝附近受其影响的当地居民举行大规模示威行动，聚集了约 12000 人，封锁了建筑工地，进行绝食抗争。同时，新德里的德国使馆门前也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大坝的两家最初的德国投资者，巴伐利亚工厂（Bayernwerk）和 VEW 意识到人们会对这个项目的进行广泛反对，并且项目本身的规划不合标准，所以这两家公司决定退出。然而德国出口信用机构 Hermes 却继续参与其中，并表示愿意随时提供政府支持的出口贷款担保。条件是德国裕宝联合银行（Hypovereinsbank）向德国工程和电力方面的跨国公司西门子公司和瑞典 ABB 公司的德国分公司提供贷款，资助这个项目。ABB 觉得德国国内的反对十分激烈，于是通过其在里斯本的机构，向葡萄牙出口信用机构 COSEC 寻求担保，向裕宝联合银行借



款 4600 万欧元。但是由于葡萄牙非政府组织于 2000 年开展的拥护运动，葡萄牙出口信用机构和金融部门于 2001 年拒绝了这项贷款担保，理由是这个项目有着巨大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同时，德国的非政府组织运动提出了对德国国际发展部门批准项目的一份独立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于 2000 年 6 月确认了这个项目将严重侵犯受害人的人权，这是不能接受的。德国和葡萄牙非政府组织运动最终扼杀了出口信用机构资助此项目，3.5 万名贫农的土地被从虎口救了下来。^⑨

马赫施瓦事件表明了全球公民社会阻止出口信用机构资助不可持续项目的潜在力量，也表明了此类运动所面临的困难。在一些经合组织国家设有办公和运营机构的跨国公司可以挑拨离间出口信用机构之间相互争斗。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德国出口信用机构拒绝提供担保，则产生将涡轮生产从德国转到葡萄牙的危险。虽然从计划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赫施瓦工程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但该项目的中止仅仅是因为此次有力且组织良好的调查研究以及印度、德国和葡萄牙国内民间社会团体发起的数十次宣传运动。多数情况下，当地居民、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组织这样一场运动。

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各国相继出现了对出口信用机构项目的强烈抗议。例如，在印尼，愤怒村民的大规模游行唤起了人们对出口信用机构资助纸浆厂污染当地水源的注意。2000 年 5 月，地方和国家的抗议者们结成了全球性的网络，当时来自 46 个国家的 350 个民间组织联合起来，签署了一份运动声明——雅加达宣言。该宣言呼吁对出口信用机构进行深远的制度改革，使它们能够遵从基本的社会、环境和人权规则。^⑩

出口信用机构受本国政府庇护，与外界相对绝缘。通常它们仅向一个机构汇报，主要是贸易、经济或财政部，而政府其他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对其运行就所知不多了。因此它们享有“纳税人支持”的好处，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透明和责任是出口信用机构不考虑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对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一个主要因素。出口信用机构之间的磋商在巴黎经合组织出口信贷集团（ECG）进行，这个地方是国际体系中最晦涩、最不透明的场所之一。经合组织不仅是一个智囊团，还是 26 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谈



判场所，所有这些国家的出口信用机构都出现在上述集团中。当出口信用机构在 ECG 开会时，会议几乎是封闭的，讨论的内容或某个出口信用机构的立场这类信息几乎从未公开过。

出口信用机构竟然连它们之间举行的秘密商谈内容都不让其本国政府知道。举一个发生不久的臭名昭著的案例，2000 年冬，众议院的贸易和工业委员会谴责英国出口信用机构缺乏透明，使公众无从知晓其所提议项目——伊利苏水坝项目的相关信息。伊利苏水坝项目是土耳其一项有争议的项目，该项目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多国出口信用机构的支持。委员会提到，这些出口信用机构秘密地进行有关如何向该项目提供资金的讨论已经将近一年了，英国贸易部却不知道该项目存在。^④

伊利苏水坝项目提供了一个例子，表明出口信用机构有资助构想拙劣的项目的倾向。这些项目没有哪个公共机构愿意见考，也没有哪家私人银行在没有纳税人担保的情况下愿意提供贷款。将大坝建在土耳其东南部底格里斯河上，7.5 万名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的库尔德人被迫迁移。尽管他们进行了抗议，但是没有能够起到什么效果。该项目将淹没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而且该项目违反了世界银行十八项环境和社会政策中的五项。叙利亚政府抗议英国参与这种项目，指出土耳其将拒绝签署关于公平使用像底格里斯河这样的国际河流的联合国公约。然而 1999 年，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瑞士和美国的出口信用机构都开始不同程度地考虑资助这个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没做环境评估，没有居民迁移计划，而且处于军事冲突区域之中，国际压力确实迫使出口信用机构们去考虑最低限度的环境和社会需要。比如，做个移民计划，就河水流动问题咨询下游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意见等。

但是除了上述措施之外，出口信用机构做的其他措施就太少也太迟了。由英国、瑞士和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库尔德人权组织一起做的野外考察，表明这个项目持续存在大量问题。例如，实施移民计划的土耳其公司不过是一家主要组织团体旅行的旅行社，这也说明了它们对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严重性的态度。2002 年，参与其中的一家重要英国工程与建筑公司 Balfour Beatty 退出了这个项目。正是这家公司将许多工程和设备转包给其他



欧洲国家公司的，这些公司从本国出口信用机构得到资助。Balfour Beatty 面临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包括在一次年度会议的表决上，40% 的股东反对公司支持这个项目。主要贷款者瑞士银行、瑞典和意大利的主要承包商相继退出，使伊利苏水坝项目名存实亡。

因此，马赫施瓦运动的成功以及 2002 伊利苏的运动发出了积极信号，展示了国际民间组织是如何开始迫使出口信用机构和它们的客户公司承担责任的。不幸的是，2005 ~ 2006 年间这个项目重新开工，出口信用机构们的借口是它们采纳了通用的环境准则。

■ 改革的第一步？

美国在许多国际环境问题上都是拖后腿的，但在过去 10 年中正是美国带头促使其他工业国家同意最低的环境标准和方针，以约束出口信用机构的行为。这未免有些讽刺意味。

要做到这一步极其困难，会遇到 ECG 内部，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政府的重重阻力。过去 10 年中，德国负责贸易和信贷的政府部门几乎反对任何改革措施，哪怕是一丁点的改革措施，揭露了许多欧洲国家的伪善面目。在公众关注而经济影响较小的方面，政府宣布处在正确的政治立场，比如呼吁增加联合国的发展援助。但是当其主要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出口收益受到威胁时，许多欧洲国家就换了一副面孔，通过限制公众获得信息，而打着公众利益的幌子做事。

美国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建议磋商环境公约，但以德国为首的几个欧洲国家拒绝了这份提议，在 ECG 的闭幕会上，它们强调环境问题和出口信贷是完全不相关的。只有当克林顿总统在 90 年代末和 2000 年的 G8 经济峰会上个人提出这个问题时，德国、法国、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出口信用机构才开始采取行动，商谈最低环境和社会标准，约束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担心会被美国抢先，而失去对这件事的控制。^②

2003 年 12 月，经合组织的出口信用机构最终签订了一份合法、却没有



约束力的协议——环境和出口信贷共同办法。它们自愿对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和投资进行初步的环境评估，而且采用世界银行对这类投资保护环境和社会的十条方针规定中的三条。

即便这样，对那些熟悉大型项目环境评估行为的人来说，这份协议仍然有着奇怪的、明显不合理的空白。例如，德国在其他几个国家的支持下，阻止了引用世界银行第四条保护政策的提议，该协议是用来保护自然栖息地的，即不能支持严重损害当地自然栖息地的项目以及当栖息地发生退化时，应提供资金保护该国同等的生态系统。提供最基本信贷环境评估要素的要求也未能通过，这些要素是透明和将关键环境信息在批准项目前告知受其影响的居民。然而，文件表明出口信用机构试图只公开可得到的影响环境的信息，例如“EIA（环境影响评估）以及总结”，且仅在最终决定支持项目前的30天才公布。此外，出口信用机构还可以引用例外情况，单方面宣布未能获得任何可公开信息。这些例外情况无需公开报道，只需知会经合组织中的其他出口信用机构。毫不奇怪，这种执行力较弱的协议几乎什么也改变不了。

站在充满希望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26个经合组织的出口信用机构都发布了和共同办法一致的评估环境的程序，而且几乎所有的出口信用机构都雇用了环境方面的职员。但是尽管协议的标准已经很低，但仍不能有效执行，原因是缺乏透明和缺乏独立的监控过程。所以，无法保证出口信用机构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比过去真的有所改进。

另一个有希望的发展是G8经济峰会上英国的胜利，成功迫使出口信用机构停止提供出口信贷来帮助最贫穷国家购买武器和其他非生产性物品。但是经合组织的出口信用机构为获取暴利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类资助。

检验2003年环境协议作用的最主要方面是出口信用机构资助的项目是否不再是严重危害人权、违反国际法和基本环境准则的项目。难以置信的是，2005年末，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出口信用机构重新考虑资助土耳其的伊利苏水坝。

这个项目是过去20年中，构思最糟糕、也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一个



跨国建筑集团的领导者，奥地利的 VA Tech 公司，向德国信用保险公司、奥地利 Kortroll 银行和瑞士出口风险担保（ERG），寻求 6.6 亿美元担保、贷款和保险，用于建设这个 14.64 亿美元的项目。^③

VA Tech 公司称，对环境做了充分的评估，183 个村镇 75000 名库尔德人的移民计划也最终得到了落实。但是仍有许多无法挽回的问题未能解决，如军事冲突区域某个少数民族的迁移、对河下游伊拉克和叙利亚水权的危害、淹没了无价的文化和考古遗址。VA Tech 称 100% 咨询了需要迁移的人口，但是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非政府组织对大坝区域的独立观察访问表明，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把每家当家的男人叫到警察局，然后告诉他需要将家搬走。

非政府的环境、发展和人权组织又一次反对这个项目，因为即便按照 2003 经合组织环境和出口信贷共同办法的标准，也根本不应该考虑资助这个项目。

■ 出口信用机构应该存在吗？

出口信用机构日益重要的地位表明了在过去 15 年中，全球竞争的加剧是如何明显地加强了富裕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自私行为的。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如下现象：工业化国家强制削减国内社会福利保障，同时却不断增加对进行国外贸易投资公司的政府补贴，所有这些都是以全球竞争的名义进行的。

出口信用机构的金融地位日益重要，与在过去 15 年中一再鼓吹的全球经济趋势形成鲜明对比，该趋势强调独立的私人部门和自由市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所描述的案例中私人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甚至取代了发展援助。但是，事实上私人部门的资金并不像政府公开宣称的那样“私有”或来自“自由市场”。相当一部分资金，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私人直接投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出口信用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和多国担保机构进行补贴的。而国际金融公司和多国担保机构这两个机构是世界银行的下属私人部门机构，它们正在快速成长，参与上



述补贴的程度尚不深。

本质上，国际舆论的政策问题是出口信用机构是否应该存在。自由市场的拥护者，诸如卡托研究所，认为这些机构造成了市场扭曲。环境和社会的拥护者认为它们破坏了政府对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承诺。但是，正如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几年前所指出的那样，简单取缔它们就相当于赞成取消军队一样，在对出口和市场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没有谁会愿意单方面解除武装。

这些大国政府通过出口信用机构向公司提供了巨额出口补贴，似乎直接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是 WTO 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明显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出口信用机构排除在外，根据经合组织的协议，出口信用机构拥有共同的最低保险费和利率。事实上，不属于经合组织协议成员的国家要加入 WTO，只有接受富裕国家在协议中提出的出口援助条件，否则对它们的出口信贷就会逐步停止。因此，仅仅是对最低金融标准的认同就使得富裕国家的出口信用机构免受 WTO 约束，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者却不得不遵守它们无法参与设定的规则，经合组织的出口信用机构却可以继续它们纳税者补贴的破坏行为。

WTO 豁免现象揭示了富裕的经合组织国家提倡自由市场的伪善：穷国的自由市场，富国的补贴。

出口信用机构是自治的，基本独立于其他国际公共机构，这难免令人担忧。上述状况削弱了一系列国际协议的有效性，这些协议包括：国际环境公约、劳工和人权合约及其他社会协议；而且主要工业化国家实施这些协议的政治意愿也大大受到影响。在出口信用机构进行出口毁灭的过程中，经合组织的表现就像一个功能紊乱的人体。数年来，它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和环境局一直致力于制定出环境评估的最佳做法和程序。但经合组织出口信贷集团却当这些都不存在，其成员出口信用机构做决定时，很少考虑经合组织其他机构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根本没有打算过让它们的出口信用机构承担责任。德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0 年，刚上台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政府在其联盟协议中，保证改革德国出口融资行为，使其沿着对社会、



环境和发展都可可持续的路径前进。但德国出口信贷机构 Hermes 的客户，那些大型跨国公司和它们可以影响的政府机构，施加了巨大压力，有效地阻止了所有改革。2005 年的德国右翼政府就更不愿意去挑战这些阻力了。

同样的情形在多数工业化出口国家都非常常见，但它们通常连改革的要求都没有。此外，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出口国家，如巴西和印度，也是如此。

2006 年，经合组织的出口信用机构回顾并修改了 2003 “共同办法”环境协议和至今未曾实施的 2000 经合组织“贿赂行为声明”。对出口信用机构来说，“贿赂行为声明”更像是不行动的宣言，而不是去遵守该声明。到目前为止，所有迹象表明情况并不乐观。2006 年 2 月，伦敦的《金融时报》揭露了出口信用机构活动的内幕。文章引用泄密的出口信用机构文件指出，德国和日本领导许多国家拒绝了打击贪污腐败的提议。其中一个提议是要求出口信用机构公开其私人部门的客户、向发展中国家的代理人支付的佣金和费用。^①这些代理人是当地的顾问，他们被雇来向人行贿和将从发展中国家政府偷来的钱顺利地转到离岸银行账户中。几家主要的出口信用机构，包括德国和日本，还反对如下要求：出口信用机构用纳税人的钱支持的私营公司，应该披露它们之前是否犯过罪。这些罪过包括是否在其他国家实施贿赂和助长腐败。

过去 15 年中，出口信用机构和它们的公司客户结成了广泛的伙伴关系，通过破坏性的出口行为来补贴贸易。改革姗姗来迟。只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民间社会团体、国会和媒体一起采取行动，唤起公众注意，并对政府施加压力，才能产生实施改革的政治意愿。

这几年，主要经合组织国家和印尼、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正在掀起一场国际性的改革出口信用机构运动，该运动的正当性和重要性正日渐增加。这说明一切还有希望。

【注释】

① 《全球发展金融 2002 年：分析和总结表格》（华盛顿：世界银行，2003），第 108 页。

② 真的，在许多发展机构的华丽言辞和它们的行为之间仍有许多不一致之处，包括它们



陈述的目标,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帮助穷人,而事实是它们在破坏环境。非政府组织对世界银行的批评中,这种差异往往是焦点。但是,就像18世纪法国道德哲学家拉罗什富科所说的,伪善是邪恶支付给美德的礼物。事实上,它常常是制度改革的第一步,而且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现在至少已有了政策,依据这些政策它们不得不为自己行为负责。

③“对伯尔尼协会(Berne Union)成员来说,生意占了21%,达7880亿美元——出口信贷和投资保险机构的记录”(伦敦:伯尔尼协会,2005年10月6日);斯蒂芬妮·弗里德和蒂蒂·森特瑞,《出口信用机构财政在印尼》(华盛顿: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2000年12月),第3页,第10页。

④詹姆斯·汉蒙,克雷森西亚·莫尔,乔恩·佐恩和托马斯·卡波奈尔,《路径分歧——出口信用机构在发展援助上的未来》(华盛顿:世界能源学会[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2005),第13页。

⑤克雷森西亚·莫尔和瑞恰·班达里,《出口信用机构的风气》(华盛顿:世界能源学会,2000年5月),第4页。

⑥克里斯多佛·巴尔,《论文的收益——印尼纸浆和造纸工业中光纤、财政和债务的政治经济学》(博果尔,印尼:世界森林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2000年)。

⑦皮特·瓦尔德曼和杰伊·所罗门,“印尼第一家庭权力交易在攻击中减少”,《华尔街日报》,1998年9月23日。

⑧尹各·阿尔特迈耶和哈罗德·舒曼,“Der Ueberfluessige Strom”,《明镜》(Der Spiegel),2000年5月29日。

⑨见ECA Watch,“腐败权力工程和出口信用机构在印尼的责任”,www.eca-watch.org/problems/corruption/bosshard6_indon_nov2000.html;山口秀香,“谁的可持续发展?分析日本对外援助政策和资助能源部工程”,《科技和社会公告》(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3期第4卷(2003年8月),第302~310页;“Paiton 燃煤电厂,印度尼西亚”,Unfarallon.info,www.unfarallon.info/paiton.asp。

⑩威尔·马歇尔,“澳大利亚公司抢劫巴布亚新几内亚岛”,2003,www.minesandcommunities.org/Country/png3.htm。《在出口和金融公司中引入道德规范》(悉尼,澳大利亚:援助观察和矿产政策学会[Aidwatch and Mineral Policy Institute],1999),第21~26页。

⑪同上,《卫报》(澳大利亚等),2000年12月6日;梅勒尼·奎维琳,出口发展公司中非政府组织工作组的协调员,“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资助了向海中倾倒氯化物的矿山”,媒体发表(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2002年4月10日),www.ecawatch.org/problems/americas/canada/JHalifaxInitPR_G8_20002.html;公共意识联盟(Coalition for Public Awareness),“出口信用机构、公司福利、缺乏责任”,www.cpa.org.au/garchives3/102/1028aid.html。



⑫詹尼弗·兰斯顿:“呼吁美国公平对待南太平洋岛”,《西雅图情报员》(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2004年7月19日,可见 http://seattlepi.nwsource.com/local/182687_bougainville19.html; 马歇尔,“澳大利亚公司抢劫巴布亚新几内亚”;新闻稿可见 www.hagens-berman.com/frontend;jsessionid=akghaP5_MP5?command=PressRelease&task=viewPressReleaseDetail&i_PressReleaseId=215。

⑬尼古拉斯·吉卢比,《对印尼的武器出口》(伦敦:反对武器贸易运动[Campaign against Arms Trade], 1999年10月), www.caat.org.uk/publications/countries/indonesia-1099.php; 罗布·埃文斯,“纳税人为失败的军火交易向BAB缴纳4亿英镑”,《卫报》,2004年12月20日, www.guardian.co.uk/indonesia/Story/0,,1377390,00.html#article_continue。又见 www.eca-watch.org/problem/arms。

⑭马丁·布劳克,“关于出口信用机构和武器交易的论文”(阿姆斯特丹:Campagne tegen Wapenhandel, 2003年3月28日),第4页,见 www.caat.org.uk/publications/countries/indonesia-1099.php。

⑮迪亚特·弗里希,《出口信用保险和反国际腐败运动》,工作论文(柏林:透明国际, 1999年)。

⑯詹姆斯·格里马迪,“安然管道留给南美的伤疤:游说,美国贷款使项目走上毁灭之路”,《华盛顿邮报》,2002年5月6日。

⑰《安然公司:违背人权的同犯》(纽约:人权观察, 1999年)。

⑱塞·赫发·查科金,“印度的马赫施瓦水坝”(扎森贝格,德国:厄吉华德组织[Urgewald], 1999年3月), www.narmada.org/urg990421.html; 施柏德·迪哈迈德黑卡瑞、帕特里克·麦卡利,“印度的村民阻建大坝”,《地球岛杂志》(Earth Island Journal) (1998年春季), www.earthisland.org/eijournal/spring98/sp98f_wn.htm。

⑲皮特·博斯哈德,《权力财政:印度权力部门的财政体制》(德里:南亚大坝、河流和人民网络[South Asia Network on Dams, Rivers, and People]; 扎森贝格,德国:厄吉华德组织),第7~11页,见 www.im.org/programs/india/power%20finance-inside-16.pdf; V·温卡泰丝,“NBA道义上的胜利”,《前线杂志》(Frontline) 17, no. 15 (7月22日~8月4日, 2000), www.hinduonnet.com/fline/fl1715/17151150.htm; 纳尔默达·巴乔·安德兰,“葡萄牙对被否決的马赫施瓦项目的承诺”,新闻稿,2001年3月15日, www.narmada.org/nbapress-releases/march-2001/portuguese_guarantee_refused.html。

⑳关于雅加达宣言和有关改革出品信贷的国际运动的其他信息,见 www.eca-watch.org。

㉑英国众议院, 1999~2000会议,贸易和工业委员会,第六次报告,“关于从出口信贷担保部(ECGD)获取对英国参与伊利苏大坝的支持的申请”(伦敦,英国政府文书局, 2000年



2月28日)，第7、10页。

②詹姆斯·哈蒙，“确保援外项目的成功”，《环境论坛》（*Environmental Forum*），18期第五卷（2000年9/10月），第4页。

③丹尼·塞顿、艾克·德里利奇等《Der Ilisu Staudamm: Kein Erfolgsprojekt: Zum Hintergrund und aktuellen Stand des grossen Staudammprojekts im Suedosten der Türkei》（柏林：世界经济，经济、生态和发展〔世界经济、生态和发展—WEED〕，2005年9月）。

④爱德华兹·爱尔登、大卫·皮凌和胡戈·威廉森，“出口信用机构的计划失败”，《金融时报》，2006年2月15日。

G8 债务减免计划对发展中国家所欠 3.2 万亿美元总债务的削减占不到总债务的 1%，而且该计划的苛刻条款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境况更加糟糕。那么，债务减免计划的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第 1 章 债务减免的幻觉

詹姆斯·S·亨利

2005 年 7 月，G8 决定向贫穷且高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400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

摇滚明星鲍娜和鲍勃·格尔多夫，电影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和乔治·克鲁尼，笑星艾尔·弗兰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英国的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都站在同一阵线为 G8 的行为欢呼。此时，我们早就应该知道是该研究债务减免计划中难懂的契约条文的时候了。

人们也许期望像布莱尔和布朗这样不喜欢出风头的政治家也会为这份协议欢呼，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称这项协议是“历史性的突破……财长们关于债务、发展、健康和贫穷问题所做出的最全面的声明。”尽管许多激进主义者对此事持保留态度，但是博诺和鲍勃，债务减免运动的最著名领导者，已经在急于宣布胜利了。Live 8/“现在结束贫困”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共涉及了 10 场免费音乐会、30 亿的电视观众、3000 万的邮件和传真以及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的 25 万游行。活动已过去几个月了，这些人仍然不愿意承认在 G8 协定和债务减免的数目与现在结束贫穷所实际需要的援助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这次债务减免最终演变为长期债务减免模式的一部分。事实上，对第三世界的债务减免有点像波士顿的“永恒之掘”、中东的和平进程和对癌症的治疗，充满着长久的期盼、无止境的讨论和永远达不到目标。

数十次努力后，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债务减免。而且诸多事实表明，已经得到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债务减免数目也未能解决什么问题。这部分是因为债务减免有时助长了有问题的政策，强化了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境地的不良习惯。还因为债务减免倾向于加强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而这些机构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通常是灾难性的。最后，债务减免只是其他发展援助方式的一个糟糕的替代方案。

同时，大部分债务减免的成本是由第一和第三世界的普通纳税人来承担的，而同时全球的银行和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正从所有的由负债筹资的糟糕项目、资本外逃和腐败中大获其利并逍遥法外。

这并不是要说所有的债务减免计划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计划为众多的艺人、政治家、经济学家、宗教领袖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大讲坛。而且还提醒我们关注持续存在的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同时也为我们举办免费的豪华音乐会提供了一个借口。

但是，从实际上提供的援助是否足以改善债务国居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看，债务减免实在令人失望。用博诺不朽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要的东西”。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策略，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但这种策略将需要呼吁债务减免的行为分子采取更富斗争性的立场，也将肯定不能像保守的自由世界领导者那样，通过举办尽可能多的欢快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来解决。

■ “请确认事实”

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付出努力来总结一下债务减免的总效果，^①看看这场游戏是否真值得这么大的关注。

是到了认真回顾一下的时候了。毕竟，自1976年巴黎俱乐部（Paris Club）重新安排扎伊尔的双边债务以来已有30年；1977~1979年的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勾销了 45 个发展中国家的 60 亿美元债务，此事也已过去了 27 年；1983 年所谓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顶峰也过去了 23 年；1996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向高负债贫穷国家（HIPSC）实施债务减免计划，也过去了 10 年。

在债务减免计划方面，英国债务危机网络成立已有 20 年；1998 年 3 月在伯明翰召开的 G8 会议上发行了 7000 多张“削减债务”的样本唱片，距今也有 8 年；Live 8/格伦伊格尔斯“贫穷成为历史”的节日，也过去将近两年。

在上述过程中，出现了布雷迪计划、密特朗计划、罗森计划、蜜蜡卡瓦（Mizakawa）计划、萨克斯计划、埃维昂计划和巴黎俱乐部的 200 多项债务重组计划，其中的条款日益宽松——多伦多条款（1988 ~ 1991）、伦敦条款（1991 ~ 1994）、那不勒斯条款（1995 ~ 1996）、里昂条款（1996 ~ 1999）、科隆条款（1999 ~ ）。最近，借鉴了 Live 8 的做法，八国集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片吹嘘声中，启动了多边债务减免计划（MDRI），宣称该计划将向符合条件的约 40 个国家，至少提供 400 亿 ~ 500 亿美元。

事实真相

尽管有了所有这些活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仍比以前增加了，而且按真实贷款条件算还会更高。对多数国家而言，债务负担用债务偿还额（本金和其他费用的利息支付）与国民收入的比例来测算，它们的债务负担比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所谓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高峰时期的债务负担还要高（见下页图一）。^②

据我估计，2006 年发展中国家外债余额的名义存量达到 3.24 万亿美元。这么多债务产生了每年 5500 亿美元的债务还本付息，主要是向第一世界的银行、债券持有者和多边机构。5500 亿美元中有 410 亿美元是由世界上 6 个最贫困国家支付的，这些国家每年的人均收入低于 825 美元。即便在实施债务减免 25 年后的今天，这些国家每年的债务偿还额几乎仍完全抵消了它们每年收到的 400 亿 ~ 450 亿美元的国外援助。它们的债务偿还额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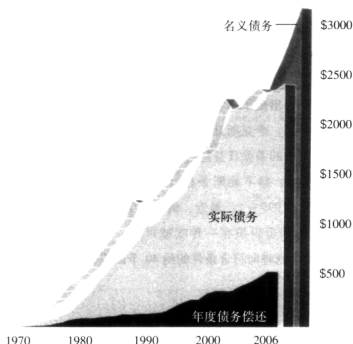
帝国金钱游戏

A Game As Old As Empire

国民收入的比例比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还要高。^③

图一：1970～2006 年间发展中国家外债和债务偿还额

（单位：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6 年数据）

大部分高债务国家对所有这些债务也没什么可以示人的。事实上，这些以“高利贷”偿还给第一世界借贷者作为基金的款项，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流入离岸银行的账户中了。

现值

由于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债务合约中规定的利率比现在的利率高，所以债务的现值（可以更好的度量成本）就更高了，将近 3.7 万亿美元（见下页表一）。^④



表一：对第三世界债务的估计
(以 2006 年美元计，单位：10 亿)

债务项目	国家 个数	2004 年 人口 (10 亿)	低收入 国家 债务	中等收 入国家 债务	估计的 总债务
印度	1	1.08	135.0		135.0
中国	1	1.30		323.5	323.5
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		2.91	336.1	2337.0	2673.1
高债务/低收入	25	0.35	131.0		131.0
高债务/中等收入	47	1.12		1874.0	1874.0
高债务国家	72	1.46	131.0	1874.0	2005
其他低收入国家	31	0.87	205.1		205.1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43	0.58		463.0	463.0
根据世界银行的名单 加以调整的国家 ^a	7	0.14	18.4	111.7	112.1
参与尼日利亚债务交 易的国家			-18.0		-18.0
名义债务总存量			471.5	2777.9	3237.1
第三世界债务总现值	155	5.45	412.6	3277.4	3690.0
仅印度	1	1.08	139.0		139.0
仅中国	1	1.30		363.0	363.0
高债务/低收入	26	0.427	147.0		147.0
高债务/中等收入	49	1.164		2408.0	2408.0
所有高债务国家	75	1.59	147.0	2408.0	2408.0
其他低收入	32	0.90	127.0		127.0
其他中等收入	46	0.59		507.0	507.0

a. 这些国家是阿富汗、古巴、伊拉克、纳米比亚、朝鲜、苏里南和土库曼斯坦。

(资料来源：2006 年世界银行数据；作者的分析)。



仅中国和印度就占了发展中国家债务现值中的 5000 亿美元。这两个国家对向外借债很小心，而且它们基本忽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结果是它们的债务负担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很低。这两个国家现在已成为高增长的经济体，而且拥有高额外汇储备，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拒绝遵循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但在另外的 3.2 万亿债务现值中，其余 2.6 万亿是由 26 个低收入国家和 49 个中等收入国家所欠的，这都是它们追求“高负债”发展战略的结果。^⑤

这些高负债国家共有大约 16 亿居民，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在债务减免的数十年后，它们现值债务对国民收入的比例仍相当高，达到 60% ~ 90%。债务偿还额每年都要消耗国民收入的 4% ~ 9%，比他们在教育、卫生上的支出还多，更远远超过它们所收到的国外援助（见表二）。到最后，这些国家没别的办法，只好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虽然事实一再表明，这些建议只会令它们失望。

表二：债务的影响

	国家的 个数	人均 收入 ^a (美元)	1994 ~ 2004 真实人均收入 增长率 (%)	债务现值/ GNI, 2004 ^b (%)	债务偿还额/ GNI, 2004 (%)	援助占 GNI 百 分比, 2004 (%)	教育支 出/收 入 ^c (%)
S 高债务国家							
低收入	26	1345	1.7	89.8	4.20	3.90	3.7
中等收入	49	6795	1.8	61.7	9.00	0.40	2.8
低债务国家							
中国	1	5419	7.9	14.5	1.2	0.1	n. a.
印度	1	2885	4.2	18.4	2.8	0.1	4.1
其他低收入国	32	1506	2.0	31.9	2.8	5.5	3.6
其他中等收入国	46	6667	2.5	25.0	5.5	0.3	5.3
发展中国家	155	4417		39.0	5.4	1.0	
世界	226	8187					

a. 2004 年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b. GNI = 国民总收入。c. 2000 ~ 2004 年的平均支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6 年数据；作者的分析)



■ 债务减免在哪里？

这些债务数据和比率揭示了一些很明显的问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黎俱乐部^⑥和赞成债务减免的激进分子，所有这些专业的债务减免者这些年都在干什么呢？它们到底减免了多少债务，哪些国家收到了这些减免，这些减免又有多大用处呢？

首先，对债务减免的衡量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所使用的债务减免与借贷者所使用的含义有很大差异，报道的债务和偿付的现金流量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因此，至今只有几次测量债务减免的系统尝试。^⑦

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本章基于对数据来源的仔细审查和我自己对其他债务测量方法的独立分析，^⑧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债务减免的最广泛的评估。

减免总量

我第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数量是相当小的。从1982~2005年，以2006年美元净现值计算，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价值（包括重组、减免的债务）是3100亿美元，仅仅是其总债务余额的7.8%（见表三）。

表三：债务减免的测量

（2005年，美元净现值单位：10亿）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总债务减免
债务减免前	574	3426	4000
债务减免	161	149	310
债务减免后	413	3277	3690
债务减免百分比	28.1%	4.3%	7.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年数据；作者的分析。）



低收入国家的减免

世界最穷的 6 个国家收到的减免比例高一些，约占它们减免前债务的 28%。总计收到 1610 亿美元，超过所有债务减免的一半。以当前利率计，这些减免将为这些穷国每年节省 153 亿美元的债务支付。^⑨

这本不该小视。但联合国 2000 年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截止日期是 2015 年，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该发展目标的进度，每年所需要的现金援助要超过 500 亿 ~ 1000 亿美元。上述 153 亿美元与这里的数目相比，还远远不够。

低收入国家为获得这么点数量的债务减免不得不等上很长时间，大部分减免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才收到。那时，已经又有几个国家进入了高负债国家的行列了。

低收入国家债务减免的来源

对低收入国家的所有债务减免中，约 30% 源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HIPC 和 MDRI。另外 30% 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于 1997 年加入巴黎俱乐部时，放弃了一大笔尼加拉瓜、越南和也门所欠的双边债务。2006 年 2 月，俄罗斯再次勾销了阿富汗所欠的 50 亿美元债务。

贫穷国家另外 650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来自于巴黎俱乐部，第一世界出口信用机构（ECA）组成的一个协会，美国进出口银行就是其中一员。这些慷慨的行为并不令人吃惊，所有这些机构在第一世界出口商、承包商和工程公司中都有实力雄厚的客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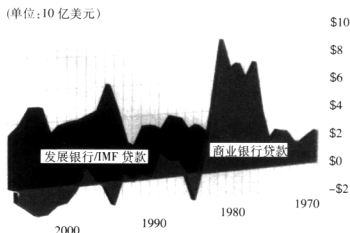
这些出口信用机构的客户都从先前贷款所资助的项目中以项目订单的形式接到过大单生意。现在，它们又完全不顾纳税人的损失（纳税人是这笔贷款的最终负担者），而急切地让出口信贷机构放弃更多的贷款的偿权，为新一轮大型项目建设扫清道路。

与它们相反，主要的全球商业银行如花旗集团、瑞银集团（UBS）、高盛、巴克莱、荷兰银行等，它们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了总计 15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主要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HIPC 计划达成。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同样是这些银行采用了辛迪加的方式给发展中国家贷款（见图二）。它们中有许多还因此成为了“私人银行业”的先驱。而“私人银行业”是一种不正当的生意，用来帮助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精英们将资金存放在避税港，以避免令他们厌烦的税收和管制。

图二：1970～2004 年间商业银行与发展银行对低收入国家的贷款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6 年数据；作者的分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曾经增加了穷国债务、促进了其财富外逃的银行，现在又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行动，集中在更有利可图的非债务国家如中国和印度以及第一世界的私人银行业和投资银行业。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早期，正当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红红火火的贷入外债之时，主要的国际私人银行开始大规模的中止借出资金，它们中止了由银行所属辛迪加曾经借给这些国家的大部分贷款。^③在低收入国家，这些强盗似的私人银行家更加频繁地号召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出口信贷机构的项目贷款中回收先前的贷款以及收回之前被偷走的国家资产。

因此，考虑到第一世界的金融巨头们从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中获取的大量利润，很难说它们在债务减免方面已经尽到了



应尽的责任。债务危机时，它们以较低的价格从巴西、菲律宾、阿根廷、印尼和墨西哥等国买断了价值被低估的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无论是繁荣时期还是经济萧条时期，它们都努力大发其财，帮助它们的客户大量借钱直到根本消化不了的地步，帮他们洗钱、逃税和隐瞒他们的非法所得。

稍后，我将再回到这些金融巨头身上。因为我们可以从它们参与这些事件的历史中找到一个解决债务减免问题的可能方法。

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减免

像巴西和墨西哥这样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共获得了 1490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这仅仅是减免前总债务 3.4 万亿美元的 4.3%。^⑩ 这些债务减免的大部分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通过布雷迪重组计划和巴黎俱乐部获得的。

第一世界的银行和政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将优先权给予这些较大的、更有利可图的、具有更高债务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这些国家贷款的份额如此之大，以致它们被套牢在这些市场上。^⑪ 事实上，对大部分第一世界的银行家、官员和记者来说，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真正含义不过是对他们自己和股东的一次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成功地减少了在第三世界的贷款，虽然大部分国家仍然深陷困境之中，但危机已从他们报纸的头条消失了。^⑫

中等收入国家债务减免的来源

私人银行总计向中等收入的债务人提供了 750 亿美元债务减免，约占所有债务减免的一半。减免的大部分是通过债务交换和债务回购实现的。巴黎俱乐部还主要通过传统的双边债务重组，另外提供了 280 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通过贝克计划（1985 ~ 1989 年）和布雷迪计划（1989 ~ 1995 年）提供了 470 亿美元的净债务减免。但是，就其自身而言，贝克计划事实上使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增加了 770 亿，同时还侵吞了美国纳



税人补贴的 450 亿美元。最终需要效率更高的布雷迪计划来抵消这些增长的债务。

1995 ~ 2002 年间，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向几个主要的债务国，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印尼，提供了短期债务减免。这些减免只不过是单纯的债务重组罢了，最终还是要支付所有的贷款和利息。因此，理论上这些减免对债务水平的现值没有任何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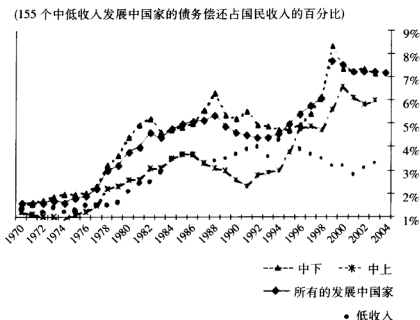
并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些短期减免的处置，在实际操作中也完全失当。例如，印尼、墨西哥和阿根廷都被允许使用紧急美元贷款来挽救国内的数十家银行和企业。而拥有这些银行和企业的人是当地精英中颇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们和第一世界的银行家，甚至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都相当熟悉。^⑨所以，上述拯救贷款中的相当大份额被直接挪用了，但这些国家仍然要偿还这些贷款，并按较高的利率支付利息。由于这些政府不愿增税，尤其是不愿对当地资本增加税收负担，因此，多数国家偿还这些拯救贷款的办法是大量向国内借债，还有通过印制钞票。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墨西哥的拯救贷款最终花费了纳税人 700 多亿美元，而印尼的拯救贷款至少也花费了 500 亿美元。通过这种方式，拯救贷款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债务水平，这点和贝克计划如出一辙。我对债务减免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处置不当的拯救贷款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第三世界债务减免的净效应因这些贷款的负面作用，而变得非常低。因此，我在对债务减免的评估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处置不当的拯救贷款的影响。

总之，20 世纪 70 ~ 80 年代期间，阿根廷、巴西、印尼、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土耳其和委内瑞拉等中等收入国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

由于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这些国家很少获得过债务减免，所以 2000 年后它们的债务偿还额飙升到了空前的高度（见下页图三）。近来的债务减免计划几乎全部集中在低收入国家，完全忽略了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和债务的不合理根源。这种关注是重新考虑债务减免计划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图三：1970～2004 年间外国债务偿还负担



■ 债务减免的政治经济学

那么，到底债务减免在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取得的成就就这么小呢？谁从中获得了利益，谁的利益又被忽略了呢？债务减免运动又该从这儿走向何方呢？

债务危机的根源

对债务减免过程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回顾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根源。这次危机有其根源，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到 2003 年，发展中国家共吸收了 6.8 万亿美元的国外贷款、援助和投资，远远超过它们之前所收到外资的总和。^⑤

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基本成功地利用了这笔巨额的资金流动，这些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如韩国、中国、印度、朝鲜、马来西亚和越南。由于



种种历史性的原因，这些国家能够抵制第一世界发展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恶意影响。今天，它们几乎是全球化这场赌博游戏中，唯一真正的赢家。它们跻身于世界最快速增长的经济行列，并成为第一世界最重要的供应商、顾客和潜在的竞争者。^⑩

这里我们不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少数赢家身上，而是要放在世界 150 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国家。^⑪一般而言，与这几个赢家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无限制的国外资本投资和贸易采取了更宽松的态度，而且还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建议（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或称 BWIs）。对许多国家来说，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这次亲密会面带来的只有麻烦，甚至是灾难。^⑫

事实上，几十年来，这些国家在进行着一项非常危险的政策试验。到目前为止，结果是很明显的。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收入水平差异很大，制度环境也千差万别，但都因依赖国外银行，并肆意向其借款，而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些国家的悲惨发展路径可以描述为“广开放、高债务、亲银行”的发展战略，我花了很大力气想找到一个例外，竟未能如愿。大部分对全球化的赞颂主要是强调那些没有追随新自由主义的赢家，它们是全球化的光鲜外衣，而忘记了其他国家的灾难。

腐败体制和非生产性债务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 1970 ~ 2004 年间共积累了 3.7 万亿美元的外债，据我估计，其中 1 万多亿美元（至少占总债务的 25% ~ 35%）要么消失在计划糟糕、贪污累累的发展项目中，要么被简单地直接偷走。^⑬

对几个最大的债务国来说，如菲律宾、印尼、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尼日利亚，其被浪费的债务份额也许更高。导致债务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模式可以用如下事实概括：过分借贷、造成巨大浪费的项目、资本外逃和腐败。而这些事实几乎都集中在前述的二十几个国家中。正如我要指出的，那些设法复兴债务减免运动的一方一定要认清这个重要的事实，它暗含的一层意思是：在这场为低收入国债务减免而进行的斗争中受到威胁的利益，要远比上述事实揭露的损失严重得多。



低收入高债务国家

在 48 个低收入国家中也出现了浪费和腐败的相似模式，而这些国家最终也符合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IPC 和 MDRI 计划的债务减免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在短短 6 年内增加了 70%。^⑩到 1996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实施 HIPC 计划时，这些债务又增加了 7% ~ 10%。48 个国家中仅 11 个国家就占了该集团 1980 ~ 1986 年间债务增加额的 68%，这 11 个国家是玻利维亚、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纳、象牙海岸、莫桑比克、缅甸、尼加拉瓜、苏丹和赞比亚。

这所有的 11 个高债务国家本来就异常贫困，^⑪并且因为国家的高额债务加剧了政治不稳定，这些国家要么是被贪婪的独裁者统治着的高度开放国家，要么就是国内内战不断，^⑫有时还可能两者同时出现。但解释高债务的主要因素是以下多种问题令人厌恶的结合：软弱的政权、腐败的领导者、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和同国外银行家的诱人关系。将这些分析扩展到前面提到的主要中等收入债务国时，我们同样发现了管理不当、软弱的政权和高度开放的银行业之间的长期结合。

对债务危机的传统解释是强调如下因素：外因冲击、政策错误、流动性危机、缺乏透明度和腐败的存在以及资本外逃联系在一起。但上述证据表明，这些高债务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和这些因素只有表面上的联系。这些国家深陷债务问题中，现在急需减免措施。它们长久以来一直处于管理不当、对外资资本完全开放、易受国外机构影响和依赖银行等问题之中。尽管矿产和石油等自然资源财富助长了经济的不良管理，但资源本身并不会导致管理不善。所以决定性的因素是国外和国内精英们的关系。

从债务减免的角度看，政府软弱、腐败和债务这种模式造成了一种困境。仅仅向这些国家提供债务减免并不能解决什么，重要的是进行政治改革和使国内外精英们的关系透明化。否则，这些国家将会重新走入先前的困境。毕竟，像中非共和国这样的独裁政权自 1971 年以来一直在拖欠它的国外债务。



借债 - 资本外逃循环

对巨额非生产性债务^②的支付占用了贫穷国家出口收益和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挤占了健康、教育和其他公共投资所急需的资金，并在金融危机之后又引发了新的危机。第一世界的借贷者们不断地逼迫债务国去生产足够的外汇，以偿还债务，从而粉碎了这些国家增长、投资和就业的美梦。同时，即便在大批国外资本涌入的时候，资本外逃的数量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这些国家相当大一部分的借款也成为了外逃资本。

当然，第三世界的资本外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长久以来就与下述因素有关：国家风险、不稳定的货币政策、银行黑幕、离岸避税天堂的出现和缺乏全球收入税的实施。^③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以贷款和国外援助等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有着惊人的增加，这些资金管理不善，激励了第三世界资本的巨额流出。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基本上被这样的资本流动所击垮。资本流动产生了历史上资本流动的最大浪潮，同时也复兴了世界离岸私人银行业市场。

我们不能简单地解释资本流动和离岸天堂活动的飞速增长，除非我们把所有第一世界借款和援助之间的关系考虑进来。

借款和国外援助管理不当，只能是以提供资本流动所需要的外汇的方式，促成纯粹数字意义上的全球资本流动增加。但借款和国外援助管理不当不能解释为什么所有新借贷资金没能在债务国中转化为生产性的净投资。在大多数国家，国外贷款的浪潮也推动了其他几种额外的资本流动：

1. 贷款使新负债国家的经济陷入不稳定，提供的资金超过了该国经济短期内可以有效吸收的数量。
2. 它们为政府收入提供了巨额来源，这些收入不在纳税者的监视之下，甚至都未被准确地测量过。这就为腐败和浪费提供了机会，部分是通过计划低劣的项目，因其对资金的控制较宽松；部分是通过直接提供美元给财政部长、主要的银行家和其他内部官员，去充实他们的口袋，并用这些美元来投机本国的货币。
3. 债务流动催生了一个新兴、高效的全球离岸银行体系。通过该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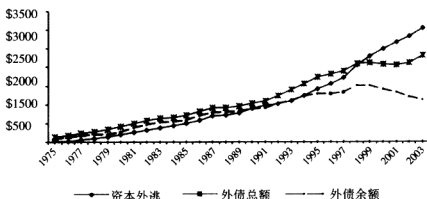


系，腐败精英们将资金诱拐到开曼群岛和巴拿马等地就容易多了，还可以将这些资金进行免税的匿名投资，进一步节约成本。

这个网络的主导者和给予第三世界贷款的辛迪加领导者都是同样的全球银行，这点并非巧合。上述三个因素结合起来，鼓励第三世界的政府官员和财富巨子们将他们私人财富的较大部分转入离岸金融资产中，全不顾他们国家的外债正日益加重（见图四）。

图四：资本外逃与外债

（单位：10 亿美元；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作者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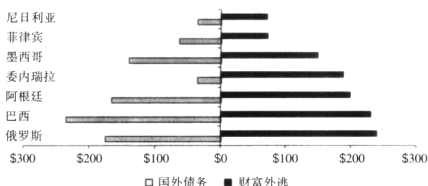
外逃资金的一部分是以国际货币的形式流出的，它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储存的硬通货和通用的货币，如美元、瑞士法郎、德国马克、英国英镑和2002年后的面值100、200和500的欧元钞票。例如，到2006年，美国通货的总存量是9120亿美元，至少有三分之二储存在离岸账户中，那些有通货贬值历史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发生这种行为。相比其他美元单位，100美元的钞票需求最大。²⁸

更高数量的外逃资本来源于精英们的私有资金，这些资金主要流向离岸避税天堂，通常是在第一世界的银行、法律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的帮助下偷偷进行的。



债务-资本外逃循环中流出的资金数额是巨大的，据我估计，1997~2003年间平均每年约有1600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测算）。^②大部分外逃资本以免税投资的形式存入离岸账户，主要是银行存款和非居民拥有的政府债券，这些在第一世界国家都是免税的。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第三世界私人流出的财富未曾征过税，其总额也超过了第三世界所欠债务的总价值。^③事实上，像委内瑞拉、尼日利亚、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债务大国，精英们流出的私人财富价值是它们所欠债务价值的数倍（见图五）。

图五：财富外逃与外债
（单位：10亿美元；1997~2003）



因此，对许多债务国来说，它们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债务问题，而是资产问题，即关于征税、控制腐败、管理国有资产和重获被国外掠夺的财物等问题。私人财富中一部分是来自国外贷款，或者是从国有公司中窃取的。但私人财富中的较大部分是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的注视下直接轻易流出的。

同时，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及其普通纳税者，正苦于支付巨额的非生产性债务，而它们的法律系统、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正接受腐败的侵蚀。

正统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完全忽略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倾向于将这些问题划分为腐败、透明等制度问题，将这些问题视为内生于特定国家的。^④从



人力资本外流

资本外逃的地下之河伴随着日益严峻的人力资本外流。由于发展中国家大批人口失业，无法生存，使得许多宝贵的技术工人匆忙移居到第一世界，加入那里的劳动力市场。2006 年，转移的第三世界人力资本财富的净价值，据我估计，是 2.5 万亿~3 万亿美元。^⑨

这些在国外工作的劳动力寄往家中的汇款，现在每年已高达 2500 亿美元。但相当一部分钱被浪费在高昂的迁移费用和胡乱花费上。很明显，菲律宾、萨尔瓦多、墨西哥、海地和厄瓜多尔等国正在实行的，严重依赖劳动力输出的政策，不是最佳的选择。它只是对国内创造工作岗位和收入的一种可怜替代。

总结：危机的根源

总之，上述债务模式对第三世界收入和福利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除了几个成功避开了债务陷阱和新自由主义药方的全球化赢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真实收入在 1980~2005 年间基本上是停滞甚至退步的（见下页表四）。^⑩尽管从那以后这些国家又重获增长，尤其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出口国，但发展中世界的多数国家仍旧在挣扎着，以期达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消费水平、社会支出水平和国内安宁。极少数国家成功仿效了中国和印度的例子，进行多样化生产和提供出口服务。

除了漫长的经济停滞之外，许多背负债务的发展中国家还承受着失业、贫穷、不平等、环境退化、不安全感、犯罪、暴力和政治不稳定等问题的急剧增加的压力。所有这些问题因债务和资本外逃而更加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偶尔竟是有益的，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印尼、肯尼亚、墨西哥、菲律宾和南非等国，金融危机有助于削弱独裁体制。但是，民主的进步即便不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也同样可以得到。

第三世界的麻烦和第一世界的相对繁荣有着强烈地对比，虽然我们也承认因石油价格的冲击使第一世界国家在 1973 年和 1979 年出现了短暂



表四：资产负债表：发展的 25 年，1980 ~ 2005

	中国	印度	49 个最 贫穷国家	其他 105 个 发展中国家	54 个高 收入国家	全世界 210 个国家
世界人口百分比						
1980	22.1%	14.4%	8.1%	33.0%	22.5%	
2005	20.3%	17.1%	11.4%	35.8%	15.3%	
	(13 亿)	(1 亿)	(7400 万)	23 亿	(9800 万)	
世界实际收入 百分比* (%)						
1980	3.2%	3.5%	1.9%	29.3%	62.0%	
2005	13.6%	6.3%	1.9%	24.5%	54.0%	
2005 年人均 实际收入*	\$4972	\$2752	\$1249	\$5123	\$26191	\$7428
1980 ~ 2005 年 实际年均增长率	8.1%	3.8%	0.7%	0.8%	1.9%	1.6%

a. 按 1995 的年美元为单位计算，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06 数据；作者的分析)

停顿；在 1982 ~ 1983 年、1990 ~ 1991 年和 2001 ~ 2003 年出现了衰退。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经济陷于停滞，法国和德国也经历了较长的无发展时期。但这些都不过是特例。总体上，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大多数贫穷国家变得更穷，而绝大多数第一世界国家和它们的金融机构经历了持续的繁荣。

■ “可以得到的减免”

不论一个人如何评价全球化和其他新自由主义信条，他都不能将高负债看作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债务减免。

根据这份肮脏的记录，第一世界政府、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全球私人银



行业都至少应该承担它们的责任，努力投入、自愿分担这笔债务的较大部分。但很明显，这些都未发生。这不是因为任何对债务减免的反感，事实上只要债务国有政治纷争，债务减免最终就会成为一项可敬的资本主义措施。^④

对债务国而言，单方面决定延期支付债务，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几个国家，如 2001 ~ 2002 年的阿根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俄国、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和 80 年代的古巴有这个勇气自己单方面宣布延缓债务支付，但它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三世界的债务国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能达成共同意愿，采取这个措施。

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可行选择是依靠第一世界债权人自愿的债务减免。激进分子对良心的呼吁也许会对它们有所影响。但这种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

一些政治、经济因素综合起来限制债务减负的最终数额：

大棒。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信它们不得不依赖贸易资金和援助，因而不能断然违背国际债权人的意图。

胡萝卜。第三世界精英中，许多已经被全球金融行业给买通了。一个常见的回报是提供机会，使这些精英能够参与国际投机和收到国外贷款及投资。除此之外，还有一整套其他的激励，有离岸账户、参与分红和直接的贿赂与回扣。更隐蔽的回报有道琼斯的董事会席位（像墨西哥的萨利纳斯），著名大学、银行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职位（像墨西哥的塞迪罗在耶鲁，阿根廷的卡瓦略在纽约大学，玻利维亚的前财政部长卡里加和前任政府官员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参与其他的高级机构（美洲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美洲国家对话组织）。还有更不起眼的方式，用意识形态来影响第三世界精英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网络一直相对较不完善，易于被侵蚀。

银行业卡特尔。全球金融服务行业比债务国家间的组织要严密的多。主要国际银行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专家们不断重复地处理着同样的债务问题，同时由债务国家数十位代表组成的谈判团一个接一个地匆匆来去。^⑤像花旗银行的威廉罗兹和美国大通银行的弗朗西斯·梅森等专家十分擅长于



孤立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并利用国家间的敌对情绪。标准贷款和债券合约中的样板式语言如交叉违约条款——同样有助于维持借贷业卡特尔的权力。

削弱的政治竞争。1990年以后，苏联不再是争夺对第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竞争者。从那时开始，第一世界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真正价值急剧下降，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同时，第一世界银行完成了它们对第三世界的债务减免；而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其他官方机构将私人银行当作了低收入国家新贷款的主要来源。信贷风险被有效地转移给了公共部门，而那些最大的债务国则专注于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改革是布雷顿森林机构提供债务减免的交换条件。总之，对第三世界债务减免的支持极大的萎缩了。

由于债务国的国内一片混乱，尽管债务国的非政府组织提出来了大规模债务减免的目标，却缺乏国家的关注；而小规模债务减免就能成为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又一工具。结果是第一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名流们联合起来，领导了一场善意的运动。虽然缺少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该运动仍成功地引导了一系列断断续续的全球抗议活动。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吧，这次运动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家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乔治·布什、中央银行、私人银行家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官僚们身上，指望他们会良心发现。但这些人几乎都没有作出过反应，使这次运动以碰壁结束。

■ 精心实施的计划

第一世界的政策制定机构提出了许多的精明的建议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债务减免。自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借债浪潮以来，第一世界就为国际信贷委员会设计了种种计划，如债务回购、债权与股权互换和出境债券等。在过去10年中，因为HIPC的增长现状令人失望，学术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许多建议，促成了独立的债务重组机构、全球破产法庭和对先前提到的延缓支付债务合约加以



修正。

这些建议的结果是一大批学术文章的出现和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文章和会议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所有的模式都不过是小心翼翼的渐进主义罢了——一系列建议，每个建议相比前一个建议只改进了一小点，而所有这些建议都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这样，就可以既不会开罪权势集团，又可以保留颜面。

贝克计划

1985 年 10 月，里根总统的第二任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宣布了其关于债务减免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认为，1982 年以来商业银行所追求的基于市场的债务重组计划，未能发挥作用。事实上，传统的债务重组正使债务问题加剧，因为银行停止了提供新贷款，同时还继续将未支付的债务利息计入债务，并以更高的利息计算。

贝克计划希望可以通过提供联合贷款来改变这种恶性循环，这些新贷款的来源是美国纳税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私人银行贷款，但贷款的条件是接受国要进行市场改革。之所以提出这项计划，是因为传统观点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本质上不过是短期的流动性问题，并不是深层结构缺陷和利益关系的反映。它们以为，以改革为条件，向债务国提供新一轮贷款，将引导这些国家走出暂时的危机，去按自己的方式发展。

到 1989 年，贝克计划共提供了约 320 亿美元的新贷款，^③主要提供给了 15 个像墨西哥、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这项无效的计划花费了第一世界纳税人 450 多亿美元，主要是通过美国财政部来支付的。当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和是 1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提供的债务减免数额就微不足道了。而且，就像前面提到过的，这些计划实际上提供的是负债务减免，因为债务现值水平提高了。最后，贝克计划几乎忽略了所有的低收入国家。部分是因为第一世界的私人银行向这些国家只提供了少量贷款；部分是因为降低发展贷款的价值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基于市场的”债务减免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所有人都在期待贝克计划发挥作用时，私人银行通过回购、债务互换等基于市场的方法，单独取消了约 260 亿美元的国家贷款。

这些做法对涉及的国家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后果，而且通过布雷顿森林机构和其他政府领导人，加强了第三世界债务问题的国有化。虽然，它们成功地部分抵消了贝克计划对国家债务水平的有害影响。^③

布雷迪计划

由于贝克计划和基于市场的方法未能有效地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继任者、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尼古拉斯·布雷迪于 1989 年 3 月引入了一项更激进的债务互换计划。但他提出该计划绝非出于慷慨。1987 年 2 月，巴西宣布延缓其对债务利息的支付，这将为其他债务国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1988 年年中，墨西哥非法操纵的总统选举紧跟巴西行动之后。墨西哥的巨额债务、衰退中的石油价格、墨西哥潜在的政治不稳定性和巴西的债务拖欠，所有这些都表明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债务拖欠，除非第一世界采取更积极的债务减免措施。

布雷迪计划最先于 1989 年在墨西哥实施。根据这个计划，国外私人银行同意将它们的债务以 30% ~ 35% 的折扣换成一揽子新发债券。这些债券的利息和本金由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日本的出口信贷机构发行的债券作担保，由债务国的外汇储备作支撑。

1993 年布雷迪计划结束时，这项半自愿的计划又提供了少量减免，主要是向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中等收入国家和少数几个美国支持的国家有波兰、菲律宾、约旦等。^④依靠纳税人的补贴，布雷迪计划几乎成功地消灭了几个小国家的债务，如圭亚那、莫桑比克、尼日尔和乌干达。1994 年墨西哥特奎拉危机前夕，布雷迪计划共促成了 1240 亿美元（以 2006 年美元计）的债务减免，花费了纳税人 660 亿美元的补贴。今天，布雷迪计划仍旧是最大和成本最高的债务减免计划。



一些分析表明，由于布雷迪计划对股票市场和直接投资的影响，1989 ~ 1993 年间债务国收到的新贷款和投资数量略有上升。但是，这些收益只是暂时的，会被增加的资本流出所抵消。布雷迪计划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净收益明显少于为这个计划向第一世界偿还的税收。

而且，从布雷迪计划最初得到的好处，也随后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亚、秘鲁和菲律宾 1995 ~ 1999 年间的金融危机中消失殆尽。事实上，这些危机是由迅速增加的短期无约束贷款引起的，而这些贷款是从布雷迪计划下得到的。^⑤总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虽然相对于出口和国民收入而言，这 16 个接受计划的国家的债务支付有所下降，但是到 90 年代末，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大多又回到布雷迪计划之前的水平。

所以，这里对之前提到的基本观点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描述：若不能改革这些国家的基本制度——不仅仅是单个国家的市场改革，而是对发展援助的全面改革——则一个时期的债务减免也许会导致更多的借债和下一期再一次的债务危机。

“传统的”双边减免：低收入国家

早期的债务减免措施主要集中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身上，虽然也有少数低收入国家从中获益。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人们日渐认识到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正在膨胀，需要更多地加以关注。^⑥

虽然这些国家符合债务减免的条件，但是它们却从未得到过债务减免，而是支付着天文数字的债务利息。后来的 38 个 HIPC 低收入国家中，有 11 个 1986 年将其国民收入的 5% 以上用于支付外债。平均而言，债务支付占了它们出口收益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十年前的不足十分之一。^⑦而且，低收入国家的债务现值，在贝克计划和布雷迪计划期间，一直在增长。到 1992 年，它们的债务水平已经是 1980 年债务水平的 3 倍，比 1986 年的水平也高出三分之一。^⑧最后，从 1985 年开始，私人银行向低收入国家的贷款远远超过了发展银行提供的贷款数额，再一次表明了市场的失效。

第一个认识到应该关注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的高级官员是尼格尔·劳森，英国保守党的财政部长。1987 年，他认为巴黎俱乐部与债务国家谈判



的焦点应该是减少这些国家的债务拖欠，以预期债务支付的现值来度量。这和传统的债务减免有着很大不同。传统减免下，其重组债务的目的一直是避免减债，通过延长支付期而维持不变的债务现值。前面提到过，这种方法假定问题的关键是非流动性和负面的随机冲击，这些问题造成了经济危机，但很快就会调整过来。劳森等人逐渐认识到这些冲击是系统的，而非随机的，而且如果不加以干预，债务拖欠也许会永久存在。

劳森领导巴黎俱乐部进行了一系列债务重组。在随后的10年里，该机构和73个国家实施了90个双边债务重组，重组的条件也日渐宽松。^④到1998年，这些努力又带来了95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这其中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发展机构债务基金对债务互换的支持。

■ HIPC

1996年9月，布雷顿森林机构推出了HIPC计划，这是它第一次全面的债务减免计划，针对高负债发展中国家。这次计划不是出于慷慨，而只是布雷顿森林机构对来自非政府组织、债务激进分子和债务国日益增加的压力的自然反应。这些人抱怨现有的债务减免计划对世界最贫穷的、负债最重的国家所做的远远不够，而且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等富裕的多国领导者来说，也是分担成本的时候了。

资格审查

1994年世界银行满足HIPC条件的初始名单包括41个国家。这份名单是依据以下几个客观标准决定的：真实收入、债务水平相对于出口的可持续性等因素。但这些标准怎么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当考虑到国外政策的影响时，更是如此。初始名单上的国家应满足下列条件：

- 1993年人均收入低于695美元。
- 债务现值对收入的比例至少为80%。
- 或债务支出占出口比例至少为220%。



依据这些标准，安哥拉、尼日利亚、肯尼亚、越南和也门等较大的低收入国家应该包括在名单内，但却会漏掉马拉维、圭亚那和冈比亚等国。1996年，HIPC 初始名单上的国家总计 2440 亿美元的外债，共涉及 6.72 亿人口——几乎是所有低收入国家债务的三分之二和所有低收入人口的国家三分之一强。

由于许多原因——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想节约债务减免成本的考虑和纯粹的地缘政治关系——HIPC 初始名单上的国家被改动了很多。包括安哥拉、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在内的 7 个国家被从名单中删掉，而 9 个小国家突然符合了减免资格。^①当尘埃落定时，仍旧是 41 个国家符合 HIPC 的条件。但是，与原始名单相比，新名单上所有这些国家仅占有所有低收入国家债务的 39%，而不是 63%，占有所有低收入、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债务的 6%；也只占有所有低收入国家居民的 23%，而不是 34%。

这种规模的缩小部分是出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自利考虑。世界银行是一个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官僚机构，其资金来源于自己发行的长期债券和第一世界政府的赠与。因此，世界银行最优先的考虑就是确保自己的现金流动和维持其债务评级。尽管原则上，第一世界的成员国总能补偿世界银行的资金缺乏，但在操作上，世界银行更愿意去避免向其成员恳求这种赠与，也因此避免了尴尬的国会听证会，在这里银行官员们不得不解释多哥的地理位置，并说明为什么这个非洲国家值得加以援助。

最初，布雷顿森林机构曾建议清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22 吨的巨量黄金储备的一部分，来为 HIPC 的债务免除融资，这些储备的市场价值已经增长到其账面价值的几倍。^②确实，在 1999~2000 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操作了一项向巴西与墨西哥出售和购回 1290 万盎司黄金的业务，并用这一操作的利润垫付了其在 HIPC 中所承担的那一部分初始成本。可是现在，一些很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搅和进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销售更大份额黄金的建议，受到了来自世界黄金理事会（23 个环球黄金开采公司，包括纽蒙特矿业公司、安格鲁黄金和巴里克黄金公司）的说客的阻挠。^③

因此，布雷顿森林机构只能通过债券销售和第一世界国家成员的定期公约（担保），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进行债务减免。债务减免的数额越大，



世界银行的各种放款业务量就越小，世界银行也就越担心其债券评级和金融独立性受到威胁。因而，世界银行内在地偏向于支持更少的债务减免。

合格国家名单中，并不缺乏反常的案例（国家）。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与 HIPC 最终名单上的国家相比，安哥拉、肯尼亚、尼日利亚和也门都承受较高的债务负担、享受较少的人均国民收入，但它们被排除在名单之外了。^④ 相比而言，据报道在法国的要求下，HIPC 分析人员修改了规则以把象牙海岸这个国家包括进来，但该国与名单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却享有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和较低的债务负担。^⑤ 名单上另一个奇怪的成员是圭亚那，该国是位于南美洲东北部富含铝土矿的前英殖民地，其 1996 年的人口仅有 75 万，而人均真实国民收入高达 3600 美元——与 HIPC 名单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很明显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同时，HIPC 排除了 29 个世界银行自身认定为“严重债务负担”的中等收入国家，包括附有“肮脏债务”的主要国家——其贷款资金用于镇压、战争和充实精英分子。这类国家有阿根廷、厄瓜多尔、印尼、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比进入 HIPC 俱乐部的国家的债务负担还要严重。^⑥

这些排外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显示出，1996~2003 年间，最终名单上的 38 个 HIPC 成员国的每年偿债额大约减少了 20 亿美元，而非 HIPC 成员的低收入国家的每年偿债额实际上增加了——为这一数额的数倍。^⑦ 因此，从整体上看，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可持续”负债和收入的审查原则，并没有完全一致地运用。它们看起来约束了自身的债务减免努力，更关注于微型的、更可塑的国家。

债务减免的漫漫长路

相对于第三世界未偿付的巨额债务规模相比，债务批评家自然对于 HIPC 不大的覆盖范围有些失望。但是他们至少可以指望布雷顿森林机构加速减免。可是，甚至对于那些值得减免的国家，债务减免的历程也将是很漫长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给予实际减免之前，施加了一个曲折延宕的流程，它们开出了一个它们偏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菜单——包



括私有化、关税削减、平衡预算。

考虑到最终名单中的 HIPC 几乎不在第一世界的银行、承包商、设备供给商的主要视野之中，上述要求尤其难以证明是正当的。一半多的这类国家的人口比新泽西州的人口还少，其人均国民收入平均低于 1100 美元，平均预期寿命仅 40 岁。为这类国家提供债务减免，不太可能设置一个危险的“道德风险”式的先决条件。

然而，在原来的 1996 年 HIPC I 方案下，所有这些国家期望在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监督之下花费 3 年时间执行此类改革，以达到它们的“决策点”。之后，一个债务减免组合将会集合而成，适度数量的债务减免最后将会批准。

到时这些国家应该继续实施进行 3 年的良好表现，以达到“完成点”，在这一点它们将最终获得债务的大量缩减。此时，它们并不会获得完全的债务勾销，而仅仅是提供部分补贴以使债务缩减到布雷顿森林机构认为相对于主要出口而言达到的“可持续”程度。在这一进程中，这些国家还要起草一份布雷顿森林机构批准“贫困缩减战略文件”，商定一个“贫困削减和（经济）增长机构”，以一种惯常的而非激进的方式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员工监测项目”。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政策被证明是家长式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大部分这类国家多不稳定、管理不善并遭受战争重创。外国援助面临着“更多的沙子，同样的鼠洞”式的困境——最需要援助的国家正是那些最缺乏良好使用能力的国家。另外，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制度变得更加脆弱了。

从一个及时进行债务减免的观点看，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责难显然不能归为及时之列。BWI 的技术统治论者采用了一种正直的、几乎是债权人式的姿态面对 HIPC 国家——毕竟，布雷顿森林机构事实上就是债权人。缓慢的分配点滴的债务减免配额，也仍然严格控制。所有随之的改革要求和免除延迟，是对破产处理中托管人所起的更中立角色的拙劣替代。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债权人和新自由主义改革者的心理以及那些国家的落后状况，产生了我们所预测到的这些后果。确实，如果 HIPC 真正目标是



避免给出有意义的贷款减免，它几乎完全成功了。到 2000 年以前，只有 6 个国家^④——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圭亚那、马里、莫桑比克、乌干达——得以走到“完成点”，债务减免要在这 6 国间进行分配。最终，HIPC I 为这 6 个国家提供了 37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⑤然而，这些微薄的减免也不是立即兑现，多数情况下是在未来数十年内支付。世界银行对乌干达的债务减免要延展超过 23 年，对莫桑比克的超过 31 年。圭亚那在 2050 年之前，每年还要偿还 100 万美元。

第一世界债权人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在管理债务减免时，是不是如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一样谨慎呢？

■ HIPC II：HIPC 的赌金

1999 年 6 月，在 1998 年 5 月伯明翰 G8 峰会遭受大规模的“减少债务”的游行之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 HIPC II，它被认为比 HIPC I 版本更快速、更慷慨。其结局显示减免仍然是令人尴尬的缓慢。^⑥在 2006 年之前，始于 1996 年 HIPC 名单上的 38 个成员国，只有 18 个到达了“完成点”。另外 11 个国家，在经历了 49 个月的漫长等待之后，到达了“决策点”，但是仍有 5 个国家被认为是“进展缓慢”。在剩下的 9 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想要获取减免资格，并有兴趣参与到审核中来。^⑦

为填补这一排行，2006 年布雷顿森林机构又确定了 6 个在 2006 年 12 月登记日结束前仍有能力获得减免资格的低收入国家。可是，只有两个国家准备并愿意在最后期限之前尝试通过审核。^⑧合计，与最初的目标成员国相比，HIPC 仅能为占低收入国家债务 18% 和低收入国家人口 13% 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

那些通过了 HIPC 设置的所有障碍的国家，最后确实获得了一些债务减免——相对于它们 1998 ~ 1999 年的偿债额，2001 ~ 2006 年每年的总削减额为 8.32 亿美元。这些削减由 27 个达到“完成点”或“决策点”的国家分享。^⑨

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比如，中等收入的圭亚那在整个项目中进展神速，从 HIPC I 和 HIPC II 中获得了人均 937 美元的债务减免。的



确，圭亚那在债务减免中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在 2006 年之前，在所有的债务减免项目中，为其每一位国民获取了 2971 美元。^⑤圣多美、尼加拉瓜、刚果共和国、几内亚比绍、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玻利维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拉利昂、莫桑比克、加纳从人均的角度看也做得不错，都实现了超过 100 美元的人均债务减免。

在 HIPC 债务减免的份额获取方面，显然获胜者是莫布图践踏过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到目前它掌握了所有 HIPC 减免的 18.2% 和所有的第一世界对低收入国家债务减免的近 8%。其他的获胜者包括尼加拉瓜、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玻利维亚、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这个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的倾慕者，就单独吞占了 HIPC I 的 37 亿美元总受益额的 55%。

债务减免最受益的这批国家，与最初名单上“战争重创/严重独裁”的国家，有惊人的重叠之处：1980 ~ 1986 年间最靠前的 10 个低收入借款国，占据了 1988 ~ 2006 年间 HIPC 债务减免和所有第一世界国家债务减免的一半还多。^⑥无论从人均还是从绝对量上看，许多其他负债低收入国家，获取了更少的债务减免。^⑦

这里首次采用的每一国家人均债务减免分析，通过运用债务减免作为发展援助的替代，强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确保偿债额（在债务削减后，新的借债可能发生）的削减部分运用到值得运用的地方将是很困难的——“控制问题”。

第二，基于与发展需要几乎不相关的因素而获取的债务免除额，在不同的国家间变化很大——“相关性”问题”。

负责 HIPC 项目的布雷顿森林机构试图通过要求接收国执行贫困削减项目、进行政策改革、对其政府支持进行监督，来解决控制问题。这么做是否起作用，仍然备受争议，存在很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限制条件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这些条件延缓了债务免除额的分配。

在缺乏债务免除和发展需要之间的比例关系的条件下，HIPC 对于解决相关性问题的无能为力。为了给发展融资而严重依赖于债务免除，换句话说，



意味着一些严重管理不良的、过多挥霍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获得最大份额的奖赏（即债务免除）。

■ HIPC 的整体效果

HIPC 看起来确实降低了成功完成 HIPC 项目的 18 国的外债负担——其国内债务却是另一番景象。

然而，2004 年与 1996 年相比，最初 HIPC 38 国名单上的 11 国，仍然承受着更高的偿债收入比。贫困的布隆迪仍然在高达 91% 的负债（当前负债的现值）收入比的奴役下生存。

进一步说，在 HIPC 存在之前的 1996 年与 1986 年相比，38 国中的 25 国的偿债收入比已经在下降了。许多没有在 HIPC 注册的低收入国家的偿债负担以及 9 个没有达到 HIPC “决策点” 因而未获债务减免的国家的债务负担也下降了。因此，甚至对于一大批走到 HIPC 所设置的终点线的国家，也很难说 HIPC 项目是成功的。^⑤

有一点毫无争议，那就是通过 HIPC 获取的债务减免的总数额是相当有限的（见下页表五）。

新闻媒体经常描述说，HIPC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500 亿~600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一个更精确的估计是，2006 年之前最多不过 413 亿美元。这一数额仅仅是低收入国家未偿付债务总额的 10%。^⑥在这些债务减免中，76 亿美元授予了 HIPC I 项目的最初 6 国；另外 337 亿美元授予了最终到达“决策点”的另外 23 国。^⑦为剩余的仍符合 HIPC 资格的 9~15 国提供的债务减免额估计为 210 亿美元，事实上这一数额只可能兑现很小一部分。^⑧甚至对于走到“决策点”的 11 国的一半国家来说，减免的时机和水平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再说，前面提到的预期未来债务减免数额的现值，这些减免多数情况下要在未来数十年内支付、而非当前的现金转移支付。说到 2006 年，只有三分之一的 HIPC I 项目的债务减免和不到五分之一的 HIPC II 项目的债务减免被“储存”——即每年不到 10 亿美元的现金储蓄分配给这些贫困国家。



表五：各国的减免债务，1988 ~ 2005

	HIPC I & II 国家人均 减免(2005 年,美元)	所有第一 世界提供的 人均减免 (2005年,美元)	所有减免 占人均收 入的比例* (%)	所有 HIPC 减免(2005 年,10 亿 美元)	占所有 HIPC 国家 减免的 百分比 (%)
圭亚那	937	2971	72.8	0.7	1.7
圣多美	753	3416	284.7	0.1	0.4
尼加拉瓜	731	2623	78.5	3.9	9.5
刚果(布)	514	698	77.6	2.0	4.8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321	582	87.7	0.5	1.2
赞比亚	259	557	64.3	3.0	7.2
毛里塔尼亚	258	545	30.5	0.7	1.8
玻利维亚	172	603	42.1	1.5	3.7
布隆迪	135	376	60.3	1.0	2.4
刚果(金)	134	183	28.3	7.5	18.2
塞拉利昂	134	510	98.9	0.7	1.7
莫桑比克	124	452	39.8	2.4	5.8
加纳	120	215	10.4	2.6	6.3
洪都拉斯	94	274	10.4	0.7	1.6
喀麦隆	93	102	5.1	1.5	3.6
卢旺达	93	120	10.3	0.8	2.0
几内亚	70	149	7.4	0.6	1.6
坦桑尼亚	64	115	18.5	2.4	5.8
马拉维	61	70	11.9	0.8	1.8
尼日尔	58	149	20.8	0.8	1.8
马达加斯加	55	141	17.9	1.0	2.4
冈比亚	54	297	16.2	0.4	2.4
布基纳法索	51	88	8.2	0.7	1.6
塞内加尔	51	375	23.8	0.6	1.4
马里	49	110	12.0	0.6	1.5
乌干达	43	380	27.9	1.2	2.9
贝宁	39	107	10.6	0.3	0.8
埃塞俄比亚	34	102	14.7	2.4	5.7



续表

	HIPC I & II 国家人均 减免(2005 年,美元)	所有第一 世界提供的 人均减免 (2005年,美元)	所有减免 占人均收 入的比例 ^a (%)	所有 HIPC 减免(2005 年,10 亿 美元)	占有 HIPC 国家 减免的 百分比 (%)
乍得	21	375	19.5	0.2	0.5
象牙海岸	0	380	26.6	0	0
海地	0	16	1.0	0	0
HIPC I 6 个国家	86	258.3	21	7.1	
计划完成 (18)	88	235.4	21	26.3	
符合条件 (11)	122	240.3	27	15.0	
不符合条件 (9)	0	57.0	4	0	
之前的 HIPC	0	79.9	5	0	
HIPC (38)	75	194.0	17	41.3	

a. 基于 2004 年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 HIPC 计划报告; IMF [1999], 世界银行 [2005 年 9 月]; 作者的分析)

对有关的贫困国家来说, 甚至这些数额不大的减免也不是免费的。为了履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要求, 发展中国家通常必须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而这些改革会伴有不良的政治经济副作用。^⑥

多边减债计划

我们债务免除列车的最后一站是多边减债计划, 这一计划是 2005 年 7 月在格伦斯格尔斯举行的 G8 峰会上大肆渲染公布的。最近的观察显示, 这一计划比 HIPC 给人的印象还差。

MDRI 根源于这样的事实, 2004 年前大部分债务人和非政府组织仅仅为处理 HIPC 问题而创设了它。英国财政部长戈登·布朗发现了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以很小的成本弥补英国对外援助贡献的不足, 并修复英国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 HIPC 即将到期,^⑦而许多低收入国家仍有大量债务未偿付, 布朗决定与 Live8/“让贫困成为历史”联



盟及它的免费音乐会密切合作。如下事实推动了这一合作：布朗的一个核心顾问，是前瑞银集团的银行家，也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董事；托尼·布莱尔在债务政策方面的高级顾问，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前政策主任。^⑤毫无疑问，这些关联使布朗的建议很容易在非政府组织内部顺利采纳，但最终这种关联并未为债务减免做出多大贡献。

MDRI 提供的债务减免的实际现金价值远小于坊间所吹捧的 400 亿 ~ 500 亿美元。42 个低收入国家欠开发银行的符合勾销条件的债务面值，却增加到了 382 亿美元。^⑥

但是 MDRI 与 HIPC 的债务减免一样，不会一下子就分配给低收入国家。考虑到大部分贷款已是低利率，且大部分已成欠账，这 42 个国家在接下来的 37 年中每年却只能从项目中获取平均 9.5 亿美元的偿债储蓄。

与第一世界国家的居民每周在农业补贴、远程导弹、高速公路以及侵略远方国家的总花费相比，这一数额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与可能符合项目条件的 19 个低收入国家每年 29 亿美元教育支出和每年 24 亿美元公共卫生支出相比，这一减免却是一个很大的数额。

布莱尔和布朗的非洲委员会建议每年增加对非洲低收入国家 250 亿 ~ 300 亿美元的援助，与之相比，G8 仅仅勾销了这一数额的 6% 就打发了这些国家。与 2006 年伊拉克战争每周 18 亿美元的战争成本相比，这一勾销额显得微不足道。^⑦

进一步说，要获得 MDRI 的债务减免资格，这些国家必须要跨越同 HIPC 一样的大量障碍，至少 42 个国家中的 8 个国家——包括像索马里和苏丹这样的大债务国——不太可能跨越这些障碍。甚至前述 19 个可能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国家，在 MDRI 项目之外还要承受 235 亿美元未减免的、高成本的双边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其每年的到期债务额为 8 亿美元。值得不厌其烦地再次说明的是，这些国家对所有的这些债务无能为力。

银行称心的一笔交易

甚至我们最乐观地假定，在未来 37 年中，MDRI 的潜在受益人若能每年支付所欠布雷顿森林机构和非洲开发银行的 7 亿 ~ 13 亿美元的到期债务



而不发生拖延或拖欠，勾销债务的净现值就不是 400 亿美元，而至多为 150 亿美元。事实上，考虑到一些债务人不太可能满足项目的限制条件，预期 MDRI 的债务减免额的净现值更接近于 100 亿美元。

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债权人，可能更偏好于 G8 成员国把它们从炼狱中拯救出来。的确，这对于世界银行来说是一笔更有利可图的交易；因为如果低收入债务人真要支付的话，这些资金的利率将不是 3% ~ 3.5%，而至少是 4.7% ~ 5.5%。

假如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中的成员国践行它们的诺言，用 100 亿 ~ 150 亿美元的真金白银换取债务深重的低收入国家高度不确定的债务偿付流，对银行来说，这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当然，这比在这一沉渣之地中仅仅作为一个票据托收人要好得多。

我敢打赌你原本认为债务减免简直就是一项慷慨之举！

■ 适中的建议

从这一传奇之举中，债务救济人从中学到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债务免除的积极分子和政府组织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呢？

经验 1：放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之外

我已经说过了，毫不意外，债务危机 25 年后，地球上一些最贫困的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还在与国外债务进行抗争。如果我们接受债务减免的这一基本前提——债务人已经陷入负债泥沼因而需要一次彻底洗净自身的机会，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巴黎俱乐部所用的债务免除的传统方法，很明显是失败的。它不仅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还有很高的运营成本，其高成本表现在延迟、管理、过多的和破坏性的制约条件方面。

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证明，它们更善于确保赤贫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分配减免额上，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债务本身上。



如果我们确实想提供实质数量的债务免除，我们必须设计新的制度安排以管理这一免除。

经验 2：放在狭隘的债务免除运动之外

或许我们不应该惊讶第一世界国家政府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不倾向于站在国际债权人一边——毕竟，政府长期站在地主、商人、军方、奴隶主和其他财产权益人一边。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尽管有对一个更公平解决方案的潜在的普遍支持，债务减免运动仍然如此无效。这部分缘于在一个由积极活动分子和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松散共同体之间维持一项非赢利运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也缘于这一运动要直面强有力的难以撼动的利益（群体）。

但是，另一个关键性的困难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极大量的“可疑债务”、资本外逃与许多国家的迫切需要进行一下对比，其实债务减免运动的请求远没有这么强烈。确实要有所改变的话，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十分相关但又很有争议的债务、资本外逃这两个方面：

1. 可疑债务，它们是由非民主或不诚实政府签过约的，并浪费在过高定价的工程、可疑的银行应急援助、削减利率的私有化、资本外逃和腐败上了。我自己的粗略估计是这些可疑债务可能占据了发展中国家 3.7 万亿美元未偿付债务的三分之一。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债务运动者 Jubilee、探究国际不良债务网站、我自己和债务评论家，一直在请求重新启用在国际法庭中使这些债务不可执行的基本法律原则。⁶⁹

2. 大量不明的、未征税的第三世界国家外逃财富现在仍滞留海外——它们就是最初通过可疑贷款以及资源转移、私有化窃取和其他卑鄙手法融通出去的。这些财富中的大部分——仅仅来自第三世界的估计就超过 5 万亿美元——已经投资于第一世界国家的资产，在这里为其拥有者创造免税收益，并为全球私人银行产业带来可观的酬金。

与可疑贷款和外逃财富有关的数额，远大于那些债务免除运动者目前所应付的财富数额。可疑贷款和财富外逃，影响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低收入



国家。领先的全球私人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建构了第三世界国家外逃资本的管道、并继续为之服务，而所有相关争议都引出了这些机构的责任问题。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此类机构已经成长为原来的好几倍，并且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有影响力。⁶⁰

如果债务免除运动有决心处理这些更大的问题，它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些可能的举措包括：

1. 为发展中国家挽回被窃取财富的系统债务审计和全球资产追回制度。

2. 恢复“不良贷款”原则，⁶¹因独裁者签约产生的外债或转变为私人财富的外债不必偿还。

3. 第一和第三世界国家税收部门间更强的国际税收合作和信息交换——也许应该在世界银行内部创建一个税收部门，这样的部门至今还不存在。

4. 制定一些行为准则，减少跨国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冲基金和公司为不良借债、洗钱和逃税提供便利。

5. 制定一个针对离岸“不明”资本的统一的、最低限度的、多边征缴的法律准则——从中获取的收益可以为减轻发展压力融通资金（在OECD国家的帮助下，甚至1%的对不明银行存款的资产税就可能每年带来100亿~200亿美元的收益）。

与这些方面有关的许多其他想法也是可想到的。多重的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组织和教育来解决哪怕上述一项措施。但是最重要的限制条件是政治勇气——跨出只关注于债务运动这一狭窄范围的意思。

经验3：超越债务免除的局限

早期的I方案表达了“更多的沙子，同样的鼠洞”方法对于结束贫困的怀疑——债务免除的主要候选国管理这些免除额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怀疑式观点最近获得了甚至更多的支持：一些令人烦恼的报告显示，资源丰富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把债务免除的钱浪费在了获取更多的不良贷款和购买武器上。



一些债务免除运动者和“现在就结束贫困”（ending poverty now）的经济学家评论道，最根本的问题是，与贫困抗争不仅仅是提供灭疟网络、疫苗、饮用水以及在教育、资本、技术和救护方面更多的投入。最终，长期的贫困削减要求推进深层次的结构变革。这意味着对社会资产如土地、教育、技术和政治权利的重新配置。有一些观念 BWI 的技术决定论者并不理解，他们也可能在对这些观念的恐惧中退缩。但是它们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每一个成功的发展神话的本质。

当然，遭受债务摧残的国家的贫困人口，确实急需短期的减免以渡过难关。甚至考虑到腐败存在时，很少量的债务减免也可能带来很大好处。我并不是支持免除所有债务，而是认为应该将之放到更大的背景下，并为之扩大新的需求。

基于这种精神，如果债务免除运动、G8 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再一次联手来，践行它们长久宣称的华丽承诺，并带来实质性的债务免除，我将会很高兴。

我们已熟识，至少 40% 的世界人口——16 亿 ~ 20 亿生存在高负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等待它们采取行动。

【注释】

①Jubilee 等非政府组织也批评过债务减免计划到目前为止提供的数量太少。但是，本章却是最先将对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债务减免的加总估计和过去 30 年中债务减免计划所实施的数量估计结合起来考虑的。

②债务估计是基于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06）中 155 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并补入世界银行遗漏的国家，有古巴、伊拉克、纳米比亚、朝鲜、苏里南、土库曼斯坦。用于标准化的指数是以 2000 年美元计的世界总国内产值算的。

③估计来自 2006 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官方发展援助和救济以及该集团国的债务支付。注意许多国外救济是和救济购买要求（要求穷国用救济的资金向援助国购买商品）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被当作救济管理费花掉。例如，2004 年，银行数据显示共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854 亿的援助和救济，但这些国家真正收到的只有 639 亿美元。中间的差额部分是会计和计量的原因，却也反应出了管理的高昂费用。与此相对，借贷银行在收钱的时候却是非常有效率的。



④ 2006 年净现值 (NPV) 美元。这里的估计基于世界银行 2004 年估计的发展中国家债务现值对国民收入的比率, 补充了我自己对缺失国家的分析。

⑤ 所有这 75 个国家债务现值对国民收入的比率都达到 50% 或更多, 而中国和印度的比率在 15% ~ 18%。较高的比率意味着该国更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 也更易发生金融和外汇危机。通常借贷每年至少花费 5%, 税收收入不到国民收入 10%, 教育、健康和国防的支出要求不到 10%, 所以发展中国家高于 50% 的比率大大挤占了其他开支。

⑥ 巴黎俱乐部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官方双边借贷者组成的非正式机构, 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等出口信用机构。

⑦ 先前的两份债务减免的调查来自克里斯蒂娜·达泽金和罗伯特·鲍威尔做的“从多伦多条款到 HIPC 计划——低收入国家债务减免的简短历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 第 99 ~ 142 页 (1999 年 10 月); 阿尔特·克拉和尼古拉斯·加尔文, “价值 1000 亿的债务减免为低收入国家做了什么?”, 世界银行, 2005 年 9 月。这两篇文章分别主要关注 1988 ~ 1998 年和 1988 ~ 2003 年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的减免。因此它们漏掉了多边债务减免计划, 2003 年后高债务贫穷国家的减免, 贝克和布雷迪计划, 债务互换和几个大型的双边交易——这些加起来, 占了到目前为止所有债务减免的三分之二。基于这些不完整数据所分析的债务减免总效应, 并将之一般化, 难免出现谬误。

⑧ 我的分析包括下述已实施的债务减免的总价值 (以 2005 年净现值美元算): (1) 基于市场的债务重组 (1982 ~ 1985 年); (2) 贝克计划 (1985 ~ 1989 年); (3) 布雷迪计划 (1989 ~ 1995 年); (4) 债务互换和商业银行所谈判的其他债务减免措施 (1989 年至今); (5) 巴黎俱乐部和世界银行的国际发展机构 (IDA) 提供的传统的债务减免计划 (1988 ~ 1998 年); (6) HIPC 计划四分之三未实施部分的期望值 (1996 ~ 2006 年); (7) MDRI 计划; (8) 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开发银行、多边领导者组织的大额双边债务减免交易, 如最近的巴黎俱乐部、美国和俄罗斯向伊拉克 (2005)、阿富汗 (2006) 和尼日利亚 (2006) 提供的减免。

⑨ 值得指出的是, 以真实现金流量计算的债务减免的期望现值, 多数仍未得到。

⑩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见我的一本书《血淋淋的银行家》(纽约: Four Wall, Eight Windows, 2003, 2005), 第 3 章“菲律宾”。

⑪ 以可比较的 2006 年净现值美元。

⑫ 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 1989 年布雷迪计划的制作人, 罗伯特·鲁宾, 1993 年布雷迪在克林顿政府的继任者, 都曾经是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家。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也曾是一家著名的休斯敦法律公司的律师。随后, 贝克协助构成了一家联系紧密的投资银行凯雷集团 (Carlyle Group)。



⑬给予中等收入国家优先权也反应了下述事实：ECA 和 多国发展银行（MDB）这样的公共领导者——它们主要向穷国贷款——面对着与私人银行不同的会计规则，在理论上，这些规则应该以市场利率计量它们的贷款价值。鲍威尔他们在“从多伦多条款到 HIPC 计划”中揭示了会计规则可以解释对低收入国家债务减免的相对差异。在我看来，会计准则的影响很容易被夸大。首先，私人银行减免和重组第三世界债务也不容易——部分是因为收益幻觉、会计标准的弱实施性和报告收益对高级经理的补偿效应。其次，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可能关心债务减免对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储蓄和贷款银行不同，大部分 ECA 资金完全是由税收提供，不需要担心减免债务的效果。

⑭例如，墨西哥的主要银行家罗伯特·赫尔南德斯于 1991 年以 30 亿美元向政府收购了该国第二大银行。接下来 10 年中，他收到墨西哥政府用于投资的 50 亿美元资金。同时，1994 ~ 1995 的危机期间，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等人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为墨西哥筹集了 300 亿美元拯救资金。相应地，墨西哥用这笔钱的相当大份额来拯救银行。理论上，这些银行应该再一次成为墨西哥政府的资产。但事实上，像赫尔南德斯等银行家被允许保留他们的所有权受益，也不必偿还救助的资金。1998 年，罗宾离开了美国财政部，加入了花旗集团。该机构从赫尔南德斯那里于 2001 年以 125 亿美元又将上述银行买走。据报道，赫尔南德斯没有为这笔交易负税，这家银行也没有偿还墨西哥政府那 50 亿资金。现在鲁宾是花旗集团的副主席。

⑮更准确地说，1971 ~ 2003 年间有 6.82 万亿国外贷款、援助和投资，以不变美元计。这一数额中，国外提供的贷款达 2.97 万亿美元。来源：2006 年世界银行数据及我的分析。

⑯当然，几个市场导向的国家在人权和政治权力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它们不可能永远避免金融危机，还没有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做到过这一点。韩国和马来西亚发生严重动荡，它们在短短的几十年可以控制债务的发展。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期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政治权利做指导。它们宽容——事实上，偏好明显——对腐败、专制政权，从阿根廷的军政府到马科斯和苏哈托，除极少数政权，像朝鲜和古巴，它们几乎从未以政治改革上的减免债务为条件，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⑰除了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韩国，项目中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2006 年人口是 31 亿。

⑱我告诉他详细记载“债务飞行”危机的几本书：《血淋淋的银行家》、《海盗银行家》、《Banqueros y Lavadolares》（波哥大：Tercer Mundo, 1996 年）。关于债务流动循环的最初叙述，见我的封面故事“债务的愚弄”，《新共和国》（New Republic），1986 年 4 月。

⑲见表二，所有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外债（2006 年世界银行数据）。

⑳数据以 2002 年净现值美元计。在名义上，这些国家的外债水平涨了近一倍，从 1980 年



的 63 亿美元增加到 1986 年的 123 亿美元。

②1980 年，前十低收入债务国中，真实人均收入低于 1150 美元。

③1980 年，所有 11 个国家都由独裁者统治。阿富汗和孟加拉国也是两个独裁者主导的低收入国家，它们的债务明显扩大。在 20 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苏丹和赞比亚等国也存在内战或同它们的邻居有着长期武装冲突。

④为此目的，非生产性定义为收入低于资本的边际社会成本。这个关卡率可能高于或低于市场的资金成本，取决于各类项目合同。破坏环境的项目，举例来说，应该有一个关卡率高于市场的资本成本。考虑到工程的发展规划很少被环境所影响，许多项目似乎已经炮制了各种理由来贷款。见亨利的《血淋淋的银行家》。

⑤对离岸和在岸“天堂”的系统而历史的分析以及它们和私人银行业、资本外逃、债务的关系，见我的著作《征服者和海盜银行家》。

⑥我于 1976 年 5 月，第一次在《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的一篇文章“注意大账单”中提到。

⑦见亨利的《海盜银行家》关于对估计方法和发现的讨论。以此估算，官方国际收支数据中所得到的“来源和用途”的差距，略去了任何调整的非货物计价的出口和进口。它还假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报道的外债和储备的“正式”统计数字是准确的，当然，这两个假设都是保守的。

⑧我个人保守估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居民拥有的所有境外外逃资金总价值超过 300 万亿美元。与此相对照的是，高达 2.55 万亿美元的外债。而其净外债——包括所有外汇储备，达 1.25 万亿美元。但这里要把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剔除，因为它们拥有份额不成比例的储备。就拿中国为例，大量的通过香港的资本回流扭曲了外逃资金（在香港回归后，其对中国的投资仍被视为外国投资）。但是，即使剔除了这两个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飞行财富至少有 1 万亿美元，高于其净债务。

⑨见安德烈·施莱弗，丹尼尔·乌尔夫真，“投资保护和证券市场”，《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66 期第一卷，第 3～27 页；拉斐尔·拉波塔等等的“法律决定对外融资”，《财务杂志》（*Journal of Finance*）52（1997），第 1131～1150 页。有趣的是，2000 年 9 月，施莱弗（1998 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哈佛大学在俄罗斯的国际发展研究所的主管，是美国政府在 1 亿美元的诉讼中的主要被告之一）诉讼指称，20 世纪 90 年代他在俄罗斯管理美援资助经济改革的资金时，曾从事“未经授权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欺诈、动用公帑为牟取私利、偷税、提交假票据……一园多种、自由市场骗局。”见《U.S. v. 总统和院士的哈佛学院，安德烈·施莱弗、乔纳森·海伊、南希·齐默曼和伊丽莎白·赫伯特》（波士顿



地方法院, 民事诉讼 00119977, 2000 年 9 月 26 日)。2005 年 7 月这次诉讼最终以哈佛大学支付 2650 万美元和施莱弗教授支付 200 万美元而告终。

⑫见亨利的《海盗银行家》。

⑬由联合国指定的世界上 49 个最穷的国家, 在调整购买力平价 (PPP) 的差异之后, 1980~2005 年, 其实际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 0.7 个百分点, 至于其余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收入增长平均只有 0.8 个百分点。由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增长 1.9%, 而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更快, 由这种落后的 31 亿人所掌控的收入份额由 1980 年的 30.2% 下降到 2003 年的 26.4%。资料来源: 2006 年世界银行数据及我的分析。

⑭其他重要历史债务事例, 见 J·J·瓦利斯, 理查德·E·西拉, 阿瑟·格瑞那斯 III, “主权债务和批判——美国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 1839~1843 年”, 绩效工作文件, no10753 (麻省, 剑桥: 国家经济研究局, 2004 年 9 月); 蒂莫西·W·吉内恩的“金融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讨论文件, no. 880 (康涅狄格州, 纽哈芬: 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2004 年 1 月), 在 1953 年伦敦债务与德国的债务协议。

⑮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墨西哥的安赫尔·古里亚, 他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控制着墨西哥的债务谈判。最终在 2006 年, 他被选举为经合组织的总秘书长。

⑯所有这些数据以 2006 年净现值美元计算。20 世纪 80 年代面向 15 个国家的贝克计划实际原始成本是 150 亿美元, 而布雷迪计划原来的成本为 320 亿元。

⑰例如, 债券股权互换需要国家发行新通货, 然后以这种货币以面值折扣买回外债。但是增加的货币可能对国内债务和通货膨胀产生负面影响。

⑱布雷迪计划的焦点清晰地反映出当时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从 1989~1993 年在布雷迪计划上的 16 个国家, 尼日利亚和玻利维亚是低收入国家, 而非拉丁语系国家是尼日利亚、约旦、保加利亚、波兰、菲律宾。这 16 个国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加权平均的实际人均收入在 1989 年是 5514 美元, 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是 2957 美元, 它们只占有 13% 的发展中国家人口。

⑲见 P·B·亨利等的“帮助穷人帮助自己——债务减免或援助”, 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 2003 年 11 月。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 作者发现了 1989 年以后 5 年间, 为布雷迪计划所有 16 个国家累积的“净资源转移”(长期净债务支出加外国直接投资和有色证券投资, 减去长期外债的利息, 再减去利润投资) 210 亿元和这项计划影响的这一切。重新计算的数字采用最新的 (2006 年) 世界银行的数据, 1989~1994 年间的总额达 2185 亿美元。不过, 这项估计忽略了同一年内这些国家以“非货物定价”的方式发生的资本外逃的 1996 亿美元。

⑳ 48 个低收入国家中, 外债对总国民收入的比率从 1980 年的 49% 上升到 1986 年的 80%。整个集团的债务增长平均一年为 12% 左右, 但对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如尼加拉瓜、莫



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平均有 20 ~ 35 个百分点左右。

③1986 年赞比亚的外债支付占国民收入的 28.5%，刚果是 19.8%，玻利维亚是 6.9%，象牙海岸 15% 左右，玻利维亚 6.9%。来源：2006 年世界银行数据及我的分析。

④达泽金和鲍威尔，“从多伦多条款到 HIPC 计划”。

⑤对巴黎俱乐部传统努力的讨论，见达泽金和鲍威尔的“从多伦多条款到 HIPC 计划”。

⑥到 2000 年，安哥拉、赤道几内亚、肯尼亚、尼日利亚、越南、也门，已经从最初的 1994 年 HIPC 名单上剔除，科摩罗、冈比亚、马拉维被补充进去；缅甸被取消，因为没有 2006 年的足够数据，而厄立特里亚、尼泊尔、海地和吉尔吉斯斯坦已在 2006 年被宣布获得资格。斯里兰卡和不丹也被看作有资格，但拒绝参加。在 2006 年国家重新申请资格，是基于在 2004 年年底的债务负担、人均收入。最后截止报名计划延长至 2006 年 12 月。

⑦2006 年 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世界持有 1.039 亿盎司黄金，以当时市价值 600 亿美元。见“IMF 的黄金”，IMF，2006 年 5 月，www.imf.org/external/np/exr/thets/gold.htm。

⑧见 www.gold.org 的成员名单。

⑨尼日利亚的例子中，因为其大部分债务不是多边的。

⑩象牙海岸客观地根据债务现值对出口比率，是不符合项目条件的。加纳、玻利维亚和乌干达也得到良好的待遇：它们都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较低的偿债比率。并比肯尼亚降低了债务对国家毛收入的比例。

⑪例如，安哥拉、尼日利亚、印尼、肯尼亚菲律宾和也门，所有都有更高的债务，即使调整收入水平也是如此。相对债务负担衡量的是产品的名义债务/国民收入和还本付息额/国民收入，加权的实际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收入。这项措施显示，至少有 15 个国家，在调整收入后，有资格帮助穷国降低债务负担。

⑫非 HIPC 债务支付的数量从 1996 年的 204 亿逐步增加到 2003 年的 298 亿美元，然后 2004 年降到 295.3 亿美元。对于“以前的 HIPC”，诸如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还本付息额也增加了，由 1996 年的 48.3 亿美元增至 2004 年的 58.3 亿美元。

⑬在最初的 HIPC I 计划下，最终这 6 个国家以 31.18 亿美元的总债务符合条件。象牙海岸也达到它的“决定点”，在 1998 年残酷的内战导致分裂之前。

⑭2006 年净现值美元。

⑮见马克·埃伦和丹尼·莱比锡的“高债务贫穷国家计划——统计更新”，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发展机构，2006 年 3 月 21 日。

⑯这里指的是中美共和国。自从 1996 年以来，大债务国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以及科摩罗，投货币基金组织或 IDA 支持程序，仅到 2006 年 12 月才启动。它们几乎占了 75% 的偿还外债的这一组。老挝合格，但它拒绝参加。象牙海岸和多哥合格，但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



遭受“不同程度的困难”。缅甸是无资格的，因为其外债数据过于明显。以上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②基于它们 2004 年 12 月的收入和债务负担，6 个新符合条件的国家是：不丹、厄立特里亚、海地、吉尔吉斯、尼泊尔和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和不丹拒绝参加，厄立特里亚缺乏 IDA 计划，而尼泊尔已“长期中断执行计划”——它正处于一场内战之中。

③HIPC 效应的一种不同度量方法是，比较 27 个国家 2004 ~ 2006 年间每年平均支付 25 亿美元和 1998 ~ 2002 年间平均支付 31 亿美元，每年共为这些国家节约了 5 亿美元。

④我的估计，基于 HIPC I、HIPC II 和其他债务减免计划。

⑤准确的比率是 HIPC 减免 50.3% 和所有第一世界低收入国家债务减免 51.3%，包括 MDRI 和大型的双边债务减免。

⑥例如，多哥没有从 HIPC 中得到好处，从所有其他计划中只得到人均 68 美元。海地也一直没有收到来自 HIPC 的任何好处，也只是从所有其他计划中得到人均 16 美元。

⑦18 个完成国的总债务对国民收入的比率从 1996 年的 5.7% 减少到 2003 年的 3.3%。不过，对 9 个达到“决策点”的国家，这个比例由 5.9% 下降到 1.8%，而低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由 3.8% 下降到 3%。

⑧以 2006 年净现值美元算，现有债务是 4126 亿。

⑨见埃伦和莱比锡的“高债务贫穷国家计划”。

⑩3 个国家，不丹、老挝和斯里兰卡减少到可以加入这个计划。3 个最大的救济潜在候选国，苏丹、利比里亚和索马里，仍受到国内动乱的困扰。

⑪BWT 债务减免条件中的有趣例子包括：布基纳法索（水私有化）、喀麦隆（水私有化失败）、乍得（水私有化）、加蓬（水私有化失败）、几内亚（水私有化）、象牙海岸（水私有化失败）、莫桑比克（许多不三不四的私有化；一个灾难性的世界银行强加的腰果策略）、尼日利亚（水私有化）、塞拉利昂（水私有化）、坦桑尼亚（水和电力私有化失败）、乌干达（舞弊银行民营化）、赞比亚（2004 年冻结工资）和玻利维亚（水私有化，燃气私有化）。

⑫最初于 2004 年 12 月；后来延长到 2006 年 12 月。

⑬威瑞德是布朗的顾问。

⑭与 HIPC 不同，MDRI 没有巴黎俱乐部的参与。

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2006 年 8 月 25 日。

⑯例如，在菲律宾，至少国家一半的公共外债是被马科斯和他的亲信们偷走的。见亨利的《血淋淋的银行家》，第 3 章。

⑰只给出一个例子，2005 年末花旗集团的总资产是 1.5 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只有 2500 亿美元。



⑧这个矛盾的信条，是由美国政府最初应用于 19 世纪 90 年代古巴从西班牙所借的债务。这个信条的基本含义是为维护国际合同法，独裁者未经民众同意，其借外债的协议无效。这个信条事实上只是旧式新自由主义和约理论的合理扩展，该理论强调合约实施的基本要求是对合约义务的自愿同意。

新秩序——全世界的人民每天都在促进新秩序的形成。安东尼娅·尤哈斯为我们找到了追寻全球正义运动希望的待议事项。

第12章 全球正义运动： 抵制之网

安东尼娅·尤哈斯

埃尔韦拉是一个菲律宾的服装工厂的工人，在本书第9章中她向埃伦·奥古斯丁讲述了她向往的生活。在埃尔韦拉想象的社会中，人人都能够满足自身的基本需要，人人都有饭吃、有房住，每个孩子都能去上学，所有患者都有钱去医院看病。人人都有一份合适的、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本书的作者们就是要向埃尔韦拉和我们所有人揭示在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时所面临的许多障碍，曝光那些障碍的始作俑者——并且现在仍然维护这些障碍的人物和机构。读者朋友，只有当这些信息激励你，并且为了埃尔韦拉们，你自己会采取实际行动时，本书才能真正的成为一种力量。作为最后一章，本章主要聚焦在许多人物、运动和制度上。他们不仅努力消除障碍，还积极帮助建设埃尔韦拉梦中那公正又公平的社会。

■ 知情者的告白

2004年11月，约翰·珀金斯出版了《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该书取得巨大成功，原因之一在于它出版的时机。那个时候全世界有正在争论公司全球化是否成为全球化的一个趋势。公众不再问公司全球化的推动有多快，而是想知道公司全球化为谁服务，对其他人来说成本如何？



在约翰·珀金斯等经济杀手及其他他们工作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主要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组成的控制之网下而遭受剥削的国家，公开的抗议和反对之声数十年来不曾间断。北方国家的民众正逐渐了解并广泛宣传真相，受控制之网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及它们的支持者正在大声宣告经济杀手们对它们的伤害，但几乎没有经济杀手愿意承认控制之网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剥削。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约翰·珀金斯出版了《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

约翰·珀金斯并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揭露公司全球化的人，但他以北方世界的内部知情者身份，证实了这些批评是可信的。虽然许多人对这些批评听了多年，但却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而约翰·珀金斯在这本引人入胜的书中爆料的独家消息使人们相信了这些批评。况且，这本书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名（约翰·珀金斯以高度参与者的身份，在书中披露了大量独家的内幕信息，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该书的书名有几分吓人，但无损于书的价值）。《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的出版就好比打开了一扇门，透过这扇门成千上万的人可以窥探到公司全球化那黑暗的一面。而《帝国金钱游戏》一书则打碎了门上的合叶。但是，正如两书中许多章节所表明的，反抗公司全球化的运动，或者按我们的说法称为全球正义运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阴影之中。

理解全球正义运动的历史和目前正取得的成就——它促成了 WTO 的几乎崩溃和颠覆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地位，不但可以指明我们的方向，增添我们的力量，最重要的是给我们以希望，这使我们相信可以克服前面章节中指出的种种障碍。

约翰·克瑞斯滕森在第 3 章中对这些挑战做了最充分的描述。尽管他的分析主要关于公司避税港，但同样可以宽泛地应用于公司全球化。“给予跨国公司高过本国企业的优惠，这种做法建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技场。这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都意味着，给予北方世界的跨国公司相对发展中国家本土竞争者更高的优惠。”我要加上一句，公司全球化还相对本国较小的竞争者给予大型跨国公司帮助，将跨国企业的利益置于几乎所有其他考虑



(包括像埃尔韦拉那样的工人、消费者、环境和民主)之上。

克里斯滕森对问题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界定全球经济中的得益者，并解答了在本书提到的各种很明显的具有破坏性的政策仍被继续实施的原因所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谁为受益方。

正因这场游戏如帝国一样古老，所以对它的抵制和对其他选择的寻求有着同样漫长、重要、具有指导意义的历史。

■ 运动的兴起

当为推进公司日程的制度出现时，抵制当代(二战后)公司全球化的运动就开始了。外界，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强烈的批判以及将其取而代之的观点来自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它们被迫生活在这些机构的政策之下。这些国家的人民指出，指导国家间贸易条款的规则应有助于民主、健康、劳工权力、平等、稳定和缓解贫困。他们成功地在联合国内设立国际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机构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但是美国和其他北方世界国家，并没有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强有力联合国的要求，而是选择逐渐将它们对金钱、时间和政治的关注转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身上，因为它们对这些机构拥有绝对控制权。这样，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出现了分裂。一些国家觉得与其在联合国什么也得不到，不如选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能得到一些利益。另一些国家认为应该坚持立场，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裂的出现，加上缺乏北方国家的金钱和关注，使得联合国的许多计划最终流产，许多计划的作用也被削弱。而同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逐步得到了权力，增强了影响。

史蒂文·希亚特在第1章描述的控制之网在20世纪70年代缩紧了，当时发展中国家出现债务危机，随后引入了结构调整计划(SAP)。这些再加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激起了全球性反抗这些机构的斗争。



至20世纪80年代末，70多个国家屈从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几乎同时，在大致相同数目的国家内爆发了抗议活动。因为这些机构对人们生活的基本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面包的成本到电和水的获得，债务国的人民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题的专家（我本人从一个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的17岁小男孩那里学到了对世界银行政策的最受启发性的教训之一）。他们了解到，要带来变化，他们不仅要向他们的政府挑战，还要向在政府背后的国际金融机构挑战。

正如我和我的同事在国际全球化论坛上的报告——“全球化帮助穷人了吗？”中详细指出的，抵制公司全球化的运动有着悠长而又自豪的全球传统。^①例如，1985年在牙买加，谴责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计划提高油价的抗议遍及全国；两年后，在赞比亚，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导致食物成本上升，抗议达数月之久，最终迫使政府暂停了该项计划。1987年在厄瓜多尔，抗议的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举行全天罢工，反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新的结构调整计划；1988年在阿尔及利亚，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造成了物价上涨和失业，民众抗议，造成200多人被杀；1989年，抗议遍及约旦南部，抗议由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要求造成的食物价格上涨；1989年在尼日利亚，因抗议一项新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数十人被杀，数百人被逮捕，结果是尼日利亚政府提出了一项福利计划，称为“结构调整计划缓解措施”（“SAP Relif Package”）；1993年，印度50万农民聚集在孟加拉省反对成立WTO的谈判。还可以列出很多，而且抵制行为遍及全球。

债务国的人民不仅抗议，而且提出要求。要求包括：结束结构调整计划，取消债务，引入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些要求传入了债权国人民的耳中，他们中许多人和债务国的人民联合起来，成为汹涌的全球正义运动的一部分。

但是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激进的公民和北方国家的一些盟友，进行着日复一日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斗争，他们却不能对付一个更具潜在破坏性的怪兽：悄然兴起的世界贸易组织。



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不是政策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为了打击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更公平要求的替代机构。

■ 公司全球化冲击北方：NAFTA，WTO 和 MAI

你也许从未听过国际贸易组织（ITO），它是 WTO 的前身。由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所以它从未真正出现过。ITO 宪章是在 1948 年在哈瓦那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上确定的，与会 56 个国家的代表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在 ITO 框架下，贸易只是被视为取得经济发展多种工具中的一种。ITO 还包括：充分就业协议；取消公司垄断；确保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得到公平对待的商品贸易协议；其他保护国内市场的措施。当 ITO 的详细条款被商定时，关贸总协定（GATT）作为 ITO 成立之前、过渡性的国际谈判机构，得以建立起来。但是，美国国会主要由于 ITO 条款未能保护美国公司海外运营的投资利益而反对 ITO，建立 ITO 的构想破灭，使得过渡性的 GATT 在将近 15 年里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仲裁机构。^②

尽管 ITO 终结于哈瓦那，但平衡国际贸易体系的信念却没有终结。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整个南方世界的人民也日益倡导，将 UNCTAD 作为创建国际贸易规则的最佳平台。他们希望的规则是：设定合理价格的商品价格协议；鼓励南方经济发展的贸易优待；给本地投资者较外国投资者的优待政策；使用贸易政策作为合法的工业化工具；制定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的计划。^③但他们得到的却是 WTO。

1986 年，政府官员相会于乌拉圭，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扩展 GATT 的权限和影响力。七年半之后的 1994 年，125 个国家签署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最终完成。

北方世界国家可以供养得起许多全职的谈判代表，来监督和参加全世界每一个国际谈判地点的会谈，而且追踪贸易法的每日发展。但几乎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这些。一旦发达国家提出了分歧，而出席马拉喀什的南方国家的代表们数量很少，还过于缺乏情报，又缺乏能力，以致不能提出有意义的谈判意见。



与之相对，北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利益推动着乌拉圭回合，正如大卫·哈特里奇，当时 WTO 贸易和服务部的负责人，在 1997 年坦率地写道：“没有美国金融服务部，尤其是美国运通和花旗集团等公司施加的压力，就不会有服务协议，因此也许不会有乌拉圭回合和 WTO。”^④

当乌拉圭回合产生时，美国和加拿大正进行贸易谈判，并于 1989 年告终，成立了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5 年后，随着墨西哥的加入，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NAFTA 和 WTO 代表了贸易协定的全新方向。本质上，对它们最好的描述也许是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扩展它们的深度和宽度，并将它们无差别地应用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北方的公司认为与其它们在国外奔波，还不如在国内获得同样的利益。

■ 全球运动的出现

最初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公司全球化的全球运动中，有些人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债务。这些人积极参与基层组织 and 团体的运动，揭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组建了一些国际机构，如“50 Years Is Enough”和“Jubilee 2000”等，这些机构游说当选官员，实施分析，并发布报告。他们举行公开演讲，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在本国有抗议行为，还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和全世界大型公司的总部发动抗议。^⑤他们以上的这些做法被更广泛的全球正义运动采用。

当债主国的人民自己突然遭受全球化政策的弊端，或者说当更多的北方国家的人民开始直接体验到公司全球化政策的黑暗一面时，这项运动就发生了较大转折。

坚定的激进主义者构成网络，联合起来对抗 NAFTA 和 WTO，这些行动者包括环保的、基于信念的、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和消费者倡导社团。但是他们的国际联系很有限，他们初始的成员数目也相当少，因此他们的影响也不能被真切地感受到。当协议被实施，所产生的成本为人感受到时，



运动也开始发展，他们的共同努力超越了事件发生的区域，跨越了国界和世界各地区。

这场全球运动的力量首次为人所知，是当其挫败了 WTO 和经合组织内提出的两个多边投资协议。这些投资协议是基于 NAFTA 的新措施，这些措施严重背离了传统的多边原则。NAFTA 赋予国外公司和投资者前所未有的权力，使其凌驾于这三国政府之上。美国和英国的谈判代表希望在 27 个国家的经合组织内和多于 130 个国家的世贸组织内，也实施这些同样的规则。

一场胜利：挫败多边投资协议

全球投资者大胆地征求权利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南方的和北方的，将处于这些规则之下，这两者结合起来催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反抗运动。发展中国家的激进行为者是最先注意这些情况，并采取行动的。他们和本国的代表们一起，在 1996 年 WTO 部长级会议上，挫败了多边投资协议（MIA）的提案。他们的成功使得 MIA 的拥护者们加强了推动措施，意图使该协议在 OECD 上通过。OECD 是世界上 27 个富裕国家的俱乐部，而协议重提时被重新命名为投资的多边协议（MAI）。

北方受其影响的人们作出回应，他们向南方那些人寻求经验和指导。1997 年，我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一次策略性会议。会议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们公开讲授 MAI 可能带来的影响。与会者有来自欧洲、美国以及南方和北方的其他国家的激进行为者们，他们所有人联合起来，试图共同挫败这项新协议。相关信息随后被带回去，并广泛应用在传统教育和游说活动中。

例如，作为 MAI 运动的协调者，我就职于位于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宣传中心。我给人打了数十个陌生的电话，这些人是关注环境、工人权利、妇女权利、小型企业、社区组织、经济和社会正义和其他事情的拥护机构的代表们。我主要是向他们解释 NAFTA 和 WTO 对他们现在的影响和 MAI 对他们和他们工作的可能影响。接到电话的大部分人以前从未考虑过国际贸易规则或投资规则。当明白内情后，他们感到震惊和愤怒。一个听完讲述的国会议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工作在“Public Citizen”、“Friends of the



Earth”、“Sierra Club”和“AFL-CIO”的同伴也打了同样的电话，他们听到了同样的反应。我们的国际合作者们也一样。

当激进行为者们日益跨国界地联合起来，揭露谈判过程的内幕时，政府感受到压力，并最终在1998年的OECD会议上拒绝了MAI。这次行动的胜利标志着政府和人民在反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协议上取得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球运动的胜利。

同时，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并开始传播，充分揭示了这些投资规则的破坏性事实。危机中的这些亚洲国家因其繁荣的经济曾被誉为“东亚之虎”，但1998~1999年间，当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限制其能力，使其不能控制国外投资流向哪个部门，不能控制这些资金的数量和逗留时间时，这些国家的经济突然崩溃了。当国外投资者开始投机这些国家的货币时，就像他们是在全球娱乐场内玩耍，这些国家的政府却无力采取行动。当金融危机蔓延到阿根廷时，对全球金融灾难的恐慌引发了一场抵制浪潮。

一场胜利：WTO 西雅图部长级会议的崩溃

每两年，WTO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高级政府官员们就现有的和新的WTO规则进行最后谈判。MAI的拥护者们真是短视得很，竟在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重新启动了投资谈判。作为回应，曾经为挫败MAI而努力过的人民，东亚深受IMF投资规则所苦的人民，努力反对世界银行和IMF类似政策的人民，联合了起来。他们扩展了全球教育和传媒活动、组织和游说的努力和针对西雅图会议的策略性计划。基层运动在全世界兴起，涉及公共教育、剧院、艺术、各种媒体、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和公民不服从培训。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这次会议的历史性崩溃，人们戏称这次事件为“西雅图之战”。

5万多人涌现在西雅图的大街上，抗议WTO。数千人采用了和平阻碍的策略，即从会议第一天开始，阻挠谈判的进行达数天之久。骚乱中的警察采用了暴力，使得攻击性的行为遍布全城，事实上只有几个抗议者向一些商店的窗户扔了砖头。人们在街道上抗议，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也抱成一团，声称他们不再简单地忍受美国和欧盟的无理要求。结果，会议崩溃。



事实上，街道上的许多人作为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的顾问已行动了很多年了，因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国际贸易规则的详尽教训，还提供了全球各地每天进行的贸易谈判的信息。

西雅图会议之后的许多日子里，反对公司全球化的公开行为仍在继续。昭示着谈判内部正在进行的事情：全世界的政府领导者正在拒绝公司全球化的突进。

■ 全球“起义”

WTO 对话在西雅图崩溃 5 个月后，2000 年 4 月，约 3 万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和 IMF 的年度秋季会议。2001 年 1 月，1 万多人聚集在巴西阿雷格利港，参加第一届年度世界社会论坛，组织该论坛的唯一目的是讨论公司全球化的有效替代选择。现在，世界社会论坛每年固定的参与人数已高达 10 万人，而且在世界各地每年还会举行地区级和国家级的论坛。

2001 年 4 月，6 万人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抗议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FTAA 是连续三届美国总统的梦想，这三位总统是：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但是对该协议的反对使得 FTAA 于 2005 年被废除。2001 年 7 月，20 万民众聚集在意大利的热那亚，表达他们对公司全球化的反对，此时八国集团（G8）正在那里举行年度会议。这次事件应当被人们永远铭记在心，因为年仅 23 岁的卡洛尔·朱利安尼（Caho Giuliani），在参加抗议时被警察枪杀。

2001 年 3 月，WTO 会议在泰国清迈召开，于是数以百计的农民和学生在场外抗议。他们向大厅内倾倒马铃薯、大蒜、洋葱和大豆，来表达 WTO 农业协议对他们的伤害。11 月，包括农民联盟在内的 1000 多人聚集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参加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世界论坛。该论坛的召开是为了反对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 2001 年 WTO 部长级会议。

2003 年，来自墨西哥、中美洲，甚至韩国的农民共同领导了一场数万人参加的游行，抗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 WTO 部长级会议。韩国农民李昆



海（Lee Kyung Hae）在坎昆自杀，以抗议 WTO 农业协议。数千 WTO 抗议者惊讶地看到，李胸口挂着牌子，上写“WTO 杀死农民”，从口袋中拿出一把瑞士军刀，刺入胸口，扎伤了心肺。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看客。李用行动抗议 WTO 农业政策，这个政策使他的农场破产，使他的家庭陷入贫困，还毁了他生存的家园。他留下了一张纸条，上写“1 个人为挽救 10 个人而死，总比 10 个人为 1 个人而死要好”。^⑥

WTO 农业协议是分阶段实施的。随着实施的深入，其对全世界农民的毁灭性影响也就越大。中美洲的小农场方式和无土工人运动，遍布全欧洲的慢食运动，美国的全国家庭农场联盟和社区工人联盟以及其他全国的和国际的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呼吁支持当地小型可持续发展农业的贸易政策，拒绝支持大型工业化的跨国农业公司的贸易政策。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农场主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运动。墨西哥恰帕斯的农场主、农民、工人和市民组成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他们选择 1994 年 1 月 1 日，NAFTA 开始实施的这一天，发表了“拉坎顿丛林第一宣言”，并得到了墨西哥恰帕斯的 6 个市政席位。

萨帕塔主义者的发言人说过：“对我们来说，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墨西哥种族的死亡证明书”。^⑦

回到坎昆，这些农民迎来了全世界各地工人和市民的加入，他们在大街上联合起来。他们的努力支持了许多参加会议的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造成了又一次部长级会议的崩溃。2005 年香港 WTO 部长级会议也一无而终。

事实上，自 1998 年以来，唯一一次没有崩溃的 WTO 部长级会议是 2001 年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当时“9·11”恐怖袭击刚过去两个月，卡塔尔正禁止政治异议和不允许自由进入。多哈的谈判代表孤立无援，被迫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美国政府一边，还是站在反对美国政府一边。但是，五年时间、三次部长级会议失败之后，多哈回合已经名存实亡。而且，许多人相信，所有这些也为整个 WTO 机构敲响了丧钟。该机构终将死亡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者开始反对公司全球化。



■ 选举的胜利

纵观全球，各国的全球正义运动影响到政府官员的选举，由此来体现民众意愿。这些官员当选之后抵制那些公司全球化的机构。泰国“聚焦南半球”组织的沃尔登·贝洛指出了在东亚金融危机时，公众压力是如何迫使马来西亚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拒绝 IMF 的建议，采取限制资本流动的政策，从而避免了金融危机的最坏影响的。瓦尔登·贝洛写道：

“马哈蒂尔蔑视 IMF 的态度并没有被他信注意到，而且他信站在反 IMF 的立场上竞选泰国总理并当选。他推动大规模的政府支出以刺激消费者需求，最终引导泰国走出衰退。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完成了贬抑 IMF 的一系列行为，2003 年当选阿根廷总统后，他宣称阿根廷政府所欠私人借贷者债务每美元只还 25 美分。这激怒了那些借贷者，它们要求 IMF 教训基什内尔。但由于其狼藉的名声和制裁手段无效化，IMF 面对抛弃债务贬值观点的阿根廷总统，选择了退缩。”^⑧

同样，华盛顿“Public Citizen”的洛里·沃勒克和黛博拉·詹姆斯写下了席卷中南美洲的竞选胜利的声明：

“声称能够带来经济增长、能提高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彻底失败了，那些拒绝上述发展模式及其种种政策和发展日程的政治家们赢得了选举的胜利，这已是广泛的共识。这些在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先前新自由主义政府的领导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完全陷入瘫痪。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墨西哥传统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即便在这些国家，总统选举也完全被对贸易自由化的争论所左右。”^⑨

全球正义运动也已成熟起来。例如，受一些机构联盟的影响，美国有组织的工人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不断发生变化。起初，他们支持公司全球化；随后，他们只支持有利于美国工人的情况；最后是普遍反对剥削全球工人的行为。在美国，白人激进者和非政府组织（NGO）们已不再是主要力量，农场工人、移民、非工会工人和年轻人正逐渐取得领导权。



■ 胜利：取消债务和世界银行、IMF 的退出

北方国家的许多行为主义者进入世界银行和 IMF 工作，通过他们有组织的努力来对抗 WTO、NAFTA、MAI、出口信用机构和个别的企业和银行。随着更多的人加入全球正义运动的行列，世界银行和 IMF 内部进行基础改革就成为必需的了，改革行为包括取消债务，而不仅仅是债务免除。

2005 年 2 月，G8 的成员宣布，它们将向 42 个高负债贫穷国家（HIPC）提供 100% 的多边债务免除。尽管我同意詹姆斯·S·亨利在第 11 章中所说的：债务免除并没有走的更远，它未能解决商业债务，也未能解决上百个不符合 HIPC 标准的贫穷国家的债务，而且债务取消和许多繁琐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但这仍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世界最贫穷国家要求取消债务已有 25 年。社会运动、这些国家的当选政府和它们的全球支持者尽情地享受着胜利，但并没有裹足不前。当它们成功地从 HIPC 项目中得到更多时，它们还想从 G8 得到更多。在进行的斗争中，它们将一直需要我们提供的所有支持。

多年的批评、抗议和激进行为最终迫使 G8 屈服，签署了所有成员国政府都不情愿的协议。该协议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声明，即承认世界银行和 IMF 的政策和更广泛的公司全球化，不仅未能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使之有所恶化。上述声明使这些机构名誉扫地，而公司全球化的政策也不能再被忽视。

在社会运动、基层活动者、执政官员和 NGO 的压力下，各国政府正削减向世界银行和 IMF 的支付。许多国家拒绝接受新贷款和拒绝支付旧贷款，阿根廷就是这么做的。它们通过拒绝从这些机构接受钱和向它们支付金钱，来挑战它们的权威。结果是这些机构的威信，像 WTO 一样，很大程度上被降低了。

但是，如果全球正义运动帮助将 WTO、IMF 和世界银行退出，那么我们该拿什么来取代它们呢？下面的有些建议结合了我最近一书中摘录的内容，这本书书名是《布什议程——侵略世界，一个时代的经济》。^①这



些建议提供了一个路标，帮助管制公司权力和帮助建立埃尔韦拉梦想中的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的社会。

■ 运用替代政策来消除经济杀手和控制公司权力

本书中详述的腐败问题主要源于公司和银行在政策制定方面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伊拉克战争是这种权力的最后指示器，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实现公司全球化、石油财富和全球霸权。

那么，我们该如何消除经济杀手、控制公司权力和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以促进对有益的可行选择的追求呢？

全球正义运动向全世界表明，同公司全球化政策的支持者使我们相信这些政策相比较，取代公司全球化政策要容易得多。公司全球化是一系列政策组合，设计这些政策是为了削弱地方团体和政府指定规则的能力，这些规则是国外公司在本地区经营时所要遵守的。因此替代选择是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允许地方团体和政府制定条款，以管制国内和国外公司的运营。

反对公司全球化规则的理由常常是：当制定一项政策时，通常会忽略一系列竞争性的利益，如环境利益、劳工利益、人权、公平等。公司的利益践踏了一切。这里没有平衡，没有争夺。事实上，只有一群人在决定结果。他们的政策同时增加了公司的财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影响，消除了民主过程，却产出了布什政府的缩影——混合的公司政府。不断增加的公司政治影响直接转变成对政府管制或不管制的影响，如离岸避税天堂，世界最大银行民主德国灾难性的借贷策略和出口信贷机构推动的经济掠夺。

如果国家政策集中在当地经济发展、限制跨国公司权力方面，那么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水平和控制它们的需要，都会大大降低。但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将会而且应该存在，所以管理它们的规则仍是必要的。

世界银行、IMF 和 WTO 完全没有实现它们的目标。它们不但没有减轻贫困、促进平等和稳定，反而加剧了贫困、不平等，和不稳定。因此，它们该退役了。正如本章前些部分所描述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地在联合国内部建立了国际联合体，以处理发展和贸易条款问题。需要对联合国进



行反“公司化”的改革。它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更多的公众注意，更多的透明和民主，更大的影响。尽管有着许多缺陷，联合国仍是有着最广泛委托托管权的机构。与世界银行、IMF 和 WTO 相比，它更开放，也更具民主性。在操作上，联合国也赋予人类、社会和环境更大的权重。如果要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那么改革后的联合国就是做这件事的地方。³³

■ 民族运动和创造选择的机构

全世界的人民并没有在等待机构的变革，他们现在正努力实施有意义的可行方案以替代公司全球化。在阿根廷，流行运动创建了一种横向的机构模式。这个模式有许多重要特点，“里民大会”是其中之一。在“里民大会”上，人们决定如何处理类似于垃圾收集、壶穴或路标的维修、学校上课和城市预算等事情。它是直接民主的一种方式，即人民直接参与做出会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和经济决定。此外，许多阿根廷工厂和其他主要的企业现在成了由工人运营的合作社，这些组织的决策是在工人大会上做出的。对于工资、工作日程安排、材料、分配和健康福利的决定，所有工人拥有同等的决策权力。

威斯康星州推进民主革命的自由树基金会和加利福尼亚的媒体专家 SmartMeme 与当地社区和政府合作，在美国建立了一种新的民主运动，该运动主要关注直接民主。工人合作社在美国的出现也越来越多。2004 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美国工人合作社联盟。今天，其成员已遍及 30 多个行业，包括银行、面包店和网站设计公司。这个联盟赞成由工人拥有公司，并进行管理。

在玻利维亚，世界银行强加的供水私有化措施失败后，科恰班巴的民众另外建了一个供水系统，一个政府、社区和工人的联合体。这个系统成为了全世界供水系统的典范。SEMAPA 公司由 7 个成员的董事会管理，在这 7 个人中，3 个由社区民主选举产生、2 个来自市长办公室、1 个来自专业学校、1 个来自工会。每周一次的会议在不同的社区召开，以评估需要、确定价格以及考察整个体系的运转情况。富裕的公民补贴收入较低的公民。



这样，当将服务扩展到城市最贫穷的地区时，公司也可以保持价格不变。这些贫穷地区，许多以前从未得到过水源供应。玻利维亚的新总统埃沃莫拉莱斯积极参与了这场供水改造运动。

2003 年，亚特兰大城的官员们取消了一笔美国最大的私人供水交易。在经历了 4 年的价格不断上涨、服务恶劣、发生违背协议的现象和公众的呼声后，富兰克林市长取消了与美国供水公司的一份 20 年合约。一些集团，如华盛顿的食物和饮水观察，正努力在全球呼吁，宣布饮用水为人类受保护的基本权利，应该成为安全、价格合理和人人可以得到的公共服务。

在美国，由于联邦政府未能控制公司运营，各地社区和州正努力承担这项任务。例如，1998 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维恩镇通过一项法令，禁止 7 年内三次及以上违背管制规则的任何公司在其辖区内经营。4 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波特镇挑战公司的宪法权利，通过了一项法令，指出“公司不应该被视为人一样的个体，不应该受到美国宪法或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宪法的保护”。2006 年 6 月，加利福尼亚的洪堡县将这项立法推进一步，通过了一项决议，不仅直接挑战公司的人格问题，而且禁止外县公司介入当地政治活动。

2005 年，密歇根的夏洛瓦镇是赞同下述法令的数十个城市之一。该法令给予地方政府限制大公司规模的权力。同年，马里兰通过立法，要求该州拥有 1 万名以上雇员的机构至少要花费其工资总额 8% 的数目用于健康福利。受到这项立法影响的公司有沃尔玛。其他几个州也提出了类似的立法。

在全美国还出现了一些有力的运动，要求实施对石油和其他垄断公司（包括沃尔玛）的反托拉斯立法。华盛顿的国际石油变革组织（Oil Change International）领导了一场运动，被称为“石油和国家的分离”。有许多运动是使用公司宪章，来迫使公司为其非法的和其他不可接受的商业行为负责，无论这些行为发生在美国还是国外，都要负责。还迫使投资者为他们投资的公司所造成的伤害负责。

和平和全球正义运动已经联合起来，揭露伊拉克战争中的公司利益和推动布什政府的公司全球化议程，包括美国和中东的自由贸易区。对柏克德和哈利伯顿公司的批评，“旧金山湾的停战直接行动组织”等机构的努



力，促成人们不断在这些公司的总部进行抗议。这些机构公布了对这些公司在伊拉克所作所为的严格分析，这些分析又被媒体大肆渲染。随后是国会的质询和调查。许多机构，如纽约的和平和正义联合、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加利福尼亚的全球交易和公司观察等，都有助于施加和维持压力。

忍受不了来自公众、媒体和国会的持续负面压力，柏克德的管理者决定不再参与伊拉克任何新工作的竞标，解放了迫切需要美国资金的伊拉克公司。联邦政府至少也取消了一项柏克德在伊拉克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巴士拉的新建儿童医院。取消的原因是一份调查表明这个项目几乎超出预算9千万美元，而且比预定日期延迟了一年半以上。数十项对柏克德的指控正在接受政府机构的调擦。最重要的是，2006年，美国军方取消了柏克德的最大的政府合约，LOGCAP，这个合约涵盖了对全世界美国军方的后勤支持。柏克德将继续完成它现在的伊拉克合约，但是下一年 LOGCAP 将会分解成几个较小的合约，由几家公司共同竞争投标。

■ 重获民主：你能做什么

过去用来推动公司全球化政策的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公司领导者们想出什么新策略时，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最近的两次策略变化是利用军队来推动在伊拉克的公司全球化目标和回归双边贸易协议。对第一件事，我们能做的是继续阻止坏事情的发生，同时尽力支持好的事情。本章提到的许多机构和人民的运动正在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必需的抗争和抗议新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等。在我的网站（[www. TheBushAgenda.net](http://www.TheBushAgenda.net)）上，我提供了许多反战和全球正义网络的链接，包括国家青年和学生和平联盟和 [www. bilaterals.org](http://www.bilaterals.org)，追踪双边谈判的最佳网站。

由于公司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有如此广泛的影响，所以反对它们的运动也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人们来自全球的各个角落，有着各种不同的特殊需要和关注事物。因此全球正义运动常常被描述为一项运动的运动：抵制公司全球化的不同地区正日渐联合起来，寻找共同的目标，来改变现状。

什么时候，从哪儿，你会进入这副图景呢？你能做什么？有此虽然没



有告诉你怎么做和做什么，但这里给出的建议曾经帮助过我参与并支持全球正义运动。

认识你自己

这个世界上，你扮演着许多角色，像工人、捐助者、消费者、服务提供者、服务接受者、投资者、雇主、选举者和居民。每一个角色都有责任、影响模式和对应的圈子。你可以在圈子里进行组织，建立潜在的联盟。

例如，作为消费者，你会觉得有责任了解所买的产品。你的影响方式包括不购买某个产品。因为其对环境有害，或者其生产方式有害，或生产工人受到恶劣对待。你也许希望购买的产品是符合环保要求的，或者是由工会工人或合作社生产的。你可以组织起来的圈子包括你的家庭、朋友、邻居和产品的其他消费者。你潜在的联盟包括产品的生产工人和产品生产地、丢弃地的居民。

2005 年，为塔可钟（Tac Bell）墨西哥速食店摘西红柿的农场工人和速食店的顾客联合起来，打了一场大胜仗。2005 年 3 月 8 日，农场工人 25 年来第一次成功地涨了工资，这是 10 年来佛罗里达州伊莫卡利工人联盟组织斗争的结果。这次斗争包括一次持续 10 年之久的、全国性的联合抵制塔可钟墨西哥速食店和它的母公司的活动，约 300 所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及 50 多所高中的学生参与了这次抵制。他们在 22 个校园里关闭了连锁速食店或阻止其开张，并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组织——学生农场工人联盟。这清晰地表明了公司的目标市场和生产食物的工人之间存在着联合。

消费者、生产者和销售者联合在一起，设立了公平贸易证书的标签。这个标签是唯一独立的、由第三方给予消费者的保证，表明某公司严格遵循了某类产品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标准。该证书有助于为生产者创立一个更平等、更可持续的贸易体系。

了解信息和消除偏见

弄明白你们的养老金被投资到哪里，你们的产品是如何生产和处理掉的，为什么战争在以你们的名义进行，税收被用到哪里，谁在避税等问题。



想想你不会和任何人有共同之处，更不会和____一起工作？想想关于____你没什么需要了解吗？想想关于____就没什么可以做的吗？想想你真的没有时间去____吗？再想想。

要受到激励并相信这场运动

你不必参与每次斗争，因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和你并肩战斗。你应该参与自己能发挥最大效率的运动，这运动随时间会发生变化。但你不必打击所有的邪恶事物，也不必做每一个你能想象得到的积极行为，因为只要努力过，就会有所改变。我们不必像完美主义者那样，成为推动变化的激进分子和代表。知道许多人在努力促进债务解除，推动清洁能源，打击石油公司腐败和追求和平，你就能专注于最能触动你的事情上，你就会觉得你在斗争中最有效地支持了其他人。而且，你还可以和专注于其他领域的人维持联盟。

相信行动：积小胜为大胜

请记住波士顿茶叶党，妇女政权论者，民权运动，OECD 上多边投资协议的崩溃，数百万阻止了国会和布什政府在反移民的轨道上继续前进的移民权利的支持者。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比什么也不做强，一百万次小行动加起来也能促成大的转变。正如丽贝卡在她《黑暗中的希望》一书中所写的：“世间总会有残忍的事，总会有暴力，总会有毁灭。我们不能永远地消除所有的灾难，但是我们可以减少这些事，使它们成为非法事件，削弱这类事件的基础和根源。这些就是胜利。”^②

推动你的信念和扩展你的技巧

如果你反对战争已有3年或3个星期，那么和你的家庭成员、你所在的教堂、你的同事讨论你的反抗情绪，可以吗？为什么不给报刊写信或参加你的第一次抗议游行呢？是否为选举中的政治问题感到沮丧？为什么不参加直接民主运动呢？对主流媒体失望？为什么不寻找独立性的媒体，或者创建你自己的呢？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没用吗？那么为什么不想出自己的



主意，并付诸行动呢？学习新方法，将信念变为行动，这样就会觉得舒服许多。

向长期斗争的人们提供帮助

倾听斗争中的人民运动，了解你的行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需要，然后回到第一步“认识你自己”。

■ 充满希望的展望

我们从来都拥有对抗霸权势力的力量。本书中杀手们现身了，不是为了请求我们的原谅，而是要号召我们行动起来。幸运的是，我们有了这么一场运动，可以从中学习，可以参与进去，可以教育他人和扩展影响。

我们的故事还只是刚刚展开，互动的全球民间社会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可能，去制造深刻的变化，去创造真正服务于全球大众的好机构。埃尔韦拉的梦想也是大家的梦想，是梦想，就会给予我们希望！

【注释】

①杰里·曼德和德比·贝克等（安东尼娅·尤哈斯，主要研究员和项目协调员），“全球化帮助穷人了吗？”特别报告，国际全球化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国际全球化论坛公告》（*IFG Bulletin*）第一卷，第3期（2001年8月）。

②丹尼尔·多齐，“ITO 短暂而重要的一生”，（多伦多：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罗伯茨加拿大研究中心 [Robarts Centre for Canadian Studies]，2000年9月）。

③沃尔登·贝洛于“南方观点”网，萨拉·安德森编辑（旧金山：Food First Books 和 2000 年国际全球化论坛）。

④大卫·哈特里奇，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和服务部的负责人，“服务贸易总协定可以做什么”，“对世界银行业开放市场：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大会的发言，由英国贸易小组和高伟绅跨国律师事务所组织，1997年1月8日，伦敦。

⑤马克·恩格勒，“一场运动的前景”，《聚焦国外政策》（*Foreign Policy in Focus*），2005年5月19日。

⑥路易斯·赫尔南德斯·那瓦罗，“李昆海先生”，《La Jornada》，2003年9月23日。



⑦曼德和贝克等，“全球化帮助穷人了吗？”。

⑧沃尔登·贝洛，“多边主义的危机”，《聚焦国外政策》，2006年9月13日。

⑨洛里·沃勒克和黛博拉·詹姆斯，“为何世贸组织回合谈判会崩溃”，《共同梦想》，2006年4月14日。

⑩安东尼娅·尤哈斯，《布什议程——侵略世界，一个时代的经济》（纽约：ReganBooks/HarperCollins，2006）；也见我的网站：www.TheBushAgenda.net。

⑪杰里·曼德和约翰·卡瓦耶等（安东尼娅·尤哈斯，共同作者），《经济全球化的备选方案——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第2版（旧金山：Berrett-Koehler，2004年）。

⑫丽贝卡·索尼特，《黑暗中的希望——未讲述的历史，异想天开的可能性》（纽约：Nation Books）。

作者简介

埃伦·奥古斯丁想要创建一个公正、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世界的激情促使她竞选美国国会议员，并发现了四个非营利的焦点：媒体暴力、辅导边缘青少年、国民外交、环境心理恢复。她以一种乐观的心态与埃伦·施瓦茨合著了《夺回我们的企业优势时代》，确认我们时代的需要和为此展开自觉行动。现在她讲的是“希望”的故事：概括描述那些通过环保功能、沟通关系和培养扶持我们的学校创建企业，获取利益（www.storiesofhope.us）。她为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呼吁——维持当前和未来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的平衡——2005年，她出现在许多广播、电视节目和杂志如《Utne Reader》中。她曾任职于几个非营利组织，其中包括全国妇女政治会议和“Sierra Club”。

由于在工业、技术教育等领域都曾任过职，史蒂夫·贝尔克曼在1983年加入了世界银行的非洲地区分部。他的工作是对银行的出资计划提供建议和进行协助，他在21个国家工作过。经过几年工作，他发现银行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是错误的，他试图说明管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无人理睬，直到1995年詹姆斯·沃尔芬森行长的上任。他本该在那一年退休，但1998~2002年期间，他又被银行召回帮着建立反腐败和诈骗研究机构，并成为一些案例的研究带头人。自从2002年以来，他帮助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立法呼吁改革多边开发银行和帮助参议院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前，他正在整理一份世界银行内部对于银行管理、贷款业务以及被窃取了数十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的看法的文稿。现在，他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李斯堡。

英国著名小说家索玛塞特·马格哈姆把摩纳哥这一地中海沿岸的避税者天堂描述为“一个对于卑劣的人来说充满阳光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约翰·克里斯滕森返回泽西，一个英吉利海峡的对于那些卑劣的人来说充满阳光



的地方，探讨境外避税是如何操作的。在金融管制盛行的那些年里，他曾经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公司管理者和岛上的政府经济顾问而工作。虽然忠实于公平交易和社会正义原则，他还是参与了全球化的离岸金融业，促进资本外流、逃税和洗钱。1998年，他辞去在泽西的职位，举家搬迁，并成为强调避税如何造成贫困运动的创始人。他现在在指导国际秘书处税收正义网（www.taxjustice.net）。

S·C·格温是《德州月刊》（*Texas Monthly*）的执行编辑，以前曾是《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在1977年拿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后，他在小说写作方面得到了霍普金斯大学小说家约翰·巴斯的指导。但他的创作生涯与在中东、北非和亚洲管理国际贷款的五年经历联系在一起，先是在克利夫兰信托，后来是在加州第一州际银行香港办事处。在20世纪80年代，格温离开银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和许多媒体有合作关系，包括《Harper's》、《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月刊》和《加州杂志》。1985年他写了第一本书《兜售金钱——一位年轻银行家对巨大的国际借贷热潮非凡起落的解释》。1991年格温尼和伙伴《时代杂志》通讯员乔纳森·比蒂以BCCI时代丑闻为素材的《著名财务报告》赢得《时代杂志》杰洛德·罗布奖、杰克·安德森年度最佳调查记者奖。他们后来出版的书籍《非法银行——追踪BCCI的中心秘密》，被《商业周刊》评为当年的十大畅销书之一。

詹姆斯·S·亨利是著名的调查记者、经济学家、律师，撰写了大量有关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腐败和洗钱的文章，他的新闻报道曾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民族报》、《财富》、《巴西日报》、《板岩杂志》（Slate）、《金融家报》上。亨利的调查包括1992年取得了给巴拿马的曼纽尔·诺列加定罪的书面证据；巴拉圭独裁者斯特罗斯所偷窃资产的境外踪迹；鉴定菲律宾中央银行和外国贷款在马斯科致富中所扮演的角色；记录美国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洗钱和逃税等方面的作用。他撰写了几本书，包括《经济战略规划》（Lexington Books, 1986年）和《血淋淋的银行家》（Avalon, 2003年），《镣铐和奴役的贡献者——菲律宾外债读本》（TNI, 1992），主编为艾曼纽·S·德迪奥斯和乔尔·罗卡莫拉。他的新书《海盜银行家》，由Avalon在2007年推出。他领导美国律师协会的税收研究工作，并且多次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亨利目前是萨格哈博集团的总监，这是一家战略顾问公司。他的新闻博客潜水市场（[292](http://www.sub-</p></div><div data-bbox=)



mergingmarkets.com)，有助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他和两个孩子现住在纽约市及纽约的萨格港。

史蒂文·希亚特是专业编辑和作家——但作为活动家，也有很长的经历。1965 年在美国德梅因，他是第一个对一个城市的同等房屋条例做实证分析的人。他编辑的地下报纸，活跃在反对越战的运动中，后来他成为一所社区学院的教师和教师工会的组织者。后移居加州，在美国斯坦福研究院（SRI）工作了很多年，这是一个跨国企业与政府的智囊机构，为它们做顾问服务。该机构和柏克德、雪佛龙、美国银行及 EHM 世界的其他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主编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分发给“全球财富”上的 1000 家公司，鼓吹新自由主义标准处方，例如公私伙伴关系。1987 年离开 SRI 以后，他开始为新闻媒体及其他出版商撰稿。和他一起工作的作者还有亚历山大·科伯恩、迈克·戴维斯、刘易斯·H·拉帕姆、克里斯丁·帕伦蒂和丽贝卡·索尼特。他和迈克·戴维斯是《炉中火——美国激进政治的位置》（Verso，1989 年）的共同编辑。希亚特现生活在旧金山，现在是 Editcetera 的主席，这是一家非盈利的旧金山湾区专业出版人员组织。

安东尼娅·尤哈斯是华盛顿的一位政策研究学会的访问学者和《布什议程——侵略世界，一个时代的经济》的作者，这本书探讨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整个中东使用军事手段推进企业全球化议程（www.TheBushAgenda.net）。尤哈斯以前曾担任全球化国际论坛的计划主管以及国会议员约翰·霍尔特和康明斯的法律顾问。作为一名获奖作家，尤哈斯经常出现在《洛杉矶时报》的论坛版页及许多其他报纸和刊物上。她是《替代经济全球化——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Berrett - Koehler，2004）的丛集作者。她现住在旧金山。

凯瑟琳·克恩自从 1993 年就同基督教和平制造者团队（CPT）一起工作。“当致命的冲突是一种现实或被公共政策所支持，CPT 为以信仰为基础的人们提供组织支持。”（见 www.cpt.org）。然而，工作队在海地、恰帕斯和其他地方发现，一旦致命暴力冲突的风险结束，而经济暴力到位后将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克恩曾在海地、巴勒斯坦、恰帕斯、南达科他州、哥伦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任职。2005 年秋天她随代表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做了调查，她在那里收集到的信息出现在这本书里。克恩说，她可能是一位很独特的作者，因为她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或商业理



论。所以她最近嫁给了一个拥有经济学学位的人，这样就有人能审核她的文章了。

露西·科米萨是一名以纽约为基地的随行记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她访问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写了很多有关她访问的一些国家发起运动推翻暴君统治的报道。当她和诸如菲律宾、海地、扎伊尔的反对派谈论时，他们总是这样评价独裁者：“他抢劫国家的一切，然后把它们全部放在瑞士的银行里。”她发现，这是一个平行的由世界上最大银行操纵的国际金融体系，使用秘密账户和空壳公司，在离岸天堂开曼群岛和泽西掩盖和转移独裁者、贪官、贩毒者、人口贩子、恐怖分子、商业诈骗者、股票操控者、企业和富人中的逃税者的钱财以及阻止西方国家政府对这一系统采取抵制行动的政治力量。从 1997 年开始，她把工作重心转向以离岸银行业务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近 10 年来她已在 www.thekomisarscoop.com 发表很多文章，但从未在其他地方发表。根据自己的调查，她现在正在写一本书，书名为《拿走钱和经营离岸业务》。

詹姆斯·马里奥特，艺术家、生态活动家、自然主义者，1983 年以来成为“平台”(PLATFORM) 的共同理事 (www.platformlondon.org)。作为“平台”的一分子，他为社会和生态正义从事多种学科的创建工作。1996 年以来，他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全球影响上。他与安德鲁·罗韦尔和罗恩·斯托克曼一起合著了《下一个海湾——伦敦、华盛顿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冲突》(Constable, 2005 年)。

格列格·穆特是 PLATFORM 的研究员，这是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研究环境问题和社会主义的组织。他的专长是对跨国石油公司的人权、发展和环境等方面施加影响。2003 年以来，他一直在监察并致力于揭露自 1972 年以来首次对西方公司开放伊拉克石油储备的秘密计划。穆特还研究和关注英国石油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道，包括与人合著的 2002 年出版的关于一些关于壳牌的萨哈林 II 石油项目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天然气项目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一些石油工业活动的《共同关注》。

约翰·珀金斯，通常写和教有关通过扩大个体意识和改造我们的体制来实现和平与繁荣的知识。他创办的替代能源公司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公用事业。1971 年到



1981年，他在国际咨询公司美因公司任职，他的职位是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与区域规划总经理——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杀手。此后他继续保持他的这一角色，直到“9·11”事件发生。这使得他愿意揭露他人生中黑暗和隐秘的一面。因此，《一个经济杀手的告白》(Berrett-Koehler, 2004)连续25周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名单上，并在世界各地已售出了超过50万册。

布鲁斯·里奇，是华盛顿的一位环保方面的资深律师。他致力于研究和提倡改革出口信贷机构，享受着意想不到的挑战的乐趣，他承认这是一项比较来说看似要求不高的同那些假想敌斗争的事业（见www.eca-watch.org）。他是《抵押地球》的作者（Beacon Press，波士顿；Earthscan，伦敦，1994年），其关于环境问题的揭露和世界银行的历史描述引起了从《纽约时报》到外交界的广泛赞誉。他还为众多的国际组织担任过顾问，已经多次在美国国会就美国参与国际金融机构问题作证，并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保成就500人大奖。他的最新著作《支撑世界——全球化战争与古印度最伟大皇帝的伦理革命》，将在2007年由Penguin India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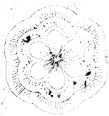
安德鲁·罗韦尔，一名已经在政治、环境和卫生出版方面工作了12年的调查记者，也是一位自由作家。其作品在《卫报》、《独立》、《乡村之声》和《生态学家》等出版物上发表。罗韦尔也和吸烟与健康行动、地球资源研究、地球之友、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泛美卫生组织、地下工程、交通与环境研究团体、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在行动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一道，承担一些尖锐的调查工作与行动，他的著作《绿色反弹——环境保护运动的全球颠覆》，1996年出版。他和詹姆斯·马里奥特、罗恩·斯托克曼合著了《下一个海湾——伦敦、华盛顿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冲突》（Constable，2005年）。他还为《Al Khaleej》的双月专栏写作，这是一份在海湾地区销量第二的报纸。他还是非盈利性公共利益调查公司的董事，该公司经营着“SpinWatch.org”和“NuclearSpin.org”两个网站。一位烟草公司的公关人员把罗韦尔描述为他们的“头号公敌”；而来自壳牌石油的人则会简单地：“哦，不，别再是他。”

致谢

作为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姊妹篇，本书应该归功于约翰·珀金斯颇有助益的启发和他睿智的建议以及——最重要的是——在面对并不那么仁慈的美国和它第一世界国家联盟的全球化帝国这一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时，他给我树立起来的榜样。我要感谢贝雷特-克勒出版公司的史蒂夫·皮耶尔桑蒂花费了数小时帮助我确定本书的框架；他对本书充满期待，自始至终给予本书良多指导。贝雷特-克勒出版公司的吉夫夫恩·西瓦苏布拉马尼亚姆也对本书倾注了大量时间，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从头至尾给予了很多帮助，贝雷特-克勒出版公司的全体成员是一支互帮互助、才华横溢的团队，跟他们一起工作简直是妙不可言，荣幸之至。

我要感谢马克·恩格勒、特德·纳斯、斯科特·斯泰因贝格、克丽思·蒂利和詹妮·威廉斯，他们从编辑的角度给本书的各章节以极富洞察力的评论。沃尔顿·贝洛、道格·亨伍德、乔·埃伦、格林·恺撒、波莉·派克斯和乔尔·罗卡莫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和分析报告。佩格·布斯、简·科尔曼、黛比·肯尼迪和戴维·克顿在给《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做宣传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还为本书花费了很多时间，贡献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同样要感谢西坡拉·柯林斯精湛的排版技术，汤姆·哈塞特的专业校对工作，以及斯图尔特·考利在绘图方面的诸多帮助。

我还要感谢启迪我心智的良师益友：布鲁斯·克拉克和乔·贝里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积极分子时就指引了我的发展道路，是我这么多年来极其高尚的同仁。塔里克·阿里、佩里·安德森、戴夫·亚历山大、罗宾·布莱克本、迈克·戴维斯、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马克思·埃尔鲍姆、迈克·马克斯、史蒂夫·汉弥尔顿、丽贝卡·索尼特、理查德·沃克在我构思各章主题时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此，我向艾里斯·马里恩·杨





(1946 ~ 2006) 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希望她对社会公平的清晰构想，对社会公平事业鞠躬尽瘁的榜样能赋予这些即将付梓的书页以生命。

没有我妻子迪尔德丽·海特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切中肯綮的建议和爱的支持，我这本书也是绝难面世的，在此，一并真诚致谢。

史蒂文·希亚特

旧金山

2006 年 12 月

附录

希望之源

Resources of Hope

《帝国金钱游戏》是约翰·珀金斯所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Berrett-Koehler, 2004）的姊妹篇，如果碰巧你最近还没有读过《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书，那么《帝国金钱游戏》将是你在这书系的前导者。本部分列示了主要的已引用资料来源——书、文章（很多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网址和电台节目——据此你可以获得本书所述问题的详细信息，了解更多发展的新动向，以利于对你所感兴趣的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 全球帝国和控制网络

塔里克·阿里，《正统派基督教的崩溃——宗教改革、圣战和现代化》。伦敦：Verso, 2002。更多信息请参见其网站：www.tariqali.org/。

安德鲁·J·巴切维奇，《美利坚帝国——美国外交的实质及后果》。剑桥，马萨诸塞州：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沃尔顿·贝洛，《统治的两难境地——美利坚帝国的崩坍》。纽约：Metropolitan, 2005。Metropolitan 关于美利坚帝国计划的一个极富价值的合订本可参阅 www.americanempireproject.com/。

沃尔顿·贝洛，希·坎宁安和比尔·若，《黑色成功——美国、结构性调整和全球贫困》，第二版。伦敦：TNI/Pluto Press, 1999。

威廉·布卢姆，《扼杀希望：自二战以来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干涉：2003年概览》。门罗，缅因州：Common Courage, 2003。



哈·乔·查,《为证明新自由主义下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和知识史是如何被改写的》。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诺阿姆·乔姆斯基,《霸权与生存——美国寻求全球统治》。纽约: Metropolitan, 2003。诺阿姆·乔姆斯基的网站: www.chomsky.info/。

史蒂夫·寇奥,《幽灵战争——从苏联入侵到2001年9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纪事》。纽约: Penguin, 2004。

迈克·戴维斯,《贫民窟的世界》。伦敦: Verso, 2006。

Dollars & sense,《真实的世界全球化》,第九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Dollars & sense, 2007。

杰夫·福克斯,《全球阶级战争——美国的两党精英们是怎样输掉了我们的未来的以及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来拯救未来》。霍波肯,纽约: John Wiley & Sons, 2006。

爱德华·弗布鲁克等编,《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手册》。伦敦: Anthem Press, 2004。经济学好像真实世界的结果,而不是真实世界的思想意识抑或原因。

爱德华多·加利罗,《拉美张开的血管——对一个大陆长达500年的掠夺》。纽约: Monthly Review, 1997。

皮特·高尔,《全球冒险——华盛顿对统治世界的浮士德式支持》。伦敦: Verso, 1999。

格列格·格兰廷,《帝国的世界工厂——拉美、美国和新帝国主义的风险》。纽约: Metropolitan, 2006。

邓肯·格林,《寂静的革命——拉美的市场经济风险和危机》,第二版。纽约: Monthly Review, 2003。

威廉·格雷德,《已经或尚未就绪的世界——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逻辑》。纽约: Simon & Schuster, 1998。

戴维·霍尔和罗宾·德·拉·莫迪,《教条式发展——六国的私有化和制约性》。格林威治,英国: PSIRU/War on Want, 2004。可见 www.waron-want.org/Dogmatic+Development+7540.twl。

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纽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亨利·海勒,《冷战和新帝国主义》。纽约: Monthly Review, 2006。

道格·亨伍德,《华尔街: 如何运作及为谁运作》。伦敦: Verso, 1999。

诺瑞娜·赫兹,《沉默的接管——全球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终结》。
纽约: HarperCollins, 2003。

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和共和政体的毁灭》。纽约: Metropolitan, 2004。

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所有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根源》。纽约: John Wiley & Sons, 2004。

斯蒂芬·金泽,《颠覆——美国从夏威夷统治转变到伊拉克统治的世纪》。纽约: Times Books, 2006。

迈克尔·克莱尔,《血液和石油——美国对石油进口的日益依赖所导致的危险及结果》。纽约: Metropolitan, 2004。

克里斯多夫·雷尼,《幻想的和平——1940 年至今美国的重大战略》。
纽约: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约翰·马德雷,《渴望贸易——穷国是如何为自由贸易交学费的》。伦敦: Zed, 2000。

曼宁·马拉博,《资本主义是怎样使黑色美国发展不足的》。波士顿: South End, 1999。

斯蒂芬·施勒辛格等,《苦果——美国对危地马拉策略的报道》,修订版。剑桥,麻省: 哈佛/拉美研究中心 (Harvard/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05。

范达娜·席瓦,《水战——私有化、污染和利润》。波士顿: South End, 1999。

鲍勃·萨特克里夫,《了解这个不公平世界的 100 种方式》。伦敦: Zed, 2002。

洛里·华莱士和帕特里克·伍德尔,《谁的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综合性手册》,第二版。纽约: New Press, 2002。

科尔内尔·威斯特,《民主主义的重要性——赢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纽约: Penguin, 2004。



埃伦·梅克森斯·伍德,《资本帝国》。伦敦: Verso, 2003。

《公司观察》(CorpWatch), www.corpwatch.org。通过教育、网络建设和行动主义与由公司支持的全球化作斗争。

在美国,有超过 500 个像帕希菲卡、美国全国公共电台和其他公共和社区电台每天都播出“现在就民主”节目及新闻节目,互联网上也有这些节目。“现在就民主”节目由艾米·古德曼和胡安·高扎莱兹主持,该节目包括世界各地独立记者和普通人的观点。节目时间安排和广播可查询网站: www.democracynow.org/。

《美金和意识》(Dollars & Sense), www.dollarsandsense.org。

全球化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www.ifg.org。提供了对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环境冲击的分析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的研究和教育机构。

《母亲琼斯》(Mother Jones), www.motherjones.com/。进步党双月刊版和在线杂志,以调查报告出名。

《新国际主义者》(New Internationalist), www.newint.org。最初由 Oxfam 资助,就全球公平问题面向国际主义者发行。因国际最佳新闻覆盖率而八次获得独立新闻奖。

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www.neweconomics.org。

《后孤僻经济学评论》(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www.paecon.net/PAEReview/index.htm。在线经济学刊物,针对数学模型在主流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排斥真实世界经济学行为这一现象而建(PAE 称作“孤僻经济学”)。与本书所讨论问题相关的很多主题在该网站上有文章做了清晰的阐述。

公共部门国际研究机构(PSIRU, www.psiru.org/)。PSIRU 调查了世界上公益服务的私有化。它的调查报告评估了这些计划的成效——比如,第一章所提到的供水体系的私有化。

《国家》(The Nation), www.thenation.com。周刊/在线发行;时事新闻和评论。电台版本,“广播国家”由劳拉·佛兰德斯主持,在美国空中广播可以接收到; www.lauraflanders.com/pages/radionation.html。TomPaine.



com; www.tompaine.com。公共事务时事分析和评论的在线期刊。

跨国学会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www.tni.org/index.htm。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研究机构, 由一群活跃的学者在 1974 年设立, 为民主和环境运动提供智力支持。诞生了一批高质量的针对全球问题的多视角分析报告。

世界发展运动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 www.wdm.org.uk。游说决策者改变政策, 研究以及提出正面的备选方案。是发展中国家民众运动的体系。

■ 黑金和离岸银行

雷蒙德·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黑金以及如何复兴自由市场体系》。纽约: John Wiley & Sons, 2005。

杰拉尔德·爱泼斯坦,《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和资本控制》。北安普敦, 马萨诸塞州: Edward Elgar, 2005。

杰拉尔德·爱泼斯坦编,《金融化和世界经济体》。北安普敦, 马萨诸塞州: Edward Elgar, 2006。

马克·汉普顿和詹森·艾伯特,《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港——全球资本的风险》。伦敦: Macmillan, 1999。

尼克·柯查,《洗衣机——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是怎样玷污美国的》。梅森, 俄亥俄州: Thomson, 2005。

奥斯汀·米切尔和普雷姆·西卡,《驯服公司》, 巴兹尔登, 英国: 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 2005。可从 <http://visar.csustan.edu/aaba/publications.html> 免费下载。

理查德·墨菲, 约翰·克瑞斯滕森和珍妮·可米斯,《如果你能, 就向美国征税》。伦敦: 税收公平连线 (TJN), 2005。可从 www.taxjustice.net/cms/front_content.php?idcat=30 免费下载。

普雷姆·西卡等,《避税港没有会计制度》。巴兹尔登, 英国: 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 2002。可免费下载自 <http://visar.csustan.edu/aaba/publications.html>。



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 (AABA), <http://aabaglobal.org>。出版《会计业务和公共利益》,是一份受同行业人士高度评价的免费刊物。参见 <http://visar.csustan.edu/aaba/aabajournalpage.html>。

布雷顿森林计划 (Bretton Wood Project)。1995 年由英国非政府组织创建, BWP 扮演着联系人、消息提供者和监督人的角色, 它详细审查并影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它的时事通讯《布雷顿森林时事》可参见网站: www.brettonwoodsproject.org/update/index.shtml。

离岸观察 (Offshore Watch)。搜索有关腐败和离岸事务信息的网址是 <http://visar.csustan.edu/aaba/jerseyage/html>。

税收公平连线 (Tax Justice Network), www.taxjustice.net/cms/front_content.php?idcat=2, www.taxjustice.net。该组织出版在线刊物《税收公平聚焦》, 订阅请联系 info@taxjustice.net。你还可以浏览 TJN 关于税收公平问题的博客, 该博客信息量很大, <http://taxjustice.blogspot.com/>。

英国税收研究 (Tax Research UK), www.taxresearch.org.uk/Blog。理查德·墨菲就逃税和公司责任问题以及在量化离岸网络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方面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了阐述。

■ 国际信贷商业银行

詹姆斯·云·亚当斯, 道格拉斯·法兰提斯, 《全方位服务的银行——BCCI 是怎样在全球窃取百亿美元的》。纽约: Simon & Schuster, 1992。

乔纳森·比蒂和 S·C·格温, 《无法无天的银行——对 BCCI 神秘实质的探究》, 纽约: Random House, 1993。

丹·布莱迪, 《坚固的三角——在卡莱尔集团的秘密世界里》。纽约: John Wiley & Sons, 2003。

亚历山大·库克本和杰弗瑞·圣·克莱尔, 《混沌不清——美国中央情报局、毒品和新闻机构》。伦敦: Verso, 1999。

阿尔弗雷德·W·麦科伊, 《海洛因的政治学——美国中央情报局涉嫌共谋全球毒品贸易》。布鲁克林, 纽约: Lawrence Hill, 1991。



马克·普特斯, 尼古拉斯·柯查和罗伯特·惠廷顿,《黑金——世界上最肮脏银行的内幕经历》。华盛顿: National Press Books, 1992。

皮特·戴尔·斯科特,《毒品、石油和战争——美国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和印度支那》。兰哈姆, 马里兰州: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彼得·特儒勒和拉里·格尔文,《欺诈性收益——BCCI 的内部经历, 世界上最腐败的金融帝国》。纽约: Houghton Mifflin, 1992。

克列格·安戈,《布什家族, 沙乌德家族: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统治集团的秘密联系》。纽约: Scribner, 2004。

克里委员会报告全文, www.fas.org/irp/congress/1992_rpt/bcci/。露西·科米萨的调查新闻: 科米萨独家新闻: www.thekomisarscoop.com/。

■ 刚果: 钶钽铁矿、内战和人权

马德琳·德里安,《暴利——公司为何和如何用武力来进行贸易》。吉尔福德, 康涅狄格州: Lyon's Press, 2004。

帕特里夏·菲尼编,《五年: 组合组织方针和国家联络中心回顾》, 阿姆斯特丹: OECD Watch, 2005。可参见 www.oecdwatch.org/。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黄金的诅咒: 九、国际性组织主动发起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开采的演说”。纽约: 人权观察, 2005。可参见 http://hrw.org/reports/2005/drc0505/12.htm#_Toc102992181。

德纳·蒙塔古,“被窃取的财产——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钶钽矿和冲突”。《SAIS 评论》(SAIS Review) 22, 第一期 (冬-春季, 2002)。

德纳·蒙塔古和弗莱德·贝里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商业战争”。《美金和意识》(7/8, 2001)。

查尔斯·欧拉拉,《卢旺达种族屠杀秘密》。巴黎: Dubois, 2002。

阿罗易斯·塔格拉, 米库露·索菲亚和多米尼亚·约翰逊,“钶钽矿现象——稀有矿产是如何改变诞生于战争中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基伍省的人民的生活的”。戈马, 刚果: 波尔研究所 (Pole Institute), 2002 年 1 月。可参见 www.pole-institute.org/documents/coltanglais02.pdf。



联合国。专家组关于非法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然资源及其他形式财富报告，2001。参见 www.un.org/Docs/sc/letters/2001/357e.pdf。

■ 尼日利亚、石油储备和雇佣军

黛博拉·阿万特，《权力市场——私有化证券的结果》。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克伦·兰，《社团战士——私有化军事生产部门的风险》。伊萨卡，纽约：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卡尔·迈尔，《陨落的朝代——尼日利亚的午夜》。纽约：Public Affairs，2000。

艾克·奥孔达和欧伦多·道格拉斯，《贪婪者饕餮之地——尼日尔三角洲的壳牌、人权和石油》。旧金山：Sierra Club，2001。

安德鲁·罗韦尔，詹姆斯·马里奥特和罗恩·斯托克曼，《下一个海湾——伦敦、华盛顿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冲突》。伦敦：Constable，2005。

肯·萨罗-维瓦，《一个月和一天的信件》。班伯里，英格兰：Ayeibia，2005；www.ayebia.uk。

国际石油变革组织（Oil Change International），<http://priceofoil.org/>。关于石油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的最新网址。

平台（PLATFORM），www.platformlondon.org/carbonweb/。提供与石油相关的资源及其他资源问题的信息，特别是对南半球石油矿藏的掠夺及其所导致的环境和经济问题的信息。

记住萨罗-维瓦网站：www.remembersarowiwa.com/。提供更多肯·萨罗-维瓦联盟和论点的信息。

旋转观察（Spin Watch）。www.spinwatch.org。英国监督机构，监督 PR 产业，提供公司操纵信息方面的资讯。

利益主体民主网络（Stakeholder Democracy Network），www.stakeholderdemocracy.org/main。提供三角洲的石油产业信息；与住在石油、天然气和采矿工厂周围的尼日利亚和几内亚海湾社团一起工作。



■ 伊拉克、PSA 和侵略

塞德·阿布瑞齐，《无情的友谊——西方和阿拉伯精英阶层》。纽约：St. Martin's Press, 2001。

塔里克·阿里，“伊拉克再殖民”，《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21（2003，5~6）。可参见 <http://newleftreview.org/A2447>。

阿巴斯·阿纳斯瓦奇，《伊拉克的重担：石油、制裁和发展滞后》。威斯特波特，康涅狄格州：Greenwood Press, 2002。

安东尼·阿努乌，《伊拉克：撤退的压力》。纽约：New Press, 2006。

诺阿姆·乔姆斯基和吉尔伯特·阿契卡，《危险的权力——中东和美国外交政策：对话恐怖行动、民主主义、战争和公平》。博尔得，科罗拉多州：Paradigm, 2006。

帕特里克·库克本，《侵略——伊拉克战争和反抗》。伦敦：Verso, 2006。

罗伯特·菲斯克，《争取文明的伟大战争——征服中东》。纽约：Knopf, 2005。

格列格·穆特，《赤裸裸的阴谋——鲸吞伊拉克的石油财富》。伦敦：PLATFORM, 2005。可参见 www.globalpolicy.org/security/oil/2005/crudedesigns.htm。

克里斯汀·帕兰梯，《自由——已沦陷的伊拉克的影像和幻觉》。纽约：New Press, 2004。

凯文·费利浦斯，《美国的神权统治——21 世纪激进宗教、石油和借款的危险和目的》。纽约：Viking, 2006。

依恩·拉特利奈，《狂爱石油——美国对能源安全不屈不挠的追求》。伦敦：I. B. Tauris, 2005。

马修·西蒙斯，《沙漠黄昏——无法逃脱的沙特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纽约：John Wiley & Sons, 2005。

丹尼尔·尤金，《战利品——对石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追逐》。纽约：Frec Press, 1993。



石油职工全体联盟 (General Union of Oil Employees), [www. basraoilunion. org](http://www.basraoilunion.org)。

聚焦入侵伊拉克 (Iraq Occupation Focus), [www. iraqoccupationfocus. org. uk/](http://www.iraqoccupationfocus.org.uk/)。网站提供入侵伊拉克的新闻和分析; 免费发布时事通讯。

■ 世界银行和腐败

凯瑟琳·高菲尔德,《幻想专家——世界银行和国家贫困》。纽约: Holt, 1996。

乔纳森·A·福克斯和L·戴维·布朗编,《责任之战——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和基层运动》。剑桥, 马萨诸塞州: MIT Press, 1998。

苏珊·乔治和法布吉欧·萨博利,《信仰和信誉——世界银行的不朽帝国》。博尔得, 科罗拉多州: Westview, 1994。

乔纳森·R·皮克斯, 和杰弗瑞·A·瑞特斯,《彻底改造世界银行》。依萨卡, 纽约: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纽约: Norton, 2003。

亚洲发展银行/经合组织亚太反腐倡议 (Asian Development Bank/OECD Anti - Corruption Initiative for Asia - Pacific)。出版时事通讯季刊, 刊登有关该地区反腐斗争的发展和即将采取的行动的信息, [www. oecd. org/corruption/asiapacific](http://www.oecd.org/corruption/asiapacific)。

伦理世界 (Ethics World)。提供商业道德、管理方法和腐败领域的新闻及发展情况, [www. ethicsworld. org](http://www.ethicsworld.org)。

《拒绝贿赂》(No Bribes)。由欧洲和欧亚大陆反腐通道 (Anti - Corruption Gateway for Europe and Eurasia) 发布时事通讯。为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反腐志士及分析人士链接主要的消息源, [www. nobribes. org](http://www.nobribes.org)。

《透明度和责任》(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时事通讯季刊, 聚焦拉美反腐活动。由美国国际开发署/透明度和反腐项目发起, [www. respondanet. com](http://www.respondanet.com)。



世界银行研究院 (World Bank Institute)。发布其管理事项和反腐活动的时事通讯, 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

▣ 菲律宾和世界银行发展方针

沃尔登·贝洛, 戴维·肯奈和伊莱恩·埃林森, 《发展崩溃——世界银行在菲律宾》。旧金山: 食品和发展政策学会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982。本书对世界银行从 1960 年代后期到 1982 年在菲律宾的政策和贷款所导致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破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沃尔登·贝洛和沙玛丽·戈塔尔, “一步步走向失败: 世界银行坚持一个破产了的发展模式”。《跨国公司监督》(Multinational Monitor) 26 (2005 年 7 月)。

沃尔登·贝洛, 玛丽·卢·玛丽格, 马里萨·德·古茨曼和赫尔伯特·多森纳, 《反发展国家——菲律宾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危机》。伦敦: Zed, 2006。

凯文·达纳哈, 《废止 IMF 和世界银行的 10 个理由》, 第二版。纽约: Seven Stories, 2004。

凯文·达纳哈编, 《55 年已经足够——反对世界银行和 IMF 的理由》。波士顿: South End, 1994。

道格·亨伍德, 《后新经济》。纽约: New Press, 2003。

理查德·比特, 《邪恶三组织——IMF、世界银行和 WTO》。伦敦: Zed, 2003。

纳奎·伍德茨, 《全球化者: IMF、世界银行和他们的借款者》。依萨卡, 纽约: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经济改革行动 (AER)。1996 年建立, AER 是一个独立的公共利益组织, 从事针对主要经济问题的政策分析和倡议。相关信息请参阅 AER 的网站, www.aer.ph。

菲律宾公民行动党 (Akbayan Citizen Action Party)。于 1998 年发起, 是基于社会运动和计划而非面向个人的先进政党。它在菲律宾国会有 3 个席



位，在很多省也有深厚的根基。它的目标是督促政府实行再分配改革，提供更多的基础服务设施和构建安全体系。参见 www.akbayan.org。

聚焦南半球（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是1995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其成员来自泰国、菲律宾和印度。该组织联合了政策研究、倡议者和基层力量以对与公司领导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有关的国家和国际政策的进行批判性分析并鼓励展开辩论。

左翼商业观察员（Left Business Observer）。道格·亨伍德的时事通讯，专注于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金融市场、收入分配和贫困，金融和生产的全球化，第三世界债务和发展，世界银行和IMF。亨伍德在纽约市的WBAI电台还有一个电台秀。见LBO网站：www.leftbusinessobserver.com。

菲律宾调查新闻业中心（PCIJ）。PCIJ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中介机构，专注于对菲律宾社会的时事问题进行调查报道。它的文章活泼而辛辣，www.pcih.org。

美国绿色企业合作组织（Co-op American）。如果想找非血汗工厂生产的衣服、家庭和办公室物品，公平交易的咖啡、巧克力和更多其他的商品，请加入美国绿色企业合作组织，全国绿色主页：www.coopamerica.org，或者拨打电话800-58-GREEN。

■ 出口信贷机构

《雅加达宣言》（The Jakarta Declaration）。来自47个国家的347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对滥用出口信贷机构贷款这一现象进行改革：参见 www.eca-watch.org/goals.jakartadec.html。在环境保护网站上也保存了很多其他与ECA有关的文章和信件：www.environmentaldefense.org/documents/2495_ECAArticles.htm。

皮特·博斯哈德等，“大型水坝的特洛伊木马——出口信贷机构是怎样在环境保护的伪装下为破坏性项目提供新补助的”。巴黎：ECA Watch，2005。参见 www.eca-watch.org/problems/fora/oecd/ECAW_reportondams_2sept05.pdf。



亚伦·戈德茨玛，“比世界银行更糟？出口信贷机构——全球化的秘密引擎”。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州：食品和发展政策学会，2003。参见 www.foodfirst.org/pubs/backgrdrs/2003/w03v9n1.html。

亚伦·戈德茨玛，“全球化的最违背意愿的秘密：出口信贷机构和投资保险机构的角色”。在会议“在新自由主义之后：为穷人设计的经济政策”所呈交的报告，华盛顿，2002年5月。可参见 www.environmentaldefense.org/documents/2487_Globalizations_Secret.pdf。

布鲁斯·瑞兹，克瑞娜·豪塔和亚伦·戈德茨玛，“非洲：因天然生产业、腐败和冲突而负债”。华盛顿：Environmental Defense，2000；www.environmentaldefense.org/documents/638_ACF666.pdf。

华盛顿的世界资源学会（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在 ECAs 上发布了一些信息量很大的文章。参见 http://google.wri.org/search?site=WRI_Website&output=xml_no_dtd&client=WRI_Website&proxystylesheet=WRI_Website&q=export+credit+agencies&imageField.x=18&imageField.y=8。

Corner House。出版了一些 ECA 的综合性背景资料报告，特别是有关腐败调查的。见 www.thecornerhouse.org.uk/subject/aid。

ECA 观察（ECA Watch）。是倡导对出口信贷机构进行改革的国际运动的保护伞。链接了所有重要的 ECA 网站以及发对 ECA 运动的重要团体的网站；还有按地区、国家和企业来标示的重要活动的网站；有大量的文章和参考书目；还有对最新进展的更新信息。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专门参考网站，www.eca-watch.org。

环境保护国际计划（Environmental Defense International Program）。从事旨在促进 ECA 改革的研究和倡议，www.environmentaldefense.org/programs.cfm。

太平洋环境（Pacific Environment）。在俄罗斯从事促进与保护环境责任有关的融资。参见 www.pacificenvironment.org/articl.php?list。

国际河网（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该组织对由 ECA 提供贷款的水坝项目进行范围广泛的研究。见 www.irn.org/。

国际探索组织（Probe International）。对加拿大的海外援助和贸易所带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进行曝光，包括加拿大的出口发展公司，



www.probeinternational.org/pi/index.cfm?DSP=home。

■ 债务和债务豁免

帕特丽夏·亚当斯,《可恶的债务——无意义贷款、腐败和第三世界的环境遗产》。多伦多:能源探索研究(Energy Probe Research),1991。

苏珊·乔治,《债务的反作用——第三世界的债务是怎样损害美国的》。伦敦:TNL/Pluto Press,1992。

S·C·格温,《货币交易》。纽约: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6。

詹姆斯·S·亨利,《Banqueros y Lavadolores》。波哥大:Tercer Mundo Editores,1996。

詹姆斯·S·亨利,《血淋淋的银行家——全球地下经济报告》。纽约:Avalon/Four Wall Eight Windows,2003,2005。

詹姆斯·S·亨利,《海盗银行家》。纽约:Avalon,2007。

诺瑞娜·赫兹,《债务威胁——债务是怎样毁灭发展中世界的》。纽约:Harper Collins,2005。

史蒂夫·曼德尔,“可恶的借款——债务豁免好似重要的道德风气”。伦敦:新经济学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2006。可参见 www.neweconomics.org/gen/uploads/v3gdvw45bfibyn55gy1fwr4514092006174700.pdf。

可恶的债务网站(Odious Debts Web Site)。报道债务问题,涵盖有关腐败的观点和非法债务应该被豁免的法律先例, www.odiousdebts.org/odiousdebts/index.cfm?DSP=subcontent&AreaID=1。

债务大赦组织南方分部(JubileeSouth), www.jubileesouth.org。

大赦美国网络(Jubilee USA Network)。该组织是由75个宗教社团,环境、劳工、人权和社区团体组成的一个联盟。通过该组织,你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在世界银行委员会成员的周年庆典前联系他们,参加倡议日活动,联系你所在地区的其他联盟成员。

潜水市场网站(SubmergingMarkets.com), www.submergingmarkets.com。追踪发展和债务的全球危机;包括詹姆斯·S·亨利和其他调查者的新闻报道



和评论。

■ 抵抗势力之网

塔里克·阿里，《加勒比海盗——希望之轴》。伦敦：Verso，2006。

加尔·阿沛洛维茨，《资本主义下的美国——挽救我们的财富、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纽约：John Wiley & Sons，2004。

贝拉·巴拉尼亚，博瑞德·布伦南，奥利维尔·霍德曼，萨特寇·基什穆特和菲利浦·塔霍斯，《挽救我们的公共水资源——世界范围的成果、斗争和梦想》，第二版。阿姆斯特丹：跨国学会和公司欧洲观测台（Transnational Institute and Corporate Europe Observatory），2005年3月。

沃尔登·贝约，《反对全球化——新世界经济体梦想》。伦敦：Zed，2004。

马吉·布莱克，《国际发展纪实性指南》，伦敦：Verso/New Internationalist，2004。

杰里米·布雷彻和提姆·科斯泰洛，《地球村还是全球掠夺——自下而上的经济重建》。波士顿：South End，1998。

哈·乔·查，艾琳·格莱博，《挽救发展——备选经济政策指南》。伦敦：Zed，2004。

马克·恩格勒，“充满期待的运动”。《外交政策焦点》（*Foreign Policy in Focus*），2005年5月19日。

南希·福布尔，《无形的中心——经济学和家庭价值》。纽约：New Press，2001。

苏珊·乔治，《另一个世界是有可能的，如果……》。伦敦：Verso，2004。

黑兹尔·亨德森，《超越全球化——塑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体》。布卢姆菲尔德，康涅狄格州：Kumarian Press，1999。

黑兹尔·亨德森，《道德市场——日益增长的绿色经济》。怀特河流域，佛蒙特州：Chelsea Green，2007。更多著作请参见其网站：www.hazelhenderson.com/。

安东尼娅·尤哈斯，《布什议程——侵略世界，一个时代的经济》。纽约：Regan Books/Harper Collins，2006。参见其网站：www.TheBushAgenda.net。



多特·金特,《全球经济体系和势力范围的南-南策略选择》。阿姆斯特丹:跨国学会(Transnational Institute),2006年10月;参见 www.tni.org/pubs/index.htm。

戴维·克顿,《后企业时代——资本主义后的生活》。旧金山:Berrett - Koehler, 1999。

戴维·克顿,《大转变:从帝国到地球社区》。旧金山:Berrett - Koehler, 2006。

弗朗西丝·摩尔·拉皮,《民主主义的优势——下决心通过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入民主主义以拯救我们的国家》。旧金山:Jossey - Bass, 2006。另见小星球协会(Small Planet Institute)网站: www.smallplanetinstitute.org/。

琼斯·克瑞·雷特,《世界社交论坛——抵抗策略》。芝加哥:Haymarket Books, 2005。

亚瑟·迈克埃文,《新自由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经济策略、市场和21世纪的备择对象》。伦敦:Zed, 2000。

杰里·曼德和德比·贝克编,安东尼娅·尤哈斯,主研究员和项目协调者。“全球化帮助穷人了吗?”专题报告,《全球化国际论坛公报》1,第三期(2001年8月)。

杰里·曼德和约翰·卡瓦那编,安东尼娅·尤哈斯,投稿作家,《经济全球化的备选方案——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第二版。旧金山:Berrett - Koehler, 2004。

维查·普拉萨德,特欧·巴尔维编,《在拉美被扼杀——反新自由主义前线》。波士顿:South End, 2006。

戴维·兰塞姆,《公平贸易的纪实性指南》。伦敦:Verso/New Internationalist, 2004。一本公平贸易/公平贸易辩论的要点指南。

博阿文图拉·德·苏泽·桑托斯,《全球左翼势力的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和Beyond》。伦敦:Zed, 2006。

约翰·索尔,《下一次解放运动——南非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纽约:Monthly Review Press, 2005。

戴维·施维卡特,《资本主义后时代》。兰哈姆,马里兰州:Rowman &



Littlefield, 2002。另参见团结经济体网站：www.solidarityeconomy.net/；阐述这些观点的一个短评可参见 <http://homepages.luc.edu/~dschwei/economicdemocracy.htm>。

阿马蒂亚·森，《发展与自由》。纽约：Anchor, 2000。

瓦德纳·斯瓦，《地球民主主义——公平、可持续性和和平》。波士顿：South End, 2005。

戴维·索尼特编，《让解放运动涌动全球——如何根除现有体制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旧金山：City Lights, 2004。

贝丽卡·索尼特，《黑暗中的希望——未讲述的历史，异想天开的可能性》。纽约：National Books, 2004。

威廉·K·塔博，《非道德范畴的大象——21 世纪的全球化和争取社会公平的斗争》。纽约：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洛里·沃勒克和黛博拉·詹姆斯，“为何世贸组织回合谈判会崩溃”，《共同梦想》，2006 年 4 月 14 日。另见全球公民项目贸易观察（Public Citizen project Global Trade Watch），www.citizen.org/rade/。劳瑞·瓦拉茨任负责人。

食物第一/食品和发展政策学会（Food First/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与其他社会变革运动合作，共同研究及发起运动，寻找导致饥饿、贫困和生态退化的根由，www.foodfirst.org/。

全球交流（Global Exchange）。成员制国际人权组织，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公平事业，www.globalexchange.org/index.html。

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加拿大发展、环境、人权、劳工和以宗教为基础的组织的联盟，立志于对世界银行、IMF 和出口信贷机构的改革，www.halifaxinitiative.org/。

积极未来网络（PFN）。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支持人们积极参与创造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和富有同情心的世界的行动。它享有盛名的刊物《YES！积极未来期刊》，关注世界范围内社团的基层革新，www.yesmagazine.org。

社会公民（Public Citizen）。全国性非营利和倡议机构，www.citizen.org/about/。



第三世界网络 (Third World Network)。由从事与发展、第三世界和南北问题相关问题研究的组织和个人组成的国际机构。是众多书刊、研究论文的荟萃之地, www.twinside.org.sg/twnintro.htm。

战争时代 (War Times/Tiempo de Guerras)。网站刊物服务于美国反战运动, www.war-times.org/。

Z 网站 (Znet)。与《Z 杂志》(Z Magazine) 相联系的网站。汇聚多方面信息, www.zmag.org/intro_to_znet.htm。

帝国金钱游戏

A GAME AS OLD AS EMPIRE

众多国际经济人物首度解密全球化浪潮背后的利益规则！

一场仍在全球进行着的残酷游戏

约翰·珀金斯在他的全球畅销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写道：“经济杀手是收入颇高的专业人士，他们从全球各国骗走了数万亿美元。他们从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对外援助机构那儿挪走资金，放入大型跨国公司的保险箱和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少数家族的口袋中。他们使用的工具有虚假金融报告、非法操纵选举、贿赂、勒索、美人计和暗杀。他们玩的是一场与帝国同生的古老游戏，但在全球化时期却以新的面目和可怖的情形再现。”

约翰·珀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暴露了这个令人震惊的隐秘世界，但他作为一名经济杀手的个人生涯纪实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如今，其他的经济杀手、金融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记者和侦探家也加入进来，共同揭露更多让人触目惊心的关于贪婪的国际腐败的过程以及相关的黑暗金钱游戏。通过抓住细节，他们描述了跨国公司、政府、权力大腕、金融机构和准政府代理机构，在“外国援助”和“国际发展”这些冠冕堂皇的幌子下，如何使自己致富的阴谋和诡计——得逞。

“虽然我很早就知道全球金融机构存在腐败，但我还是为《帝国金钱游戏》中内部知情人士所描述的经历惊得目瞪口呆。数亿生命和地球自身已岌岌可危，这本书为彻底的政治动员以结束有悖人性的犯罪打下了基础。购买它、阅读它、动员起来，将相关内容抄录下来寄送给你最喜欢的脱口秀主持人、网友和你所信任的议员吧。”

——戴维·克顿

《当公司统治世界》和《大转变：从帝国到地球社区》的作者

“关于给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华盛顿共识’被贪婪、自负、权力和傲慢所腐蚀这一事实，又有了更充分的证据可用来证明。”

——黑兹尔·亨德森

《道德市场——日益增长的绿色经济》的作者

“这本书将给‘华盛顿共识’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一个增加了全球经济不平等、阻扰民主规则、破坏环境的经济模式。这些内部知情人士的记录，埋葬了人们认为跨国银行和公司能够给贫困国家带来‘发展’的天真幻想。”

——凯文·达纳哈

“全球交流”的共同创建人

ISBN 978-7-80170-639-3



9 787801 706393 >

ISBN 978-7-80170-639-3/F · 137

定价：38.00元